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李达军事文选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序 言

在《李达军事文选》即将出版之际，让我写几句话，我是很乐意承担的。我认为，这本文选总结了历史经验，为我军建设又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李达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担任过各种重要的领导工作，他建树的革命业绩是多方面的，但人们往往用“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来概括李达同志的特殊贡献。我想，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大部分经历都离不开“参谋长”的岗位：在红军中担任过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12月接替倪志亮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尽管他还先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兼任过云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和国家体委的副主任等等，但给人的印象最深、时间最久的仍是一个“老参谋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人们说李达同志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还因为他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李达同志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军事家直接领导下前后工作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军事斗争十分严峻复杂、我军战略战术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的年代。作为参谋长，在刘邓指挥的许多大小战役中几乎都倾注着李达同志的心血。也正是作为刘、邓的参谋长，他在自己著述里的很多方面反映了刘、邓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辩证法。这也是本书所收的文章的价值所在。我同李达同志自在援西军、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建立以后就接触越来越多，他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身上最突出的是政治强和业务精。他事事按党的政策办事，吃苦在前，不计名利，严以律己，处事公正求实，深受同志们的敬重。他热爱本职工作，善于接受新事物，精通业务，特别是做到知己知彼，能及时向领导提供可选择的方案，深为刘、邓所器重。我以为，像李达同志这样的好领导、好党员、好干部，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其它各条战线上，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今天新的长征路上，都是广大干部的好榜样！我相信，这本内容丰富的文选必将对广大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产生积极的良好影响。

宋任窮

李达军事文选

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

1934年盛夏时节，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于7月23日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红六军团当时共有9700余人，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8月7日，我们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艰辛的西征之路。12日，我们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并由任弼时宣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委。但是，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且非常准确。我很奇本篇是李达同志1979年为纪念贺龙同志逝世10周年而作，后经修改充实，发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红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直到9月26日，朱德同志给“任、萧、王”发来“火急”电，我们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行动目标。电报说：“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恩南、印江、清江并向石呷方向前进。”并确定我们的路线：“由现地域或经清江、青溪、恩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依据这一指示，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部队，与追堵我军的湘军、桂军巧妙周旋，且战且走，途经湖南、广西，进入贵州。10月3日，军委电示任、萧、王：“桂敌现向南开动”，“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来电令，迅向江口前进。”4日，军委又电：“黔敌柏辉章师现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我贺部追击，其兵力正形分散。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并相机攻击堵敌部队。”为执行军委上述指示，军团首长命我带领由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担任前导任务。我们6日进至石阡地区，7日继续行军至甘溪，与桂军廖磊所部第十九师遭遇。原来，桂敌并未“南下”，而是一直在追踪，当发现我们之后，突然抄后路，切断了我们与主力的联系。由于当时我们以为桂敌已经南撤，只顾向江口急进，和红二军团会合，所以没有和桂军作战的思想准备。加之，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事先也没

有得到情报，待发现桂敌的前卫部队时，已经深入湘、桂、黔 3 省敌军 24 个团的重兵包围之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指挥先头部队与敌军奋力苦战，坚持到黄昏之后，我带着机枪连冲出敌围。其余部队也相继冲了出来。我清理了人数，只剩下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的两个团部和机枪连，总共 400 人左右。许多同志在突围中失散了。我们从一个叫作大地方的镇子，钻进了山沟。所幸这一带林深草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我们同敌人周旋了两昼夜，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我们与军团首长失掉了联系，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和第四十九团政委晏福生、第五十一团团团长苏杰等同志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折回去寻找主力部队（主力也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则很可能在途中重陷敌围，亦有被歼危险。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寻找红二军团，而据当地老乡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距江口、印江只有三五日行程。如果我们能很快找到红二军团，请求贺龙同志派部队接应红六军团主力，比我们这 400 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于是，我们在无法与军团首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先寻找贺龙同志。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人临时编成了 1 个先遣支队，直奔北方。10 日到江口时，没有发现红二军团的踪迹。于是，11 日经德旺，12 日沿梵净山西麓继续寻找。在甘龙口附近，我们听老乡说，这一带常有部队活动，既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像土匪。对于梵净山，我是早闻其名的。它位于江口县北、印江县东，海拔近 2500 米，山势奇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是历史上土匪出没较多的地方。为不致弄错，我又找了些老乡，仔细地询问了一下。从他们提供的零星情况来看，在梵净山西北一带，很可能有红军活动。10 月 15 日，我们又进一步打听到，在沿河县一个叫枫香溪的镇子附近确有红军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忘记了连日的辛劳，恨不能立刻见到他们。我重新整理了部队，就直奔枫香溪。经过来安营，又走了大约半天的路程，就看见一座小山头，上面有部队在活动，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由于我们红六军团穿的是制式军装，事先又未联系，他们误以为是黔军又来搜山，就作出了戒备行动。为避免发生误会，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我观察对面山上这些老乡打扮的部队实施戒备动作时，很像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所以断定他们就是红二军团的部队。于是，我就派人向他们喊话：“我们是红六军团，从根据地出发，来找你们会师的。不要误

会——”“你们是红二军团吗？我们是来找贺龙总指挥的——”喊了一阵，对面山上派人来跟我们接头。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垫着文件包，匆匆写就一封信：“贺总指挥：我们是红六军团，奉军委命令，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前来寻找红二军团会合的。我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面，希望同您会面。”我将信折好，交给来人。他们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对于贺龙同志，我虽久仰其名，但从未见过面。他是否知道中央派红六军团来会合，我也拿不准。如果接不上头，或者虽然接上了头，但不能马上派援兵，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对得住正率部队浴血苦战的任、萧、王首长呢？我正想着，忽见山上下来几个人，朝我疾步走来。最前边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脚踏草鞋，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深灰色的衣服。他走到我跟前，笑着伸过手来，我迎了上去。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他拽着身旁一位瘦削而精干的中年人，说：“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关政委也热情地同我握手，并亲切地说：“李达同志你们

辛苦了！弼时同志来了吗？”我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贺龙、关向应同志听罢，立时紧锁双眉。贺龙对我说：“李参谋长，你先把队伍带上山休息。”“我还是先向您汇报部队被围的情况吧。”于是，我边上山，边向贺、关首长汇报了红六军团寻找他们的经过，特别将我们在甘溪遭到敌军袭击的情况，详细地讲了一遍。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为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红六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一块儿了。”我说：“贺总，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贺龙爽快地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他用力一挥右臂，对部队说：“明天就出发，接应六军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他那平易近人、豁然大度，在危难之时毫不迟疑地援救兄弟部队的豪爽气概，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还萦绕在眼前。

二

第二天一早，贺、关率领部队，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我们这支先遣队仍然担任前导。途中，我们了解到红六军团主力已经摆脱敌人，朝梵净山方向去了。我们又折回来，大约转了一两天的样子，在梵净山西南发现一支部队，经用军号联系，原来是郭鹏、彭栋材同志率领的第五十团。我给他们介绍了贺、关首长，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第五十团的同志们争着同贺、关首长握手。许多同志拥抱着在一起，不知说什么好……。郭鹏、彭栋材同志说，他们团同主力失去联络后，既无地图，也不知道红二军团的位置，转了好几天，偶然从一个破纸堆里翻出半张旧报纸，上面登着贺龙所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向蠢动”的简短消息，这才有了具体目标，一路找来，果然同你们相遇。我们稍事休息，便一同沿梵净山西麓向北继续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大概又转了一两天，终于10月24日在木黄找到了他们。两个军团的同志虽然以前多不相识，见了面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握手，拥抱，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小鬼们手拉着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我陪着贺、关和任、萧、王首长亲切交谈。贺龙特别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因为电台坏了同中央断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的具体位置。这下可找到你们了。看见你们安全脱险，我也就放心了。你们来自井冈山，来自毛泽东身边，可要好好给我们介绍经验哪！”接着他和关政委关切地询问了红六军团脱险经过。王震政委见了我，百感交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任、萧、王首长经过十几个昼夜的辗转奔波，疲劳过度，特别是任弼时和萧克同志已经走不动路了。贺总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行军。在行军途中，王政委跟我说，10月7日在甘溪时，被敌人截成了三段。他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高山临时开路，行军一昼夜，到达包溪。我第十八师和敌军打了半天。他们走到路腊，又遇到敌人，我尖兵缴了敌人6支驳壳枪，主力仍在高山与敌人对峙。这时，已经减员六七百人。到了12日，为了避免被敌人追击，行动方便，他们将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烧掉了不必要的行李。经过施秉附近时，又被桂敌追了20余里。10月15日，他们向板桥前进，准备渡石阡河。但敌李觉部已先到板桥堵击。他们避开敌人，又折返甘溪，第五十二团在龙塘被敌截断，又退至白沙方向。17日晨，他们到达甘溪。午后，强行通过了敌军在石阡、镇远

设置的封锁线。这样，经 10 余天转战，终于摆脱了敌军，在印江县的木黄同我们相遇。弼时同志身患痢疾，还手拄木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行军。听了这些，我非常感动。回想起甘溪遭遇战，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红六军团被桂、湘、黔 3 省联军重兵包围分割，仍能各自为战，杀出一条血路，同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这是与任、萧、王首长平日对部队的培养、训练，和临战时的机智指挥分不开的。后来，我曾读到两份敌军总结为何未能追上和消灭红军，是因为这个部队确有一些“长处”，“如服从命令，拥护首领，完成任务，动作迅速”，“比如遇到国军，该部因避战之故，马上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不见了”，“该部对于其主义，信仰极深，故拥护首领，甘心效死疆场。”另一份则是白崇禧对桂系十五军的训话。他说红六军团的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心。”至于桂军为何没有追上红六军团，他认为这是由于桂军存在四条“短处”：“第一行军弱，有些官兵不能走路……这次追赶萧克，暴露了这种弱点；第二是有少数的官兵胆小，借故落伍，不肯上前；第三是后方勤务不好，行动不敏捷；第四是通讯不灵”。红军的长处，当然不止于此。但从敌人公认的这几点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部队在西征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奋战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当然，我们的胜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失是很大的。先烈们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鞭策我们幸存者更加谨慎、周密，更加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去战斗。

10 月 25 日，红二、六军团在向南腰界转移途中，任弼时、夏曦、贺龙等首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商定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于当天电呈军委说：

“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 800 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 3 [个] 团，总数约 3000；二军团为七、九两师，总数约 3200，精良充足，但子弹缺乏。

“任与夏、贺商议，二军团以下七、九两师编成 3 个团，独立师编 1 个团，共 4 个团；六军团暂编 3 [个] 团。两个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萧随二军团，夏、王、李随十七师。

“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向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 [2] 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贺总和关政委对六军团非常关心，多次指示二军团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照顾好六军团，保障好六军团。二军团的指战员，按照贺、关首长的指示，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筹粮、送肉、送盐，组织人上山选割细软的茅草，给我们当铺草；给我们营以上干部配备了乘马，还拨给我们七八挺轻机枪。这些无私的援助，感人至深。

10 月 26 日，二、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标志着两个军团胜利地结合在一起。

三

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说二军团，由于夏曦同志盲目地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在部队中搞肃反扩大化，屈杀了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甚至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 [3]；在军事上，亦曾犯过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使部队和根据地受到了很

大损失。二军团的电台坏了以后，同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中央对二军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夏曦当时的职务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又一直不承认他的政治错误，以贺龙、关向应的身份，是不能左右夏曦的。六军团出发前，任弼时同志即已受命于中央，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前往解决二军团的问题。

再说六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中途几遭敌军重兵的追、堵、截、围，部队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只剩下3000人左右，其中还有300多伤病员。会师前，为了轻装，连行李都烧掉了。因此，我们亟需休整、补充。

正如贺龙同志所说，“我们二、六军团两个军团会师以前都是多灾多难的，肃反都扩大化，干部损失最大。所以，两军都希望会师。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如果没有（黔东）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丢光了，很狼狈。”

但是，由于军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上述情况，于10月26日急电“任、萧、王”：“一，二、六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二、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六军团所携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个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

二、六军团首长，包括夏曦在内，接此电今后，都认为二、六两军团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分开行动的，因此不同意分开。为让中央及军委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先于27日汇报了夏曦在二军团（即红三军）所犯的严重错误：“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把]9/10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最近到白区配合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苏区缩小到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人口3万余人；20个区缩小到12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3000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由于夏曦同志“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军委会的主席，萧、任副之。”第二天，“夏贺关任萧王”又电呈军委，详细申述了两个军团需要统一行动的理由：“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记得这样反复了几次，军委才同意二、六军团共同行动，调夏曦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关于二军团的政治路线问题，由于贺龙、关向应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夏曦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得到纠正，并于6月中旬恢复了党团组织。只是党团员敢于站出来登记的还不多。弼时同志到二军团了解情况后，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促进了二军团的政治生活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两个军团会合后，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统一指挥二、六军团。贺龙对六军团是非常尊重的。他曾带着二军团的一部分干部到六军团来学习，诚恳地对萧克和王震同志说，你们军团来自中央根据地，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普遍比较高。二军团的干部，大部分在肃反中被错杀了。新提起

来的干部，特别是营团级干部，素质差，经验少。希望六军团能支援二军团一批干部。萧克、王震同志欣然同意，立即选调了一批同志到二军团工作。如甘泗淇、方理明、张平化、袁任远、余秋里、朱辉照、洗恒汉等同志就是这时调到二军团的。萧、王首长对二军团的能征善战也十分钦佩，要求贺龙、关向应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六军团工作。贺龙同志还请弼时同志给二军团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介绍中央红军反“围剿”和土地革命的经验。贺总听说我懂得一点儿军事训练和参谋业务，也曾经让我给二军团的干部讲课和做示范动作，还叮嘱我帮助二军团司令部搞好业务建设。不久，又调我担任二军团参谋长。这样一来，二、六军团就融合在一起了。大家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一般，无形中增加了几倍的力量。贺龙同志说：“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个会师的模范。”为策应长征，我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敌人发动了攻势，在运动中歼敌数千，相继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地，于11月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任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贺龙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又于1935年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9日，两军团主力由桑植出发，又走上了伟大长征的新阶段。注 释〔1〕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简称“中革军委”。〔2〕乾、松、凤地区，指地处湘黔边界的湖南省乾城县（1953年改名为吉首县），贵州省松桃县（1956年与铜仁、江口两县部分地区合并为松桃苗族自治县），湖南省凤凰县。〔3〕1933年3月24日，夏曦以“改造党不能依靠旧的干部”为由，不顾许多同志的反对，作出了解散湘鄂西地方和军队中党、团组织的决定，红二军团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取消。誓师抗日东渡黄河

三原誓师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触发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地区，整装待命。我们援西军〔1〕此时正驻在甘肃省镇原县的屯子镇地区。接到命令后，8月7日，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同志率领，从屯子镇出发，路经甘肃省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陕西省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颁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以后又称第十八集团军），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3个师。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于当天发表了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通电。我们援西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同志任师长、徐向前同志任副师长，张浩同志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同志为副主任，倪志亮同志任参谋长。当时，我担任参谋处长。这篇文章是李达同志1980年应《刘伯承回忆录》的编者之约而作，该书198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援西军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罗炳辉同志领导的一支队伍）组成。改编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编为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团、第七七团；红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第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

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还有一部分干部编成了教导团。全师共 13000 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第三八五旅除第七六九团外，连同师属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脱离本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的，计有 9160 余人。部队整编完毕，准备 9 月 6 日召开全师指战员奔赴抗日战场誓师大会。徐向前副师长和倪志亮参谋长尚在延安，此时还未到职。刘师长和张浩同志指定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担任誓师大会的总指挥，要我协助他工作。刘师长特别嘱咐我们说，这是我们一二九师第一次阅兵，也是我们开赴前线抗日的第一次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一点，但要庄严；主要是把部队组织好，要造成抗日救国、杀敌立功，为挽救祖国的危亡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气氛。我们选定了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按陕西的习惯，叫作“休闲地”。这片小“广场”面积不小，是作会场的理想地方。按照刘师长的指示，我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我组织师直属队的一些同志搭检阅台。这检阅台很简单：先用四根木桩埋到地里，然后在上面架上几块木板。在这个简单的检阅台的四根立柱上，又贴上了几条标语，烘托着会场的气氛。6 日清晨，我们刚刚通知各部队到会场集合，天空中乌云密集，随着阵风，零零星星地下起雨点来。看样子，这雨是要越下越大。这时，驻地离会场近的部队已经到了。陈赓同志和我看雨暂时停不了，就商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再请示刘师长可否将誓师大会改期举行。说罢，我们便上了马分头通知已经进入会场的部队。刚好，刘师长和张浩主任骑着马到会场来，和我们走了个迎面。他们没有穿雨衣，身上都淋湿了。一见面，刘师长就问我们：“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我们回答。“不行！”刘师长干脆而又坚决地说，“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定了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出师抗日的誓师大会，更不能改，要按时举行！”“是！”陈赓同志和我马上按照刘师长的指示，又分头去追赶往回走的部队……刘师长这一年 45 岁了。这个年纪虽然并不算大，但在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人看来，他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川军中的一员名将，以带兵严格、骁勇善战著称。从他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时起，多年担任红军参谋长之职，1928 年到 1930 年，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研读军事学。他性格坚毅，对部下要求很严。他平时总是讲，作为一个军人，就要风雨无阻，有一股无往而不胜的气概。尽管我们早就了解这一点，但这一回我们的体会却更为深刻。这次雨中誓师，场面庄严、壮丽。近万人的队伍，分列在检阅台的四周，队伍又长又宽，摆了方圆四、五里，一眼望不到头。那时还没有什么军乐队，我们就把号兵集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军乐队”。雨果然越下越大，到临开会时，已经是倾盆而泻了。师首长们在大雨中泰然自若地站在检阅台上，宛如一株株挺拔的松树。首长的以身作则，感染着全师将士。全师指战员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在雨中，秩序井然，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红光。干部、战士一个个英姿焕发，等待着师首长检阅。陈赓旅长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刘师长讲话。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就是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后，我军从上至下，都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标记。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换帽子和帽徽。这对于红军广大干部战士来说，可谓一大转变，一时很难接受。有些战士听说要换帽子，心里非常憋气，在睡梦中还常常哭醒。不少同志说：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却戴上了白军的帽子，接受不了。还有的同志一时

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经过各级党、团组织做工作，部队中的一些糊涂想法虽然消除了，但在感情上，是难以转变过来的。为此，刘师长在讲话中，特别讲了换帽子的问题。刘师长向前走了几步，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开赴抗日最前线的誓师大会。”他魁伟的身躯，昂然屹立在雨雾中，洪亮的声音压过了风雨的喧啸。接着，他简短地讲了全国抗日的形势，然后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音，激动地接着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那顶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一声令下，全师同志一齐从挎包里取出昨天准备好的帽子，又依依不舍地把红星军帽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挎包里。没有一个人把红星帽丢掉。换帽之后，举行授旗仪式，颁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章。这时，同志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紧接着，进行宣誓。誓词是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刘师长读一句，同志们跟着重复一句。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弦。这次雨中誓师的豪壮气概，永远印在全师将士的心中。

巧拒蒋介石的调令

誓师大会之后，9月16日，一二九师奉命进驻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地区，准备向晋东南进发。一一五师向晋北进发，一二九师开往晋西北。这样，八路军的3个主力师就可以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战略部署。我师到了庄里镇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如军事训练、组织先遣队、进行侦察、了解华北地区的风俗习惯、进行政治教育等等。正当我师准备按八路军总部的预定计划，东渡黄河北上的时候，国民党驻西安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我师。这是一位不速之客。我们既没有请他，师部事先也没有接到通知。值班参谋告诉我，乔茂才来到师部，自称认识刘师长，要求见。我想，刘师长早年参加辛亥革

命，毕业于重庆将校学堂，曾在熊克武先生的部队任过团长。他是川军中被誉为“刘伯温”的有名的常胜将军，知道他的人一定不少。这个乔茂才可能在四川时跟刘师长共过事，也许他仅仅见过刘师长的面，或者只不过闻名而已，到底见不见他呢？我立即向刘师长报告了此事。刘师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还是先弄清来意再说吧。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我领会了刘师长的意图，便来到师部那间简陋的会客室。我打量了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他年纪约有40多岁，头戴礼帽，身穿便服，见我来了，立刻起身相迎，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乔茂才，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我叫李达，参谋处长。”我说了这么一句，跟他握了握手，算是礼节。“唉呀，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到现在还没回来。”乔茂才露出着急的样子，问：“那几时才能回来呢？”我说：“很抱歉，刘师长行前没有说回来的日期。”接着就是一阵沉默。我想：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反正你总得讲话。果然，干坐了一会儿，乔茂才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李处长，我此次来贵师，一是来拜访，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您可否转告刘师长？”

我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忙着到部队交代准备出征的事，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

告。”乔茂才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取出一封信来递给我说：“请李处长先过目。”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命令的大意是，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边看，乔茂才边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贵师到了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息一段了。”我看过后，觉得这个命令大有文章，就问乔茂才：“蒋委员长的命令，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我想，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就把它还给了乔茂才，说：“乔参议，这个命令还是等刘师长回来交给他为好。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我这就去找刘师长，请他尽快回来，您看怎样？”乔茂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我也就趁机辞了出来，把这个情况向刘师长作了汇报。刘师长沉吟了一下，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不是找我叙旧，而是要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他边说边走到地图前边。“一一五师已经到了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一二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日本鬼子呢？9月13日占了大同，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个方向推进。照国民党这种打法，用不了几天，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们同一一五、一二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本人切断。”“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我们实际情况恰恰应该尽量避开正面防御。”我插了一句。“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我要马上报告朱总司令。”“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我问。“看来，他已经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我不能见他。你就说找不到我。过去我们是共过事，现在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充当引我们上钩的钓饵。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这个协议嘛！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就这样，第一天我陪他吃饭，散散步。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彼此再

没有什么话好说。过了几天，乔茂才看看刘师长就是不见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成。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他为了下台阶，就对我说：“我还有事回去要办，等刘师长视察回来后，我再来拜访。”“既然乔参议有要事在身，我就不好留您了。”这位不速之客，就这样被送走了。他本想来一二九师显显身手，没想到碰了刘伯承的软钉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述职”了。以后，再也没敢来。蒋介石原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作一作一二九师的文章，企图假日本人之手消灭之。结果是错打了算盘。蒋介石的阴谋被粉碎了。我师仍然按照原计划，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

东渡黄河

出发前，师里组织了一个先遣队，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组成。为了在师主力到达前搞清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先遣队由刘师长亲自率领，陈赓、陈锡联同志随同，9月24日由庄里镇出发，比大部队先行一步。车运到晋北后，每到一地，刘师长都要亲自看地形、摸情况。行军时，他总是尽量向前靠。这已成了他多年来的习惯。我随张浩同志跟大部队走在后面。先遣队行军4天，到了韩城县的芝川镇。这里是黄河的一个渡口，河面宽，水流也较缓些。再往北60华里左右，就是著名的黄河龙门古渡口〔2〕。龙门是司马迁的故乡。在芝川镇南边，有司马迁的祠和墓，但是，此时谁也无心去光顾这些名胜古迹。大家心急如焚，只想早点找到船只，渡过黄河。但是，奇怪得很，参谋人员在河西岸都跑遍了，也没有看到一条船。究竟河西岸的船让他们弄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这么巧，偏偏八路军要过河的时候，竟然连一条船都找不到呢？这里面一定有鬼。一一五师首获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早已传到我师。指战员们求战心切，恨不能插翅飞到抗日前线去痛揍日本鬼子，怎么能让一条河拦住而耽误时间呢？刘师长更是十分焦急，马上派人去找负责芝川镇和渡口的国民党地方官。等把这两个地方官找来后，天已经很晚了。刘师长先是问他们为什么河西岸没有船？这两个人油腔滑调，支支吾吾他说：“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不用说，这是含糊其词地搪塞我们一下。很难说这不是他们故意给八路军制造麻烦，好让我们承担贻误战机的责任。刘师长对这两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非常恼火，气得使劲一拍桌子，厉声问道：“你们认识我吗？”那两个家伙摸不着头脑，连说：“不认识，不认识。”“这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位参谋向他们介绍了一下。一听这个，两人的气焰收敛了。忙说：“刘伯承将军大名，我们早有耳闻，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师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语气十分严厉地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的命令，要渡过黄河去抗日前线的。我们必须明天拂晓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给我调齐。不然我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当汉奸论处”，在那时就是枪毙的代名词。那两个家伙这时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战战兢兢地答道：“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刘师长叫过两位参谋，说：“你们陪他们一块去找船吧。”这一着真灵，那两个家伙果然在个把小时就把所有的船都调到了河西岸。第二天，即10月6日，先遣队便渡过了黄河，比预计时间，晚了一天。事后，有几位同志问刘师长：“师长，我们可从来没有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啊？”刘师长说：“你们看，国民党政权腐败成了

这个样子，上上下下都是如此，还能不打败仗？我在旧军队里混过几年，知道国民党这些当官的脾气。他们欺软怕硬，看势头办事，何况这次是故意刁难我们。吓唬他几下子，他就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了。”说罢，刘师长和几位同志会意地大笑起来。注 释：〔1〕援西军：1936年10月，红五军团、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于河西走廊。因敌众我寡，处于危险境地。为援助西路军，中共中央和军委1937年2月令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组成“授西军”，从陕西三原、淳化出发，西进救援。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2〕龙门古渡口，又称禹门口，在陕西省韩城县和山西省河津县之间。记辽县游击训练班

1937年11月上旬，日军攻占太原以后，在华北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基本崩溃，先后退到了黄河以南。嗣后，日军便肆无忌惮地向河北、山东等地进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我党我军，庄严地向全体华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等口号，为收复国土，领导民众反抗外来的侵略而斗争。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伯承师长认真总结了一二九师出师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日军的作战规律。并对一二九师的同志作了《游击战术》的报告。太原失守后的第三天，我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11月13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的石拐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由刘师长作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并传达了毛主席给八路军各师所作的具体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今后全师的任务：即按照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刘师长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就要在太行山上来一个麻雀满天飞！”这是李达同志1981年为《刘伯承用兵录》撰写的文章。该书1982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会后，一二九师的同志对于今后的战略转变，有了较好的思想准备。但是，对游击战如何打法，游击队如何组织，还是一个新课题，为了使同志们明确打游击的具体搞法，师部决定，举办一个游击训练班。刘师长选中了辽县作为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地点。11月15日师部在辽县〔1〕西河头村安营，训练班就设在附近的石匣。第二天刘师长召集司、政机关的有关同志，交代了抽调人员轮流参加集训班的事。他说：“今后华北抗战的重担，就要落在八路军的肩上了，所以我们办训练班是非常重要的。参加学习班的干部，一部分要从已经派下去的游击支队中抽上来，学习完后再回去；另一部分从主力部队抽，学习完了派下去建立新的支队，或派到已有的支队作骨干。你们好好商量一下，作个计划，争取一年内轮训一遍。”按照计划，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分成两部分，课程略有区别。一部分是师属各部队排以上的干部，学习的内容是如何分散到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打游击；一部分是地方上县、区级干部，他们的学习内容是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本侵华军，以及组织好支前工作。那时，有些同志对打游击战还很不了解。他们只愿意在一地打仗，不愿意走路。有的则说：“游击游，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大米小米啖。”还有的说：“一年来都说打日本，为什么打一下就拉走了？”这些，都是要在训练班里解决的思想问题。刘师长针对部队的现实状况，敌人的战术特点，和我们的作

战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和运动战》等讲稿，结合半年来的实践事例，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们讲授。我记得刘师长在讲集结与分遣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时，举了“黄蜂围攻战马”和“打麻雀仗”的例子。他说：“你们回去，首先要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普遍分散到各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大量分散的抗日武装去消耗日军集结来进攻我们的兵力，掩护我们的主力集结去歼灭敌人分散的部队。只要我们打得巧妙，我们一连人就可以箝制日军一个营或一个团，甚至更多。”接着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战例说，1937年11月26日的范村战斗，敌人以五六百步兵、一连骑兵、6门迫击炮和2辆汽车向我进攻。七七一团一连则把全连人分散在十余里广阔地面上，从四面八方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敌伤亡近百人，汽车被我打毁1辆。从此，我们就运用了“麻雀仗”，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麻雀仗，有时，一只麻雀也闹得敌人团团转。汪乃贵支队有一个战士执行送信任务，走到上龙泉附近，遇到了100多鬼子。他就迅速躲在一个石洞里，沉着地向敌人射击，一连打死十来个鬼子，鬼子却没有办法打到他。后来鬼子就让汉奸出来诱降，这个汉奸又差点被击中。敌人围着石洞转了半天，也无计可施只好撤走。我们的这位战士也安全归队了。

刘师长又说：“有了游击队、自卫队组织之后，就要武装起来。

用当地的各种武器，如土枪、土炮、地雷、红缨枪、大刀等进行训练，做到有大刀会砍，有红缨枪会刺，有地雷会埋。我们不是天天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口发银光’吗？俗话说：‘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蛋的蜂不可侮！’这蛋就是它的武器。有一次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在山坡上走着，他的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也象受到传染一样，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跑去。我们使劲抓住缰绳，才没有摔下来。警卫员很着急地从后面追了上来。等我们各自勒马站定，才顾上互相问一问，这马为什么突然受惊了？警卫员说：‘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螫痛了。’”

刘师长接着说：“你看，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并且懂得游击

战术，会从马的屁股后头来攻击，弄得这个庞然大物用尾巴扫也来不及，被螫得遍体伤痕，过后半天还痛苦不堪，心有余悸。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对他的行军纵队，不也是打尾最好吗？因为眼睛是长在前面的，对后面的注意就差。”刘师长又列举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事例来说明，他说：“推翻秦朝暴政，就是陈涉首义，群雄蜂起嘛！现在我们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民众蜂起嘛！民众武装起来，到处象黄蜂用自己的蛋去螫庞然大物一样，到处打击敌人，敌人总有一天要化脓吐血而死。”学员们听了，都活跃起来，认为刘师长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听就明白。“麻雀战术”和“黄蜂战术”在学员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后，使学习班的讲课内容大为丰富，游击训练班的学习，每期多则一月，少则半月。虽然学习时间很短，学员们都感到有很大提高。有些同志来时，不愿意打游击；毕业时，就积极要求下去打游击了。从此，大家都以被派出去打游击为荣。学员们毕业以后，就被派到各地，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游击队。地方干部则回到本地，以区、村为单位，组织群众性的自卫队。有的就补充到已经成立的游击队里作骨干。他们刚下去时，往往只带三五个人，或一个班，多的有带一

个排或一个连。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些游击“种子”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二九师的游击队训练班，后来演变成参谋轮训班、随营学校，简称“随校”。辽县这个不为人注意的偏僻的小山城，就这样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之地。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到1938年4月反敌九路围攻〔2〕时为止，一二九师曾有步骤地分遣了2/3兵力（当时64个连队，派出了41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这里，举几个游击队打鬼子的例子，来说明辽县训练班是卓有成效的。如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破路劫车就是一例。他们在寿阳、榆次一带和石太线上炸桥拆轨，“捉火车头”（使火车出轨）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还分遣了许多由二三人组成的小组，散伏在敌长凝〔3〕据点周围，日夜打冷枪。敌人被围在长凝，甚至都不敢上厕所和挑水了。太原失守后，正太路敌人的火车正值大忙的时节，三八五旅的一个游击队乘敌人警戒疏忽之时，以一个连进行夜袭。敌人死守在站房里不出来，游击队毫不客气、一阵手榴弹投到站房里，17个鬼子、19箱军用品和枪支同归于尽，车站也被烧毁。敌人立即由石家庄运来一车皮兵增援，又被我解决了。等到日军的又一批援兵赶来时，我们的部队已迅速地撤上山了。汪乃贵支队有一个打昔阳汉奸的故事。昔阳有一个汉奸，非常狡猾，日本人亲自来找，才肯出来接头，平时躲起来不敢露面。汪支队有几个人就找了几套日本军服，装扮成日本军官，到了那个汉奸住的地方，嘴里叽哩哇啦地乱嚷，要人给他们当翻译。那汉奸果然就迎出来了，当场就当俘虏。这些游击小组象黄蜂和麻雀一样满天飞，闹得日本侵华军如芒在背，似鲠在喉，坐卧不宁。敌酋们非常害怕刘师长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和“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等，他们在失败之余，不能不哀叹：“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击是风。”“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敌酋们不得不竭力来研究刘伯承同志写的《游击集团》、《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论著，并要他们的正规军也来学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以子之略，攻子之略；以子之术，攻子之术”。然而，这些异族侵略军，既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又不熟悉地形。我们地广人多，他们防线宽兵力少，加上他们那股按操典行事的“牛劲”，学游击战谈何容易？等待他们的，只有彻底失败而已。注 释〔1〕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辽县东南的十字岭地区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2〕反敌九路围攻，是指1938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万余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总部特务团及部分国民党军队作战20余次，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粉碎了围攻，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3〕长凝镇，曾为榆次县城，在今榆次市辖境内。

从收复黎城涉县战役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与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一、战役经过的概况

第一，沿潞城至邯郸线各大小据点之敌是谷口第一混成旅团。本师在奉到朱彭总副司令关于××区作战部署的××电今后，当即增调×××等部基干兵团以充实长治线之突击力量，组织3个攻袭集团由黄克诚、谢富治、徐深吉3同志分别指挥。在这些基干兵团尚未到达指定地及攻袭准备尚未完成以前（12月8日至13日），当令潞城至武安线的所有部队并动员指挥沿线自卫队游击小组，向敌作不间断的破坏袭扰，以消耗迷惑疲惫敌人，以便主力在其掩护下隐蔽集结，各该部队在执行这一任务上一般的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6日内（8日至13日）全线小战斗合计共73次，埋设地雷11次（敌均触发），而敌人则无日无时不在用机炮猛射中，恐慌消耗之大可知。第二，14日以后我大规模之动作准备均完毕。各路皆积极袭攻，如14、15、16、17、18、19等日×××部、×××部不断从路南伏1939年12月8日至25日，一二九师及晋冀豫军区部队，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配合下，发动了邯（郸）——长（治）公路破击战。是役，我军收复了黎城、涉县两座县城，拔除日军据点23处，歼敌700余人。李达同志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这是他为此次战役所作的总结，经整理后发表于1940年1月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击，袭击由潞城东退之敌，及井店镇、黎城停河铺、东阳关、响堂铺各据点敌，×之大部同时由路北袭击围击以上据点及运动中之敌；并先后埋设地雷23个，炸毁敌汽车5辆、大车12辆，敌死伤在60名以上。武涉线〔1〕上之袭击与破坏同样积极，特别重要的是×××部15、16两日夜攻袭响堂铺，该地之激烈战斗确实截断了黎、涉交通，涉县两次出援之敌被我完全击退。最后并使敌人于16、17两日根本不敢出涉县城一步。由于以上的有力战斗给了敌人以莫大的震撼与痛苦，如各据点之敌每日夜不安宿，电话根本不通，抢粮部队不能出门，时有挨饿之苦，尤其慑于地雷之不意触发等等，以致迫使敌人不能不作逃命的撤退，成为收复黎城涉县的重要因素。第三，敌人遭受我以上之严重震撼后，促成了他的基础动摇，我部决于22日后施行全线的总攻击：（甲）22日10时，我××部以一部及当地自卫队游击小组，由下桂花麦仑方面箝制黎城之敌，主力则分2路，经东西水洋向赵店镇迂回，×××两部之各一部则经岭东沟分3路直袭赵店镇，敌共500余人固守工事顽抗，入夜22时，我在统一信号之下一齐冲入该部将敌击退，我即刻占领该镇，并将附近碉堡及漳河桥星夜彻底破坏。23日，××部主力转到上桂花麦仑分两路进袭黎城，××两部主力由董壁望壁亦分两路向黎城进袭，其他小部及自卫队佯袭停河铺，×××部之一部则由靳家集急袭戚里店，15时进入激烈战斗，往返冲锋9次，毙敌共90余人，伤亡奇重，19时敌不支向东阳关窜去，我当晚克复黎城，一面又以有力一部追袭东窜之敌。窜退东阳关之敌，在我追击部队赶到施行彻夜之袭击后，于24日拂晓狼狈窜退，东阳关同时被我收复。以上战斗共计毙伤敌约250余人，我负伤连排长9人、班长以下35人，阵亡连排长各1人、班长以下31人。缴获步枪24支，轻机枪2挺，各种子弹7115发，其他军用品甚多。（乙）响堂铺至涉县之敌，22、23两日曾占领路侧要点掩护黎城敌人东窜，经我×××部及×××旅一部于23、24两日之夹击，敌极颓丧，我并以主力由西岗村分两路于25日夜突袭

涉县,以一部由寨上招岗间迂回之,另以××支队之××游击队及自卫队 200 余人袭击井店,攻袭战甚为激烈,敌损失消耗奇重,并于 24 日夜 24 时,及 25 日晨 7 时先后由响堂铺涉县东窜,我于同时克占该两要点,随以有力一部尾敌猛追,25 日 12 时即收复井店镇,计收复涉县响堂铺井店镇之战斗共毙伤敌 200 余人,我负伤营长 1 连长 3 政指 3 排长 8,班长以下伤 93 人,阵亡 45 人,获步枪 37 支,轻机枪一挺,以及其他胜利品。(丙)××纵队××团及××支队××大队与××大队,由 20 日起即不断向武涉线之鸡鸣铺、猛虎村、牛尾头、固义等各据点之敌攻袭,每日均有激烈战斗,并一度将鸡鸣铺、乱石岩间之交通完全截断,毙伤敌百余人,俘敌伪 8 人,毁汽车 4 辆,我伤亡 50 余名,24、25 两日,仍向东窜之敌分别袭击中。

二、经验教训及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甲)协同的重要。由 14 日至 20 日的积极动作,部分的尚欠协调,如路北的部队,常不能与路南部队同时突袭,以致敌人的炮火,今天对付路北,明天又对付路南,到了收复赵店、黎城、涉县等据点时,一般的是能统一信号,统一时间及统一战术行动,故收效宏大。(乙)小部队不断的分段破袭与打击敌之抢掠部队,确能困饿疲惫麻痹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之行动,特别是雷厉风行的突袭,是有特别效果的,这证明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之重要性,说明企图取消游击战者之毫无根据。(丙)广泛的组织自卫队游击小组,形成有机的游击集团,确能给基干部队以耳目手足的辅助作用,这说明不愿意与害怕武装民众者之守旧成性,目光如豆之可笑。(丁)广大民众是抗日的,广大民众力量的发动是伟大无比的,如沿线的群众在我军及游击队每次破坏交通袭击敌人时,无不积极参加,特别在基干兵团到达时,群众都磨拳擦掌,兴高采烈的帮助部队给养,搬运伤兵,自动送茶水、稀饭慰问伤兵,使军队无其他顾虑,战斗情绪益加巩固与提高;而发挥其高度的奋勉性。这说明一般顽固分子抑制民众抗日活动,摧残民众组织的行为,即是实际上帮助敌寇来摧毁抗日的基本力量。(戊)地雷是有很大大作用的,要求我各抗日部队广泛使用。然而这里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地雷是“土造”的,同时是笨重的,这是由于我们没有炸药和制造的导火材料。同时也是我们步枪子弹缺少,迫使我们不得不用这种“土办法”的结果,但我们也希望逐渐改进我们的技术。(己)最后不能不说黎城涉县之收复,是八路军指战员忠诚卫国和高度奋勉的热忱与不顾一切艰苦流血的模范行为所换来的直接结果,如有些部队在奉到命令时尚远在数百里之外,不惜忍耐饥疲的日夜兼程以赴;有些部队,为了连续攻袭追击敌人而两日只得一餐;有些干部和战士,在负了重伤后还不愿下火线,有的卧在救护床上,仍高呼“同志们!请你们努力!把鬼子打出去!打出鸭绿江去!”等等令人歌泣学习的壮烈勋绩,这证明了八路军与那些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并以磨擦为能事者之不同,证明了顽固份子投降派到处造谣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发展实力不抗日”的胡说八道之卑鄙无耻。注 释〔1〕指河北省西南部武安至涉县的公路。

百团大战——中外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这一战役，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粉碎了敌人围困我敌后军民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敌人向大后方的进攻，提高了我八路军的声望，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敌后军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

1940年的8月，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互相勾结，妄图称霸世界。由于过去一个时期，英美法一味采取妥协政策，助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在德意横行欧洲之际，日本准备打通平汉路〔1〕南下，在亚洲发动新的冒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诱降政策，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扬言要兵分三路向蒋介石的大后方进攻：南路由越南进攻昆明；中路由宜昌进攻重庆；北路经洛阳进攻西安、兰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汪精卫等国民党投降派的劝降下，国民党莫衷一是，投降活动日益加剧，乌云浓重地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大片国土。*本篇是李达同志1980年为纪念百团大战40周年撰写的文章，刊登在

战士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本第5集上。

在敌人后方，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越战越强，对敌人的威胁越来越大。以太行山为例，我们的实力已由挺进太行初期的2个半旅，发展为11个半旅。敌人为了束缚抗日军民的手脚，大搞“囚笼政策”，使我们的敌后抗战面临严重的困难。当时，刘伯承师长曾生动地比喻说：从“囚笼政策”的意义上来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日寇现在正忙于装置这样一个“囚笼”，企图把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分割开来，永远作它屠刀下的羔羊，任其宰割。为了挽救时局，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22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签发了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达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这个命令明确地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华北的整个战局，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意义，规定了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以彻底破坏正大铁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恢复若干重要关隘据点，较长时间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正太路，从石家庄到太原，全长249公里。它横贯太行山脉，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西去，把巍巍太行劈成两截。它是华北敌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对我根据地破坏的重要封锁线之一。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陘煤矿。除太原与石家庄外，日军以第四、第八、第九3个混成旅团共3600余人，分布在50个据点里，守备在这条铁路线上。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担任守备。铁路两侧20至30里左右，均构有一线外围据点。敌人还经常派装甲车轨道巡逻，自吹自擂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7月间，我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曾带着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初步设想，由总部所在地沿清漳河下来，到了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见到了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当时，左副参谋长传达了彭总的初步设想，说：这次破击战的

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2〕、平绥〔3〕、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死队都将参加作战。邓政委听后明确果断他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刘师长听后也很赞同。他们认为，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华北敌后的抗战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敌人，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邓政委和刘师长接着吩咐我说：“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设想很好。正式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你们可以提前搞。”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我立刻开始了这一工作。8月8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同时发出《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接到命令之后，刘、邓首长立刻忙起来。他们在作战室里通宵达旦地思谋着、指挥着。我忙着组织进行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兵器的配属；道路的选择；弹药器材的准备；群众参战的动员；后方勤务保障等工作。8月18日，我们在一二九师前进指挥所——和顺、榆次和榆社3县交界的石拐镇，即太行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召集了由左、中、右翼破击队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传达了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8月8日下达的战斗命令：由我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共同担任正大路破击任务。集总分工由聂荣臻司令员指挥下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以15个团的兵力，破击阳泉以东、石家庄以西的正大铁路东段；由刘、邓首长指挥的我师部队与决死队的第一、第二纵队也是15个团，担任阳泉至榆次段破击作战任务。在作战会议上，我把正太铁路上敌人分布情况，详细作了介绍。根据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作战命令和刘、邓首长的作战决心，将太行、太岳部队主要兵力作了如下部署：以10个团破击正太路西段，另以28个团及地方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路袭敌，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作战的主要方面，分为3路：左翼破击队以三八六旅之十六团，决死一纵队之二十五团、三十八团组成，占领寿阳、榆次间敌军据点，破坏该段铁路；右翼破击队以新十旅之二十八团和三十团组成，占领阳泉、寿阳间敌军据点，破坏该段路；以三八五旅之七六九团、三八六旅之七七二团组成中央纵队，开进平定以西的天花池、苇池村地区。并以一部主要兵力控制阳泉西南之狮恼山，担任阻击由阳泉出犯或由平辽线援正大线的敌人，保证破击作战的顺利实施。以新十旅二十九团及三八五旅十三团结合平、辽、榆〔4〕等地方武装，分别对平辽、榆辽〔5〕公路进行破击，牵制各该线守敌，并配合中央纵队消灭回援之敌，保证我主力侧后安全。根据集总关于攻占敌军据点，特别是铁路沿线据点，是达成破路任务的先决条件的指示，我们要求，在战役发动之后，各个破击部队，要乘夜绕过敌外围据点，首先对铁路线上守备之敌展开进攻。最后我还讲了通信联络和后勤保障等问题。我讲完后；刘师长指着作战地图，又强调了一些重要地方。邓政委简明扼要地讲了执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作战命令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军民抗战胜利信心，提高我军战斗力。”他还特别指出：“这个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全国抗战，提高有志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

二

按照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命令和刘、邓首长的行动决心，我军于8

月 20 日晚，以秘密神速的行动，果敢而勇猛的动作，开始对正太路守敌发起全线攻击。由于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又经过周密缜慎的准备，摸清了全线守敌，敌除石家庄、太原外，仅有 3600 余人，而且战线绵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我军在全线投入几十个团的兵力，10 倍于敌，造成了在这一地区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所以敌人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战斗发展比较顺利。战役一开始，战场上主动权即在我军手中控制着。经过一昼夜激战，我太行、太岳部队的左、右翼破击部队连续攻克芦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等车站、据点，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破坏了敌方的战术工事，打开了战场，为破路和进一步扩大战果扫清了障碍。到 8 月 25 日，我太行、太岳部队又连续攻克上湖、燕子沟、坡头、狼峪、张净，同时攻克外围据点冶西。至此，正太路西段铁路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基本为我控制。与此同时，我晋察冀军区兄弟部队，在正太路东段经 3 小时激战，一举攻克了娘子关要隘，还攻占了井陘煤矿，使敌在华北的燃料基地损失惨重。在晋西北，我一二 师破击大同到阳曲的同蒲路一线，以及汾离〔6〕公路全线，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8 月 21 日攻占静乐到忻县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康家会。同时，平汉路、德石路、北宁路及其他主要公路均被切断。这一阶段作战目的基本得以实现。随着正太路上车站、据点一个又一个地被拔除，我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在“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冒着敌机的低空扫射，对铁路、公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车站、水塔、桥梁、路基被拆毁、炸掉。有的还把拆下的路轨抬到数十里外埋掉，把枕木放火烧掉。在破击战役开始之前，刘、邓首长根据对敌情的认真分析，就预料到，由于敌指挥官骄横暴戾，并且器小易盈，战役发起之后，驻扎在这条铁路上的敌人片山旅团，将会抽集大部兵力，进击我右侧背。所以，在战役发起前研究兵力部署时，刘、邓首长一再要求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根据首长的指示，我们决定把师的主要打击力量预伏在狮垭山一线，以防敌人材我侧背。狮垭山位于阳泉西南，是控制正太铁路的咽喉要地。刘师长特别关照要我审时度势，严格指示部队，注意隐蔽集结，不要暴露意图。果然不出所料，战役发起后，阳泉敌片山旅团为挽救其分散守备部队被我各个击破的命运，纠集了其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并武装了住在阳泉的日本人，自 8 月 21 日起，开始向我狮垭山高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兵力从六七百人增至 1500 人。在大批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敌人向狮垭山拼命攻击，企图强夺这一有关战役成败的要点，阻挠我战役计划的进行。守卫狮垭山的部队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凭险阻击，顽强战斗。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仅 21 日，敌人就伤亡百余，遗尸 40 余具。22 日晨，敌 200 人又向狮垭山东北高地进攻，激战终日，敌仍无进展。次日，敌又以炮火对我阵地轰击，并大肆施放毒气。午后，敌机 20 余架，轮番低空轰炸、扫射，均未奏效。狮垭山争夺战，我军整整坚持了 6 昼夜，有力地保障了左翼部队的行动。这个战斗充分说明了我军不但攻如猛虎，而且守如泰山，大煞了“赫赫皇军”的威风。左翼部队连日在高平、道坪、红凹、卷峪沟地区歼敌后，争取了主动，安全转移。我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 6 日到达榆社西北之双峰地区，把从太谷出犯之敌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包围，经一昼夜激战，歼敌 400 余人，敌永野大队长被我击毙。从 8 月 20 日到 9 月 10 日，我军在民兵的支持配合下，按照预定计划展开，经过 20 多天的奋战，任务全部完成。与此同时，正太路

东段、平汉路、同蒲路北段，以及德石路、北宁路和其它主要公路均被破坏或切断，使华北之敌各交通线陷于瘫痪。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早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前，彭总就提出了乘胜扩大战果的设想，8月31日用电报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发各部队负责同志。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要求我军应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明确指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大战战役行动。这样，中央不仅完全肯定了由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组织和指挥的这一战役行动，而且赞同扩张战果的意见。根据集总的指示，我太行、太岳部队第二阶段作战中心是拔除辽县至榆社公路沿线敌军据点，相机收复和顺、辽县两城，并准备在辽、榆、武地区歼灭可能由平辽或白晋方面增援之敌。榆社到辽县的公路是敌人楔入我根据地的平辽公路前锋段，敌人早就企图把这条公路再向榆社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路连接，以达到其分割我太北区、便于运兵的目的。榆辽公路上的敌情是，该段共有榆社、沿华、石匣、管头等7个城镇与村落据点，由第四混成旅团之池边大队主力守备。由于这段公路突出伸入我根据地内，敌工事设施坚固，兵力兵器较强，象榆社、管头就各有敌一个加强中队兵力守备。我们的战役部署是：以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共4个团为左集团，攻取榆社、沿华、王景3据点；以三八五旅并指挥二十三团为右集团，攻取管头、铺上、红崖头、关帝垴、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之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以新十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止昔阳、和顺出犯之敌，配合作战。

榆辽战役，于9月23日夜发起。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辽县之敌

即行西援。我按照刘师长、邓政委的意图，立即下令预伏在狼牙山的部队伏击敌人，敌增援部队即被击退。24日我连克沿华、王景、小岭底，铺上等4个据点。此时，我进攻榆社部队，激战方酣，敌人在我强烈火力与猛烈攻击下，开始施放毒气，我采取了防毒措施，继续战斗。榆社之敌有城墙，有暗堡，有充足的弹药和粮秣，而且有飞机的支援，易守难攻。在敌猛烈的炮火面前，为了减少伤亡，我军进行了坑道近迫作业，用炸药炸开敌堡，乘硝烟攻入城内，解放了榆社。与此同时，我进攻管头部队，由于地形所限，在占其一个碉堡后，未获进展。我右翼集团除一部分兵力围困管头外，抽一部分兵力先攻取石匣，然后，又返兵再攻管头。这时，敌已弹尽粮绝，我军遂又克管头。经过上述战斗，榆辽公路被我军彻底破坏，守敌大部被我歼灭，据点被我荡平。我军在第二阶段整个战役进程中，重视实施战略机动，强调要在运动中歼敌。集总下达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中，要求我师相机解放辽县县城。正当部队向辽县外围运动时，突然获悉武乡敌人来援。于是，刘、邓首长毫不犹豫地要我下令除留少部分部队围城外，撤回进攻辽县的部队，把主力预伏在榆辽公路的红岩头一带，准备打伏击。攻坚战斗马上变为围点打援，把敌人调出坚固的筑城地域，在崎岖山地上歼敌。部队半夜12点到达预伏地点，拂晓就打了个成功的伏击战。从9月20日至10月20日，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战斗除上述在太行地区的榆社、辽县战役外，尚有晋察冀地区的涞源、灵丘战役，冀中的任丘战役和晋西北地区朔县到原平间的同蒲路破击等。为了配合正面作战，我冀南、太行、太岳部队等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冀南军区四旅、七旅、八旅和新九旅及路西之十一旅积极战斗，配合太行军民将平汉路元氏、安阳段作了严重破坏，炸毁了该段大部桥梁，并一度攻克

邢台车站。对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和邯济铁路的路基也进行了破击。太行区我新一旅除对安阳、磁县间铁路和长治、潞城间公路进行辗转破击外，并袭入长治机场。我太岳部队对白晋、同蒲作了连续破击，直接配合了榆辽战役，牵制了敌人。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的作战，给敌以沉重打击，使日伪军陷于异常混乱的局面，敌人急忙调集部队进行报复“扫荡”。从10月6日到12月5日，百团大战进入历时2个月左右的第三阶段，即反“扫荡”阶段。敌人的“扫荡”首先从太行开始，以后又在平西、晋西北、晋察冀、冀中等地进行。10月10日，武乡、潞城、襄垣等地之敌3000余人，犯我浊漳河两岸，用什么“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向我根据地军民进行报复。我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避实就虚，节节阻敌。我新十旅一部在弓家沟设伏，击毁敌人40辆汽车；我三八五旅十四团阻击犯麻田之敌，在黄烟洞抗击敌人达3日之久。10月26日，武乡之敌冈崎大队500人，取道关家垸西进。我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新十旅主力及决死纵队2个团，奉集总命令将敌包围于关家垸。彭总和刘、邓首长亲临前线指挥。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观察地形，及时发出命令和指示。部队于27日对侵入关家垸之敌发起总攻。敌一边坚守待援，一边攻占风垸顶，并有三四架敌机轮番空袭。关家垸战斗非常激烈，我与敌展开的短兵肉搏，几经反复，将敌大部歼灭。风垸顶的战斗也很激烈，我连续猛攻，予敌大量杀伤，在援军接应下，残敌仓皇而逃。继“扫荡”太行之后，同蒲路敌四十一团、白晋路敌第九混成旅团，纠集7000余人，向我太岳区沁源及其以北地区合击，我避其锐气，打其弱点，在官滩地区，一举杀伤敌100余人，又在胡汉坪战斗中与敌展开10多次肉搏，杀伤敌160余人。“扫荡”太行、太岳之敌，先后共达3万余人，经我军民2个月奋战，到12月初，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报复“扫荡”。从正太路破击至榆辽战役和反“扫荡”，在历时3个多月的作战中，我太行、太岳部队指战员英勇作战，友邻部队协同配合，胜利地完成了正太铁路西段的破击任务，拔除了榆辽公路上的据点；加上其它各条战线对同蒲、平汉、德石主要铁路干线及公路交通所进行的破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给予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的德江、原田、池边、铃木、坂井等5个大队和敌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甚多。在粉碎敌人“扫荡”的第三阶段中，我军又毙伤日伪军2700余人。在浴血奋战中，我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整整3个半月作战中，我亲眼看到彭副总司令、刘师长、邓政委和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英勇杀敌。为了胜利，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面对装备优良、补给充足的敌人，我军克服了种种困难。有的部队在22个昼夜中，很少吃到一顿饱饭、睡过一宿足觉，有时一天只喝两次南瓜汤，在阵地上睡一觉。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轻伤不下火线，有的一连负伤两次，仍坚持战斗。就是这样，我们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敌人，取得了伟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没有这个时期八路军的英勇牺牲和艰苦奋斗，就不能有今日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在百团大战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踊跃支前，也是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因素。在东起德石、同蒲，北至正太的辽阔战场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部队拆墙、破路、送弹药，运军粮、抢救伤员。特别是在正太、榆辽战役中，我们听到和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寿阳县景上村自卫队员王蝉余等3

人在火线上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一个牺牲了，第二个上去又牺牲了，第三个再上去，终于把伤员抢救下来。和顺县寺沟村刘蒋氏老大娘，从战场上——连背走了7个伤员。和西县自卫大队长率领群众抢救伤员数十人，并抬着伤员与敌人打游击。……这无数的事例，都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战役胜利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自8月20日起到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又15天的百团大战，以我敌后军民的伟大胜利、敌人的惨重失败而告终。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我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18000多人；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0余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在百团大战中，我们为什么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我军英勇顽强的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敌后军民的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外，我觉得还有些情况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首先，我们认真执行了党在当时的政策策略和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同时还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了要“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的方针，百团大战就是为了贯彻党的这一方针，以实际行动来振奋人心，遏制投降逆流，争取时局的好转。在对日作战中，我军的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百团大战就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引下实施展开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地变换斗争策略，这是永操胜券的法宝。由于百团大战坚持了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次是较好地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锻炼了我敌后军民，提高了我军作战能力。这次作战的特点：一是它的主动性。这与我军在抗战初期所进行的反围攻、反“扫荡”战役不完全一样。那时，我们处于被封锁的地位，有时迫于应付，主动性小。而这次我军作战是经过充分准备，采取迅速而突然的袭击，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二是它的协同性，由于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以正太路为重点，战线以各破击线总长计算，约达5000华里左右，我军有100个团左右，并有大量民兵参加了作战；在集总统一号令、统一指挥下行动，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作战的战术特点还具体表现在，一是把攻克据点与破坏交通紧密相结合。攻占敌人铁路线上的据点，是破坏铁路的先决条件，迅速破坏了交通，使敌不便集结兵力，又是歼灭分散之敌的手段。因此，何时侧重于“破”，又如何侧重于“击”，这种指挥艺术，必须适时掌握。二是设伏与围点打援交替运用。在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对交通线之敌据点，往往采取奇袭手段。奇袭芦家庄、巧攻上湖、强袭和尚足，攻夺马首都是这种战术的运用。有时也采取围点或吸敌打援的办法，如围困落摩寺和辽县以及狮垴山、关家垴战斗，红崖底、弓家沟设伏等等均属这类。在整个战役中，有奇袭，有围困，有吸敌打援，有声东击西，完全根据敌情、我情、任务、地形的变化而决定。战术上变幻无穷，兵力使用上游刃有余，在战法上才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于这些，彭总和刘、邓等首长，在百团大战中都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再一个需要提及的是，成功地运用了大兵团作战。百团大战中，我军投入兵力之多，袭击敌人之众（敌在华北的5个师团、9个旅团约15万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战线之长（各破击线合计长度约5000余里）、战场之广（遍及晋、冀、豫、察、热、绥等）都是空前的。不论是在主战场还是协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

胜利。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为以后我军开展大兵团作战，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当年，刘伯承同志谈到百团大战的作战意义和影响时曾指出：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克服投降妥协危险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非常严重，不少人对能否战胜日军信心不足，悲观失望和投降妥协空气弥漫着国民党统治区。百团大战一扫这种空气，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连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反响。卫立煌当时就给朱、彭总副司令打来电报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仅给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励。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战略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就连蒋介石在给朱德、彭德怀同志发来的“嘉奖电”中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7〕。这使国民党顽固派当时所谓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反共谎言不攻自破了。百团大战不仅震动中国，而且震动世界。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当时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对百团大战作了这样的描述：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成了战场。“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8〕。当然，这次大规模的战役，也是有教训可资借鉴的。比如，当时对华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战役规模过大，参战兵力过多，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当时我华北部队和根据地的作战、补给能力所允许的限度。当年敌我作战技术力量对比悬殊，作战时本应避敌锐气，击其弱点。但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某些作战中，轻视敌军先进装备技术力量，不顾飞机大炮，死啃敌人据点，攻击时间过长，造成我军一些不应有的伤亡。总之，百团大战成绩是巨大的，战果是辉煌的，意义也是深远的。我们要认真总结百团大战的作战经验，为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现代化的强大军队而努力奋斗。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注 释

〔1〕平汉路，即北平至汉口的铁路，今为京广铁路的一部分。〔2〕白晋路，北起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南至晋城，原有公路相通，日军计划修筑铁路，于1940年春动工。〔3〕平绥路，北平至归绥的铁路，即今京包铁路的一部分。归绥是呼和浩特的旧称。〔4〕平、辽、榆，指山西省东部的平定、榆社、辽县（今左权县）。〔5〕平辽公路，指平定到辽县的公路。榆辽公路，指榆社到辽县的公路。〔6〕汾离公路，指山西省西部离石至汾阳的公路。〔7〕见1940年9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8〕见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31页。

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与我党我军的“磨擦”由来已久，持续时间也很长。就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来说，自从1938年秋天以来，一直到日本投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里，概略地谈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所谓“磨擦”的由来，以及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九师及所属部队与之斗争的一些情况。

磨擦的由来

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不久[1]，已经就任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的鹿钟麟，就带着“反共”和“收复失地”的使命来到冀南。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刚一接到鹿钟麟来冀南的通知，就在师部驻地子镇于1938年7月17日电示在南宫的副师长徐向前同志和宋任穷等负责同志：“八路军欢迎鹿主席早到河北主持工作，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说八路军阻鹿，系汉奸、托匪造谣，破坏团结。你们应向群众揭破”。邓小平政委也于当天到达南宫。他和徐副师长回电说：“鹿钟麟的代表邵鸿基先到了冀南，透露消息说：蒋介石任命鹿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是为了筹建冀察战区，限制八路军在华北的发展。鹿已*本篇写于1981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研究》经召集了大批原西北军的旧人，计划以太行山为省府根据地；鹿认为，八路军不会改变过去的作风，感到八路军发展可畏。”为了表示我党我军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解除鹿钟麟的疑虑，当他8月24日到长治时，刘师长亲自去会见他，商谈有关河北诸问题。鹿钟麟当时的表示也还是不错的。由于他很有演讲才能，刘师长和邓政委还请他到我师进行过几次关于抗日的演讲。9月14日，我中央军委就如何与河北省府合作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河北武装、地方行政，我们虽应切实掌握，但对鹿钟麟之省府不应采取冷淡态度，使鹿感觉我们不理他；朱瑞、伯承同志应以八路军代表名义积极向鹿提出各种建议，如向鹿及行政院要求参加河北省政府，即使鹿与行政院不准或不能占有重要位置，亦应不断要求参加，以便在河北合作；杨秀峰同志应多与鹿发生关系，可能时即去鹿处一次，行署工作虽不要每事向鹿请示，但每十天、半月须总结一下，向鹿作一次汇报。鹿钟麟下车伊始，就表示不承认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暗中纵容其部下开始与我军制造磨擦。仅9月中、下旬就发生了3起事件，即：12日，王子耀部将尧山县抗日县长沈铁民扣押；13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2]率部进攻驻博野、安国的我军，我冀中二分区政委宋振桓、县委书记何昆山等4位同志惨遭杀害；30日，受鹿钟麟收编的游杂武装胡和道部，勾结枣强县“六离会”、“黄沙会”进攻驻在姚屯的我东进纵队独立团的1个连，杀害战士13名，抢走步枪17支。我们以团结抗战为重，并没有还击。这几个事件发生后，徐副师长和宋任穷同志派代表向鹿钟麟提出了严重抗议，与他进行交涉。鹿钟麟同意了以下四条处理办法：一、由省府下令解散会门组织，只准其参加抗日团体；二、申斥胡和道，令其将收编的会门解散，以后不再收编会门；三、交还俘我人枪；四、偿恤我伤亡。然而，事态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到了南宫，同鹿钟麟共同筹划反共，结成了所谓“冀鲁联防”，企图以濮阳专员丁树本相配合，限制我党我军在冀鲁豫地区的发展。由于日寇围困武汉，形势紧张，10月上旬，蒋介石被迫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办法，通知河北省府承认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这种对我有利的情况下，

为了争取鹿钟麟转弯子，朱瑞同志又一次同他进行了会谈，表示我们愿意协助他扩充军队及整理内部，并由行政主任公署负责建立统筹支付及供给制度，帮助他解决衣食困难；但省府一切政令的下达，应通过行政公署执行。鹿钟麟勉强同意了。然而，10月下旬，鹿钟麟却写信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向他们提议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想通过他们来影响蒋介石。这个情况很快为我党组织获知。毛主席、胡服〔3〕和朱、彭总副司令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立即指示徐副师长、宋任穷和朱瑞同志：“应坚持行政主任公署，……向鹿极力解释目前形势之严重。在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状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主任公署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鹿指示方针，并表示凡有利于抗战的工作莫不努力完成。武汉失守后形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取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对鹿作让步。朱、彭归来后与鹿谈判。”我们按照这个指示精神，做了不少工作，但未能使鹿钟麟回心转意。他继而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向国民党中央保荐石友三为河北游击司令，企图以石牵制河北与我对立；二是指使胡和道策动“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无理要求；三是亲自出面，以莫须有的口实，宣布撤销束鹿县长王耕同志的职务。徐副师长和宋任穷、杨秀峰、刘志坚等同志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他们指示王耕同志拒绝交代束鹿县长职务；组织束鹿县的广大群众进行拥护王耕县长的运动；同时，派了一个营进驻束鹿县城，以支持县政权。国民党顽固派无端制造磨擦之时，日寇乘机出动了第三混成旅团及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共3700多人，对冀南区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扫荡”。11月5日，日寇占领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等县城，其东阿部300余人则占领了聊城。在反“扫荡”作战中，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将军及我党派到其部队中工作的姚第鸿、张郁光同志不幸英勇殉国。随即，日寇又相继占领了夏津、高唐、永年、南宫和临清县县城。正当日寇进行大规模“扫荡”之际，国民党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之津浦纵队赵云祥部，非但不去抵御日寇，反而于11月19日将我新河工作队、战委会、基干队，在新河城东的仁让里村包围缴械。刘师长在正社得知此事之后，非常气愤他说：“我们对鹿钟麟让步让得太多了。再让下去，他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这一次，我们先不还手，给他拍一封态度强硬的电报，警告他一下。”11月25日，刘师长把亲笔拟就的电报稿交我发出，其内容是：“迭据敝师徐副师长向前电称：敝师正与南宫之敌作战时，赵云祥部竟乘此机将敝师在新河组织之救亡团体及基干队解除武装，并拘捕其人员等语。当此日敌进攻南宫之际，凡我军民应当团结御侮，不意赵部竟如此违背民族利益，给抗战以困难。特恳主席命令赵部速发还此项人枪，恢复救亡团体，并保证此后不再有此类事项发生，以利抗战。如赵万一不听主席命令时，则请电复，以便敝师采取正当自卫之手段。临电不胜待令之至。”为了避开日寇的正面进攻，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随部队转移到广宗一带。当然，鹿钟麟的省府办事处也早已撤走。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鹿钟麟竟乘日寇占领南宫之机，以“不知去向”的罪名，宣布取消行政主任公署，通令各县立即向他的省政府报告工作。他们还大肆宣传“八路军未放一枪放弃南宫”，“省府如何抵抗日寇”，“赵云祥如何应战”等等。事实是怎样的呢？我军从11月15日开始反“扫荡”作战，到30日止，历时16天，进行大小战斗共28次。敌人被我军杀伤在600以上，其中击毙高邑县伪保安队长1名；击毁敌汽车

18 辆，缴获了许多枪支、战马和军用品。我军阵亡营、连、排级干部和政治指导员 44 名，总共伤亡 598 名。而真正“不知去向”的却是鹿钟麟的省府和部队。鹿钟麟等人制造磨擦、蓄意破坏团结合作的恶劣做法，激起了冀南群众的愤慨。徐副师长针锋相对地在冀南发起了反对赵云祥解散新河救亡团体、收缴八路军枪支，反对取消主任公署，拥护主任公署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军、政各级组织在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收复南宫大会，大力宣传八路军击退日寇、收复南宫的胜利。我主任公署也转向南宫办公。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组织了请愿团，向省府请愿保留主任公署。11 月 30 日，朱、彭总司令对冀南的反磨擦斗争作了具体指示：“在敌大举进攻西北时，华北形势将更严重。彼时华北友党友军除汉奸外将更依靠我以图存，即使顽固分子亦有逐渐好转，对我减少磨擦之可能。在取消主任公署问题上拖延时日，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原则。对鹿办法应：一、冀南为我兵员、资材来源及连贯鲁省之要道，我已取得的政权，即使一县、一区亦不可轻易放手，故杨秀峰同志绝不应辞省府委员，更不应离主任职；二、主任公署立即布告群众，以公正态度申诉成立以来之抗战设施，争取群众同情与拥护，对鹿取消主任公署之布告、训令置之不理；三、继续向省府作工作报告，各专员在报告工作时亦可以除逐报主任公署外，同时报鹿；四、避免与鹿武力冲突，如他先向我开枪，则不放过机会，给以有力之打击，随即宣传我系不得已之自卫，在其同意合作后再发还人枪；五、认真搜集鹿违反民意，违抗抗战利益，破坏统一团结的证据。”鹿钟麟手下原来并没有多少兵。他所依靠的，无非是张荫梧、赵云祥、胡和道及一些失意的旧西北军军人。而这些人大多是反共的积极分子。由于这些顽固势力的影响，使鹿钟麟对我们的态度日趋恶化。他活动孙殿英派了一个团和保安三旅进驻枣强北边的肖张镇，以壮声威。接着，他又下令在各县张贴取消主任公署的布告，派人几次催我主任公署结束办公，移交文件、印信；命令各县县长向省府报告工作，上缴办公用费。张荫梧则更为积极，几次催促鹿钟麟撤换南宫县县长，并亲自率部进驻冀中，准备成立所谓“民军区”。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及冀察战区所属部队的恶劣态度，对冀南乃至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极为关注，并于 12 月 2 日指示集总〔4〕及我师：“鹿钟麟本无力量，只有省府的合法地位。看来他们已采取排挤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估计与鹿钟麟合作，必须经过激烈的斗争，否则鹿恐难醒悟。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无法进行，应给以有力反抗。在群众团体中应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揭破污蔑我八路军名誉的行为，与之强硬交涉。取消主任公署事，我们不宜让步，八路军应保护主任公署。由地方名流和群众发起拥护主任公署运动，向中央政府控告鹿之行动及挽留主任。武装冲突尽量避免，但其过分无理时则采取自卫手段。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应广泛宣传，使大众了解我党目前对时局对友党之坚决立场。”为了再次争取鹿钟麟，避免武装冲突，湛厚慈，陈菁玉同志于 12 月 3 日去同鹿钟麟会谈。然而，出面接待的，却是他的一位参谋长。这位参谋长说：“鹿主席的意思是与八路军合作无望，我们今后一切唯有执行中央命令。鹿主席曾说过：现在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请中央调换主席职务，一个是准备八路打过来，他牺牲或者缴枪。”紧接着，孙良诚在卫东大放厥词，不准讲“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赵云祥部则惨无人造地活埋了数名共产党员。鹿钟麟又下令撤换赞皇县县长赵敬扬，任命侯如塘的第十二支队政

训员刘某为赞皇县县长。 12月4日，国民党豫北专员郭仲魁部在博爱县东北许河村伏击我独立游击支队二大队，使我损失500余人。为了打击这伙磨擦专家的气焰，刘师长和徐副师长迅速采取了几个步骤：一是在12月4日将向我进攻的盐山县第四区的民团孙仲文部全部解决，并发动群众向专署请愿公审枪决孙仲文。二是，侯如塘部驻南北漳城的一个团，在12月5日受到日寇的袭击，损失很大。刘师长速令我就近部队以游击姿式掩护该团，并派出工作人员，组织群众进行慰问，以表示只要合作抗战，我军就给予大力支援。三是飞函被鹿钟麟撤职的各县长，坚决不办交代，照常办公。令七六九团速以游击姿式到赞皇以西适当地区活动，以武力拥护主任公署及发动拥戴杨秀峰、宋任穷二位主任的群众运动，向群众广泛宣传杨、宋及赞皇县长收复冀南建立根据地、保护民众等功绩，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组织群众开会、游行，向专员及国民党驻军请愿，向省府及国府送呈请愿书，要求保留主任公署，继续领导抗战。四是派宋任穷同志6日去冀县同鹿钟麟谈判。参加这次谈判的，国民党方面还有河北省党部书记韩梅岭。经过两个小时的谈判，鹿钟麟表示愿意和朱、彭总副司令商量解决冀南问题的具体办法。这时，日军的第十师团已由武汉调回平汉线上的邢台、邯郸地区。蒋介石经鹿钟麟的请求，将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辖第六十九军及高树勋的新八军）由鲁南调至冀南及冀鲁边区。在鲁西北地区，自聊城失守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椿、六区专员王金祥与地方武装势力齐子修、王来贤部勾结起来，控制了聊城周围各县，企图将我第十支队挤出馆陶、冠县、邱县地区，切断冀南与冀鲁豫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夹击的形势。尽管如此，我师仍然遵照军委的指示，本着对友军一贯的友好态度，去电欢迎石友三、高树勋率部来冀南共同抗日，并组织群众进行慰劳。此外，我们还帮助石友三、夏维礼和乔明礼的部队解决了一些给养和被服。他们慑于我军在当地的威望，尚不敢轻易参加磨擦。为了巩固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鲁西北地区的斗争，保障一一五师向冀鲁豫及山东发展，刘师长和侧刚从延安开会回来的邓政委，按照集总指示，于12月21日，率三八六旅主力、先遣支队三大队，进入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直接领导冀南及鲁西北的斗争。

初次教训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国民党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亲日派则在1938年12月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英美派，则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保存实力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中全会通过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在敌后，则以“合法”、“统一”为名，限制我党我军及抗日群众团体的发展。蒋介石还增派大军，妄图向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他们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在日寇日益加紧的诱降政策之下，他们又进行了谋求妥协的活动，大肆散布“和则存，战则亡”的投降言论。在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危险的形势下，我师部到达冀南后，就在南宫县的老虎张庄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由邓政委传达我党六中全会决议。在这次会上，根据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靠广大乡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则明确了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与同盟者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原则。本此精神，刘师长曾于1938年12月26日、1939年1月4日和14日同鹿钟麟进行了3次谈判，向其宣传我党六中全会精神，重申我党我军与其合作抗日的诚意。但由于鹿钟麟坚

持顽固态度，这3次谈判都未获积极结果。1月8日，师首长派刘志坚同志到南宫县的乔村与石友三进行会谈，争取他团结抗日。1月16日和25日，邓政委又亲自与石友三进行了两次会谈。经过一番努力，争取了石友三的暂时中立，孤立了鹿钟麟和张荫梧。2月1日，鹿钟麟和石友三又函致我师云，程潜转来蒋介石电令，要我军依下列办法“调整”之：一、所在地方行政权应一律交还各当地政府，以统一政权；二、其在冀察鲁豫之各部队及游击队应分别受所在战区司令长官或总司令指挥，绝对服从命令，统一指挥系统，集中抗战力量。鹿钟麟在谈判前，已经把冀南各县长的人选都内定好了，从而使冀南绝大多数县都出现了“双县长”、“双政府”的局面。由于我方县长（都是经过民主选举的）都接到拒不办交代的指示，鹿钟麟进而大打出手，竟采取了武装撤换县长的做法。与此同时，鹿钟麟又活动高树勋部跟我军对立，让高委派县长、区长，以武装接受我政权。于是，我在盐山、宁津一带的民运工作人员及区长、县长全部被扣留。很明显，这是他们在华北问题上，于彭副总司令来冀南谈判前施加压力，逼我就范。不久，蒋介石又加委石友三、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并令石“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此外，蒋介石还拨款12万元给鹿钟麟，让他在河北发展国民党组织。而鹿钟麟属下的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统辖赵云祥、胡和道等部）和河北省府秘书长邵鸿基等相继投靠了石友三。石友三与鹿钟麟、张荫梧等人互相配合，网罗地痞流氓，依托反动的土豪劣绅，疯狂地侵占我根据地，向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残酷屠杀我党我军人员和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其罪行累累，可谓罄竹难书。1939年2月22日、23日和3月10、25日，赵云祥部分别在冀县宋家庄、广宗县刘家庄和威县枣科庄，4次共活埋我东进纵队五支队副官吏炳银、李化一及纵队司令部管理员康建修、二团八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昌、王伸元以下共44人。2月12日，我东进纵队二团事务员王茅南等8名同志带马1匹、步枪4支、子弹40余发、大洋64元及一部分军用品，在束鹿与日寇作战时失掉联络。在其南下归队途中，路经新河县的邢家庄时，被国民党民军第十团全部捉去。他们把我方人员的武器、财物抢光之后，一面鸣枪威吓，一面把他们全部推入河中。幸好由于水浅，这8名同志才侥幸逃了回来。5月5日，我师某部队回民连被日寇袭击于馆陶、大名间的公路上。当该连转移到馆陶县善乐村时，被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专员丁树本部保安第三旅偷袭，该连战士60余人被其解除武装，是为“回民连事件”。5月15日，石友三部将我在清河以北所存的迫击炮2门、步枪600余支及许多炮弹、炸弹、军衣抢走。王子耀部则别有高招，他让部队控制住滏河上游的水，不许老百姓随使用水浇地。如果要用水浇地，每浇一亩地必须交给他们3角钱。其“刮油”手段之卑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乔明礼部也不甘落后，在宁晋东北一带大肆搜捕我侦察员数次，以向张荫梧表功。这些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还经常假冒八路军，四出抢劫、绑票、奸污妇女，蓄意败坏我军的声誉。他们还在大营一带贴出了伪造的“奉朱彭复电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主任公署”的布告；到处造谣说，“八路军不打仗，光吃小米”、“八路军不是河北人，却要向河北人民要吃的；他们不会在河北久住，将来一定会逃跑”，“八路军又没有弹药，又没有粮食，就要垮台了，老百姓不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等等。他们还穷凶极恶地吊打了许多乡、村的农会主任，边打边喊叫说：“因为你们是共产党，所以要打！”尤其恶毒的是，他们派人在我驻地水井内投放毒药，企图大批毒害我抗日军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足。我军曾经与鹿钟麟、张荫梧、石友三等人进行了多次交涉，他们仍然没有停止磨擦活动。刘师长对此非常气愤，经常说：“我们对这些磨擦专家太软了。我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在虎狼夹击之间。这只狼虽然不敢惹老虎，可是它敢吃人。不狠狠地揍它一顿，它是不会放下屠刀的。”

在彭总来冀南谈判的前夕，国民党又进一步加强了华北的反共阵容，派来许多受过训练的国民党员到鹿钟麟、孙良诚、赵云祥、胡和道等部当参谋长；任命朱怀冰为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

这时，张荫梧看鹿钟麟在政治上准备得多，在军事上办法少，就跃跃欲试，想大显身手，取代鹿钟麟的地位。他先后在冀南设了3个办事处，每个处都行使专员职权，任命乔明礼为束鹿区办事处处长，尹开夏为冀枣区办事处处长，王子耀为隆尧区办事处处长，并指使他们同我抗日政权制造磨擦。

在鹿钟麟、石友三和张荫梧各施计谋之时，新五军孙殿英部则比较收敛，他似有被争取中立的可能。5月16日，刘师长指示陈赓同志去和孙殿英会谈。行前，刘师长向他交代了两点：一是我们在华北要互助，坚持抗战，我们始终患难朋友，防止有人挑拨，现在要解除以前的误会，二是粮食问题，彼此要商量一个互济的办法。

26日，陈赓同志回电报告说，孙殿英对我表示很好，要求我们最好能派一位参谋住在他的军部，有事情好联络；并要和我们建立无线电联系。孙殿英还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并希望朱、彭总副司令指挥他的部队。陈赓同志与孙殿英会谈的成功，对我们集中力量打击鹿钟麟部是非常有利的。5月下旬，张荫梧、赵云祥、乔明礼、王子耀等部麇集在深县、束鹿之间的磨头、南北马庄一带，扬言要以武力取缔我抗日政权机关。他们一面和皇协军〔5〕谈判，以获得他们的暗中支持，一面威逼我冀中部队让出防地，暗中准备突袭我冀中部队。刘师长和邓政委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狠狠地回击一下。22日，我早有准备的冀中七支队，突然将这些“磨擦专家”们包围。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诸部击溃，俘敌700余人，获长短枪300余支。乔明礼负伤后被活捉。张荫梧和赵云祥等见势不妙，化装逃走。其残部又流窜到了束鹿以南的郊西、倪家庄、邢家庄、东西花里庄一带。这次战斗，给我们受压已久的部队出了气。下边部队有的还想趁势打下去。刘师长说：“看来，这个磨擦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我们原则上还是从政治上解决。这次狠狠地教训他一下，也是为了谈判。如果单从武力上着手，来个快刀斩乱麻，在运用失着时会得出相反的效果。目前，我们对石友三部还是要争取，对鹿钟麟则保持现状，看看谈判结果再说。在彭总到冀南之前，我们应该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磨擦。”

彭鹿会谈

彭副总司令于5月下旬来到冀南，26日同鹿钟麟进行了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彭总代表八路军总部，既坚持了严正的原则立场，也对河北省政府和冀察战区作了一定的让步，表现了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和为了民族利益而牺牲的崇高精神。谈判开始时，彭总在军事问题上提出了3点意见：一、冀察战区总司令部应以八路军将领担任一副司令职。这样做，不仅可以密切冀省军队的指挥关系，亦可密切察省的指挥关系。二、八路军部队，在冀南的，归刘伯承指挥；在冀中的归贺龙及吕正操指挥。由鹿钟麟指挥刘、贺、吕3人。三、冀察战区总司令部对冀察两省八路军作战的指挥，须经过八路

军总部转属各部执行。鹿钟麟说：“彭副总司令所提办法，第一、二两项可以同意。但是第二项办法中，似应补充一点，即八路军所组织的地方游击队，应该改为保安队，以便统一。”彭总答复说：“我认为，游击队系积极抗日之武装组织，官赖以维系人心，镇压汉奸，打击与削弱敌人，为巩固敌后抗日政权之重要支柱。而保安队则是消极性的，是仅仅维持治安之自卫组织，不适合在敌后抗战的需要。改名之事，还请三思。”在谈判政权问题时，鹿钟麟说：“冀中、冀南两行政主任公署，本省府早已明令取消，如今兄弟很难收回成命，希望彭副总司令本国家行政统一之精神，协助省府处理此事。”彭总义正辞严地答道：“冀中、南地区现正面临日寇残酷进攻之际，许多县城均已陷落，交通具被敌封锁。吾人所能保者，惟有乡村而已，所能做的，则是破击敌所占之交通支点。其艰苦之情，虽省府居高直接领导也势所难能。况且该两主任公署有抗战历史，有优良政治，深入民众信仰，又有相当武装，当此艰苦危机之时，端赖其领导支持，如将其取消，损失莫大。我意暂保留冀南主任公署，由省府再派一位副主任充实之，实现共同领导。至于冀中主任公署，则由冀察边区政府领导，改为省府直接领导。石家庄（含）北平段平汉路以西地区，为指挥便利计，仍归冀察晋边区政府领导。不知鹿主席以为如何？”鹿钟麟对此项意见，表示不宜采纳。于是，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接着谈判关于撤销双专员、双县长的问题。彭总说：“自从日寇残酷进攻以来，省府所委派的专员、县长多数离职外走，也有始终未到职者。而原有之专员、县长则皆不离职守，艰苦抗敌。为了主持公道，似应维持原有之专员、县长，由省府加委，以奖有功。”鹿钟麟没有料到彭总会这样巧妙地回答，愣了一下，很尴尬他说：“双专员、双县长并非本省府所为，乃被撤职之县长拒不交代公务所致。以省府名义所委之专员、县长是合法的，故应留职。不然，本省府职权安在？”彭总又说：“撤销原县长职务是不公道的。如省府不肯加委，那也应推行民主政治，各县县长由民众选举，其中得票多者才能留任。”鹿自知他们委派的县长没有群众基础，便说：“省府命令早已公布，再进行选举为时已晚。”就这样，双专员、双县长的问题由于鹿钟麟的顽固态度，仍然没有达成协议。随后，彭总又提出了双方停止磨擦的八项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停止武装冲突，进行政治解决，各驻军如何统筹解决筹款、筹粮等问题。由于八路军的意见公道，并且又作了让出一定的防地、在根据地内帮助友军解决一部分筹粮、筹款困难等方面的让步，鹿钟麟也表示基本上同意这个纲领。但他对彭总提出的筹款筹粮要公平负担一项表示不同意，主张搞什么“摊派”，此外还提出建立“保甲制度”。这两点，均遭到了彭总的拒绝。这次谈判，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站到了主动地位。我们的做法，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部分开明士绅的同情与支持。鹿钟麟等上层人物在谈判后，暂时有所收敛。但是他们仍然在幕后指使下层继续在有双专员、双县长的地区推行“摊派制度”和“保甲制度”。由于局势稍有缓和，被冀中七支队俘虏的乔明礼的部下，几次派人到汪乃贵支队处求情，请汪乃贵同志出面调停，释放乔明礼。刘师长提了一个建议说：“应乘此机会设法争取乔明礼。释放是可以的，但要跟他谈好。如果他回去以后能公开反对张荫梧，或与我们建立抗战共同纲领，即可还枪释放。”7月底，宋任穷同志到河间县把乔明礼接到了南宫，热情地款待了他。经过几天的谈话，乔明礼表示尚好，他说：“我本来对张荫梧的做法就不满。此次如能回去，一定劝说张荫梧和八路军合作。如果劝说无效，也只好离开他另谋前途。我希望临

走之前能面见刘师长。”刘师长因为工作忙，不能会见他，就请杨秀峰、宋任穷、王宏坤同志代表他向乔明礼表示慰问，并希望他回去后不要再搞磨擦，共同抗日。我们还答应帮助乔明礼部每月解决经费 7000 元、棉衣 5000 套；并划藁城、晋县、栾县和赵县为其活动区域。乔明礼似为此而感动，又一次表示说：“兄弟回去，对张荫梧一定要有所行动，决意批评其磨擦行为。而兄弟我今后决不参加张荫梧的反共漩涡。”临行之前，他给刘师长拍了一封电报，表示感谢。不久，国民党党政军委员会委派到河北省帮助调解双方关系的中央视察员宋君仁、范锦等 3 人也来到冀南。8 月初，宋君仁曾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来访，说是要征求各方意见，以求解决河北问题，并提出请杨秀峰同志担任省府民政厅长。宋君仁还准备在石友三处召集一个座谈会，邀请杨秀峰同志参加。杨秀峰、宋任穷同志认为，这其实是鹿钟麟企图用民政厅长的位置来引诱我们，以便从下层着手，逐步破坏彭、鹿谈判的成果。因而，没有同意宋君仁的提议，只表示可以去参加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宋君仁提出了一些解决河北问题的具体办法。其中关于行政机构一项，大意是：一、强化省府机构，容纳各党各派，以能促进河北各级军事政治真正合作为原则；二、主任公署问题，按照当前实际抗战工作需要，冀中、冀南两公署取消，以合行政系统；三、双专员问题，可从拒不交代之专员中由省府择优留用；四、双县长或更多县长之县区，可由民意机关选举，由省府加委，尔后县长由省府委任。这个办法看来似乎公允，实则仍然是倾向于省政府的。为了慎重起见，杨秀峰、宋任穷同志没有作正面答复，表示河北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报告朱、彭总副司令，请他们指示解决办法。1939 年夏天，就在拖延和表面缓和的气氛中度过了。

严惩张荫梧

蒋介石等人表面上搞了一些政治解决办法，暗中却在酝酿更大的磨擦活动。蒋介石为了网罗反共势力，在河北准备起用张允荣，事先曾征求鹿钟麟的意见。鹿钟麟给蒋介石回电说：“欢迎张允荣到河北省府担任民政厅长〔6〕。”蒋介石却一时舍不得张荫梧这个磨擦的急先锋，又复电鹿钟麟：“现在张荫梧与八路军冲突甚烈，如马上发表张允荣代替张荫梧任民政厅长，似乎有助八路军气焰，故张允荣的厅长职务稍后再发表。”张荫梧得知蒋介石为他撑腰后，对我磨擦则越搞越凶。他的民军部队到处破坏我抗日政府，造谣污蔑我们是什么“伪抗日军”和“伪抗日政府”，并且公开宣传说：“八路军游而不击”、“现在蒋、毛决裂，蒋委员长不抗日了，要反共反八路军了。”因此，他们的口号是“专打八路军”和“剿共”，还提出要“限共、防共、杀共、罚共”。他们对抗日群众团体负责人、村长、农会主任及八路军军人家属肆意毒打，勒索钱财，对我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家属每个罚款 50 元至 500 元不等。还是在 8 月 1 日，张荫梧就指使部队包围我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队，捕杀我工作人员 10 多人。紧接着，他于 8 月 12 日又派出 3000 多人，向我驻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二大队发动进攻。张荫梧还大肆散布“曲线救国论”，暗中与日寇及皇协军进行勾结，秘密订立向我军进攻的协定。铁证俱在。我军曾经缴获了张荫梧属下韩祖光的两封密信。其中一封信公然称我军为“伪抗日军”，另一封信则是他们勾结皇协军的详情。8 月上旬，刘师长和邓政委召集我们研究对付张荫梧的办法。由我先把最近其他顽军对我磨擦的情况作了简单的汇报：“石友三近来同我磨擦加剧。7 月初，他曾委派辛海岭为清、广、邱、威、曲五县保安司令，在威县制造磨擦。庞炳勋

过去曾经与汪精卫、张慕陶有密切的关系。庞最近在群众中宣传‘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绝不会卖国。他与日本接近是中央有其他用意’，‘有人说汪精卫卖国叛党，纯系八路军造谣。’孙殿英看着别人与我磨擦，也不甘寂寞，纵容其部下同我磨擦，并且和汉奸、伪军暗中勾搭。他的第八支队李光第部接受了伪军的50000元经费，还请伪自治军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住在支队部‘指导工作’。李光第在8月1日曾派出200多人，在武涉公路上从后面偷袭我先遣支队的两个连，夺走我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8月2日，还是这个李光第，派了500余人到小瓮岭以西山地，又将我先遣支队的那2个连，还有独立第二游击队全部包围，大有消灭该部的模样，情况很危险。王子耀部也抢了我军许多枪支、军用物品，活埋、枪杀、击伤我指战员多人。他们还假冒八路军名义进行绑票，派便衣到我们部队里拉人，有一次将我九支队五连长拉去拷打了80多棒子。”邓政委非常气愤他说：“这些M·C〔7〕”专家们欺人太甚了，应该教训教训他们。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我们的部队都叫人家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独裁了。我们还是政治的、军事的双管齐下。对这几个人，也要区别对待。对石友三、孙大麻子〔8〕，目前可以先不动他，以争取为主。对搞我们最积极的张荫梧和王子耀，这次要毫不客气地打击他一下。政治部门要搜集张荫梧等人反共、通敌的罪行材料，要确凿，无懈可击，报给集总。建议朱总和彭总给蒋介石去电，陈述张荫梧的罪行，要求撤他的职。这样，我们就可以占住理了。”刘师长说：“这就叫作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子看。谁搞M·C最凶，我们就迎头把他打回去。”

8月13日，刘师长在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

在讲到磨擦问题时，他说：“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因此，磨擦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目前我们每一个干部要学会对付磨擦，叫作‘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对张荫梧之流疯狂反共的顽固派，我们的办法是所谓‘必要的磨擦不可无，不必要的磨擦不可有’。具体做法呢？10个字：‘争取、说服、瓦解、孤立、打击’。太行山，是战略的据点，敌人和顽固分子都重视它，争夺它。我们一定不能让步，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目前，我们要孤立、打击的是张荫梧这位专搞M·C的‘英雄’，为我们被杀害的阶级兄弟报仇！”

这次打张荫梧的任务，交给了独立一团、青年纵队三团和冀

游〔9〕，由刘志坚、汪乃贵等同志指挥。并派陈锡联、谢富治率七七二团、七六九团担任配合，在路东堵击残敌，以求彻底消灭张荫梧部。另派徐深吉同志率领两个团靠黄北坪地区开展工作。打王子耀部的任务，则交给了青年纵队。

8月16日，我军即开始向在赞皇、元氏地区的张荫梧部队进

行反击。反击张荫梧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一方是要消灭八路军，想打出个样子给主子看；一方是早就憋足了劲头，非全部将顽军消灭不可。战斗进行了几天，到24日，张荫梧部终于招架不住，率领残部约1200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赵县方向逃窜。而我军则俘其部2000余人，缴枪1200余支。25日，张荫梧残部逃到赵县县城以北10余里的江安、鸣家庄、李庄和周家庄一带。我东进纵队第八支队第二、三两团共5个营和李林部2个营即于当日拂晓赶到了关化镇以南，他们不顾冒雨连夜行军的疲劳，马上包围了张荫梧残部。部队按照师首长指示，27日终于在赵县东北的唐家寨将张贼残部消

灭。张荫梧本人落荒而逃。他那股反共的凶焰、此时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同时，我青年纵队一部在任县邢家湾地区，消灭了猖狂一时的民军独立旅王子耀部。

战报传开，人心大快。

党中央接到我师胜利消灭张荫梧部的报告后，于8月28日指

示全军：“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的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屡见不鲜。应当估计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向我进攻的行动者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三、在武装冲突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必须占到上风，有正大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则必须提高警觉性，免遭袭击，不随便给中级干部以武装冲突的权限。”

与此同时，程潜〔10〕致电集总，命令我将冀南7个主要县划给

张荫梧作防区。这种无理要求激起了我军的极大愤慨。朱、彭总副司令就此事先后给程潜发出两封电报，痛陈张贼罪行，强烈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蒋介石在我军强烈要求下，在铁一般的罪证面前，不得不忍痛

割爱，于9月19日明令“着张荫梧停职查办”，将其军队交鹿钟麟、高树勋收容整顿。后来，鹿钟麟委任乔明礼代理民军司令职务。

没过几天，国民党中央因鹿钟麟未能收拾河北局势，准其辞去

河北省主席职务，由庞炳勋继任。鹿钟麟卸任后，偕孙良诚去重庆述职。冀察战区总司令一职仍由鹿钟麟担任。

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晋冀鲁豫

张荫梧自从遭我覆灭性的打击和被蒋停职后，一蹶不振。石友三则幸灾乐祸，乘机扩大势力。他为了与沈鸿烈、丁树本两部互相靠拢，以形成一个隔断我冀南、冀鲁豫间联系的反共根据地，9月间，就把新八军高树勋部由冀鲁边调至观城、濮阳地区。其原来驻在枣强、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的六十九军，也竭力向西南发展，不断向我军进行军事挑衅。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一旅齐子修部的反共活动日益加剧。齐子修曾两次派亲信（军需官）单抗洪到博平城与日寇谈判，以台击我军筑纵〔11〕为条件，让日寇给他补充枪弹和允许他进驻博平城内整训。齐子修穷凶极恶地指使部队活埋我筑纵战士78名、侦察员1名，枪杀我请假回家的战士1名；绑架我先遣纵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解长泰的家属，罚款15000元之巨。此外：还掳走该纵队战士家属10余名。在反抗过齐子修的地方，他公开下令部队“自由”3天，对当地群众大肆烧杀、奸淫、抢劫。齐子修自知力量单薄，就让部队到处张贴欢迎石友三、高树勋的标语，大表其投靠之情。为了使武装冲突不再扩大，10月16日，刘师长、邓政委和蔡主任〔12〕又进一步指示冀南的同志，强调“目前的重心应加强统一战线，调剂各方及士绅关系。这一工作要在团结鲁西北力量，准备应付敌人新的‘扫荡’口号下进行。我们的一切应站稳抗日而不是对内的立场，对磨擦也仅是自卫的立场，这样去孤立对方，以便于在有利时机求得适当解决。一切急躁不耐心进行统战的艰苦工作的倾向，都必将使自己陷于孤立与极困难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师首长对统一战线的维护和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抱有极大诚意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1月1日，国民党的六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蒋介石为了麻痹我们，在此前不久曾经公开对新闻界说：“国共两

党本无事。地方磨擦，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宣传，更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日本人就是无事也要造谣。”他还对我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说：“中央绝不会再剿共。如果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如果要反对中央，那就是中共的失败。〔13〕”他的两面手法玩得何等妙哉！国民党的“限制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制定之后，原本就非常积极的磨擦专家们，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我军进攻了，首先动起来的，是国民党冀察游击纵队夏维礼部和别动第四纵队侯如墉部，该两部共 3000 余人，于 11 月 16 日开到沙河以西的渡口、册井一带，进行反共活动。我根据地各民众团体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面前，纷纷组织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在太行、太岳各县举行集会，公开谴责蒋介石、阎锡山的分裂投降活动。在人民群众的抗议之下，他们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大打出手。11 月 21 日，国民党二十七军在高平鲁家村用机枪扫射请愿群众代表，当场绑架代表 7 人。鹿钟麟为了策应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北进，撤换了我沙河县县长，设立了沙河县“第二政府”，并委派了一个邢台专员同我们作对。群众对这一做法极为不满，自动起来进行请愿示威。23 日，侯如墉部的于衍支队竟肆无忌惮地在册井打死打伤请愿群众百余人，一手制造了“册井惨案”。此后，国民党委派的铜山县县长耿继勋，将我铜北办事处及独立营 200 余人包围缴械。顽固派的强盗行径，引起了根据地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分裂投降、反磨擦斗争的高潮。蒋介石慑于舆论界的压力，经我集总一再抗议，不得不在 10 月 24 日将臭名昭著的张荫梧正式撤职查办。同时，任命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任命乔明礼为河北民军总指挥。朱怀冰取代了张荫梧的民政厅长之职以后，本应牢记前车之鉴，不再重蹈覆辙。但是他忘乎所以，自恃有一个正规军的武装，根本不把我军放在眼里。在他就任民政厅长的第三天，即 11 月 26 日，就率部由高平、陵川、辉县向北挺进，直逼我太行山根据地。30 日，石友三派出其独立四旅进至束鹿、宁晋地区。这就形成了对我太行区东、南两面夹击的态势。很明显，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要消灭或者把我军从晋冀鲁豫地区驱逐出去，然后建立正太路、德石路以南的反共地带，以隔断我军西北、华北与华中的联系。没过多久，在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阎锡山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政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纠集了 6 个军，并请来 5000 多日寇同他配合。从 12 月 16 日到 26 日的 11 天内，他们摧毁了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 7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袭击了第五专署、牺盟会长治中心区和《黄河日报》上党分馆等机关，屠杀了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达五六百人之多，被绑架的也有 1000 多人。一刹间，反共的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我抗日将士的鲜血洒遍了晋东南大地。这是日寇所想做而做不到的！12 月 23 日，驻在沁水、阳城、晋城、高平地区的决死三纵队主力，由于领导同志事先缺乏警觉，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孙楚的策动和顽军的进攻下，内部的反动军官发生了叛乱，拉走了我们 3 个多团和纵队直属队一部，大约 4000 余人。还是在 12 月初，朱怀冰部和阎锡山遥相呼应，命其先头两个团开往邢台、内邱以西一带，企图控制邢、沙、永、曲、肥〔14〕地区。高树勋部则以南乐、朝城为基点向北发展，打算与在冀南的石友三部衔接。而石友三则又以袭击石家庄为名，派其一部进驻我冀南一分区的晋、束、赵、栾〔15〕一带，与侯如墉部共同控制了路西、路东地区，还委任了景兴周为隆、平、赵、栾地区的专员。师首长立即部署反击顽

军进攻的准备工作，并一再叮嘱部队各级干部：“磨擦重点在太行山。望令各部星夜到达指定地点，勿忽！”朱怀冰非常狡猾，得知我军要包围他后，就立刻改换了部队的番号和标记，把他的军直改成了十旅，九十四师改为一旅，新四十四师改为十二旅，野战补充团改为五旅，等等，企图迷惑我军。他们叫嚣“创建根据地，驱逐八路军”，到处派兵抢占我军要点，包围我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抢夺我军粮食物资。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2月下旬，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进攻陵川县抗日民主政府，配合孙楚委派的长治县县长聂士庆进攻我长治县公安局。石友三部又袭击了在威县东北贺剑地区的我军医院。乔明礼看风使舵，此时也违背了自己三番两次许下的诺言，忘恩负义，与侯如墉同流合污，向我发起了进攻。乔明礼还请伪特务机关派来一个叫阎记录的，担任他的支队长，在束鹿县屠杀抗日群众。月底，师首长决定回击侯、乔二部，并要我和谢富治具体指挥此役。刘师长指示我们：为占先机，便于抽调太北〔16〕部队南移，配合太南〔17〕斗争，可让七六九团于12月31日北移，会合独立一团形成夹击力量；独立二团主力于1月2日北移，接替独立一团的防务；青年纵队主力于12月30日到涉县接替七六九团的防务。此外，刘师长还电请集总通知吕正操、程子华同志率部消灭路东的一部分顽军，以配合我们的行动。1月12日，侯如墉、乔明礼两部共6000余人，向我驻在赞皇地区的范子侠部开始了攻击。于是，我们的反击战打响了。当时，乔明礼部的第二、三、四、五、七等支队都住在几个羊杯村及司马村、朱家庄、大尖庄、苏庄一带，乔明礼本人住在羊杯村，带着大约2000多人。我们派警备旅担任消灭乔明礼驻羊杯及朱家庄部队的任务。该旅由南智丘村出发，经过秋雯寺、郎口后，于清晨6时和乔部接火，仅打了3个多小时，就将其大部消灭。乔明礼只带了300多人落荒而逃。其余残兵抵抗到下午4时，终被警备旅全部解决。我第二十一团、二十二团及李林部担任消灭驻在苏庄、大尖庄、大安村、司马村的乔明礼部队的任务。他们分别以两个小时解决了战斗。范子侠部在赞皇一带回击侯如墉部，也将其大部消灭。13日，我军又继续追歼侯、乔部残敌。阎记录部在我追击时，跑得最快，逃到石家庄附近投降了日寇；侯如墉的第十三支队一部也投降了栾城的日寇；另有200余残敌亦投降了日寇。其余少数残敌则逃散在各村。正当我军追击侯如塘残部时，日寇为了救援他们，分别由赞皇、元氏、石家庄、获鹿、井陘、昔阳等地，共出动2500多人，以飞机配合，分九路合击我军。师首长命令我们回击日寇。我军马上掉过头来同日寇展开了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侯如塘就在此时趁机逃走，到赞皇县城投靠了日寇。这次战役，将滏北及平汉路东的侯如塘、乔明礼部共计8000余人大部击溃，俘虏了1500百多人，击毙了侯如塘的参谋长李智、第七支队司令韩忠义和第十一支队长陈宪香。我军还缴获了长短枪800余支，轻重机枪各一挺，子弹上万发，牲口50多匹。其中缴获的炸弹足足拉了50车。我们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了副营长以下30余人。由于这次胜利的影响，朱怀冰自觉孤军难保，于2月初同鹿钟麟一起缩回武安、涉县、磁县地区。我太北阵地由此得到了巩固，也为集中力量反击太南顽军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反击前的准备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自认为羽毛已丰的石友三，从盘踞冀南的枣强、南宫、巨鹿、广宗、威县、清河等地以来，其吞噬我根据地的胃口越来越大，反共的手段也越来越毒辣。他与日寇密切联络，互相交换情报，还从天津邀

来一个叫吉田的日军少佐担任他的顾问。他指使部下暗杀了我军外出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不计其数。他最近不断包围我零星部队，强缴我枪支，吊打我官兵，策动我新收编的部队逃跑，等等，可谓坏事做绝。仅据 1940 年头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石友三部杀害我八路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及抗日干部和群众就达 200 多人。我在威县、广宗等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救亡团体，有半数被其破坏。石友三是个有名的流氓军阀，所以他的反共言论也颇具“石记”特色。例如，有一次石友三在动员部队进攻八路军时，说：“过去在山东时代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现在亦是利用日本发展自己。”他散发了大量的《告官兵人民书》，其中说：“我们是赞同马列主义的，我们看事物的方法也是唯物辩证法。我们不反对马列主义，不过只反对共产党，因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国情。”“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共产党是俄国的走狗！今天的做法，一切都归罪于共产党！”等等。为了维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崇高威信，打击石友三的嚣张气焰，刘师长、邓政委决定把石友三部队作为目前的打击重点。正在我军进行新的反击准备工作之时，蒋介石于 1 月 19 日命令孙楚进剿三、五两区的决死队〔18〕，并命令八路军离开太南与太岳，说是“以免发生误会”。朱、彭总副司令当即致电蒋介石等，提出抗议，表示太南、太岳的八路军决不能离开；坚决反对进攻决死队。朱、彭总副司令还指示我师，即派陈康同志率领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两个团移驻太岳，与决死队会合，同薄一波同志统一指挥太岳的八路军和决死一纵队；如果对方胆敢发动进攻，则以决死队名义坚决予以回击。刘师长向陈赓同志交代了任务之后，对我们说：“现在的仗是不好打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者叫做‘按下葫芦起了瓢’吧。我还得出去走一圈儿，找鹿钟麟、朱怀冰他们谈谈，叫他们不要插手，至少争取在我们打石友三的时候中立。你们可以先草拟作战部署，等我回来后，看看谈的情况再最后下决心。”1940 年 1 月 20 日，邓政委在桐峪召开的全师卫生大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说：“现在时局已到了严重危险的程度。目前，投降妥协局部分裂已成事实，反共更加严重，由过去‘防止异党办法’的以政治为主，转而为‘处理异党方案’，以军事为主。现在的讨逆斗争，并不是内战，而是联合不愿投降的资产阶级继续回头抗战。这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资产阶级也有它相当丰富的反革命经验，特别是其麻醉、毒辣、狡猾的手段，是要我们的同志充分注意的。中国今天的抗战，正处在十字路口，正在激烈斗争中。时局尚未最后绝望。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我们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准备应付随时可能来到的突然事变。突然事变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全国下大雨，一是部分地到来。无论是哪种突变，我们仍然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邓政委简短明晰的讲话”给全师将士以根深刻的启迪，特别是使同志们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当前投降妥协和反共的逆流，从而迅速提高了同志们的斗争信心。翌日，刘师长风尘仆仆，回到了师部。不用说，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谈判的结果。刘师长顾不得休息，就对我们说：“原先，我还考虑可否争取石友三、高树勋两部中有一部分起义。可是，自从蒋介石下达了要太南、太岳地区我军一律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命令后，反共形成高潮，连乔明礼都转过去了，起义恐难实现。能争取他们中立已经是很困难了。”我说：“朱怀冰是在陈诚指导下主持 M·C 大计的。他很重视特务工作，要依据太行山向我收复失地。

前些日子他还说‘八路军长胖了，将到处走到，不要再搞扩大了’，不知道这一次他是什么态度？”刘师长说：“我对朱怀冰说，八路军现在是壮大了，但是由于打日寇，缴获了日本装备武装起来的。八路军所以能发展，也是由于根据地人民的支持。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都是八路军和人民用鲜血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我们以大局为重，一让再让，已经是退避三舍了，现在也实在无地可退了。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吧？我们一二九师一个师抵御了10万日军和十几万伪军，并非怕你们。不过，我们为了团结抗战，不忍同胞自相残杀。要是有人逼我们太甚，我们是有根据地的人民做后盾的。朱怀冰却支吾着说：‘陇东、晋南、沙河事件〔19〕，都是局部问题，刘师长不要看得过重嘛，这都是下边不听约束搞起来的，是兄弟对部下管束不严。再说，我们在地方搞民选政权，也是为了和八路军比进步，也是为了抗日呀！’”蔡主任很气愤他说，“没想到朱怀冰厚颜无耻到了如此地步。鹿钟麟辞职后搞磨擦不大积极了，现在的心境和朱怀冰总不大一样吧？”刘师长说：“鹿钟麟已经察觉他在受监视，对特务人员把持他的部队很不满。这一次他对我说，冯玉祥过去曾经对他说过，‘要远看30年后发展的世界。’第三党人程星龄对他讲，现在的投降运动可厉害呀，你要当心。鹿钟麟极力向我表白他不愿投降日寇，但要我帮助他解决河北问题，说‘希望伯承兄让兄弟在河北问题上过得去呀！’他还向我打听各方面的消息，要苏联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表。看样子有想和朱总、彭总再见面谈谈的意思。他的态度比朱怀冰要好些。只要他不动手，我们还是争取他。”我们正说着，邓政委走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话：“朱总和彭总来电报指示我们，现在朱怀冰已经南撤，高树勋尚在卫东，离石友三较远，正是消灭石友三的好时机，要我区集中兵力坚决消灭他。”

冀南反顽作战

作战会议开始了。刘师长说：“这个石友三，我们是非教训他一下不可。李参谋长，请你把打石友三的方案说一下，然后再研究。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今天就给各部队发通知。”我汇报了司令部草拟的初步方案：叛军石友三部直属特务旅、一八一师、暂编三师及孟昭进旅、张东臣旅共约12000人，加上孙良诚、赵云祥、邵鸿基的部队4500多人，分驻于枣强、南宫、威县、清河地带。他们同日军均有秘密协定，由“互不侵犯”发展到了“防务交换”，以共同消灭八路军为目的而达成了默契。石友三等人已经公开说，他们要先发制人，就是要先下手向我们进攻。叛军现在的位置是：石友三部的的主力孙良诚部位于卫河以西；高树勋部主力集结于卫河以东的观城。他们构筑的碉堡工事都比较坚固，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我们设想，拟集中主力把石友三部歼灭在卫河以西，并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它。接着我又提出了部署作战的具体建议。师首长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之后，迅速地作出了决定，要点是：一、石友三既已向我进攻，目前重点应放在打击石，并求得逐渐消灭之。二、由徐深吉、吴富善同志率领东进纵队第一团、青年纵队第三团和特务营，限于6日前到达丘、威间〔20〕，并指挥三八六旅补充大队、三分区地方武装、先遣纵队第一团、牛连文团，由南向北打击石军；请吕正操、程子华同志速派3个团以上的兵力进至枣强以南地区；鲁西北对高树勋部采取箝制姿态，但仍与之保持联络。以上各部统归宋任穷、王宏坤同志指挥。三、应用坚强的小游击队，分途不断袭扰，激其出堡垒，在运动中消灭之。不可能一口吞下，应咬一口算一口。用一切方法消灭其特务机关，

挖其耳目。1月31日当天，我们就把师首长如上的指示传达给了冀南军区。第三天，师首长又下达了冀南反顽战役的基本命令，进行了更具体的布置，并指定本战役由程子华、宋任穷同志指挥。刘师长一再叮嘱冀南参战部队，要把整个战役中心放在消灭石军全部，卫河西岸的作战要从敌腰软弱处砍断，打乱其长蛇阵；卫河东岸的作战，应隔断石友三、高树勋在卫河两岸的策应，重心在打高部；右翼队主力的任务是打击李有科部，并防石友三部东渡；杨勇支队主力，应逼近和消灭在观城的高树勋本部，特别吸引其清丰、郟城两个团的增援，在运动中消灭之。在冀南反顽战役开始之前，师部收到了两份振奋人心的捷报：一个是《打叛军金宪章要报》：叛军新二师金宪章部约2000人，1月31日由正太路北边向南，想会合薛文教旅后，再经由马坊、石拐到洪（洞）、赵（县）以西地区进攻我军。但是，金宪章却没有料到2月3日就在马坊被我独立支队拦腰截击。叛军慌忙丢下4门炮和70多支步枪，匆匆南逃。我独支遂跟踪尾击。到5日清晨，我预先埋伏好的三八六旅第一团，在榆社以北的赵玉村、仰天村对该股叛军进行伏击，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将其全部击溃，估计叛军伤亡约80余人。我们俘获200余人、步枪100多支，轻、重机枪3挺，还有电台、电话机等不少军用品。金宪章收拾剩下的人马向北退去。当我军追击至马坊时，叛军却在由平定县出援的日寇掩护下，逃到平、辽公路以东地区。我军在追击途中缴获了叛军第三旅旅长许绍祖致平定县日寇的一封密函，当时就派专人报送了集总。叛军于10日逃至宋家庄、白鹿角村之时，又被我冀游及先遣纵队第二大团截击，生俘其200余人，缴枪200多支、轻重机枪6挺。我军乘胜追击，地方部队在沿途进行侧击，又将其击散一部。最后，金宪章的2000人马只剩下700余人逃命去了。第二个是《消灭叛军薛文教要报》：叛军暂编第二旅薛文教部，大约有1500人。他们由晋西北到太原东山与日寇接头后，即以太原为后方，1月15日开始向榆次东南方向的崇原、坑西、上下黄彩一带袭击我抗日游击队，摧残我抗日民众组织。我军三八五旅的两个团（欠1个营）、三八六旅第一团及独支队的兵力，以决死队的名义出现，于1月30日深夜，以奔袭手段，从南、北两个方向兜击该股叛军。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该旅叛军一败涂地。我军当场击毙了旅长薛文教、副旅长赵武才，还击毙了1个团长、3个营长、4个连长和薛文教的副官，生俘450多人，缴获长短枪320余支，轻机枪19挺，各种子弹8500余发。从缴获的文件中我们才得知，薛文教旅是奉阎锡山的命令到洪、赵一带集中，以准备进攻新军〔21〕的。这两个战报，使我军反顽作战的信心大为提高。冀南反顽作战，原定于2月11日开始。但是，石友三得知金宪章、薛文教两部被袭之后，于9日秘密南窜。师首长得到情报后，立即电令我参战部队猛烈追击与堵截。11日，我青年纵队的七七一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队在清河以西的狼窝消灭了孙良诚部的1个团。我东进纵队第二、三团及冀中第二十三团在威县东北的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三师激战，歼灭了2个营，其余部队也大部被我击溃。我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和三八六旅第四团在清河西南的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的第一八一师激战了一整天，从而阻滞了顽军的逃窜。随后，我们便将叛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的下堡寺、马鸣堂、窑安镇地区，向其发动了猛烈围攻。不长时间，就连续攻克被顽军占据的村庄多处。13日，孙良诚带了3000多人突围。他们逃过卫河后，到南乐地区向丁树本部靠拢。而石友三的主力由于伤亡较重，于15日夜突围向西逃走。我东进纵

队主力、青年纵队的七七一团与冀中赵（承金）谭（冠三）支队共6个团，立即在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16日同顽军激战于曲周东北的南、北大堂村。我冀南部队的另外5个团及冀中刘支队、津南自卫军等部，也由邱县东面向西南急进，截击顽军。正当我乘胜追歼顽军之际，早有默契的日寇为了掩护石友三部，由广平、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几个据点出动了日、伪军1000多人，突然到了广平、邱县之间的平固店一带，以阻止我追击叛军。我冀南军区政治部遂被日寇冲散。但是，我军仍然十分英勇地击溃了这股日寇，继续追击石友三部，于17日追至曲周地区。日寇见未能阻我前进，就再由威、邱两县调出1000多兵力，同前一股加在一起，共约3000人左右。他们分数路到东目寨、下堡寺一带，并且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向我追击部队大肆施放毒气，并朝我后尾猛攻。就这样，我军陷入了敌顽夹击的境遇之中，伤亡增大，许多人中毒，如再前进则非常困难。而石友三乘机带着残部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东南地区，与丁树本、高树勋部会合。刘师长和邓政委为了防止部队增大伤亡，遂下令暂时停止追击。这时，石友三部、孙良诚部除被消灭、击溃7000余人外，尚有8000人的力量。战斗结束后，刘师长对我说：“这次由于虎狼夹击，我们才没有全歼石友三部，但是也达到了‘咬一口算一口’的目的。”

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计划的制定

1940年2月初，蒋介石为了发动对我军的新的进攻，令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据守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与石友三、丁树本及山东的沈鸿烈等部相呼应；增调第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向太南开进，待该两部到达冀南后，以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由南而北向我太行、冀南大举进攻。集总为了对付这一次新的进攻，抽调了晋察冀边区的兄弟部队一部进入太行区，加强我军力量。2月下旬，顽军方面的第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在黄河以南，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还未北进；鹿钟麟辞去河北省主席职后，搞磨擦已不甚积极；孙殿英则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石友三部遭我打击后立足未稳；朱怀冰部远离太南顽军主力而突出于武、涉地区，比较孤单。这对我军集中兵力反击朱怀冰和再次打击石友三等部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为了粉碎顽军据守太原、联结直南、鲁西，隔断我华北、华中联系和调动大军“围剿”我军的阴谋，师首长决心同时进行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在着手制定卫东战役计划时，刘师长说：“估计顽方将抓紧太行山南段，并且可能伸到巴东地带的丁树本驻地，以断我与泰山及华中的联系。朱怀冰要夺我磁县西部地区。而庞炳勋呢，他是想等胡宗南、汤恩伯的4个师开到山西时，会同朱怀冰再向我进攻。看形势，他们还可能策动丁树本，让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3部结合，坚守阵地，等待援助。我看，这3个人早就各谋独立发展，行动肯定不会协调。如果他们嗅到了气味，很可能向西，或者向东南逃窜。根据前几次的经验，我们打击顽军的时候，日寇一定会设法配合他们。制定卫东战役计划时，要从这几点出发。”

邓政委说：“对丁树本，要尊重他的政权，以求其中立，借此可以发展一下我们的地方工作，如组织武装，肃清反共毒素、发动起义等等。如果丁树本要打我，我们只消灭进攻我们的那股部队，不可扩大。凡是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要在消灭石、高两部，中立丁部，放松杂牌队伍的总

目的之下，协同作战，消除各顾各的游击主义。”

我们按照师首长的指示精神，草拟了“卫东战役计划”，经师首长阅改后，于2月22日下达。

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共17个团，其区分及任务是：一、冀南

军区诸地方部队，以王宏坤同志留在冀南指挥游击，巩固根据地，控制卫河渡口，肃清石逆残部，防其散而复集；协助党振兴工作，特别策应卫东作战。二、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在卫河以西只留小部为鲁西北支队，消灭南乐、朝城、冠县地域之高树勋部，向东进展。三、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部和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为鲁西支队，归杨勇同志指挥，消灭濮阳、观城、范县的石、高部，特别袭击石逆惊慌未定的残部，由西北向东南进展。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部为豫北支队，消灭濮阳及清丰地带石、高部队及投降派特务军队，并首先以一部控制卫河渡口，防止顽军向西南逃窜。五、冀中7个团、冀南5个团为中央纵队，统归陈再道、刘志坚同志指挥。首先，协同鲁西支队奔袭消灭冠县及其以南之高部，随即与鲁西支队共同消灭石、高两部和肃清其反共毒素；适时转移重点于清、濮地带，以便策应大南作战。如顽军西窜，则追歼于卫河边。为策应战局，应由中央纵队抽出两个团左右的兵力为战役预备队。此次战役指定由宋任穷、程子华同志指挥；最迟须于2月29日进入指定地域。这个战役计划下达后，我们紧接着又协助师首长制定“磁武涉林作战计划”。朱怀冰从2月初撤退到武涉公路南边以后，就到处构筑工事，扼制高地。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他在禅房、庙庄、泽布交、岭底、贾壁等地修建的碉堡一共有300多个。2月18日，他派了两个团向我们驻在北贾壁、大湾村的先遣支队第一大队及青年纵队第二团进攻，使我军伤亡100多人。孙殿英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采取了谁也不得罪的态度。他的部下刘月亭对我们态度还好，说不愿意跟我们搞磨擦。庞炳勋现在位于长治以南的荫城、西火地区，正与我三四四旅、三八五旅对峙，因此他暂时还不敢北进。而日寇在纸房（彭城以东）、峰峰、和村、磁山、玉果岭、午汲等地都设有据点，每个据点有守敌几十人到200人不等，估计他们也很可能援助朱怀冰。邓政委指示我们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是著名的磨擦专家，经我们屡次争取无效，已成非打不可之势。根据目前叛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除去参加卫东作战的部队外，我们还能抽出几个团？”刘师长问我。我回答说：“13个团。”刘师长非常坚决他说：“我们这13个团的兵力是朱怀冰部队的3倍左右。好吧，这次全用上。除了独立支队作为别动支队外，其他部队编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3路进攻，采取包围穿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他的心脏。关键在于迅速，叫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这个战役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因此，各部队都要加强政治动员，讲清打这个战役的重大意义，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地坚决消灭他们！”邓政委考虑了一阵，说：“我们对鹿钟麟呢，还是区别对待吧，要打，就打他的特务机关和他的部队。如果遇到鹿钟麟本人和他的手枪队，还是不要杀害他。但对他的行动仍然要监视，免得我们吃亏。对孙殿英，可以采取相约不打枪的办法，劝他们尽量离开战斗区域，免得生麻烦。如果他们的部队敢阻止我军前进，我们也不要客气，就顺便解除他们的武装，讲明战斗结束后保证归还。”作战计划于2月25日制定完毕。其中各纵队的区分和任务大致如下：一、独立支队两个团为别动队，

经芦家寨进至观台、漳台间的漳河南岸，分选隘路要点，构筑坚固工事，堵击消灭可能渡漳河的溃散朱军；同时分派小队，向白土、两岔口一带袭扰和侦察。二、三八六旅第一团一部和独立支队、师部特务团为右翼队，由桂干生、周希汉同志指挥。任务是截断顽军后方交通，由南向北兜击，协助中央队消灭顽军主力；于3月2日进到任村集以北一线，3月3日继续北伸转到甘泉、南王庄、选择要隘，构筑工事扼击；再派出足够兵力伸向北王家庄、两岔口兜击可能向西南逃窜之敌。三、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附炮兵两个连，组成中央队，由李达统一指挥；于3月2日拂晓，分经朱军九十四师与二十四师接合部的安子岭、南坡、南庄、及王金庄、刘家庄、古台，迅速消灭二八团；同时突入关防、岭底、北王家庄，随时东撤，兜击两岔口、花园以东朱怀冰的军司令部及九十四师；如二十四师不能争取反而打我时，则一并消灭之。四、王树声同志指挥先遣支队一大队为左翼队，于2月29日到达天井地区，逼近朱军九十四师，积极袭扰侦察，疲惫敌人；至3月2日拂晓，向天井西北侧击顽军二八团之右侧背，以配合中央队消灭之；还应分派便衣队，向日寇游击侦察。

磁武涉林之战

3月5日凌晨2时，磁武涉林战役全面开始。我们中央纵队的青年纵队由冶陶经鞍子岭向南，警备旅由石泊镇经王金庄向东南，同时进攻由顽军补充团守备的庙庄、西蛟、南坡、一四一点五高地、一三六一高地、桃花山及前后李家村、前后牧牛池村阵地。激战至下午4时，顽军的50多座碉堡逐个被我收拾掉。这个补充团被我歼灭了大部，只得钻出碉堡向牧牛池东南方向逃走。我中央队的挺进支队由石泊镇出发后，经王金庄、刘家庄，遇到了守备在前后何家庄、禅房、青阳山的新二十四师第七团，为了争取该部中立，让我军通过，我军到了刘家庄后即派出代表同该团谈判借路。谁知，该团头目蛮横无理，拒不同意给我军让路。我军代表同他们谈判长达5个小时，仍然无效。于是，我军只好绕路而走。不料，该股顽军不自量力，突然朝我军开火，我军无奈，只好还击。这个团虽然占据40多座碉堡，可还是没能抵挡住我军的进攻。我军将碉堡全部攻占，俘虏了100多个顽军。该团见势不妙，便向关防、两岔口方向撤退。这时，正是中午时分。到晚上10时，我中央队主力会合于前后牧牛池。朱怀冰的主力遭我打击后，迅速龟缩在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一带。于是，我中央队一部进至古台，一部继续向刘家坡、苏家庄攻击前进。在中央队进攻的同时，我右翼队也开始了进攻，在峪门口，将阻止我军前进的顽军冀察游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700余人击溃。至5日清晨4时，右翼队又攻占了南王庄和齐家岭，歼灭了顽军1个营。顽军2000余人凭据老爷山、天保寨的险要地势阻我前进，并3次向我军反扑，企图夺回齐家岭，都被我右翼队击退。尔后，我右翼队以主力扼守齐家岭，另外一部绕过齐家岭，经甘泉向北王庄方向推进。左翼队于3月4日下午5时半由固城出发，当夜派出2个连到崔炉西南的新庄、马庄、天井一带，袭扰该地的九十四师部队。而我左翼队主力则进至张尔庄东南山地，阻止顽军向东南逃窜，并监视在彭城、峰峰、和村等地日军的动向。别动支队也于3月4日下午由任村集向南北阳城前进，但由于在南坡一带受到鹿钟麟部主力的阻击，不得不折返杨耳庄一带，因而未能完成预定的破浮桥任务。3月6日凌晨1时许，我们中央队主力先分别从古台、牧牛池、刘家坡、苏家庄等地向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一带，以飞快的速度，星夜猛进；左翼

队也从东南边向张尔庄、青碗、南北贾壁、淘泉兜击。将近拂晓时分，我军接近顽军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向朱怀冰的巢穴发起猛烈的攻势……别看朱怀冰搞起磨擦来气势汹汹，谈判时盛气凌人，其实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很强。何况朱怀冰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我军这么快就直捣他的心脏，搞得他措手不及。经我军从南、北两面夹击，终于溃不成军，丢下他们的全部辎重和后方机关，慌忙朝东南方向抢渡漳河，以保残生。刘师长、邓政委命令我军立即进行追击，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坚决把顽军歼灭在林县、科泉以北地区，不给顽军以喘息的机会。我们稍微调整了一下部队，就分头急追。朱怀冰的部队虽然不经打，但跑起来倒是很快的。我们的部队由于连夜作战，非常疲惫，因此追击他们就显得格外困难。在此关键时刻，刘师长鼓励部队说：“现在双方都很疲劳，谁能坚持，谁就能获得胜利！”为了阻滞顽军渡河后急窜，以待我主力赶到林县以北歼灭他们，刘师长命令右翼队全部轻装，由邰家口、小王村渡过漳河，连夜向南疾进。3月7日，我随邓政委到了任村集。当日9时，右翼队的先头团已飞奔至芦家寨、东西岗地区，咬住了顽军的尾部。顽军仓皇应战，慌忙把部队散开，分守在附近的几个山头上，不敢再动。8日拂晓，我挺进支队和警备旅赶到姚村一带截击顽军，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击溃顽军近3000人。青年纵队也于8日早晨消灭了顽军1个营。然后，他们继续到姚村东边的南卷、北卷一带，由西向东进攻顽军。这时，曾被我军击溃的金宪章旅残部也与朱、鹿部混在一起，再加上黄宇宙的部队，一齐向我们开火。然而，他们已是强弩之末，经我军两面夹击，渐渐招架不住，终被我歼灭大部，其剩下的3000多人经横水、科泉南逃。他们逃到临淇地区，又被恭候多时的别动支队截击。最后，顽军残部只剩下2000余人，逃向修武县境内。磁武涉林之战，我军共歼灭第九十七军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的参谋长王斌、蓝衣社的雷鸣远、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均成了我军的俘虏。此外，还有一个俘虏是个德国牧师，是所谓“十字军”的军长。被我军抓获的俘虏中，还有军官太太150多人，其中就有朱怀冰的一位太太。3月9日，师部接到了集总的指示：卫立煌出面请求我军停止进攻，表示愿意同我军谈判。我八路军为了再一次表示诚意，向卫立煌作出最后的让步：一、撤退高部峰头村、东王庄、东西石门、西坪罗之线以南的八路军；二、我唐天际部主力撤到陵川，仅留小部掩护高、阳、垣线〔22〕兵站；三、临、汾、屯公路〔23〕以南，长乐、高平公路以西之八路军撤至公路以东、以北，该公路以东、以北之各友军同时撤至该公路以南、以西；四、请卫立煌保证我高、阳、垣、曲兵站一线及我来往人员之安全，并令各军互相尊重，取消对八路军的敌视态度；五、如卫立煌同意以上条件，八路军当即遵照春季部署坚决打击敌人。遵照集总的这一指示精神，磁武涉林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以后，为了表示我军不愿扩大武装冲突的诚意，我们对俘虏进行了教育之后，分批交还给了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其家眷们，我们也派人送了回去。3月10日，我随邓政委并带领中央队的指挥机关、特务营及第一团的后方部队，到达科泉至魏家河一带。这时，徐深吉、易良品同志所率领的第一、二两团主力也驻在科泉。3月16日，我们做好了善后工作之后，便将部队北撤。从此，邯长公路以南，临淇、西平罗以北地区，便被我军所控制。

卫东战役和石友三的下场

卫东战役的开始，比磁武涉林战役早一天。3月4日凌晨1时，我军发

起总攻后，很快就攻克了濮县、观城、仙庄、六塔集、卫城集等地区，俘虏了顽军 800 余人，并击溃了由范县进至观城以北阻我前进的王金祥部 1 个团。高树勋见势不妙，就率部往东北庄、双庙集一带撤退，向石友三部靠拢。我军趁其立足未稳，紧接着又从东、西、南三面发起猛攻，相继占领了柳格集、魏小寨、东北庄、双庙集等地，消灭了一部分顽军。5 日，刘师长电示陈再道、宋任穷同志说：“徐深吉部俘石逆部 3 人，无一带子弹，可见其消耗极大。此战役应强化游击战争，不断袭扰、佯攻，以消耗敌弹药和士气，要吸打敌援，夺取粮弹，以诱起灭敌良机。”当日深夜，顽军分成数路向南逃跑。我军按照师首长指示，立即穷追猛打，在濮阳城东和东南击溃顽军 2 个团。3 月 10 日，卫东战役胜利结束，我毙、俘叛军 3600 余人。同一天，蒋介石严令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孙良诚、丁树本等残部不准退过黄河，由庞炳勋统一指挥，继续向八路军进攻。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3 月 12 日，集总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对我师下达了新的指示：一、石友三溃退直南〔24〕，因未得了实力援助，现更向菏泽方向溃窜。朱部经我反击已退林县。至此，在反对晋、冀南顽固分子对我施行的军事进攻斗争中，我已取得胜利。二、顽方反对我军的气焰现已遭到打击，中间势力看到八路军确有力量，将发生新的动摇，同情分子和群众对我更兴奋。这就形成了我们开展各方工作，争取中间势力、争取时局好转的有利条件。三、目前应巩固这一胜利，开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中立部队和分子继续抗战，以巩固我政治优势。……我师依据上级指示，遂将反磨擦斗争告一段落。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4 月 1 日，石友三、丁树本两部在菏泽日军 500 余人的掩护之下，分两路进占了东明城，并积极北犯，企图重占我直南。4 月 5 日，他们又肆无忌惮地分别进至徐镇、保安集以东和两门西北地区。我们当然不能给他们便宜占。我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第二天就在两门西北的小韩集一带将丁树本部击溃。丁树本没捞到便宜，自知不是对手，就率领残部逃往豫西去了。8 日，我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和赵谭支队又向石友三部猛攻。石友三见此处立足不得，只好率部南撤到曹县、定陶地区。至此，我军共歼灭了石友三、高树勋、孙良诚等部 6000 余人，将其部队驱赶到了我根据地的边沿地区。由于我军高举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正确地、恰如其分地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和策略，终于取得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完全胜利，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党我军彻底粉碎。我军打败了无论从数量上和装备上都比我优越得多的顽军，其伤亡 6560 人，被俘 9890 人，被缴枪 1023 支。我军在诸次讨逆战斗中，也伤亡了 4815 人〔25〕。这就是顽固派制造磨擦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是抗日力量一个不小的损失。可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分子出于反共的本性，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他们以后又掀起了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我区，他们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磨擦活动。这里只谈谈“磨擦英雄”石友三的下场。石友三这个流氓军阀和日寇秘密勾结，几次被我包围时都得到日寇的配合，因而都得以逃脱。朱、彭总副司令充分估计了各方面的情况，曾先后几次指示我师，消灭石友三部是一个相当长期艰苦的工作，只有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作长期打算，才能取得胜利。事态的发展，果如朱总、彭总所料，我们同石友三的斗争，一直延续到 1940 年年底，先后进行了几次战斗，相继击毙、击伤、俘虏该部数千人。在 7 月中旬的一次战斗中，我军缴获了石友

三部的一部分密件、密本及有关军事决议的文件，此后，我军又多次抓到了石友三公开投靠日寇的证据。如，宋任穷、肖华等同志在8月12日向师首长报告说，他们缴获山东日军饭田部队的机密通报中载，石友三于7月7日派代表到郓城报告其部移动情形，7月11日又派代表到郓城报告该部部署情况。蒋介石虽知石友三其人，但鞭长莫及，加之石友三还能打仗，特别是打八路军积极，就对他采取了拉拢的方针：1937年底，提升石友三为六十九军军长，将新六师高树勋部拨归该军建制。次年，又提升石为第十军团军团长，不久，又委其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野心复萌。他将第一八一师一下子扩编为两个师，将米文和旅扩编为第三师，又将高树勋的新六师扩编成新八军，并由原来的每旅2个团扩编为3个团。1939年夏天，蒋介石为了武装石友三打八路军，特地批发给石友三汉阳造步枪800支，马克沁机枪30挺，步枪子弹100万发，并且一次给他发了半年的薪饷，还加委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让石友三大过了一次官瘾。1940年7月，石友三部被我紧紧包围，不能脱身。他给其弟石友信写了一封密信，云：“石师长慎初弟：总部及各军被八路军包围，攻打甚急，望速往清丰联络日军扫荡，万急。兄友三。”石友信接信后，即率部伪装成我游击队模样，混出了包围圈。他派其副师长温大可到清丰同日寇联络。然后，石友信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先由温大可说：“为了解总司令（指石友三）的围，我今天进城向日本人说了半天好话，日本人才答应出动一个联队，这是很大的面子。”石有信接过来，说：“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他们都打败，就只有拉一个，打一个。日军乐意跟我们合作，现在八路军打我们，我们就只好拉日军去打八路军，让他们对消了，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你们都要对下面官兵讲清楚了。”蒋介石对石友三的反复无常，早就知之有素。加之石友三并没有如愿地打垮八路军，反而屡遭八路军打击，声名狼藉，已无大用。蒋介石预先派了政工特务臧元骏当石友三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待我军抓到石友三通敌的证据后，他们得到石友三的把柄，就利用高树勋等人同石友三的矛盾，密令高树勋处决石友三。1940年11月下旬，臧元骏奉蒋介石密令，与石友三部的总参议毕泽宇商妥，由毕出面说服孙良诚，让孙假意劝说石友三与高树勋消除前嫌，加强团结，共图大业，并许愿拥戴孙取代石友三为总司令。孙良诚见石友三后，终于将石说服，并偕石到濮阳柳下屯见高树勋。高当即将石友三扣留，秘密处决了。其后，石友信也被毕泽宇设计击毙。石氏兄弟被除掉之后，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毕泽宇由总参议升为六十九军军长。12月3日，集总将这一情况通知了我军，并指示我军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高树勋、孙良诚和石友三部下的工作。可是，事情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石友三的老部下孟昭进等，与高树勋又发生了矛盾。1941年1月3日，孟昭进和段海洲以“替石校长〔26〕报仇”为口号，脱离了高树勋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经参与处决石氏兄弟的毕泽宇也扯起为石友三报仇的旗号，网罗了石友三的一些老部下脱离了高树勋。毕泽宇找到了石友三的尸体后，挖出来搬到濮县附近的一个地方，召集一些石友三部的部下举行追悼会。毕泽宇煽动他们说：“誓为石总司令报仇，与高树勋誓不两立！”会后，毕泽宇便率领其六十九军的几个师与高树勋部发生了激战〔27〕。在这种情况下，刘师长和邓政委于3月20日指示部队：“目前暂不应提打高树勋口号，以留争取余地。”宋任穷同志按照集

总和师首长的指示精神，建议杨得志、崔田民同志具体负责高树勋、孙良诚部的统战工作。当然，这是一项艰苦而长期的任务〔28〕。回顾我区反磨擦斗争的这一段历史，使我受到的启发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都是我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而取得的。这期间出现的缓和，也是由于我党我军有强大的力量（包括军事的和政治的）做后盾。从晋冀鲁豫区来说，如果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正如周恩来同志 1945 年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从新军事变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二次谈判。〔29〕”正是由于我党我军打了胜仗以后，仍然委曲求全，相忍为国，因而赢得了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使他们清楚地看到，破坏国共合作的始作俑者是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而我党我军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让步，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统一战线的团结。而当顽凶们猖狂进攻我军，我不得不进行自卫还击时，我师首长仍然没有放弃团结争取的方针。由此可见，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诚心诚意地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如果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有识者能够仔细回味以往的教训和经验，捐弃前嫌，响应我党中央提出的“九点建议”，为振兴中华再一次合作，我党我军是完全欢迎的。注 释〔1〕冀南行政公署，于 1938 年 8 月 14 日成立，杨秀峰为主任，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兼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副主任。〔2〕张荫梧曾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北省警备司令。〔3〕胡服，系刘少奇同志抗日战争时期的化名。〔4〕集总，即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简称。〔5〕皇协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伪军之一，主要协助日本侵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6〕张荫梧此时兼任河北省民政厅厅长。〔7〕M·C，即磨擦一词的简称。〔8〕指孙殿英。〔9〕冀游，是冀南游击支队的简称。〔10〕程潜，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1〕筑纵，即范筑先纵队的简称。〔12〕指蔡树藩，时任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13〕见十八集团军总部《军政通讯》，1939 年第 42 号。〔14〕邢、沙、永、曲、肥地区，指河北省南部的邢台、沙河、永年、曲周、肥乡地区。〔15〕晋、束、赵、栾，指河北省中部的晋县、束鹿、赵县、栾城地区。〔16〕太北，即太行区北部。〔17〕太南，即太行区南部。〔18〕决死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于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部队。〔19〕陇东事件，发生于 1939 年 12 月，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属地宁县、镇原县城；晋南事件，指阎锡山在山西发动的屠杀共产党员、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的“十二月政变”；沙河事件，是国民党军队侯如墉部在沙河以西的册井制造的惨案，共打死打伤请愿群众 100 多人。〔20〕丘、威间，指河北省东南部的丘县、威县一带。〔21〕新军，即山西新军，前身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40 年后，新军实际上已加入了八路军的序列，分别集中于晋东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22〕高、阳、垣线，指山西省南部的高平经阳城至垣曲的公路。〔23〕临、汾、屯公路，指山西省南部汾城（今襄汾）经临汾至屯留的公路。〔24〕河北省旧称直隶，河北省南部地区及今河南省北部地区又称直南。〔25〕见刘伯承：《晋冀鲁豫建设报告》。〔26〕石友信曾任第十三路军干校校长，孟昭进为副校长。段海

洲所部军官大多为该校的学生。〔27〕毕泽宇部于1941年6月13日在鄆城东南六营被日军包围缴械，毕泽宇投敌。〔28〕高树勋将军以后在我党我军长期争取下，于1945年10月的平汉战役中毅然率部起义。〔29〕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0页。

关于整训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我师执行了集总4个月整训工作的命令，即由去冬12月初旬起，我各野战旅，先后开始正式训练，截至本年5月底止，在太行区除十旅外，已大部将完成计划，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概略总结起来，有以下的经验教训：第一，加强训练的领导和健全各级司令部训练部门的组织，是保证训练收效的先决条件。1.各兵团首长，在训练时期，必须把部队训练工作看成为战斗任务的中心一环，切实负责领导与检查督促，才能使部队训练工作开展起来，取得应有成绩。此次训练计划拟定后，在师范围内，即由刘师长亲自到五旅及六旅〔1〕分别宣布这一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具体办法，接着就是各兵团首长亲自检查督促，如各旅及团级首长人员，均曾亲临操场，领导操作，亲自到连队中检查是否按时起床等等，起到了示范的倡导作用，一开始就掀起了全部队整训工作的浪潮。2.为了协助兵团首长来指导训练工作，必须把各级训练部门的组织健全起来，征调一批文化程度较高、政治坚定、富有相当军事常识和战斗经验的干部来担任训练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特别要培养其独立工作的能力，使教育的领导，才能灵活和实际。即如此*百团大战结束后，一二九师部队奉命进行了为时4个月的整训。此文是1941年6月5日对这次整训的总结。次整训中，因各级训练部门的不健全，及训练人员的能力薄弱，使得师的领导冗重，甚至进度表都要由师发去，这种工作方式是极其不科学的，是要设法补救的。第二，解决训练中的干部问题，是完成训练任务的关键。有了完善和周密的训练计划，没有干部来执行，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在训练计划确定后，随即就要以最大力量来解决训练干部问题，其解决办法在整训中有如下的经验：1.举办短期训练班。这只是限于短时间和某些专门项目，召集中下级干部进行训练（如刺杀射击等），训练后即去教育别人。2.集中训练与巡回训练。这是在某些技术兵种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举行的，以加强训练的领导和调剂训练干部的作用，如此次迫击炮之分别集中训练，因缺乏得力的干部，便以赵章成同志先后分别到五、六旅巡回主持，故收效较好。3.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1）只有认真的有充分准备的进行教育准备课，使实施教育的干部预先得到确实的练习，熟练了教练的动作，特别是示范的动作，才能帮助他们在热炒热卖的办法下，实际进行教育。目前部队中几乎没有教育准备课，很难实施教育，应加纠正。（2）加强军事研究会的工作。只有真正掌握了这一工具，干部的军事学习，才能组织起来，才能领导好干部的自习。但部队中一般只有其组织而无其内容，今后军事研究会的工作，只有由兵团首长人员负责领导，将组织健全起来，建立实际的工作内容，才能开展其工作。（3）进行经常的干部课。干部课以分营团与连排两级为适当。这样便于集中上课，但每周次数不要过多，因整训中各级干部均异常忙碌，上课过多，反而会影响部队教育的实施，故干部课以减少为每周一次为适当（原来两次），同时干部课应着重作业与实兵指挥，而事先又要充分地准备，仅在课堂上讲一下是不能获得好的成绩的。这次整训，干部课没有收到应有的成绩，应引为教训。第三，要有深入不断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工作的配合，才能保证整训任务的胜利完成。1.必须使全体指战员，对整训都有足够的认识，把整训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提高战斗力的基本的一环，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情绪，才能发动全体人员，对整训工作的积极性，才能以最大的努力来领导和执行整训工作，仅依靠上

级的一纸命令是万分不够的。例如去夏颁布了4个月的训练计划，因未有深入的动员，未能获得显著的成绩。此次整训中，首先由刘师长亲到各旅动员传达，接着各部队便以各种方式，继续动员和不断的号召竞赛、参观等，故部队对整训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就成为完成计划的首要保证。

2. 整训中的政治工作必须经常围绕在整训任务的周围，与整训工作取得密切的配合与协调，才能保障部队的巩固，减少非战斗的减员，发动整训的热潮，发扬整训的模范例子，克服整训中的不良倾向。特别要防止在进行较长时间的整训时期中，可能发生的厌倦心理。政工人员必须参加军事学习，参加操课等，以保证整训任务的完成。

3. 政治动员，又必须不间断的进行，防止波浪式的和“寒热症”的现象，特别在一个教育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必须抓紧进行动员，防止松懈。此次整训中，第一次两个月，训练开始都有了普遍而深入的动员，因而整训工作异常紧张。但至第二次两个月整训开始时，由于没有那样认真而深入的动员，因而就有些松懈，进展就较为迟缓。

第四，训练计划要分期进行，每时期要有每时期的重心，课目不要多，不要铺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的企图，都是不实际的，应当按照部队实际需要的缓急，而有步骤的分段落来完成。只有这样，才是适合敌后战斗环境的。例如，此次师根据集总4个月整训总的要求，即是将教育计划分两期完成，每期两个月，第一期仅要求能完成到班的战斗动作，故第一期教育中班以下的动作，均较熟练，确实收到了教育的效果。

第五，及时解决必要的教材是教育的重要工作。拟制教育计划，解决教育干部和教材问题，是三位一体的，在我军目前教育的状况下，缺一都不能解决部队的训练任务，因此，颁发了教育计划，解决了教育干部问题还必须迅速将教材发下，因为我们干部程度一般的不高，今日所需的教材，又不是一般的，而应是具体的，应针对部队干部教育实施中的需要，来写成教课书式的教材，只有这样，才是适合实际需要的。此外，必要的军事图书也同样极为需要，不大批予以翻印和编译，就不能提高部队军事水准。但同时不克服部队中随意将军事文件抛失，及私人随意把教材和军事图书带走的恶劣现象，则教材是永无法满足的。抗战以来，每次整训时都印发了不少的教材，但由于不少干部的任意丢弃和任意带走，直到现在，部队中的教材还是异常缺乏的，这是要严格纠正的。

其次，部队中尚未将出版费和书报费及教育设备费专门明确规定出来，故对于编印教材购买与出版图书等都不无影响，尚须予以补救。

第六，打破训练中的障碍——农民保守性。我们部队中的指战员，大部出身农民，他们在教育中所表现的弱点是先入为主，墨守成规，束缚于狭隘的经验，不愿接受新的事物。不克服这种保守性，要使训练工作求得进步，取得新的发展是极为困难的。但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是一个“撞铁门”的工作，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和耐心的组织工作，才能予以打破。首先要使他们认识一件新事物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即以现实事物的成绩来证明给他们看，以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效果，来认识这种新事物的重要性与可能性。这样才能使他们可能接受新事物，打破他们的成见，使其倾其全力，从事改进。如刺杀教练问题，师刺杀训练班毕业后，到各兵团举行巡回表演，发动参观，便于部队和部队在表演中真正认识了加强刺杀教练的重要，并改进刺杀教练的可能性，才能把部队学习刺杀的热潮发动起来。但要真正能建立威信，仅仅举办一下训练班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地把训练班办得有成绩，能够使大家信服，特别是在战斗中能表现出功效，才算收到了教育的成绩。

第七，建立经常的巡视与检查制度。

1. 只

有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才能及时的反映部队训练的现状，适时给部队以指示，发扬各部队的模范例子，及时纠正不良的倾向。2月20日至3月15日的全师大检阅，予部队整训以极大的推动，反映了极多实际问题，故一般确定师对旅每半年检阅一次，旅对团一月一次，团对营每半月一次，这是一个制度，必须纠正过去不能坚持半途而废的恶习。

2. 按时进行检查，是上级对整训领导的重要手段，但检查应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才能收到更多的效果。如按期的电话汇报制，运动大会、抽查制等等，然应防止检查次数过多，干部忙于应付，忙于突击，影响到经常工作。另一方面会发生对检查的麻痹现象。故应建立经常的检查制度，又须注意检查的适时。

第八，为了解决训练人员缺乏的困难，还必须善于发现人才和善于使用人才。经验证明：不大胆的使用在友军中、旧军队中、或敌军中来的擅长技术与教育能力的人才，要迅速提高我军的军事技术，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是困难的。因此，对于他们一面要加强在政治上的帮助和物质精神上的优待与巩固；一面要大胆的引用他们来帮助我们进行教育，训练干部，这就是正确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应用，这才正是正确执行党的关于引用专门家的政策。目前我们部队中，确实还埋没着不少这样的人才尚未发现，或已发现而不敢大胆使用，这是需要努力去发现和寻找与善为引用的。此次整训中，我们引用了3个日本同志，事实证明获得效果很大，大大提高了我们刺杀与掷弹筒教育。从友军和旧军队来的刺杀人才，找到了5个以上（实际尚不止此），他们过去均受过长期的刺杀教育的，但入伍以后，原被任为管理员、排长及一般的教员，未能发挥其长处，最近才被师发现出来，其中的高孚同志，在师举办的刺杀训练班中帮助日本同志教育成绩甚佳。这些都证明，只要大胆的使用和积极去发现人才，干部荒决不至如此之甚。

第九，特种兵科训练的建立与健全。

1. 特种兵科，无论是炮、骑、工、辎等，目前依靠旅来单独进行训练是异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缺乏这样的人才，还没有单独进行教育的能力，检查过去教育的成绩，收效极微。为此，必须进行适当的集中训练，提高他们的技术，最好集中于师训练和整理，若不可能时，则应派专人到各部队实施巡回教育，但这些办法只是过渡的，是在干部缺乏的条件下使用的。只有着重培养一批干部，才能解决他们将来单独进行教育的困难问题。

2. 必须提高部队对特种兵种的重视，过去部队中对于特种兵科的不正确态度，如把犯错误的人员拿去当工兵抬炮，任意抽调，特种兵科中已有技术的人员担负其他工作，以及认为炮兵是老太爷等现象，都应立于纠正。但同时要各特种兵种本身建立威信，依靠各兵种本身对技能的提高，技术愈高才愈有威信，才能使本身愈有发展，这一点必须使特种兵科的同志有足够的认识。

3. 对于特种兵科的训练，也应注意到有适当教育的组织，和适合环境需要的问题，教育应有中心，课目不宜过多，重在实习和作业，并解决其必要的器材。

第十，整训期中必须善于掌握与调剂时间，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会议和公差勤务，使指战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和恢复体力。特别在物质上应有适当的保障，尤其是粮食的调剂，使部队的训练计划，不致因物质的限制，延长过久。过去整训中往往因掌握时间不紧，使部队可能完成的训练计划延长过久，以致战斗到来即无法完成。尤以物质保障工作做得极其不够，如：甲乙两队住地附近各有粮食，而却分配他们各到对方所在地去搬运，致战士们有：“这是供给机关故使我们锻炼体力的办法”之怨言；有些战士因无鞋袜而冻坏脚趾；有的部队则因鞋袜太小不能穿，令战士们冻脚；不少部队更因无药治病，医药费不能报销，因而

有药也不敢买，以致癣疥传染 20%至 50%之多等等现象，障碍整训实为重大，这都是不容再重复的严重现象。注 释〔1〕五旅及六旅，指一二九师所属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

参谋长会议的报告提纲*

一、司令部工作的一般任务及其前途

甲、司令部的使命。司令部是部队的首脑机关，是部队首长指挥军队与建设军队的机关。关于军队之组成、编制装备之改进、正规制度之建立、战斗力之提高、战斗战役之准备与组织，和保障战斗任务之顺利完成等等工作，司令部应负到直接责任。没有健全的司令部，要想建设军队，争取战斗任务之圆满完成是不可能的。乙、在技术与战争日益发展条件下的司令部。技术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的，战争则因技术之发展而日益复杂化，军队司令部的工作，则因战争之复杂性质而日益繁重与艰巨起来。如何进一步掌握技术与左右战局以至掌握与支配战争，均应由军队司令部直接负责，因之司令部的工作是应不断的力求进步和改善，以求适应这一历史进展的客观需要和要求，如“故步自封”，欲图以现有之简陋智能与工作方式和方法，以担负日益繁重的历史任务是极其不可能的。这在我们的军队司令部是尤应特别警惕的。*1941年7月4日，李达同志在一二九师团以上单位参谋长会议上做了关于司令部建设问题的报告，本篇是报告的提纲。二、八路军司令部

(参谋)工作的特点

甲、有进步的优良工作制度和作风，承袭了红军时代司令部工作的传统，吸收了苏联红军司令部工作中适合于我军需要的经验，并采用了一般军队参谋工作的一些进步长处。因此，我们的工作作风是紧张活泼、精细耐烦、艰苦负责和朴素正确的。乙、有一定的工作地位、性质和作用。参谋人员在政治地位上，在人格上均与其他相等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一样，绝非旧军队中把参谋工作当作军队的附属品，把参谋人员当作“主官”的财产掌理者——忠实的仆役等等之可比。丙、司令部的组织机构是合理的、分工是科学的、是适合于时代性与工作需要的，没有像旧军队中那样庞大的容纳“赋闲者”的副官处与仅作文牍工作的书记处。丁、工作人员具备着优良的品质和条件，均是政治上忠诚可靠，头脑清醒，富有工作热忱和积极负责的优秀干部。戊、在参谋业务的遂行上，是把建军和作战同时进行的，也就是把储蓄武力与使用武力同时进行的。己、处在敌后的紧张环境，战斗频繁和艰巨，因此也就要求我们参谋工作之极度进展与技能之不断提高，以适应这一客观特点之需要。庚、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配合，这是它建立健全工作的有力保证。

三、一二九师司令部工作的历史概况

甲、红军四方面军时代。在四方面军时代，由于张国焘军阀主义的领导与愚民政策(知识分子被杀戮)的摧残，差不多是等于没有司令部的工作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才由一方面军抽调了一些同志来开始着手司令部的组织，但其真正的工作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乙、援西军时代。援西军时代，司令部的组织虽略具雏形，但当时全军的主要工作是在于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的建立，特别是开展和深入进行反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司令部的工作也没有确实开展起来。丙、抗战以来。抗战开始，由援西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当时是比较健全起来了。但自进入抗日前线后，因部队猛烈扩大与发展，各个司令部因为人员的分散，而组织随着就不健全了。1939年7月总部召开之晋东南参谋会议后，在组织与工作上都起了推进的作用。但当时因敌人对晋东南的“大扫荡”，在部队没有深入传达。去年集总、

野政〔1〕颁发了健全司令部组织与工作的命令，及师一再的督促检查，一般的是引起了各兵团首长及司令政治机关的重视，在组织工作上均起到质的变化和进步，但这还是非常不够的。

四、抗战以来本师参谋工作的检讨

甲、成绩和优点。1.逐渐发展与建立了轮廓的组织，逐渐提拔了一些新的优秀干部到司令部中来，大部分干部的前进精神与努力学习还好。2.一般的执行了组织战斗的任务，在侦察通讯勤务上，均有了部分的开展，取得了战斗战役的不断胜利，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和进攻，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一般的执行了建军的任务，进行三次大的战略性质的整军工作，发展和巩固了军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顽强性。3.在工作过程中，逐渐求得了组织上和工作效率上的不断改进，工作人员的能力与责任心和紧张性，不断的进步和提高，逐渐建立了司令部工作的威信，基本上克服了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4.部分的整理了一些作战经验与整军经验，建立了部分的正规制度。5.逐渐密切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和诸勤务部门的关系，基本克服了轻视政治领导的观点，取得了政治工作的有力配合。6.兵团首长大部分重视了司令部的工作，逐渐加强对司令部工作的直接领导，逐渐熟悉运用司令部的组织，一般的能依托司令部来进行建军与作战工作。

乙、缺点与错误。1.一般的工作少计划，少检查，尚未完全摆脱事务主义的羁绊，没有以精细的组织工作去保障每一项工作任务尤其是战斗任务之完成，特别缺乏面向部队的精神，对自己军队的实际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和适时的反映与解答问题；对敌人缺乏深刻的研究，没有想出足够的对付与制服敌人的对策。所谓真正“要参要谋”的工作，是没有确实建立起来的。2.对于我们全力战的研究与认识，及交通斗争的研究与认识，均异常不够，在领导与组织游击战争上，特别表现无力和无能。3.许多司令部的组织，均没有依照集总、野政及师的命令全部健全起来（全师参谋人员其缺额约100余名），没有把最低限度的必要人员调补齐全，尚不敢或舍不得把政治上可靠已有战斗经验的新的知识分子适合参谋工作的干部提拔到司令部中来。4.大部分参谋人员的质量尚嫌不够，智识尚是异常简陋的，特别缺乏基本的军事学识与科学知识，工作能力异常低弱。虽然我们是能够前进的，但还赶不上客观的需要与要求。5.个别工作人员的观点意识异常不正确，或存在着军阀主义的实权思想，不安心于参谋工作（要当带兵官）。或则骄傲跋扈，不尊重兵团首长及潜越职权；或则政治责任心薄弱，不能以身作则，及轻视政治领导；或则腐化堕落，丧失共产党员的操守和民族气节而叛变投敌，甚至还有个别的奸细分子，混到我们的司令机关来。6.不少同志对军事学习及职务技能的学习是很不重视的，以致连一般的军事“术语”尚弄不清楚。7.在防谍斗争上，未引起高度的注意和采取一切应有的必要措施，招致了不少的损失。8.个别部队首长不了解司令部的重要作用，不熟练或不会运用司令部的组织，没有给司令部工作以应有的帮助和实际的领导，没有发挥司令部的职能，在部队中则没有把司令部的工作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甚至对参谋人员采取谩骂侮辱的态度。9.在作战工作上。（1）缺乏对敌我状况的正确研究和估计，缺乏掌握战场与操纵情况的能力；（2）一般的还只限于缮写命令与传达命令，没有多方面的搜集材料，整理与分析情况，提出作战意见和方案，以供首长人员定下决心，并以各种努力来保障这种决心求得实现（所谓组织战斗）；（3）对于每次战斗过程中的情况，缺乏详细的登记（没有有内容的阵中日记），缺乏对作战

问题的整理和总结，缺乏有系统有实际内容的战斗详报，以致使上级很难了解战斗进行的实际状况；（4）缺乏对战术问题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上级每个命令与指示的研究异常不够，如游击集团的问题是本师在三年前提出的，但现在还没有正确的了解，有时甚至把上级命令中的任务和时间弄错；（5）作战案卷没有较固定的格式和规定，因此不好整理与检查。

10. 在侦察工作上。侦察工作是我们最薄弱的一环，具体表现在：（1）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侦察组织，特别是侦察网与间谍的组织，以致周围情况——敌伪军、伪组织、敌人特务活动、敌之交通，以及道路地形、社会经济等，均缺乏系统的了解，对敌人总力战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尤其不够；（2）侦察人员的技术教育异常不够，如不善于深入敌纵深到其据点附近进行确实的观察，往往“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被敌人的谣言攻势所迷惑，得不出正确的材料，特别不善于进行化装（无论说话行动都改变不了军人色彩），常易为敌人所窥觉；（3）与地方机关及政治机关的工作联系不够，没有取得他们的有力帮助与配合；（4）在物资保证上做得特别不够，没有应有的化装的便衣及足够的活动费，以致化装不像（如上身穿着便衣，下身穿着军裤草鞋），背起米袋（出差费不够用）带着冀南钞票（无法币）深入敌区，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11. 在通讯工作上。（1）一般的通讯联络尚欠顺畅，无论在有线电话，无线电讯，及徒步通信上，均不断发生障阻，通讯纪律异常松懈；（2）对器材的保管爱惜异常不够，不断发生损坏情事。电话机之浪费以及任意拆毁零件的现象，时有所闻；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器材尤多任意损坏、浪费和丢弃；（3）发行工作，尤为糟糕，贻误时间，张冠李戴的现象不断发生；（4）通讯部队和干部的技术教育极差，工作技术极欠熟练；（5）通讯组织许多地方尚不健全，有的电台，仅有几个工作人员，一遇紧急情况连机器都无人搬运；有的电话分局，仅有十数个电话员（长途电线则有四五百里），每遇故障即无人派出修理；（6）物资保证同样不够，不少电台无雨具，不少通讯员则因出差费不够而途中饿饭啼哭，破坏群众纪律，甚至逃跑。

12. 在队务工作上。（1）干部政策的掌握与运用极其不够，特别没有做到知人善任，不少的特殊人才尚在下层埋没着，对新老干部与知识分子和农民干部的适当配备与调节不能令人满意；（2）对部队的兵员补充工作，从来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部队的组织表现极不严密，各种制度，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尚未坚持和巩固起来；（3）对部队中各种实际生活的材料，缺乏正确的了解，和适时的反映与解答下层的实际问题；（4）选送学员及调动人员时缺乏正规的登记鉴定等手续和严格的审查工作，以致选送学员往往不合条件；人员调防后多无案卷可查；（5）不少队务部门的同志，不知应作何事，同样，不少的首长亦不知运用队务部门去进行工作，而把所有的行政问题，仅由首长人员独自办理，以致一切问题都是无案可考。

13. 在训练工作上。（1）训练部门的组织仍不健全，训练干部的能力一般的仍极薄弱，负不起训练工作的全责，很难单独进行教育；（2）每期教育计划均未能十足的完成，一切规定均难彻底实施；（3）对于部队训练的检查总结及坚持教育的规定，尚欠实际，一切动作尚未彻底统一起来；（4）各旅均无教材费的规定，许多课目因无教材而收不到应有的效果。

14. 在管理（后方设备）工作上。（1）在后方设备问题上，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在每次战斗中，后方机关及人员均异常紊乱，粮食供给时感困难；（2）对来往人员的招待极欠周到，影响极为不好。

五、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具体要求

甲、确定司令部工作的正确方向。1. 面向部队，关心部队的生话，一切

为着部队的扩大巩固，特别是战斗力的提高与不断加强；2.面向敌人，深刻地研究敌人，积极设法定出战胜敌人的对策；3.面向战争，学习研究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特点与坚持华北抗战特点和条件，学习观察与掌握战场，研究掌握与操纵情况，研究指导与组织游击战争，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4.一切为着完成司令部的使命，争取建立工作的威信，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提高参谋工作的地位。乙、健全司令部的组织机构，仍是重要条件之一。这里要求：1.仍按集总、野政命令，在部队中抽选一部分头脑清醒有战斗经验适合参谋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干部到司令部中来；2.选择一批聪敏机智政治开展文化程度稍高（识字3000左右能写简单信件者）的青年干部作见习参谋；3.继续选送学员到师参谋训练队（第二期）学习，这里要反对不按照规定条件选送的现象。丙、提高现职参谋人员的质量尤为重要。1.加强军事学习，规定：（1）每星期内上两次军事课（每次两小时）专讲步兵战斗条令，并配合以战术的作业（由排连演习起），每日的两小时学习制应以一半时间研究军事问题；（2）旅、团参谋长及科、股长与知识分子参谋，应于半年以内看完战斗条令，阵中要务令（以军队指挥纲要作参考）和本师2周年战术报告；（3）其他参谋人员须于半年以内看完战斗条令及2周年战术报告；（4）各时期的战术指示等首先在参谋人员进行教育和讨论；（5）由师颁发军语释义，首先教育全体参谋；（6）以旅及军分区为单位，每月对所属参谋实行一次战术作业的测验，并将验卷分送一份到师，以便考核（冀南3个月送一次）。2.加强政治学习，研究我党的各种政策及各时期的政治主张，特别要加强党性的锻炼，加强每个同志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及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意志；3.加强文化学习，特别是科学常识与算术（工农出身的同志最低限度要学会四则）。丁、改善司令部的工作方式。1.紧张精细，艰苦负责；2.切实朴素，分工合作；3.要有切合实际的具体计划；4.要有保证计划实现的组织工作；5.要有深入下层的检查；6.要有及时适切的总结整理及具体迅速的解答问题。戊、严格参谋工作的纪律。1.确保军事秘密；2.遵守工作秩序；3.服从与尊重领导，不侵权不冒功。己、严格执行司令部工作暂行条例，首先了解与遂行各部门的使命与各个人员的职务，并研究遂行条例的具体办法，立即把队务与训练部门分开。目前要求的中心工作是：1.在作战工作上。（1）研究新的破击作战的准备；（2）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整理抗日战争以来的作战经验，研究战术对策于“九一八”以前以旅与军分区为单位作出书面的报告送师；（3）每次战斗均应具有实际内容的战斗详报和阵中日记；（4）月终统计要正确，首先要把抗战以来的枪支滥帐结清，亦于“九一八”以前报师。2.在侦察工作上。（1）建立真正的情报组织；（2）把本兵团周围及军区军分区范围内的敌情弄清，特别把敌军的调动状况弄清；（3）加强侦察技术的学习与研究，加强对侦察部队和干部的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克服过去所发生的不良倾向；（4）确实解决物资困难问题，规定军分区每月侦察活动费600元（冀南各分区400元），各旅200元，各团50元。侦察员必需的便衣鞋子等准予特别制购，其他必要的化妆品、武器等均应给以适当的解决。3.在通讯工作上。（1）健全通讯部队的组织系统，补齐最低限度的人员；（2）节用现有的通讯器材。充实野战团，只准留6副电话机、1副总机（不充实的团依次减少）；旅部5副电话机、1副总机，多余者一律登记由旅保存（保存数目报师）；严禁随意装置收音机及无线电中听广播新闻；无故损坏器材及拆取零件者须给以应有的处分；（3）切实整理长途电话，责成太行各军分

区于8月15日以前，将所有电线重新整理一次，求得各军分区与军区直接通话（二分区除外）；（4）加强对通讯部队及干部的技术教育，切实整理发行工作；（5）解决通讯部队的物资问题，电台上的雨具准即制购，通讯员的出差费、鞋子等应即酌予增加。4.在队务工作上。（1）了解干部，规定区了解排以上的干部及个别优秀的班长；旅及军分区了解连以上的干部及个别的优秀排长；师及军分区了解营以上的干部及个别优秀的连长，并将这些领导干部每半年鉴定一次；此外亦须尽量发现埋藏在下层的特殊人才，确实做到知人善任；（2）继续调节干部；（3）确实监察部队遂行新颁布之内务条令，首先建立供给处副处长及司务长的工作；（4）重新整理部队组织，充实战斗单位，适当调配武器，太行各军分区一律组织工兵排；（5）计划新的兵员补充工作；（6）准备8月份的检阅工作。5.在训练工作上。（1）复习整训中未完成或未熟练之课目，巩固4个月整训的基础；（2）物色与配备各轮训队的训练干部；（3）解决教材问题，规定3个团的旅每月300元的教材费，2个团的旅及各军分区每月200元的教材费；（4）准备将各级训练干部分别训练一次。6.在管理（后方设备）工作上。（1）检查与整顿各部队的后方设施，尤其是各军分区的工厂、医院及物资存藏设施；（2）立即改变和纠正不善于待人接物的不好作风。庚、要求各兵团首长善于运用自己的司令部，善于领导司令部的工作，经常出席司令部的部务会议及各部门的会议，给司令部工作以适时的指导和帮助，并扩展其活动的工作范围，勿干涉其细事，使司令部的工作自动积极紧张起来，真正负起建军作战的繁重任务。

辛、各级参谋长对于健全司令部的工作，要负起直接的责任，

特别要以自己好的思想意识、政治积极性与工作责任心以及努力学习艰苦勇敢等模范作用，来影响各个参谋人员和领导全司令部的工作。参谋人员应以十二万分的努力，在参谋长的领导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完成各时期的工作任务。壬、进一步改善与密切司令部和政治机关的关系，特别要端正每个参谋工作者对于政治机关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防空防敌袭击）给政治机关以多方的帮助和便利，克服轻视政治机关与政治领导的不良现象。癸、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党政的领导上，在政治工作的配合上，继续给司令部以有力的帮助，以使我们的司令部工作也和政治工作一样的紧张活泼与实际化深入化起来，推动其向着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目标迈进。注 释〔1〕野政，即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的简称。

太行第二军分区 1942 年春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敌寇在其所发动之“驻晋日军总进攻”〔1〕的战役中，其津田第四混成旅团主力，是担负着对我太行第二军分区，〔2〕及西周村、银交、王景村线以北之榆社所辖地区之“讨伐”“扫荡”，自2月3日起，截至3月3日止，我第二军分区全体党政军民，经过一个月零两天的长期艰苦斗争，这一“扫荡”与反“扫荡”，才算基本上告一结束。兹根据对这一“扫荡”与反“扫荡”的观察，总结其经验教训如下：第一，在思想上应深刻认识敌寇在太平洋战争，〔3〕爆发后，由于其兵力之愈形不足，困难之愈益增加，与内部不稳，日兵厌战，伪军伪组织动摇情绪和敌占区民众抗战信心之日益滋长等等，随之而产生的就是其对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讨伐”、“扫荡”、摧毁破坏必愈加频繁、残酷和毒辣，企图镇压削弱我之力量，毁灭我之生存条件，打击我之抗战意志，来掩饰其兵力不足，稳定内部与日伪军情绪，巩固其对占领区之统治和掠夺，以便维持旷日持久的长期战争。应当纠正某些人以为敌寇可能继续抽兵南下，因而就会减轻对我各根据地之军事压迫，以麻痹自己，疏于备战的错误观点。但同时必须指出“敌寇这种毒辣残暴穷凶极恶的行动，只是它更加困难更加*1942年2月初，日军12000余人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春季“扫荡”，太行第二军分区首当其冲。经1个月苦战，日军“扫荡”被粉碎。本篇为李达同志1942年3月所作的反“扫荡”总结。接近失败的必然产物，是它垂死时的回光返照，再战两年日本必败。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咬紧牙关，熬过今后最困难的两年，一定会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对于根据地的被灾群众，尤须以此次敌寇残无人性的暴行，激发其仇恨心理，提高其誓死复仇，绝不屈服，争取最后胜利的自尊心与抗战决心与信念，纠正部队中和群众中某些震惊于敌人持久“扫荡”的威力，可能发生的张惶无主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第二，由于敌寇“扫荡”之愈形频繁与突然，因之我们的备战工作应是经常的，无论军政民均应预先拟定在敌人突然“扫荡”时的行动和工作方案，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过去看到有“扫荡”征候时再来布置备战工作的办法，是不适合于今后的新情况了。县、区指挥部尤应具有经常的组织与工作。指挥部的参谋长应是固定的，或即以武委会的军事组长为当然参谋长，以便熟悉整个指挥事宜。前此指挥部均无固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其副指挥与参谋长都是在“扫荡”时才分别派去，以致人事两生，机构不灵，无法进行工作，特别不善于领导民兵进行斗争。第三，同样由于上述情况，因之我们的整理训练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也应适合这一客观环境的特点。一切争取在备战和战斗过程与很短的间隙时间中来同时进行。过去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的和平建设时机，今后将日益减少甚至没有了。现在的精兵简政以及春耕等建设工作，即应在反“扫荡”的间隙中来实施，等待“扫荡”过去的办法，是不应该的。第四，同样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应适合上述情况而求改进，纠正过去某些非战斗化的作风，在领导上遇有新的问题，分派得力干部传达、巡视、检查，较之召开大规模长时间的会议，是要经济的。此次师部分派干部到各军分区，在“扫荡”到来时，获得对反“扫荡”工作的同时帮助和领导，是很切合实际需要的。反之党政机关召开了全太行区县以上负责干部（武委会主任也在内）的大会，直到3月初，二军分区的赴会人员还未转来，以致在反“扫荡”斗争中，失却各级的领导重心，予工作以不少的损失，似应引为教训。第五，武委会的作用，一般是不大的。整

个说来，缺乏对民兵自卫队的实际领导，开始时有些民兵的活动尚好，但那都是民兵的自发与自流现象，很少是组织上的领导与推动作用。于是在“扫荡”进入残酷与持久阶段以后，便各自敛迹，无人过问，不少地方等于没有民兵。主要因为：县级武委会干部开会未回，区、村级干部，大都缺乏军事斗争经验，经不起这样残酷的风浪，而且质量不高，往往做了落后群众的尾巴，起不到先进作用，以后在干部配备上，须注意选择较有军事常识与游击斗争经验者为宜。对于现任干部，还须注意经常给以适当地训练，以增强其领导斗争能力。此外，个别地方，如横岭村武委会的干部在领导民众转移上，均很适当未受损失，则应鼓励发扬之。第六，此次“扫荡”中民众损失极为重大，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空舍清野工作领导之粗枝大叶，没有耐心说服与克服农民之浅视和保守观念。牛羊杂物被劫、被毁为数至巨，在群众撤退转移时，亦缺乏切实的指导，大都散伏在离村不远之小山沟和洞内，且多数烧小火，结果不少被敌搜获，应立即彻底纠正。第七，分散领导民兵之干部及区、村指挥部的人员，要一律民众化，并处处顾全民众利益，为群众设想。纠正着军服与群众特异的现象。埋设地雷手榴弹或打枪时，最好远离村庄，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行之。尽可能勿在村内举行，否则可能使敌人因受损害而行报复的烧杀，群众又将认为给他惹祸以致不要军队人员及民兵与他们同行。第八，农村警戒以夜间为最要紧，放哨者以持手榴弹或锣鼓离开村一里以外，发现敌人时，立即投弹鸣锣击鼓警报，惊醒村民为宜。仅放哨于村口，一遇敌来，便无法喊起熟睡中之农民，同时不少地方之放哨者，遇见敌来，大都不敢作声，顿时匿逃，结果村民多在睡梦中被敌包围，惨遭危害，这是不可再重复了。此外各个联防村，特应注意夜间紧急情报之飞送和投弹、鸣锣等警报。过去情报工作多半于极紧时，尤其是夜间即告停顿，应立予纠正。应规定甲村遇敌或有紧急情报而不急报乙村以致乙村因而受到损失者，甲村应受处分之情报纪律，以资遵守。第九，由于一夕数惊，敌人伪装我军游击队和逃难民众，不时捕捉民众，尤以夜间为多，故使民众难于分别敌我，一见队伍及两三个人走路，即要远避，同时也形成我军与群众联络和讯问情况的困难；因此我军将到某地时，须先头派遣二三人预先于一二小时以前出发，找群众联络，并多方给群众证明，使之确信非敌，方不致使群众遭受无谓的惊逃，而且得其帮助。第十，由于敌人运用梳子队形的“铁壁合围”，在每次合围中，差不多没有一个山梁，没有一条河沟以及没有一个大小村庄不到敌人；因之，在反“扫荡”中之战术侦察，就被提到极尖锐的程度。没有确实的接敌游击，没有四面八方距敌在半日行程以内的多层侦察，以便适时发现敌人，要想顺利脱离敌人，摆掉其合围而行机动，是难能做到的。此外，无论敌人之“扫荡”如何来得突然，但他总有可资推测之各种征候。如要民夫抽调部队等，无论如何是不能完全匿迹的，这就要求我们特别加强在“扫荡”前之战役侦察，以各种方法，探索一切征候，勿麻木不仁，勿放松每一个可资推断之材料，以窥察敌人之动态。事实上此次敌在“扫荡”前是有不少的征兆的，只是我们的警惕性未有提到应有的高度，麻痹苟安，或者知而晚报，或者并不惊异，这是决不可重复的。第十一，由于敌人突如其来，占据或摧毁我之通信组织，并到处横冲直闯隔断我之交通，使我对各部队特别小游击队的通信联络，就极形困难，每一个指示或命令，差不多三四天甚至一个星期后才能送到，彼时情况的变化已是大非昔比了。同时这样指示和命令，或常有失落敌手之危险，因此除给各部队预行拟定其在敌人“扫荡”来

到之时活动范围，以课其行动外，还特别需要各级干部发扬高度之政治责任心与主动行事之灵动性、果敢性与坚毅性，自动负责的向敌游击破袭，配合腹地和邻区之反“扫荡”行动。此点必须特别强调。今天许多干部很少能达到这种要求，甚至个别营团干部亦难做到。害怕敌人不敢接近，耐不过疲劳，不积极动作，甚至躲在一边过旧历年者，曾数见不鲜。为此，除加强新情况下之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和严格军事纪律外，各军分区之轮训队还应经常保留30人以上的连排干部，加强政治与游击战术的训练，并由军分区某些擅长游击动作的负责同志，抽时带往敌区游击实习，以一定时期，从实际活动中给以如何接敌，扭敌游击，如何掌握政策的示范教育，经过此种锻炼后，再顶换其他现职干部，轮番学习，似觉有效。第十二，便衣队的战斗，被提到重要的程度，因此各军分区的基干部队每连至少须组织一个便衣班，县、区干队应有1/2的便衣，接敌区的游击队应全部是便衣，这些便衣队在活动技术上还应有专门的训练。如在与敌未实际冲突之前如何不被敌人发觉自己的队伍，故行动、言语、食用，力求农民化。至于便衣队的便衣，则应相同于各地民众的服色和式样，过去工厂制发之一般化的东西，是绝对要不得的，须彻底纠正。第十三，在敌这样持久的“扫荡”中，无论它如何吹嘘其“驻晋军增强”，和其“铁壁合围阵”之如何完善，然而它的弱点与漏洞，倒是很多的。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到处存在，如敌夜间宿营时之极度疲劳而疏于戒备，一般行动的规律性之暴露，行军特别是夜行军中的绵长，后尾之便于截击，外出搜山的小部队之易于扑灭，临时补给线上的辎重运输之易于劫夺，归巢时所抢劫的牛羊之易于打散和抢回，尤其是基本据点之兵力极空之易于捣袭等，均扩大了我之活动范围，为我进行机动之良好时机，只要我们善于寻找，是会得到不断胜利而予敌以不断大小创伤和有意义的打击的。在反“扫荡”中有些部队因此而获得大小不断的成果，是值得特别发挥的。反之不少的部队，消极躲避，坐失良机的现象，则须严格纠正。第十四，粮食问题，在这样反“扫荡”斗争中，形成很难解决的问题。敌人严重的反复搜剿，使群众多远离村庄，敌人到处伪装八路军游击队和避难民众，又使群众很难一下子辨明敌我，因之我们也很难一下子找到群众，即是找到，还须费时良久才能使群众确认非敌，经过如此过程，再找粮食，差不多每需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然而敌人寻踪而来的时间，则常常较此为短，问题就不易解决了。为此必须：一、军队本身要在某些必要地点密存一部粮食，以便急时自取。二、各村须密存一部干粮（如炒面类）使军队费时找到后，即可拿起就食，三、争取一切可能，使部队常带足三天干粮。第十五，在长时间的反“扫荡”中，争取一切时间与可能条件恢复部队的精力，特别及时解决睡眠，吃饭、鞋子问题，是每个干部必须随时注意的。第十六，最后，政治工作无论对我军、居民和敌伪军，均要求下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与政治工作人员，根据每一新的具体情况，和不同材料不同对象，抓紧时机提出新的扼要恰当而有力的口号、说明，和鼓动方式，以及有效的必要处置。对于敌人暴行与其武断宣传之揭露和回答，尤为重要。依靠上级是会失时机的。此次本师、区党委及北方局、野政的各种指示，在二军分区大都于3月上旬才先后收到，即其实例。为此，必须设法加强下层党政干部的质量，特别提高敏锐的识量与感觉和迅速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果决性，是非常需要的。此外，这次反“扫荡”中部队的群众纪律有些是很恶劣的，除了立即设法补救和进行严格的教育外，今后更应注意，随时提防以免重复。注 释〔1〕驻晋日军总进攻，

是在日寇华北方面军统一部署下，以歼灭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并摧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目标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它分为两期，1942年2月至3月为第一期，5月至6月为第二期。此处所指是第一期。〔2〕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位于太原东南。1942年控制着太原、阳泉以南，太原、榆次、祁县以东，阳泉、昔阳、和顺、辽县（今左权）以西，祁县、榆社、辽县以北的地域。〔3〕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中日本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在各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1945年8月，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

要关注机关战斗化*

1942年夏季反“扫荡”之后，严峻的华北敌后斗争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统率机关战斗化问题。刘伯承同志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在1942年2月反“扫荡”总结时，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年夏季反“扫荡”总结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付诸实施。他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一文的第五部分中，专门讲统率机关问题。他严肃地指出：“敌人对于任何抗战的统率机关，都是奇袭捕捉，从来没放松过的。这次我们统率机关又成为敌人合击的主要目标。为要发挥指导作用而便于分遣游击起见，我们的统率机关必须做到短小精干，成为战斗的组织，马匹还要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免累赘。本身的组织应分为前、后两梯队，前梯队是限于战斗指导必要的组织，其中一部分是指导人员，另一部分是警卫队。警卫队能战斗，而指导人员也能战斗。后梯队是分遣活动的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独立游击的单位，另一部分是到地方参加游击或做工作的人员。这些分遣活动的组织，平时就应与相关地方机关建立联系制度，做联系工作，以免临时凿枘不入（工作不合手），或累赘地方。后勤部门除往前梯队派代表外，本身是属于后梯队的组织，力求民众化。”“无论前梯队或后梯队，对于战斗警戒、侦察联络等必须练习，对于活动地域的地形、*本篇是李达同志1982年为《刘伯承指挥艺术》一书所撰写的文章。该书198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关于机关战斗化问题，李达同志1942年曾为一二九师起草过《非战斗机关军事化问题》的文件，文件主旨已概括在本文中。道路和民情必须研究，对于战斗生活的装备必须预备。某些同志生活于敌后抗战的环境中，口喊党员军事化，而不懂军事，也不参加军事活动，是不应该的，是要实际改正的。”刘伯承同志认为这样的指挥机关，对于军事指挥是一个负担。他曾幽默他说：“带着这样的机关，就象挑着一担电灯泡子，总担心碰破，但晚上又要用它来照明。”当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为了迅速解决这一迫切的问题，交代我要给机关提出详细具体的办法和要求，并尽快落实。为此，我于1942年8月2日，起草了《非战斗机关军事化问题》的文件，经刘、邓首长审查修改后，下发到部队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为了适应日军持续不断的残酷“扫荡”的现实，领导机关必须在短小精干的前提下，实行军事化、战斗化。为了使机关干部战斗化，文件从机关的编制组织和作风纪律等方面的军事化，谈到机关人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真正掌握军事常识和军事技能；进而谈到在反“扫荡”中的战斗行动和战斗动作；同时还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以保障上述规定的落实和今后反“扫荡”的胜利。自此，旅以上的机关由非战斗化转为战斗化，在反“扫荡”中就轻便得多、自由得多了。拿刘、邓首长的话来说，无后顾之忧了，便于集中精力专注指挥部队打仗了。所以自1942年年底起，我们在以后的历次反“扫荡”中，都以较小的损失赢得了胜利。刘伯承同志谈的机关战斗化这个问题，对我军今后进行反侵略战争，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在和平环境中，习惯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指挥机关，尤有深远的意义。尽管今后的战争同过去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为了便于实施指挥，减少伤亡，有利于战斗，机关战斗化问题仍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我把那时的一些做法介绍出来，以供参考。太行军区经过了1942年2月反“扫荡”，特别是夏季反“扫荡”斗争，其中最严重的痛苦教训就是旅及军分区以上的军政机关人员臃肿

庞大，无战斗组织，缺乏军事常识和技能，转移不灵，活动不便，遭受了许多损失。因此，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旅及军分区以上军政各机关人员军事生活的组织和锻炼，使之能真正军事化、战斗化起来，经验证明，这已是争取反“扫荡”胜利的重要保证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所提出的机关军事化、战斗化的具体要求是相当严格的：第一，加强战斗组织，提高战斗作风与纪律性。1. 紧缩机关组织，减少行李马匹。机关组织机构尽量精简，人员马匹尽量减少，各人行李一般应做到适于自己携带，不另由军马驮运。办公用具也要做到轻便合用，取消不必要的公文箱和其他笨重物件。总之，要确实做到短小精干，消除臃肿现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轻捷地行动起来。2. 组织适于军事行动的班、排、连单位。把机关的全体人员，依照工作性质及行政关系，组成适合于军事行动的班、排、连单位，并将有战斗经验及军事常识的人员加以适当调济，选择一些有指挥能力的人员分任指挥干部及辅助干部，以便组织军事训练，指挥战斗行动。3. 把机关人员划分为分遣部分和随队行动部分。根据反“扫荡”战斗的需要，一部分在反“扫荡”中不必随队工作的人员，在必要时分遣到下层帮助工作。这些人员要事先同预定要去的县、区、村取得联系，熟悉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及附近地形，建立群众关系，以便于敌人“扫荡”行将到来时即直接分遣下去，帮助与领导下层的反“扫荡”斗争。过去往往临时仓促地把人员分遣下去，因为人地两生，对地形与群众不熟，加以自己无指导游击战的能力，未能起到帮助下层的作用，反而形成到下层避难，连累下层，连本身的吃饭及避敌方法诸事项都要下层为其担心，影响反“扫荡”的工作。至于不准备分遣出去的另一部分又不便于随队工作的人员，则组成可以单独游击活动的单位，划定一定的活动范围，必要时单独去进行反“扫荡”的游击活动。但这也同样需要与所要活动地区的地方干部取得密切联系，以便互相帮助。4. 组成担任战斗勤务的警备掩护队和日常工作组。各机关随队行动的人员，应抽出一部分精壮的战士、干部，组成警备掩护队，以便担任侦察警戒、通信联络诸战斗勤务。其他干部则编为日常工作组，于反“扫荡”中在上述战斗组织的警备掩护下，进行日常工作，以便始终不中断对部队的指挥和指导工作。5. 人人带枪支、手榴弹等武器。所有人员都应配带枪支、手榴弹和其他武器。对于这些武器的使用方法，平时就要切实熟练，做到人人皆兵，不致在反“扫荡”中把自己变成手无寸铁，无能抵抗的文弱书生。6. 各备鞋子、粮袋及水壶。所有人员应各备两双鞋子，各备粮袋，并带足3天以上的熟食，没有命令不准零星食用，以免在紧急情况下挨饿。同时用葫芦、竹筒等材料做成水壶，每人一个，以备急需（夏季反“扫荡”中，因无水饮而受不少痛苦）。7. 工作方式和作风的战斗化。减少工作中不必要的复杂手续，减少冗长空洞的指示、决议、报告和谈话，减少铺张门面的长时间大规模的会议等等，切实提高工作的速度和效率，以弥补反“扫荡”转移行动中所耽误的时间。这里就需要与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把一日可能完成的事拖延数日等等现象，作坚决的斗争。8. 严格军事纪律，人人服从指挥。要保障反“扫荡”行动之顺利进行，就要严格军事纪律，使人人服从指挥，克服乌合之众的无组织现象。没有严格的军事纪律，没有人人服从指挥的习惯，在反“扫荡”行动中，尤其在严重情况下，将要遭受不可估计的困难和损失。为此，在平时必须以极大努力从各方面养成所有人员遵守纪律听从指挥的习惯，不可稍事忽略。第二，认真实施军事训练，提高应有的军事素养和技能。为了提高机关人员

应有的军事素养和技能，加强其体力锻炼，师及太行军区曾制定了旅及军分区以上机关人员（包括地方党政机关）两个月军事训练计划，要求这些机关的领导者以身作则，领导督促检查，认真组织实施。在组织实施中，必须注意抓以下事项：1.要有严格的纪律。所有机关人员，无论何人都不得无故不到。到场人员必须一律遵守规定，认真操作，不得松懈儿戏。不能按时到操的事务人员，必须另找时间给予补训，不使遗漏一人。2.一律进行单个训练。如教练人员不足时，可选择现有人员中受过军训及身体灵活者，集中给以特别训练，使其在操练中分任班长或组长，指导实施单个训练。反对把全部人员集中起来，由一人喊口令，进行连排教练的敷衍塞责“一锅煮”办法。3.操作时的每一动作都要准确实在。教练人员要多作示范，少讲多做，并及时纠正受训人员的不准确动作，克服只喊口令而不改正动作的毛病。各教练人员须先行预操，求得自身动作熟练确实，然后施教。反对以昏昏使人昭昭的恶劣现象。第三，反“扫荡”时的战斗分遣与游击动作。根据机关人员的迫切需要，当时特别强调了反“扫荡”时的战斗分遣及游击动作诸问题。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适于机关自身防护的“游”的方面。1.战斗的分遣。估计到敌人“扫荡”行将到来时，迅速将应行分遣的人员作战斗的分遣。这些分到下层帮助工作的同志，要真正做到对下层有益无损，不累赘下层。为此，这些分遣的人员，在实施军训中就要真正学会一套必要的军事技能，否则仍不免给下层增加困难。随队行动的部分，则须立刻将现有组织重新切实整顿。埋藏不必要的物件，检查个人行装。全体紧张起来，以便随时迅速转移。2.侦察防谍勤务。在反“扫荡”的转移中，无论行军或驻止，无论情况紧张与否，也无论接到总的指挥者的指示与否，各机关自身均应及时向可疑方向或周围派出直接侦察。同时多方设法防止敌人的特务间谍活动，不放过任何可疑分子。要时刻提防敌人别动队的突然奇袭。对于这类问题的任何麻痹偷安，都会遭到意外的损失。

3.通信联络的组织。在反“扫荡”中，情况变化无常，同时在敌人伪装欺骗下，敌我识别困难，没有周到的通信联络，常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就要：（1）规定识别记号，这些记号须随时变更，防敌窃用；（2）派联络员随时与上下级及友邻联络；（3）规定紧急情况下的集合点与联络所；（4）夜间行动时要注意在道路之分歧点及转弯处设标记及联络员，必要时派干部专司其事，对于难以通过之处所，则须加以特别修理；（5）与附近的民兵和指挥部互派联络代表；（6）对可疑之人员及部队，应拒止其接近我们。

4.伪装与封锁消息。认真施行伪装和封锁消息，是隐匿自己企图，防敌间谍活动的重要条件。具体办法包括以下的内容：（1）利用夜暗、阴雨、下雪、起雾等天候和隐蔽的道路、地形、高苗等施行转移；（2）转移时多走折拐路，或先向虚假方向前进，然后向真目的地转进，并及时撤收通过路上的标记及可资敌人判断的材料；（3）不把自己的真目的地告知别人，应于拂晓或黄昏前后，投入预定地点；（4）不把自己的真番号和负责人的真姓名向任何人泄露，同时教育各联络通信人员，亦不得随便询问其他部队的上述事项；（5）不许在宿营地标示番号或代号，转移时应将原驻地的标记及可资敌人判断的废纸等全部搜集销毁；（6）进入新宿营地后，在情况紧张时则完全禁止居民及自己人员外出，如有外来人员应即加以查问，同样不许外出。以上问题须在全体人员，特别是勤杂人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检查，

认真实施。

5. 直接警戒与直接观察。估计到敌人的合击，特别是敌人便衣

别动队的奇袭多是突然的，每个单位在进入宿营地时，均须派出自己的直接警戒并构筑临时工事，遂行步哨员守则，必要时并须派遣干部在附近要地担任直接观察，以防意外。6. 集中宿营与指定紧急集合点。无论情况如何，在宿营时务须使所有人员尽可能集中于少数房舍，以便发生紧急事变时，一声令下，立即集合起来，以免因零散而无法收拢。这须严格克服机关习气，不准许少数人或一个人独住一个房子。此外，无论情况如何，在到一地时，必须指定紧急集合点与后备紧急集合点，并须督令班、排干部甚至所有人员，亲自查看通达集合点的道路，必要时还要把这些道路加以修理和标记，以便于发现敌情时，迅速到指定地点集合，不致乱碰一气，以致失掉联络，遭受损失。7. 熟悉地形与密切群众关系。所有干部甚至所有人员，必须以各种方法，如识图、上课、访问以至亲自查看等，去熟悉自己活动区域的情形，包括道路、河流、山脉、村落、人口，有无柴、水等事项，以及其他与敌我斗争有关的问题，以便利用这些已熟悉的条件去游击活动。要密切群众关系，照顾群众利益，及时向他们通报情况，告诉群众如何反敌“清剿”烧杀、反抓壮丁等斗争方法。必须与群众利益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任何违反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的现象，都是不允许的。8. 防敌奇袭的处置。敌人对我奇袭，常是出我意外的，我们除了加强侦察、警戒、伪装等工作外，在情况紧急时，还须注意以下问题：（1）夜间人员、马匹一定不可解装；（2）在拂晓前吃完早饭集合待命，或者即行出发，入夜后即组织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在驻室内外及其附近巡查，发现可疑异状时，须立即作必要处置。晨2时后，须分派武装人员前去于敌人可能来到之方向的5里路以外游动，如发现敌人即须一面鸣枪或打手榴弹报警，一面飞速回队报告。必要时于黄昏或半夜后转移到新的驻地。9. 在严重的合击“清剿”状况下应有的处置。在遭受敌人严重合击“清剿”时，应该是：（1）警备掩护队应以一切努力，甚至牺牲自己亦在所不辞，打开一条出路，掩护其他人员脱险；（2）有计划地分组由敌人空隙突围，即使这种空隙甚小，也比不突出去为好；（3）组织一部分得力干部及战士，救护负责干部、尤其高级领导人员脱险；（4）利用夜暗突围。总之，不管敌人如何严密包围（事实上这种包围绝对不会毫无空隙的）与“清剿”，我们只有抱定革命者最后牺牲之决心和誓死不作俘虏的豪迈气概，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薄弱方向拼命冲击，才能找到出路，死里求生。假使一见情况严重或被敌之刺刀枪声和其他声势所吓倒，就如绵羊一样地缩做一团，或一味向合击圈内退缩，那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这是毫不值得的。警卫掩护队及其他人员，必须抱定牺牲自己来抢救干部和高级领导同志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牺牲决心的人，恰恰会遭受无意义的牺牲，而抱定牺牲自己来抢救干部与领导者的同志，反而可使自己也转危为安。在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将会有极少数个别人员不幸被俘，在这种场合下，应采取以下的必要处置：（1）敌人对我被俘人员之看守管押，常是不十分严密，不论行军、驻止或被押送到敌之据点或劳役处所，总有许多可乘的机会，尤其管押之伪军人员，不少是同情我们的，我们应用一切机会，设法脱险，不应慑于敌人威胁，作驯服之囚。过去有许多在被俘管押中脱险的例子。（2）无论如何应抱定一个坚决的革命意志，不作任何屈辱变节行为，同时以一切机警诡诈方式欺骗敌人，争取有利时机，并隐瞒掩护我之干部和军事秘密与资

材。(3)即使在敌人各种利诱威胁下,我应一本富贵不移、威武不屈之豪气,宁可牺牲肉体亦不作任何背叛革命利益之行为。历次反“扫荡”中,许多以死殉国的模范先例,应在部队中深入教育和发扬。(4)此时我们凡未被难的部队及人员,则应以各种方法,如以战斗方式抢救和经过其他线索营救,以救护我被俘人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第四,政治工作。为求得军事化、战斗化的具体要求彻底实施,并达到圆满的成功,争取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还需要有充分的政治工作作切实的保证。为此,必须:1.在实施战斗组织及军事训练时,政治工作应以各种动员、说服、鼓励以及组织竞赛等方式,保证其顺利施行。2.在反“扫荡”斗争中,应及时恰当地进行鼓励与解释工作,保证全体人员在任何情况下确实完成任务,并保证每个人员自始至终有良好的政治情绪及高昂的斗争意志。3.保证全体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均确实遵守群众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最后还要指出:无论敌寇“扫荡”之如何频繁与残酷,无论“扫荡”时间之如何延续,但这总是它垂死挣扎的“回光反照”,他在“扫荡”中的弱点与困难,是始终无法克服的,只要我们有了真正的军事的战斗的组织与锻炼,一定能争取每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刘伯承同志对机关战斗化问题所强调的某些细则,是针对40年前的对敌斗争需要而言的,但他倡导的总的精神,对当前我军领率机关的建设,仍有着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太行区粉碎敌人“扫荡”的主要经验*

敌寇这次对我太行区晋东、晋中地区的“扫荡”，亦即其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的具体实施。其主要目的，在于抢夺与毁坏我根据地之粮食物资，奔袭与合击我军主力，搜击民兵。并企图借此吸引我主力部队于“扫荡”区之腹地，使我纠缠于反“扫荡”，减轻我对敌占区（即敌所谓治安区）与接敌区（即敌所谓准备治安区）的进击。以便求得它对“治安区”之进一步巩固，对“准备治安区”之继续扩大与逐渐转变为“治安区”。以达到其抢粮、灌仓、扩大伪军，并实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然而，由于我抗战军民的团结一致，敌占区广大人民的抗敌斗争，大家一致针对着敌寇这种阴谋，由“扫荡”开始，即给敌以不断的严重打击，终于粉碎敌寇这一企图，使它预定1个月以上的“扫荡”，不得不于16天内即行破产而仓惶窜回（在晋东区），或准备窜回（在晋中区）。这一胜利的反“扫荡”斗争，是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的，兹择其主要者申述如下：（一）在思想上，一般我们有了较充分的准备，足够的认识敌寇“扫荡”之必然到来，预先做了周到的动员，及反“扫荡”的具体组织*1942年10月20日，日军出动16000余人对太行区、太岳区同时发动了“扫荡”。太行军区于11月上旬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李达同志时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这是他为此次反“扫荡”所做的总结，曾发表于1942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晋中区做得更好）。特别是识破了敌寇“扫荡”之主要目的。因此，在反“扫荡”的领导上，进行了正确适当的部署。各级领导同志，在执行这种部署上，都能抓住中心，依靠本身具体情况适当实施。尤其对敌抢粮及捣毁敌“治安区”统治机构上，给了敌寇以极大的打击与威胁。这就成为反“扫荡”胜利的中心关键。然而，尚有某些地区，对于这些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存在着麻痹苟安侥幸的心理（在某些击被“扫荡”区表现尤甚）。如有些指挥部，尚未确实组成，情报通信工作毫未着手。有些在粮食斗争上，对于快收、快打、快藏工作，进行得不认真，特别没有说服与纠正农民之浅见与保守观念，不把粮食分散密藏野外，仅仅只埋在自己的屋内及其周围。有的在地雷的使用上预先缺乏确实的训练。有些以为敌人将不来，或不马上来“扫荡”，因而苟且偷安等等。以致受到某些不应有的损失与可能避免的危害。这是今后不应再重复的。（二）由于识破了敌寇的行动目的，故我们的基干部队灵活运用了分遣集结的原则。在被“扫荡”区之腹地，留置了必要的兵力，结合各地民兵抗击敌寇的抢粮与“清剿”。在敌“治安区”，派遣了多数有力支队，结合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捣毁敌寇的“治安”机构。我各基干兵团的主力，则分别集结，不时拊击“扫荡”之敌的侧背，与摧击其补给线。由于下述这三方面的动作协调，乃能争取反“扫荡”的决定胜利。第一，使深入我腹地抢粮“清剿”之敌，无时无地不碰到我反“清剿”的有力打击。整个被“清剿”区，差不多每日到处都有地雷爆炸声与特等射手的冷枪声，敌寇在这样的打击下面，死伤的人马，每日平均总在数十以上，以致敌之“清剿”抢粮收效极微。第二，我伸入“治安区”之各个支队，打滥敌寇各种“治安”机构，使得敌寇极为震惊。如我某部在5日以内，即将长治、潞城、长子等地之敌寇腹心的伪组织，摧毁近百，捉到伪维持人员200余名。晋中敌人在正向我区大举“扫荡”时，其“治安区”中之某些乡村的伪组织，即自动取消维持。因此使得敌人在其“治安区”的秩序，大为混乱，抢粮灌仓计划，

遭到严重的失败，形成顾此失彼的窘状。第三，我各基干兵团之主力，在拊击“扫荡”之敌侧背，和摧击其补给线上，收效更大。无论敌在转移，以及归途运输上，均受到严重的创伤。尤以敌安达联队于10月22日向韩壁进犯，即遭我迎头痛击；28日由西井南犯时，沿途又遭我在30余里长的路线上的不断有力截击、伏击和尾击；27日经上下北漳犯蟠龙之敌，也遭我惨痛的夹击；在武蟠路上以及晋中各补给线上，敌之运输部队，不断遭我之有力摧击等战斗；都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这种三方面斗争的密切联击与运用，是必须在今后更加发扬的。（三）空舍清野工作，一般作的尚好，特别以晋中区为更彻底。这一方面使敌抢不到粮物，找不到人民。甚至使被敌驱使的伪军、民夫找不到一口锅煮饭。以致许多伪军和民夫，许久得不到熟食，仅以火烤土豆、洋芋、南瓜来充饥，饿跑了不少伪军和大批民夫。其没有逃跑者，则饿的不像人样，毫无精力。因此，就很少有人愿供敌寇驱使来进行抢粮，即使抢到一点，也无人为之运输。故被敌抢走的粮食，为数极微。但也有一些地方不注意空舍清野工作，使粮食受到严重的损失。如晋中区之下白岩、润郊等村，即被敌抢走了不少未打之粮。晋东区之韩壁、大陌村等，多将粮食埋在屋内和院内，以致被敌人抢光和烧光。（四）地雷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由于反“扫荡”准备中适当的分布了地雷，训练了使用地雷的干部和民兵，故在反“扫荡”中，使得敌寇饱尝了地雷的滋味。差不多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不遭到地雷杀伤的。在晋中，我临时驻扎的小部队，都常以地雷埋于敌人可能经过之道上，以作警戒之用。因此，敌人包围每一个小部队时，都要进行很迟缓的搜索，以至碰响地雷。又如我在另一未被“扫荡”之接敌地区，因为各村都进行使用地雷的训练，同时在各地确实埋藏了不少的地雷，故敌人闻而生畏，不敢横行。当然，在我们的某些地区，也有对地雷使用尚不熟悉的，以致多不爆炸，或被敌人抢走，甚至有时误炸我方人员，这是应立即纠正的。（五）各级指挥部，特别是情报通信工作的初步建立，这在晋中区也比较作的好。他们接受了2月份反“扫荡”的经验教训，预先派遣多数干部，加强各个指挥部的这些组织机构。故指挥部在指导游击斗争、群众转移、情报联络各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与发挥，在极严重的情况下，尚不致与各方面中断联络。这是值得发扬的。但还有不少地方，尤其是某些未被“扫荡”的地区，则对指挥部的工作不加注意，甚至还有不知指挥部应做何事者，这是应该急起直追的。（六）各地民兵在单独游击活动抗击敌人“清剿”抢粮，以至配合军队作战上，均显示了极大的神威。毙杀敌军人马，俘敌人马武器，以及截夺被抢赃物，解救被捕男女等事，各地每日均有不少的成绩。使敌不能不到处发生恐慌。以致敌人多方设法来围击我某些地区的民兵（但均未得逞）。可惜某些地区，尚不善于使用民兵，有时以数十人至数百人的民兵集团，作正规的阵地战斗，以致造成伤亡，这是不应该的。（七）对伪军及敌占区人民的政策，在晋中区有着很好的成效。他们运用2月份反“扫荡”的经验，对于逃亡之伪军及民夫，不但毫无伤害，且一般的给以掩护招待，并指示他们逃跑的道路与方法。因而影响许多伪军，尤其是大批民夫的继续逃跑。这在减少敌寇的辅助力量上，是值得各地学习的。注 释〔1〕治安强化运动：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其在华北的统治，对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与“蚕食”的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主要

企图是“巩固治安”，整顿、加强伪政权、伪组织，建立保甲制，清除抗日人士；扩充伪军，建立伪乡村自卫团；加强对敌占区人民的经济掠夺。第二次，从1941年7月7日到9月8日。仍以“实行剿井、巩固治安”为方针，除继续扩充伪军、伪组织，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外，并加强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封锁，组织汉奸武装对我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第三次，从1941年11月1日到12月25日。主要强调“经济战”，在敌占区实行配给制，增加苛捐杂税；加强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的掠夺；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第四次，从1942年3月30日到6月中旬。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其目的是结合大规模的“讨伐作战”，巩固其对华北的统治，建成“大东亚兵站基地”。日寇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加紧推行保甲制和配给制，抢修碉堡和封锁沟，以压缩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第五次，从1942年10月8日到年底。日寇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瓦解华北人民的抗日意志；经济上进一步封锁，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军事上继续进行全面“扫荡”，以消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斗争下，日寇的历次“治安强化运动”均被彻底粉碎。

祝伯承师长五旬大寿*

伯承师长，是我军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与战术家，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滥觞者，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始者与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其生平忠实于党的路线之坚毅真诚，与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之豪气，在在皆足为我们所矜式。值兹大五旬大庆，我深感无以为贺，谨愿连同全师各级参谋人员，在伯承师长的英明领导与命令之下，努力于各级司令工作的建设，为加强壮大与提高党军的战斗力而奋斗，争取把日寇最后由中国赶出去。敬此奉表贺忱，并祝长期矍铄。*1942年12月4日是刘伯承同志50岁生日，本篇是李达同志在为刘伯承同志祝寿时所致贺词，发表于1942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响应叶参谋长“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

叶剑英参谋长〔1〕在他为苏联红军25周年纪念而作的《实行军事教育革命》〔2〕的一文中，介绍了苏联红军在20个月抗战中，能由劣势转为优势而获得惊人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苏联红军“完全依照了最新式的装备和军事科学与作战经验，进行训练的结果；介绍了苏联红军怎样地实行军事教育革命，如在苏芬战争后，反对了过去“红军训练方法中的拘泥旧套与因循成规”，抛弃了“旧的假拟的训练方法”，而代之以新的“可能与实际作战最相似的情况下训练部队”的方法，“只以实际战争中所要作的东西教育部队”，“使军事训练适合于最迅速地融化最近战争经验中一切新的东西”；介绍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后备军的训练，是更高度的发展了军事教育的精义，在训练上确实从各方面做到训练与战斗的密切联系，且不惜“将作战最优良的指挥员调到后方担任教员”，及适应战时要求的“专长教育”而组织各种专门训练，与随着战争发展和战斗任务变化的“重点教育”，而使各时期各部队的教育重点各有不同。同时还指出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虽然“自来是特别注意作战中的实际教育”，“最实事求是的军队”，“作战与教育结合为一体的军队”；“但是部队特别是学校的军事教育中，还存在着许多主观主义*本篇写于1943年4月4日，发表于1943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义与不实事求是的歪风”。因此，“作战与教育脱节，学校与部队脱节的现象，还在很多地方严重的存在着”。现在我们以叶参谋长的这种“军事教育革命”的基本观点来检查本师的军事教育吧！诚如上述，我们军队之所以能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发展和壮大，也是由于我们是有以上这些优点，但假使用整风的精神来自我检讨一下，本师几年来的部队和学校的军事教育之所以没有长足的进步，亦确有许多歪风需要用革命的精神才能克服和转变它。就军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来说，我们今天虽然是进行游击战争，但游击战争亦必须善于使用各种武器来消灭敌人，同时夺取敌人武器以武装自己，长期赤手空拳的游击战争是没有的；而我们各种武器的射击均不够准确，刺杀教练还只是做为基本教育在某些部队中有了些基础，屡次指出的冲锋假目标的应用教育还没有实现；投弹教练，还在操场的基本姿势上打圈子，很少在各种地形各种情况下切实演练，更没有进行普遍的实弹投掷，以致许多战士不明了手榴弹的威力而害怕投掷它。这些都是由于我们学校的军事教育和部队在职干部的军事教育，偏重了战术原则（这些原则虽然要紧，但也是很现实的），而忽略了使用武器的技术教练。在战斗教练方法上又偏重于条文原则的讲解而实际演练的太少，即或演练也只注意于战斗形式的排演，而忽略了战斗指挥法的锻炼；我们夜间作战较多，但夜间演习又少。因此，某些干部回到部队中进行教育时，就只好用学校的干部教育方式向战士讲一些脱离实际使人无法了解的条文原则（能讲原则还算好的），而无法进行切合战争需要和战事要求的技术教练与战斗教练；这些干部（当然不是全部）一到战争中发觉自己的原则条文用不到实际中时，就干脆的抛弃了从前所学的原则，而单凭部队狭隘的经验来从事战斗指挥。于是战斗中就很少能运用正确的口令、命令词以指挥战斗和射击，而普遍的听到“冲冲冲”“打打打”的指挥方式；还有个别学员回到部队中只能当“候补马夫”……，虽然与送学生未全送优秀者有关，但这都是在教育内容及方法上与实际作战脱节，学

校与部队脱节的具体表现及其恶果。就教练干部来说：我们学校干部很少与前方交流，很少得到现实的作战经验。前方又很少肯把作战最优良的指挥员调到学校担任教员，虽然也还有客观条件的阻碍——就是前方具有作战经验又兼长于训练的干部还不多，但是我们事实上对这类干部的培养与调剂没有尽到应有的努力。此外，学校中虽然也曾留用了一些战斗部队中的干部，但学校本身则还存在着墨守成规的现象，不去设法采用这些干部的宝贵的实际经验，致使这些经验始终未与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教员收集学生的经验加以原则整理后再教学生的这点上，做得非常不够。就教材来说：我们这几年虽然总结了一些作战经验，但是这还只是战术思想上的东西，特别是连这些东西还没有普遍迅速的为学校工作干部所重视而运用到教练中去；至于部队中则很少收集连队的战斗经验和整理战例，特别是战斗汇报上关于战斗经过写的不具体不细致更不真切，使我们无法整理适合小部队训练的战例，以充实部队和学校的现实战术教材；其他如射击兵器及工兵筑城等类的教材之编写；对于战事教材之必须去繁取精的少而精的精神，必须适合现实战争需要的基本原则，必须考虑目前对象的文化程度较低等等，都还把握不够（当然某些专门性的参考材料必须精详是例外的）。另外，我们还有某些干部在教材的采用上，还有些宗派主义，就是他们非翻译某国教材就认为不好，不肯批判的接受资产阶级和敌人的好东西，甚至对于本军血的经验也不很重视。以上所举这些缺点，不过是指出本师过去的军事教育上存在着这些歪风，而不是抹煞了近年来某些进步的革命的表现。例如我们某些基干兵团目前对技术教练的开始重视与获得了某些成就；各兵团在去年的战斗教练上，多少都进行了实战的教育，特别是某旅能在战后集中干部到战场去实地检讨和讲评（即战地旅行）；例如去年太行各军分区在总结战争经验上都有了进步，特别是第一军分区在这方面的收获最大……，都说明我们去年整风已有了某些收效。但这些军事教育革命的表现还不够普遍，在整个军事教育工作中还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质的转变。因此，我们大家还必须来大声疾呼“实行军事教育革命”！还必须把这种军事教育革命的真意灌输到每一个干部的脑海中去；我们还必须来研究和创造一些崭新的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实施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就是怎样使军事训练的内容真正切合实战的需要，做到“训练就是作战的预习”，怎样使军事训练的方法，更能短期收效，更能“迅速地融化最近战争经验中一切新的东西”，还必须出版一些适合部队需要的简明切用的教材；因为干部决定一切，因此各兵团必须不惜将作战中表现最优良的指挥员抽调一些拿到干部学校中去创造更大批的优秀干部，而在干部学校中则需不断收集与接受前方经验，特别是就便向那些来自前方的学员收集其作战经验而加以原则整理；为了针对目前前方需要，还必须注意技术教练，以培养能够指挥作战且能教练的人才；因为学习时间的短促，在技术教练能力上必须培养其一项专长，使精通一艺。但这不是说一个干部光会投手榴弹或光会步枪射击就行了，而是说在其他方面仍然能像一个普通的干部。这样能有几个不同专长的干部在一个连队中，部队训练的问题便解决大半了。至于部队中的战士训练，因为目前是游击战争，是小部队作战机会多，且部队装备简单，战斗中技术分工不多（刺杀、射击、投弹经常都要使用），不必采取普遍的绝对的分科训练，而可以于一般教育之中，发挥各个战士的长处，予以专长的培养，且为将来专长的干部作准备。其中特别要考虑到我们今天弹药的缺乏与战斗中普遍发扬步枪火力的机会较少，因此特等射手的培养，

更为必要。对这问题，我暂时只能提到这些。希望本师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学校的干部，都来一个自我检讨，加一番研究，提出更具体的办法，使叶参谋长“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切实实现！注 释〔1〕叶剑英同志时任八路军参谋长。〔2〕叶剑英同志这篇文章刊登在1943年3月3日《新华日报》上。

加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之商讨* ——5月反“扫荡”的部分经验总结

太行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此次5月反“扫荡”反“抉剔清剿”斗争中，是发挥了比过去任何一次所没有的伟大力量。各地人民武装协同各该地基干军队与游击队，有机地与敌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击了敌寇企图摧毁我根据地物质资材与抢掠粮食的阴谋，严厉镇压了敌寇所派遣的大批奸细爪牙，使合围“清剿”之敌，到处感到“四面楚歌”“随地皆兵”之痛苦，遭到我们不断的扭击、饿困、伏击、围袭与追击。而我们则胜利地保护了广大抗日民众的生命财产，最后粉碎了敌寇“新作战”的大举“扫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发扬与鼓励的。但严格检查起来，我们这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还有许多缺陷与弱点，急须我们各方继续努力加强和改进，使之更向前迈进一步，来发挥更伟大的力量与作用，以便随时都可粉碎敌寇任何残酷的“扫荡”与其他新的大小进攻。兹根据初步材料的了解，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尚请各级武装工作同志加以研讨和考虑。

第一，各级指挥部的指挥问题。1.许多指挥部由于平时没有经常的工作（甚至有作指挥与政*1943年5月，太行根据地粉碎了日军20000余人的“扫荡”。本篇是李达同志1943年6月1日所作的反“扫荡”经验总结，发表于《战斗》增治主任者，平时根本不问游击战争组织工作），没有打下指挥工作的基础，以致“扫荡”将到或已到来时，便缺乏较成熟地“指挥若定”的作战指挥。此次“扫荡”前军区于半月以前，提出敌寇“扫荡”之必然到来，提出在“扫荡”中“反敌人摧毁斗争”（即以顽强抗击掩护人力物力财力）、“给养斗争”（即善于蓄藏粮柴水借以饿困敌人）、“情报斗争”（即自己做好情报工作，同时除好防谍塞闭敌人耳目）3个口号，但尚有某些指挥部由于上述缺乏平时的经常指挥工作的原因，便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没有慎重其事的将这些问题提到指挥部来深刻考虑，以精细的组织工作加以实施，在空舍清野、群众转移、情报通信各方面均未能预行办理（如某地在“扫荡”前之第三天才真正着手备战），因之就未免有些临时忙乱，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为此要求各级指挥部确实建立平时的经常工作，确立指挥体制，于一定时间内研究情况，研究上级关于作战指导的文件，研究如何指挥作战，尤应设想各种情况预定各种指挥方案，如组织群众空舍清野与及时转移，组织游击集团的具体活动，组织情报通信除好防谍等等均应预行拟定，可能时并须进行实地演习，以资熟练在反“扫荡”中之指挥机能与作用。

2.在民兵的使用上不少地方只注意高度的集中（如集结一个区的民兵于一地），不善于分遣多数游击小组于许多地方散布成为游击网，以使无论运动与“清剿”之敌，到处得在我游击网的笼罩与神枪手的冷枪射击之下，遭受着肉体上与精神上的高度消耗与疲劳。这种集中使用的办法，便会使某些自然村的民兵脱离本村，失掉直接保护本村以及本身利益的作用，失掉与群众的联系和依靠，使许多地方形成没有武装活动的空白区，达不到全面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要求。今后在民兵的使用上，应变更这种方式，一般的以不高度集中为原则（特别情形例外），应依照各自然村散布的实际情况，把民兵分成若干游击小组（每组三五人至八九人不等），有组织的分布于各个适当的地点，给以一定的活动范围，这些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并分头结合相关自卫队活动，取得群众的直接支援，这样来把全区以至全县形成有组织的有机的游击网，如敌寇行进时，则各地游击网

依次就近机动实行扭击追袭之；如该敌短距离追击，则略为退据有利地形狙击之；如该敌撤走，则又扭击追袭之；如敌寇“驻剿”某一区域时则除该区域之民兵直接坚持与敌斗争外，邻接该区域之其他民兵，则分由外线袭击敌之侧背，以配合邻区作战，这样就会组成真正有弹性的全面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使敌人到处有钉子碰，而又无法捕捉“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以至敌人伤亡不断和疲惫万状，无所施展其技了。自然在某些条件下，如确知敌人移动或逃窜时，是可以集中一些力量机动使用的，但这只有发动各地分遣的诸游击小组各顺现势不失时机地由局部集结逐步战斗，来形成各方疏散围袭的状态，宛如黄蜂轻松围袭一般，如预先把各自然村的民兵一下子集中于一地，实行“待机”或在战斗中临时机械集合，那不但不能机动打敌，反而有被合击的可能，这是不合理的。

3. 在侦察布置与情况估计上，许多指挥部只主观的注意到一面或几面的游击，而缺乏周围可游可击的布置；多引证狭隘的经验以为敌人从来没有走过某些道路，没有到过某些村庄山沟，这回也一定不会走或不会到的，结果敌人一从我不注意的地方来到，或一到过去不曾到过的地方，便大惊失色，甚至因受到不意的损失，而顿时悲观失望起来，这样的事实曾是屡见不鲜的。今后在侦察布置与情况估计上，不仅要注意到正面的或两翼的，而且要注意到后面的与周围的；不仅要注意敌人常经之路与常到之处，尤应注意敌人不常走的道路与不曾到过的地方，并根据这样的注意与估计来布置我们的斗争，以免临时束手无策和遭受意外的损失，因为游击战争是无定形的一定地域的，敌人是从任何方面都可来到的，同时“出人不意”、“攻人不备”更是无人不知的战术常识，敌人是会以一切方法从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和不注意的时机来突然出动的，这是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4. 许多地方对一般自卫队的整理尚欠应有的注意，在反“扫荡”中没有大量运用他们担负一般抗战勤务，而把许多自卫队应担负之勤务，转移到民兵身上来，分散与减弱了民兵的战斗力量，这是很不适当的。因此，我们平时在人民武装整理上，不仅要注意民兵，而对于广大的一般自卫队，也同样不要放松。在作战时要充分运用它们担负一般抗战勤务，作后梯队的一切活动，尽可能使全部民兵担负紧张的战斗勤务，以增强其战斗力量。

5. 在组织分工上，一般的把民兵分为战斗队、地雷组、炸弹组、情报组等，各人各有特技的分工是对的，但机械的分门组织，没有各种力量混合的运用，以致战斗中各不联系，缺乏有机的配合，战斗队只管拿步枪射击；地雷组在埋上地雷之后就无事可做，又因无枪掩护而不敢接近敌人再重新起埋地雷；炸弹组也不协同步枪手进行战斗；情报组亦因无战斗经验和没有武器，在情况紧急时就不敢接敌侦察，也不敢送达情报。同时又只有战斗队的人员，才给吃公粮，地雷炸弹情报组则不给公粮吃，这样在反“扫荡”中他们常常因没有饭吃而饥疲、情绪低落，以至怠工。至于旧武器基本上就很少有人提倡使用，而拿旧武器者更没有编入到战斗队的“资格”，难怪在反“扫荡”过程中很少听见它们的消息了！为此应重新考虑上述分工的组织，我的意见，民兵的战斗队（一个小组到一班一队）应是包括步枪手、地雷炸弹手和土枪土炮以及刀矛手的混合组织，至于侦察勤务则是战斗活动手段之一，在情况不明时，往往是要用战斗手段来实行侦察，同时更因为要遂行战斗任务，又不能自行侦察情况。故除固定的情报系统外，用不着再形成单独的情报组了。这样的混合组织，是能在战斗中相互发挥其擅长弥补其缺陷，显示伟大的力量，特别在夺得敌人武器后可随即使地雷炸弹手人员和刀矛手重新武装起来，在

步枪手伤亡时，同样可将其所携的步枪由其他人拿起使用，不至减少其战斗力。6. 也由于指挥部平时无经常工作，即在反“扫荡”后也缺乏总结游击战术的经验教训，指挥者的指挥艺术既差，而斗争经验的收集又极缺乏，以致有某些指挥部在情况严重时，就不敢继续坚持领导斗争，如某些县区指挥部，一到情况紧张时，就被迫远离自己的辖境，数日不回，或竟把枪埋掉，这种现象是极不应当的。照规则说来，指挥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是应在自己的辖境以内辗转坚持始终领导斗争的，如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放弃领导职责，那是应该受到纪律处分的，即使迫不得已，必须暂时向他区转移时，亦必仍留必要人员继续指导内地斗争。而指挥部转移到他区后，并应随即争取一切可能复回原境，辗转指挥。如一下子全部转移，久不回境，以致内地斗争中断指挥，那就成为逃避斗争的有害行为了。7. 有些指挥部，当我基干部队来其附近活动或经过时，没有主动的适时寻找他们（当然部队也有主动联络指挥的责任），供给以所要的情报和其他应有的帮助，以商洽配合行动，这种现象也应加以改进。应做到部队一到，除部队本身立即找指挥部联络外，指挥部即应立时主动的找部队联络，告以当前的具体情况，给以粮食向导等帮助，如部队在附近有战斗活动的任务时，并立即商定与组织人民武装的配合诸事宜，这样才能使部队与人民武装密切融洽起来，发挥骨干与筋肉联系的有机作用。8. 此外，我们各县区交界之接合部，多形成无斗争组织或少组织的空白地与薄弱区，指挥部应注意加强这些地方工作，以弥补缺陷。同时指挥部更应注意在敌寇不“清剿”各该区村或暂停“清剿”时，则应不失时机，指导群众耕种收获，以加强战斗空隙中的生产组织，使生产与战斗密切协调起来。为使生产与战斗之有机协调，以及合理的处理非战斗群众转移中的各项事务（如掌握群众情绪，解决生活问题，进行后方防谍除奸，照顾民兵家属，通知民兵与家属间的相互情况等等），指挥部并应吸引救国会负责同志参加其组织，以便更有力地协助上述工作。

第二，民兵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1. 不少民兵在战斗活动中的一般毛病，就是不敢真正接近敌人。步枪手往往在距敌一二里以外虚晃一枪，胡乱射击；地雷手则多在敌人未来以前埋设地雷，很少在敌人住宿后，抵近其宿营地的各村口，以至潜入其宿舍门口，施行埋设；至于炸弹手及持旧式武器之刀矛手等，则更很少结合潜迫敌人，进行鬼神难防的投掷与白兵突袭。由此原因，所以对敌寇的杀伤与打击，尚没有达到应有高度的纪录，使敌寇对于我们的民兵，尚有许多轻视之处。今后我们应高度发扬秘密接敌，实施突然短促的射击投弹爆发地雷和刀矛格杀，尤其是各兵器结合的威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长处，以乘敌寇的弱点，获得更有效的战果。上下清泉村的6个无枪的民兵，乘敌人夜宿疲惫不堪之际，各携手榴弹刀矛，潜入敌人驻地，以手榴弹突然投掷，炸死和轰散敌之骡马30余匹，我并顺利的夺回6匹，这种战斗方式，应即广为发扬，以教育全体民兵。2. 不善于游击动作，尤其是只有群胆而少独胆，只晓得集团式的多人活动，不善于发扬神枪手的冷枪作用，以致我们力量围绕敌人的散布面就很有限，就留出了许多空隙地给敌人钻，使敌人还讨得了不少的便宜（碰的钉子不够多），这是于敌有利，于我们太不合算的！以后应根据民兵的质量与数量，分组多数游击小组，每组适当配备以步枪手炸弹地雷及刀矛手，有组织的分布于许多机动地点，能够相互呼应，给敌人准备好多数锐利的钉子，教他来碰。如敌人进入某地区时，无论它行动驻止或者进行“清剿”，这些游击小组，就像黄蜂一般的到处以冷枪地雷、抵近投弹、

刀矛突杀、以扭击追袭围袭敌人；当敌人排开阵势找我某些小组正式作战时，我即于敌人快要接近之时，机动转移。其他小组，则拊击这一敌人的侧背；当敌人住宿时，我各小组如乱箭射豪猪似的从各方面一致向住宿之敌围袭，使其不仅不得安宿，即使打水屙尿，亦须受到我之冷枪及暗雷的照顾；如敌人回窜时，我各小组则施行左右前后的堵、截、追，一直把敌人送回老巢为止（上述场合在有基干部队结合作战时则收效更大）。这样发展下去，任何进攻“扫荡”之敌，都不能不在饥疲、恐慌、颓丧、不断毙伤、急求逃走的情况下过着它们的“讨伐”生活了！有这样一个故事，很可比拟我们游击小组的神威作用，有一次我们带着多数骡马向某地前进，适逢道上有一窠黄蜂，一遇骡马由其附近通过，即群起而分螫之，顿使这些骡马无论头部、腿部或腹部，没不受到黄蜂的有力痛螫，以至伏地急滚，以求摆脱。还有一个很大的骡子，于通过半里之后，犹战栗无比，唯恐黄蜂之复来。这是游击小组对付“庞然大物”的进攻“扫荡”之敌的逼真写真，请同志们以之玩味游击小组的作用，普遍发扬组织之。

3. 不知道利用地形，不会瞄准射击，也是不少民兵的共同毛病。许多民兵，在发现敌人时，都是惟恐敌人看不见自己，挺直其身的随便打枪，很少利用地物，以发扬射击效力。尤其是十之八九，不知道射击要领，只会拿起枪来照敌一打，就算完事。至于如何据枪，如何瞄准，如何击发，甚至表尺的作用何在等等，他们大多是莫名其妙的！此次“扫荡”中，各地民兵消耗的子弹当在数万以上，而敌寇之死伤者（包括与我各基干部队及游击队作战在内），总计是 2000 以上，这其中究竟被我们民兵射杀者为数若干？虽然无法统计，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看来，敌人碰到我们民兵的钉子而毙伤者，则大多是地雷的作用，很少是被步枪杀伤的。至于民兵所用的步枪有一部分是私厂制造，一般不起作用，不应再行购用，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大部民兵尚不会据枪、瞄准、击发则确是事实。因之提高全体民兵的射击技术，切实从据枪、瞄准、击发以及在各种实地来着实操练，求得真正领会各动作之要领，做到弹不虚发，一致向者神枪手刘二堂学习，以加强民兵的战斗力，增大敌人的伤亡率。这是当前的急切任务之一。

4. 夜间战斗，多数民兵是不会遂行的，本来夜间活动，是能利用昏暗秘密接近敌人，而敌人又于疲惫之后，入夜更熟睡若死，异常疏忽，成为我可乘之有利时机。如我善于夜间活动，则常可以劣势武器，获得良好的成果。上下清泉 6 个无枪民兵之获胜，就是很好的榜样。此外夜间活动还可给日间战斗以很多的影响和帮助，如能在夜间给敌以不断的袭扰与杀伤，或使敌人不能安宿，增加其精神与物质上之高度疲劳与损耗，常可减杀其日间活动之狂焰。此次反“扫荡”中（历来也是如此），民兵夜间活动的成绩是太微弱了，许多地方日间活动尚称积极，但到夜暗便都消沉下去，很少听见响动（上下清泉之夜间获胜等个别例子除外），这一方面是农民的习性（夜间是不出门的）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夜间战斗的有利条件缺乏认识，以及很少夜间行动，没有除却夜间的恐怖心理等所致。今后应从各方面提高民兵夜间活动之能力，首先从思想上克服农民夜不出门之积习（在雨夜时尤为重要），使之深刻了解夜间活动之有利条件，并不断施行夜间袭敌、摸哨、捕捉俘虏汉奸、伏击夜行之敌、潜入敌地埋设暗雷、接敌侦察、监视封锁敌人等动作之演习，同时也联系演习夜间警戒与防敌袭击诸动作，养成夜间活动之习惯。在实际战斗中，随即实施这些活动，开辟夜间战斗之新局面，增大我之胜利成果。

5. 地雷战在此次反“扫荡”中是收到了功效的，敌寇凡死伤于民兵之手者，大多是尝

了我们地雷的滋味的。但这种功效，还极微弱，尚还达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埋设的地雷，不为不多，而实际爆发毙伤敌人者则为数甚小。这里有因埋设不当，而触之不发者；有因伪装不好而被敌发现取出或绕行通过者；有因未及起收或看守不严而误炸我方军民者；有因保管不良，以致潮湿而不发火者；有只在敌来以前埋设，而在敌“扫荡”“清剿”中，或敌行进部队之空隙中则未行埋设者；有不善于估计情况，不善于把多数地雷集中于主要地方，把少数地雷分置于次要地方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石雷则因才开始采用，只有个别地方发生作用。而我们数年以前曾经提到的滚雷，则根本无人试用，这则是一个遗憾！地雷作用之重大，在此次斗争中，更为事实所证明，也为广大群众所深信，我们现在应从使用上与保管上切实纠正上述各种毛病，使其更加精练化与普遍化，特别是机动化起来。要以之阻绝与迟滞前进之敌，也要在敌之抉剔“清剿”中乘隙埋设，以破坏其“清剿”；要乘机埋设于敌行军纵队前后之空隙中，以轰炸其后续部队，也要潜埋于敌驻地之周围村口屋口厕所及饮水附近，以封锁、堵塞、围困驻止之敌；要善于伪装与引诱敌人触发真雷大雷，也要故意暴露一些假雷小雷；要虚虚实实，在重要地点埋设，也要在某些不重要或敌人不甚注意的地点埋设；要用之于防敌人之进击，也要用之配合伏击袭击以进击敌人。总之，要使地雷各方机动，以高度发挥其威力。此次西戎民兵以地雷封锁饮水，并以冷枪射击配合之，曾逼走了驻止之敌；黎城民兵布置了雷中雷、地枪雷，均收到很大的效果；涉县民兵在敌先头部队通过时埋设地雷，炸倒了敌人的本队。这是应各方鼓励，准此续行发扬的！

石雷的效用，根据此次的经验，是不弱于地雷的，有时其威力

且会超过地雷，在制造与伪装上均较地雷为易，是应鼓励民兵以至全体民众一致采用的。所感困难者，只是火药集收不易，这应由各方设法给以必要的解决。

滚雷以至依据悬崖掷石，在某些要隘处，亦能显着功效，此次

下黄堂民兵在北恼，以及北委泉与西井民兵在九龙恼，均曾以居高掷石的办法，击退了沿隘路攀登企图搜山之敌，据民兵意见：当时如果有较大之缓发手榴弹使用，则成功必尤大。这说明滚雷掷石作用同样重大，我们也必以具体办法来实现这种久未实现的号召。

6. 据险机动，根据上述北恼与九龙坑斗争的经验，也是很易成

功。我们应多方发扬这种方法，选定某些可资机动的要隘，必要时并将附近地形地物加以人工的改造（如阻绝塞闭道路及秘筑我之机动小路等），配以擲石滚雷手榴弹与神枪手，密存粮水，以资扼据，来阻绝敌之行动和打击敌之进攻企图。

7. 旧式武器之使用，及其力量之发挥，是群众性游击战争中不

可缺少的东西，这是在抗战以来就不啻三令五申地屡道不忘的。但由于我们许多领导者，尤其某些武委会的同志，早在思想上取消了它们的地位（如在民兵的分工组织上根本不提一字），故在这次斗争中，它们是不会显露头角的。

但许多铁的实例，则粉碎了他们这种错误的唯武器论观点。在

反“扫荡”反“清剿”中，广大群众都感到不抗敌活不成，在魔爪兽蹄下，是连绵羊也不易当的。所以莫不认识赤手空拳之痛苦，各自要求武装自己，不少的群众，都准备好了刀矛与杠棒，甚至拿起两块石头，准备与敌厮

斗，有些妇女，并且袖藏了剪刀，还有以拳打敌者。至于无枪的民兵，则因为没有把他们编入“战斗队”，看不起他们，许多都表现的闷气与不快。此外以石头打击敌人者，除北垵与九龙垵以外，还有几处。辽县方面，尚有土炮奏效者。凡此都指出了旧式武器应予使用之重要，唯武器论者，只是会走到取消“全民皆兵”之群众性之游击战争之危险方面，这是要我们特别警惕与注意，来重新以有效的办法，实现使用旧式武器之号召！8.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武装自己，是中国革命的武装人民与革命军队的历史优良传统，这次斗争以及过去斗争中，我们夺获敌人的武器尚为数太少，此后应从各方面鼓励教育民兵和群众，以各种手段——由战斗抢夺以致偷窃收买，利用各种时机，不断取得敌人和伪军的枪械弹药，达到从斗争中来武装自己、坚强自己的目的。9.现在从民兵作战的战术技术上来检讨我们人民武装的训练工作：由以上各项观之，我们人民武装的战术技术，是何等惊人的落后呢？！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不能不归根于我们的训练工作。严格检查起来，我们在这一工作上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很明显的，人民武装的组织是为着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着组织强有力的游击集团，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为此加强游击动作，提高各种技术，那是最迫切没有的了，可是在训练上，许多同志，都不根据这一实际出发，历来是多满足于大的检阅，满足于队列整齐与步伐一致，不少民兵的装备，都严若正规军的战士，以致与众不同，操作时完全搬用正规部队中有害的形式主义的一套，只求操场上的整齐划一，尤其是无目的打圈子，而忽视于在野外的实际演习；只会作班侦察排进攻之类的正规动作，而不作人民武装所急需的小型战斗——游击小组的动作；只注意于步枪、手榴弹、地雷使用的研究（这种研究也是皮毛的），而忽于其他旧式武器使用的研究。有一个在我们军事学校地于队受过训练的武委会的干部提出过这样的声明：“我们过去在地于队所学的都是排进攻，连防御之类，回来以后在训练民兵中因为根本用不上，所以也就没有用过”。这是说明我们的训练工作是如何与实际脱离的坏现象，难怪大部民兵在实际斗争中不敢接敌，不会射击，不善于小组活动，以及不善于夜间动作了。当然我们许多干部，大多不是从真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尚不熟练于日益发展的具有新内容的游击活动，但许多同志缺乏研究实际而不从实际出发，缺乏到群众中去学习与总结武装斗争之新的丰富经验，从而研究领导人民武装的方式，缺乏及时吸引新的事物，扬弃那些老一套的陈腐东西等等，却是无容讳言的事实。

为此应该：A、立即以整风的精神，深入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民

武装的训练工作，实行人民武装训练工作的革命，废止一切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老一套的训练方式，而代之以切合实际的人民武装所急需的东西。B、在技术操作上，要做到人各善于使用所使用的武器，拿什么学什么，各精一技，并不断作实际的演练，如步枪手演练各种情况下的精确射击法；地雷手演练各种情况下的埋设法；刀矛手演练如何实行突然的短兵格杀，以及拿石头杠棒者演练如何以石头杠棒打击敌人等等。废除只看见几枝步枪，把操枪动作来代替一切的简单办法。C、在战斗动作上要完全教练以游击动作，特别是游击集团组织内的小型战斗——游击小组的活动，并进行数村联合，假设敌情，互为敌我之实际演习，借以精练战斗活动之机能，并熟悉周围地形，严格禁止以一切以正规军的训练内容如排进攻连进攻等来代替游击

动作之教练。D、在武装检阅时，即着重检查上述之技术动作与战斗动作，禁止一切只看行列整齐步伐一致，甚至举行阅兵式与分列式等形式主义的办
法。E、在反“扫荡”、反“清剿”及反“蚕食”斗争的实际活动中，要善于在战斗中或战斗后从现地上将战斗中的具体动作加以讲评，及时教育民兵，这是印象最深收效最好的办法（民兵是很喜欢这种办法的）。F、在训练实施中，各级相关的领导机关——军区、军分区与县、区指挥部及各级武委会，要组织实际的指导与检查，及时发现与解决不适于实际要求的动作和其他诸问题，纠正一任下层为之，而只在上催问或要报告的放任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作风。

第三，情报通信问题。

情报工作有许多方面，尚未能适应战时严重情况的需要，敌人

既经深入，情报即无法传递，敌情愈严重，情况愈不明了。这主要是地方群众情报网未能认真建立与健全，各地秘密情报通信所亦因缺乏与地方指挥部及群众作有机之结合，孤立无助，未克服联络传递上的困难，并坚持岗位，而发扬其应有作用。各级指挥部，平日对这一工作亦不重视，未能足够意识到它在战争指导上群众利益上的重大作用，此后必须迅即作以下之改进：1. 各级指挥部，应确实建立健全地方群众情报网。战时情报之供给，为全体军民最迫切的要求，常可以此将群众情报组织在指挥部的周围，并使侦察与通信密切结合起来。各级指挥部之间，应建立固定的情报站，根据联防村的划分，确立村与村之间的情报联防，为求得情报不受地形与行政区的限制，县与县、区与区联防与联防之间应自行确立情报交换的办法，各村（包括自然村）指挥部及其所属之分指挥部，均应有坚强人员，专门掌握情报，除选择有专门的情报员担任敌情侦察与传送外，更应组织一般自卫队及一部分民兵担任日间了望，与夜间潜伏的观察。如群众在敌情严重转移到隐伏地时，应即组织他们的直接侦察，不断监视敌人，避免敌人的危害。此次反“扫荡”作战中许多地区如涉县五区等群众自发的组织了望哨，监视敌人，保障了本身的安全，这说明群众自身对情报组织已有事实的需求，各级指挥部在指挥上，必须从群众出发，照顾与解答这种要求。战时情报机构力量之发挥，主要在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即必须事先挑选确定战时情报工作的人员，并加以训练，建立情报制度，特别纪律与联络制度，此在腹地地域的县区尤为重要。2. 健全秘密情报通信所的组织，有少数组织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效力，但大部在电话线中断后即消声匿迹，甚至脱离岗位，未能继续遂行任务，基本是干部及其与群众结合并利用群众组织的问题。不怕情况如何严重，只要有坚持胆大机警的干部，仍能不断遂行任务，必须在某些要点上，配置强有力并且是预有联系的干部，他们并须参加与尊重当地指挥部，不断供给群众以必要情报，克服过去孤立化神秘化的倾向，各情报通信所之间的通信联络，除应改进技术通信方法外，主要在加强与充分利用所在地的群众情报机构。3. 有线电话之使用，应保持到最后一分钟，即使敌人已进到我电线之某端或某段，我应立即切断通敌之一端，仍力求与可能通话的方面继续通话，加强情报之传达；各级指挥部，则应命令各地民兵负责保护电线，如查有汉奸破坏或窃听电话时，则立即逮捕或捕杀之；如情况严重电线又确被敌人破坏时，则发动民兵自动将电线收存起来，敌情一趋缓和，则随即架设起来，恢复通话。此应在人民武装中同样进行教育和必要的演习，以求熟练。4. 通信联络上，必须善于使用一切信号如焚火鸣土炮、鸣枪、打手榴弹、打钟等办法，

实行警报；同时组织在敌情与天候恶劣条件下之飞行传递，并预行必要的演习。为便于指导作战起见，各级指挥部之间须确立几个固定的秘密联络地点，联络记号，应力求适合习惯与程度。并在群众特别是民兵中进行教育和演习，反对形式。第X军分区及黎城的战时联络记号根本未传达下去，涉县的联络记号，异常繁杂，实际上变成了形式的东西。部队行动时，应派少数人员在先头出发与村指挥部及民兵取得联络，这些先头人员，要熟悉与地方联络的记号，同时部队与民众间最好组织熟人联络，以减少不应有的误会。各村指挥部则日夜均应设有专门的人员为部队担任向导，这些向导一般的要带路至30里以外再行转换，不要沿村交换以免延误时间。此外还必须双方积极主动积极向对方联络，反对坐待情报送上手来的观点。必须使用重复通信的方法，重要的问题，应以信号徒步等手段重复送递，在联络线割断时应设法从侧方迂回，特别利用夜间恢复联络，不可固守成规。

5. 情报工作的领导上，应注意以下事项：上级指挥部在情报通报上应对敌情的分析判断特别敌之行动特点我军战绩告知下级指挥部，村指挥部应随时供给群众以正确情报，以安定群众情绪，揭破谣言，各级指挥部，必须不断掌握敌人变化，监视敌人行动，许多地区由于夜间或下雨时即不再进行侦察敌情，使敌人顺利脱出我之监视。而敌人则恰善于利用夜间和下雨时出动，我因此遭受损失者不少，亟应纠正。若干地区有拾得敌重要文书不肯迅速交与当地高级军事机关研究，拘泥于原有的组织系统，以致影响及时了解敌人行动企图的现象，亦须予以纠正。对于敌占区的民夫解放或截留后，应予以耐心教育，与之建立秘密关系，争取其不再度被敌征用来根据地时，向我报告敌情。

第四，除奸防谍问题。

1. 反“扫荡”前，在大众除奸防谍的领导组织上，做的是很欠深入化与普遍化的，表现为：军区发出关于镇压敌探奸细的命令，许多地方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对于敌探奸细必须采取严厉镇压手段之意义，许多地方没有向群众作普遍深入的教育；抗日戒严清查户口巡查要道或僻径等，是做的非常粗枝大叶的，只注意一些较大的村落与复杂的集镇，至于奸细间谍可以立足藏身的偏僻处所，则未加任何注意；应该处决的真正汉奸，很少组织有计划的公审判决；抗日联合取保，尚非常不普遍不精细。诸如此类，都是给敌探汉奸以活动的机会和余地，大批间谍，尚可陆续钻入我根据地来，河南店、五十亩、安居村、白鹿角等地所暗藏的敌人之奸细内应，亦多未被我们发现。敌人所组织的“密谍”、“密商”等在“扫荡”之前，尚不断把我根据地的情形向敌转报，在反“扫荡”中，敌寇隐藏于我内地的奸细内应，不断引导敌人搜捕我之机关及军民财物，不断散布谣言，扰乱人心，降低军民情绪。这些在反“扫荡”中，给予我们的危害都是极其重大的。照客观说来“对日寇汉奸的宽容就是对抗战军民的残忍”，这是何等的罪过呢！此后我们要以锐敏的警惕性，来注意这一问题，尤应深入教育广大群众开展广泛与深入的群众防奸防谍运动，抗日戒严必须认真，清查户口与巡查时，同时要注意奸人易藏之偏僻处所，并切实施行不定时间不定地点不定次数之检查。抗日联合取保，还要进一步的普遍办理，同时要组织所有一切民众，在反“扫荡”中和转移后之相互保证，发动群众组织防谍除奸竞赛（此工作偏城做得很有成绩）。处决真正汉奸时，要在某些有政治意义的处所，组织有计划的公审，普遍宣布其罪状，其不重要的被迫胁从分子，则使其听审后教育释放之，以扩大其政治意义，警惕其他未来之汉奸。要对于一切奸细间谍分子进行无情的严厉镇压，要使全体抗日民众完全站在除奸防谍的阵线之内，把根据地造

成对付汉奸敌探的天罗地网，不使一个奸细分子得逞其技而逃出我们的监视与网罗之外。“对于奸细分子的任何容忍与放任，都是对于自己残酷的陷害”，我们应特别体会这一警语。

2. 由于我们对于在紧急情况下之处理奸细的办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呆板的遵守平时的“司法手续”与个别地方对某些奸细分子采取了“妇人之仁”甚或有故意“纵囚”之结果，故反“扫荡”中曾发生了下面的现象：A、某些村庄捉到汉奸后，不敢杀，也不敢放，又不便带走，即临时封闭于枯井或野洞中，随被敌人拖出，便对这些村庄施行毁灭的恐怖；B、不少村庄捉到汉奸与可疑分子，如上送则恐轻被放逸，以后复遭汉奸的报复，封闭干枯井野洞等处，则又恐敌人拖出反咬。故干脆私自杀掉，但这里却有个别被误杀之非死心汉奸与逃跑出来的民夫和伪军；C、由于会受到违反“司法手续”的责罚与恐遭“纵囚”之反咬，以及捉到之后反要自己贴赔粮食，故有些地方，即发现有奸细可疑分子，亦听其逍遥法外，不敢“惹祸”遗累。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我以为应该是：A、给区指挥部在反“扫荡”情况下以处决死心汉奸之特许职权，但须保证不乱杀人，所杀者必须是确实有据的敌探汉奸，而非普通的民夫，且随时将实情报告上级指挥部；B、在反“扫荡”时由军分区和县指挥部分派党政与公安除奸干部到区和某些主要的村指挥部，掌握除奸政策；C、在格斗场合中（但不得假造当场格杀）准予格杀勿论；D、村内所俘人员（无论汉奸及伪军民夫）其已食用的粮食，应即准予核销；E、教育群众告以争取非死心汉奸之必要，但勿因而无条件的不捉可疑的份子。

3. 现在敌寇于“扫荡”中又有计划地留置和制造了一批奸细坐探于我根据地内，如收买（给以大批伪冀钞），纵放所捕去的某些民夫回家，遗留下经过训练之某些难民，在杀场上将我被捕获之人员故留几个不杀，使之为之工作。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立即施行必要处置的。

第五，军分区及基干部队对于各级指挥部及民兵的领导帮助问题。

1. 军分区对于各级指挥部的领导和帮助，根据检查的结果，尚有许多不够之处。如在反“扫荡”的布置上有些军分区对于指挥部照顾得较好，但另外存些军分区则对各指挥部粗枝大叶，很少专门的训令式的指示（某军分区的反“扫荡”部署中根本未提指挥部，某军分区命令中的注意事项内，仅说到县指挥部应受活动于该县的基干团之指挥，而某团的命令则仅规定了某县独立营的任务，至于县指挥部应做什么事也是一字未提），反“扫荡”前的备战工作各军分区均缺乏甚至没有进行应有的督促检查。虽然也曾派了一些干部到各指挥部任参谋长和帮助其他工作，然在人员选择上则欠十分慎重，尚有少数人员根本起不到作用。在分派这些人员时，则尚感缺乏计划（某区指挥部就有军分区一级派来的党政军干部六七人，但对另外一些区村指挥部则未派一人）。在反“扫荡”中，特别情况紧张恶劣时，军分区与指挥部就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联系。反“扫荡”总结时，军分区则很少有或没有负责同志参加各县指挥部的总结工作，于是就在自己房间空想杜撰做自己无根据的总结。以上这些都表现我们对于各级指挥部的领导与帮助异常不够，对于它们的疏忽与放任，是应立即纠正与改善的。要知道指挥部是各该县区村游击集团的领导核心，是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直接组织者与指挥者，不加强对于它们的领导和帮助，则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与坚持，将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以为军分区应：A、适时的给指挥部以专门的关于作战指导的训令指示，指导其适时备战，武装保卫群众利益，指导其在反“扫荡”中坚持斗争的原则方向，并随时检查督促其对这些指示的切实施行。B、利用电话徒步及情报通信，组织与指挥部的不断联系，适时

告以有关的情况，指示以新任务和方向。C、在反“扫荡”时选择有游击斗争经验、有工作能力、政治坚定及群众观念较好的干部，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配到县区村参加或帮助各指挥部的工作，严格禁止把不胜任的人员派去，或堆积一些躲难人员去累赘它们。为着扶助它们确实建立指挥体制，必要时军分区某些负责同志也可亲自去指导某一指挥部的工作，但这绝不是“越俎代庖”妨害下层指挥能力的发展。分配去参加或帮助指挥工作的同志，最好是联系制的固定人员，并应提早到达，以便熟悉情况与人事关系，同时他们还应谦逊友爱，切忌骄矜包办。D、及时总结各指挥部某一时期的工作，给以新的适合情况的任务。

2. 基干兵团之部队，被分遣于某些指定区域活动时，其中间问题，就在于加强相关的指挥部，结合（主动地虚心结合）当地民兵，以强化游击集团，坚持斗争，争取更有力的打击敌人。这次斗争中有些部分在这点上做得尚有成效，但有些部分则做得异常不好。有参加了相关指挥部，但工作尚极不协调，而把军队的一套搬去，不照顾地方特殊情况者；有受令指挥相关指挥部，但却毫无指挥者；有不坚持斗争并带同相关指挥部擅自转移他区者；有不去主动地寻找相关指挥部进行联络协商者；分遣下去的小部队，有不真正与人民武装密切配合而孤立行动，不坚决与敌斗争，不照顾群众利益，违犯纪律，给人民武装及群众以不良的影响。这都是不可继续存在的现象。要知道：敌后游击战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发动与组织真正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没有高度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并争取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而所谓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不是把正规部队除外，相反，它正是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骨干，是游击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不与人民武装血肉结合起来，则不仅不能坚持斗争，甚至连自身也不能存在。为此，在反“扫荡”或反“蚕食”斗争中，分遣坚持某些区域斗争的正规部队就应：

A、各部队首长一定要参加相关的指挥部或接受其指挥，以进行统一的斗争。同时应照顾地方同志的特点，主动的团结地方同志，求得精神与行动上之融洽一致。B、对于自己的部队，除控制必要的一小部分（1/3以上乃至1/9）机动使用外，其余应依情况以班以组乃至以个人为单位，最好还化装起来，分布于人民武装的小队或小组中去作骨干，如在基干部队窥破与抓住敌人弱点需要集结相当兵力消灭之时不在此例。但无论怎样，凡基干部队都应结合人民武装以加强它们成为它们的核心。这些参加人民武装的指战人员，应求得一切都群众化起来，求得与群众极相融洽，不要骄傲自大看不起人民武装，并不断鼓励与带领他们接敌扭击、围攻、夜袭以及潜埋地雷等等，以锻炼他们，提高其战斗力，逐渐转变他们不敢接敌不惯夜动和怕雨不动等心理（没有这种带领与锻炼，人民武装战斗力的提高是很不易的）。此外，特别应处处照顾群众利益，以模范行动来影响他们。进攻在前，撤退在后，在群众尚未转移之前，自己尽量做到不轻于脱离敌人，在敌人烧屋挖粮搜山时，则须领导民兵坚决打击以营救之，以此来促成军民相依为命的关系，巩固军民团结对敌之坚决意志。某团第二连在武北地区，某团第十、第十一两连在胡蛮岭、长乐村附近，与人民武装血肉结合，收到显著成效，应发扬与学习。相反的某军分区分遣的射击训练队个别人员，不接受区村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敢接敌，不与民兵一起行动，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之极不满意，则应引为“借镜”万不可尤而效之！

3. 至于县区基干游击队与其他小型武装，更是固定或较久隶属于相关指挥部的直接指挥，固定于各该游击集团的组织部分，其与人民武装的结合，那就须比正规部队更要做得更加密切，特别良好。然

而某某两县独立营，在此次斗争中，乃到处躲避敌人，不但不与人民武装结合，且给他们以极坏的影响，受到人民舆论的严格责备，这是应该十分警惕的，不可再行重复！第六，人民武装的干部问题。干部在人民武装中作用的重大，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得最明显没有了。凡是斗争成绩最好的人民武装，没有不是由于干部坚定勇敢之领导所致。反之，干部斗争意志薄弱以至动摇者，则带领人民武装躲避、逃跑甚或埋枪，丝毫起不到坚持斗争保卫人民利益的作用，有些民兵，甚至被特务破坏份子所掌握，反而危害抗战，进行有利于敌的勾当。五十亩的特务份子，亲自指示着为其所掌握的两个民兵，杀害了我们县指挥部的情报干事（这是没有贯彻上级确实掌握民兵指示的实例），因之根据这次斗争的考验，来慎重调整人民武装的干部，是非常必要的。这应该：1.凡在斗争中表现坚定勇敢忠实的份子，即应有计划的大胆的提拔起来，代替那些不称职的干部。至于那些不坚定的动摇份子及有害的特务坏蛋，则应按其情节轻重，立即撤换和逮捕法办，任何犹豫与容忍，都会遗祸抗战，帮助敌人残害我们的革命同志。2.物色在乡退伍军人之坚定忠诚者，提任干部（上桂花民兵自卫队在一个退伍军人领导下，巧妙的击退了数十伪军的进攻，保护了全村的利益。九龙璠据险掷石击退进攻之敌，亦是一个退伍军人的杰作）。3.对于坚定有为但缺乏战斗经验的某些干部，应有计划的酌量集中，配以有指挥能力与战斗经验丰富之指挥员，轮番带领到敌区游击活动，给以实战的锻炼，以培养加强其指挥领导能力。第七，党对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问题。领导革命战争的党，必须切实掌握与领导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运动所证明与所特定了的铁则，由这次斗争中的部分材料看来，就我所晓得者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值得加以研究的。例如：1.在确实掌握人民武装上，根据中共北方分局和师部3月5日的联合指示来看，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不少地方的民兵，尚被特务份子挟持操纵，以危害抗战，危害我们的生存，尚未引起我们应有的注意。反“扫荡”前，初步查悉民兵被危害份子操纵掌握者，已有十余起之多。而在反“扫荡”中，五十亩之惨杀案，则更应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我们应重新把中共北方分局及师部上述的指示，在全党中加以不断深刻的研究，并具体实施，以使彻底得到实现。在党员军事化上来说，我们尚有许多同志，同样注意的非常不够，不学习游击战术，不研究游击战争的指导方法，以致无法也无能力领导游击，也无法在敌后频繁战斗中工作，某县委同志说：“咱们是不懂军事的，反正‘扫荡’来的时候跟着人家走就算了”。某县委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游击集团；此外则有不少的民兵党员，根本不敢打枪，而获得了“枪架子”名词的讽刺称号，甚至还有少数干部党员领导民兵埋枪的现象，这样下去将会使游击战争失掉杠杆的作用。“军事化”并不是什么神秘不可企及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专门军事家的私有物，我们生活在敌后有丰富内容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之中，只要我们善于在武装斗争中，总结和学习每次斗争的具体经验，善于向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以至每一个民兵每个勇敢的农民来学习研究。善于研究与总结指导武装斗争的规律，那么久而久之也就会“军事化”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原不是生下来的军事专门家，只是他从领导农民暴动起，就总结了每次战斗战役的经验，不断发现新的斗争方式方法和方向，所以就成为我们唯一的战争指导者，请同志们一致向他来学习！2.在每次反“扫荡”以前党是应该根据当前情况，适时发出应有号召，指导武装人民及所有群众作对付敌人坚持斗争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这次反“扫荡”中共北方分局

是有专门指示的，《新华日报》，也曾刊登了专门的社论，但我们有些下层组织，似尚未作出更适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处置，不少的县区村对于“扫荡”前之备战工作及群众转移的组织，尚欠周到的布置与及时的检查督促。空舍清野仍异常粗枝大叶，“扫荡”前的三两天，有些地方才开始备战，以致反“扫荡”中因备战不周而遭到了许多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似应引为教训。至于在反“扫荡”中，无论对民兵对群众的政治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对于群众情绪之掌握与稳定，疑难问题之解释均欠及时和周到，也是应该及时注意改进的。

3.反“扫荡”现已结束，我以为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特别应注意人民武装之各种组织工作，切实遂行和实现中共北方分局及师部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第八，对于群众性游击战争及其指导的研究问题。最后提到对于群众性游击战争及其指导方法的研究问题，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太行区经过去年5月反“扫荡”之后，由于基本群众的发动，人民武装工作进一步的开展，在去冬及此次反“扫荡”中，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确是逐渐向前发展，增进了不少崭新的内容。但严格说来，这些进展还是非常迟缓，远赶不上斗争形势的需要。不少同志，对于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全貌，尚缺乏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因之就不能完全发现其中新的丰富内容，不能完全掌握其规律，也就不能更妥善地指导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使之适应新的情况更胜利更彻底地粉碎敌人每一新的进攻。各级指挥部不善于指挥游击，唯武器论观点者忘记了“全民皆兵”，大众除奸防谍不深刻与不普遍化，某些军分区不经过指挥部来实现反“扫荡”作战的指导，某县委同志自以为不懂军事只准备“跟着人家走”，某县委同志不知什么是游击集团等等，都在前面叙述过了。此外还须指出：游击集团的问题，抗战开始时就提出了。但不知它的实质是什么，其组织形式与作用如何？则不只这位县委同志为然，还有我们久经战斗生长于游击战争中的某些营团干部直到今天也是莫名其妙的。上述种种，何一不是对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意义及其面貌之不完全了解的表现呢？至于分遣部队之不结合人民武装，以至违犯纪律，破坏群众利益等那就更是看不见武装人民与抗日群众的力量，不懂得军队与人民结合之重要，不懂得如何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了！所以，深入对于群众性游击战争及其指导方法之研究，以便进一步高度发展普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便成为当前指导游击战争的重要环节之一，兹提以下意见：1.军区、军分区的编审委员会并指导县指挥部设立游击战争研究会，有计划的定期研究关于群众性游击战争的诸问题和其指导的规律，特别在每次战役战斗中要设法深入下层，收集村级指挥及其所指导的人民武装与抗日民众以至分遣活动之小部队的实际斗争材料，加以周到地研究和准确地总结，并以此教育各级干部，教育武装人民及群众。2.组织党政军干部学习群众性游击战争，深入研究北方分局及师部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联系当前实际，组织实施检查。学习与研究每次战役战斗的总结，并以此证印自己的实践活动，并在新的实践中遂行实现之，军队干部更应深入学习游击动作，尤其是结合人民武装的游击动作，提高游击作战的能力，纠正只拘守部队单独活动的老一套办法。3.动员全体党员，实现党员军事化的政治号召。

1944 年的战争指导问题（摘录）*

甲，指导方针。

高度发展真正普遍而坚强地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辅之部分有力地运动战，打破敌人各种进攻，并主动进击敌人，以保卫壮丁、保卫粮食、保卫生产、保卫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是 1944 年战争行动的总任务。为此，必须加强适应战争情况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加强战斗活动的组织艺术与指挥能力，加强适应战争需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式，来坚持斗争，达到战争任务之遂行与完成。

乙，思想准备。

深入政治动员，提高各级指挥部及全体军民的警惕心，足够认识 1944 年战争形势可能发展的每一动向，认识敌人尚有的力量与我们的困难，一致紧张起来，高度备战，为粉碎敌人一切进攻而努力，反对任何麻痹迟钝与侥幸苟安的心理。同时，要充分认识我们的胜利条件，及我们可能坚持斗争与粉碎敌人进攻的把握，认识敌人的困难和其一定死亡的必然性，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与斗争勇气，提高在任何困难环境下百折不回的顽强到底精神，反对和克服可能在敌人凶恶进攻与物资困难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切惊惶失措，悲观动摇情绪与厌战心理。*这是李达同志为太行军区起草的文件，写于 1943 年 12 月 30 日。1944

年 1 月 1 日，以《强化战争指导，坚持胜利的 1944 年》为题，摘要发表在《新华日报》（太行版）新年特刊上。

深入政治教育，普遍加强整风学习，加强时事教育，加强群众性的锄奸反特运动，肃清民族敌人及国内反动派侵蚀我们的影响，以坚定和统一我们的意志，整齐我们的步伐，团结干部、团结人民、团结一切力量来统一对敌，争取胜利。在军队中，加强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重视政治工作，实行阶级友爱与拥政爱民的教育，克服一切军阀主义倾向，在民兵系统中，加强纪律与劳动教育，加强执行政策、法令的教育，克服一切游民习气与新恶霸土匪主义的现象，是健全武装组织支持战争的最重要一环，必须时刻注意。丙，组织准备。一切组织，必须适应残酷频繁与延续性战斗情况，及交通可能隔绝，联络困难的条件下，力求具有高度地灵动性与弹性，并富于在统一意志下，分遣独立工作和独立活动的机能，在这种要求下应是：第一，军分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应进一步的紧缩合并（如军分区司令部与地委机关合一伙食单位）。在反“扫荡”时，军分区司政机关须与地委、专署临时合组一个单位，并分配一些主要干部去临时加强下层工作，求得减小目标，增大警戒防护，便利行动，避免遭受不应有的意外袭击。但仍须加强巡视组织，以指导检查某些分遣部分的工作。在某些地区有可能被敌割裂的情况下，并准备组织分割指挥（领导）的联合指导机关（如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之类），以加强被割裂地区的指导。军分区的后方组织，如工厂、医院等，应按照具体情况，有机地分散配置，并加强干部，使其进行宽大独立的工作。第二，各级指挥部必须依照军区颁发的工作条例迅速健全起来，并建立经常性的实际指挥工作。其同级诸领导机关在战斗到来时，则留必要的少数人员集中于指挥部，加强集中的统一领导。其在游击区及格子网内者，则纯用工作队形式的办事处，各党政人员均参加在游击队（指挥部）去，以行使职权。被割裂之地区，重新区划，或设立分指挥部，实行分割指挥。彻底整理民兵自卫队的组织。

经过群众反奸运动，肃清混在民兵组织中的不稳成分，合理地配备与调整民兵的武器，根据地理情况划分游击小组，并加强各小组的领导骨干，扩大活动面，增强其战斗力与弹性。为加强军队直接帮助与结合人戾武装的责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一般的应兼武委会的主任。群众转移（牲畜在内）之组织，应依照地理条件划分为较小的若干小组，并指定坚强的组长和副组长负责领导，确定其与指挥部的联络关系，这些都要事前组织就绪，同时举行必要的演习，以免临时漫无秩序。空舍清野应是彻底分散远藏、深藏、密藏，克服农民的保守观念与侥幸心理。粗枝大叶的办法，只能招致严重的损失，这是要指挥部负责指导检查才行，一切只有号召而没有检查或不深入检查的作法，都是不应该的。第三，部队组织必须健全而精干。某些单位如暂时不能满员时，则干脆紧缩起来，以俟兵员充足时，再行恢复其组织。严格战士的体格检查和成分检查，对于体力素弱及不可靠的份子，则坚决清洗妥善处理之。基干兵团之营，应改设政治委员，并加设参谋一人（不设副营长），单独活动之连，则临时指定政治委员。敌后小型武装的任务较过去更加严重，其组织更须特别坚强与精干，因此应定期检查调整，以免久而腐蚀解体，一切政治上不健全与不可靠的份子必须及早调到内地处理，不应拖延，以致蜕化投敌和进行内奸活动。在新开辟的地区繁殖新的组织时，更应慎重地吸收新的成员，严防奸细特务乘机混入。第四，经过整风之后，重新调整各组织的干部，加强领导骨干，是决定一切的重大问题，必须适时实施之。

丁，战斗活动。

第一，诸游击集团的活动。强化诸游击集团的作用，是强有力地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标志，是各级指挥部作战指挥的实际体现，这里就应使：

1. 县区基干游击队，经常以 1/2 乃至全部力量，在 1/2 乃至 2/3 的时间内，结合相关人民武装及其他斗争，并在其遮蔽配合之下，对“扫荡”或“蚕食”奔袭之敌，以及敌伪某些点线，进行辗转有力地游击破袭。当敌合围搜剿时，则坚决顽强地扭击之，并力求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可能消灭之小股敌伪及少数人员，打击敌之抉剔活动。

2. 敌后诸小型武装，以同样的力量与时间，结合敌占区其他各种斗争，尤其是政治攻势，并配合或伪装其他部队积极活动起来，不断以秘密神速的动作，向某些敌伪点线及伪组织进行突然有力地挺袭及飞行爆破，打击敌之“清剿”活动，肃清特务奸细，摧毁某些伪组织机构，破坏敌之抢粮、抓丁等计划。尤应善于进行对敌军伪军伪组织瓦解争取工作，扩大与团结敌占区民众同情和帮助抗战，扩大我之政治威力，吸引人心向我。并以一切努力发展与创造新的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建立秘密抗日组织，繁殖新的武装，争取把我们的工作扩张到敌之基本点线附近及其内部去，以减弱敌人对我根据地之“扫荡”、“蚕食”来配合保卫根据地。

善于隐蔽自身以积蓄力量，是敌后小型武装重要任务的另一方面，必须结合上述工作，同时达到这一要求。

3. 各地民兵并结合自卫队，在敌向我“扫荡”或“蚕食”前，以有重点地分散配置的原则，用多数有力的游击小组，形成有机地游击网，昼夜不断随时随地的扭击、围袭、追袭、困饿敌人，并捕捉少数敌兵及汉奸便衣人员，同时遮蔽配合或伪装县区干队和基干兵团，进行有意义的较大活动，争取较大的胜利。
4. 发扬地雷、石雷等的机动威力，有重点的把某些地

方布成雷区，切实阻绝或迟滞敌人的行动。特别要灵活地移用地雷石雷，来轰炸敌之驻剿、抉剔部队及其运动中之后续部队，封锁敌驻地之出入口，封锁饮水和其他敌人必须到达的处所。还可在某些绝壁多方装置，借壁崩石飞以加大其杀伤力。各作战民兵自卫队，还应携带必要的器材，在战斗中尚须临时凿装石雷，以供急需。埋设技术必须特别讲究，要做到一触即发，要善于伪装，虚虚实实，使敌无法起取及绕避，以使敌人由“扫荡”起一直到退出之日随时随地都得饱尝我们地雷石雷的滋味，最高度发扬它们的神威。

5. 当敌人严重地合围搜剿时，无论县区干队及民兵自卫队，均应善于和敢于由敌之空隙中坚决透出或迂回打圈，扭袭敌人，以掩护和抢救群众及房屋粮食牲畜，坚决反对与纠正被敌压缩封锁所吓倒，一味后退，堕入敌之合击圈心；或一下跳往他区，躲避观望，置被搜剿之民众及其财物于不顾的现象。

6. 加强边地游击警备的组织及工作，适时发觉与识破敌之进攻企图，以减弱和破坏其突然性。

第二，诸基于兵团的动作。

1. 经常以 $1/5$ 乃至 $1/3$ 的兵力，派归某些指挥部指挥，以加强其游击集团的骨干作用，对某些点线之敌及其“治安区”进行积极有力地游击，并坚决打击小股出扰之敌。
2. 兵团主力，应以备战姿势，控置于机动位置，积极整训，在敌“扫荡”进攻时，则给以有力地回击。特别应善于适时转移外线，当敌已构成包围封锁圈时，则须坚决由其间隙中插出，或毅然以大踏步的迂回，绕经他区转到敌之侧背。在穿插转移中，如遇敌之残置封锁部队或巡逻部队及其薄弱的一路，于有利及可能时，则应以突然猛烈的动作给以消灭的打击。否则即以极少数的兵力箝制监视，掩护主力迅速通过，不可被其抑留或受阻后退。转到外线后，应以必要的兵力机动地坚决猛烈地辗转摧击敌之补给线，乘虚进击敌之基本点线，与某些作战基地，使敌不得不顾此失彼，以至回头护痛。同时坚决拊击深入“扫荡”之敌之侧背，直接策应腹地反“清剿”斗争。

无论转移及进击敌人中，均须适时与当地游击集团尤其是指
挥部取得密切联络，求得相互配合与帮助。

3. 预选适当干部及老练战士，给以短期训练，并确定联系区

村，在敌“扫荡”前，分派下去，帮助与带领民兵作战。这些干部及战士，一到被指定的区村，则应完全听从各该指挥部的指挥。在生活言语上，应完全群众化，与他们同甘共苦，不得有任何突出之点和丝毫侵犯群众利益的倾向。在战斗活动上，应进攻在前，撤退在后，切实引导民兵善于接近敌人进行短促的动作；善于争取不断的小胜利，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善于掩护与抢救遭受危害之群众及粮物，以达到真正与人民武装和全体民众血肉结合的目的。

4. 认真虚心地学习研究与运用游击战术，特别学习结合人民

武装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善于寻找敌人的弱点而发挥自己的特长；善于消灭与消耗敌人而不遭受敌人的消灭与不应有的损失；善于以轻微的牺牲换取重大的胜利；善于隐蔽力量与保护自己；尤应善于避免在不必要的时机过早消耗与削弱自己的力量，以支持较长期的斗争。——这些都是机动的要义，是诸基于兵团的全体干部特应高度注意的。

第三，非战斗机关部队的活动。一切非战斗机关和部队，在敌人“扫荡”进攻时应：

1. 划分一定的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与这一地区的指挥

部及民兵建立联系制度，事先经常联络和考察地形，以熟悉人事地理，

预先分存必需的粮食以便临时取用。

2. 派遣若干有战斗能力和经验的人员，到联系区村的指挥部帮助（仅是帮助而非包办代替）或接受其指挥，或参加民兵作战。

3. 不能参加游击活动的人员，如须在群众中隐伏时，则应请托

相关指挥部安置于适当地点。但不论这些人员工作职位如何，都须听从指挥部的指挥，不得妄自干预工作，不得自由行动，不得徒自惊惶，不得向当地干部或民众作不应有的要求与需索，以免影响指挥部的指挥，增加它们的累赘。4. 其余人员则组成一个或几个小游击单位，即在联系区村的范围内，受相关指挥部的指挥，独立游击活动。5. 凡埋藏资材及知道物资所在地的人员应令其随队游击，远离这些地区。第四，防敌不意合击之处置。无论战斗部队与非战斗单位及民兵，均须特别机警，加强直接侦察警戒，防止敌人的突然合击。当发现可疑征候时，应迅速转移，不得偷懒苟安。在转移到外线时，尤应勿走直路，勿久停一地，严防敌人预设之机动部队和原有据点敌人之捕捉。不意遭受合击时，应坚决地有计划地突出或分散突出，不应一味退守或束手就擒。如敌有空军轰炸配合时，应特别注意对付地上之敌，勿被飞机所抑留，致遭地上敌人的捕杀。不幸被俘之人员，应寻找一切时机，坚决逃脱，特应发扬高度的民族气节，不屈辱软化，以至暴露我之秘密——军民动向及资物所在地。一切失去联络的人员无论军队和民众，都应立即寻找当地指挥部，接受其指挥，不得无组织地长时间流浪，以免散布失败情绪及使敌伪奸细作为鱼目混珠的伪装对象。第五，特别节用弹药。节用弹药，成为在频繁延续战斗活动中万分严重的问题。无论部队和民兵，亦无论对机步枪子弹及炮弹、掷弹筒弹、地雷、手榴弹等，都要特别节省，尽可能发挥短促地刺刀突击与旧式武器的作用。做到不在十分有效时机，不妄发一枪一弹一雷，保持一定数量的弹药，作为持久斗争的保障。要警惕到：当战斗活动之初期，如不慎而大量消耗了弹药，则在持久延续地战斗中，将会使我们受到无法坚持以至惨遭挫败等不可思议的痛苦。第六，敌伪军工作。战斗活动中的敌伪军工作，是无论军队及人民武装都是不应忽视的，一切放松对敌伪的多方宣传，以有侮辱与残杀俘虏的个别现象，必须严格纠正，这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的情况下，其意义更为重大。

第七，战斗保障。由于战斗情况的复杂与频繁，由于敌人特务

间谍活动的更加花样翻新，尤其是我之交通可能一时或暂时被敌隔断，因之，作为战斗胜利保障的侦察通信工作，其意义就特别重要，各级司令部、各级指挥部及各个组织单位，就都应特加注意。

1. 军分区对于战略战役的情报工作，应立即重新加以调整，坚

决取缔与改造一切不可靠的和无作用的线索，另以艰苦深入的工作创造与建立新的极端可靠的组织，严格防止我之组织被敌打入劫持操纵，以便切实掌握敌伪情况，明了敌伪每一个战略动向与其战役战术的具体企图，并及时报告通报各有关级层。

2. 估计某些地区特别是我工作较好的及较富裕的地区，敌人

可能持续“扫荡”、“清剿”和临时盘据时，应首先精干这些地区的情报通信组织，提高其坚决顽强的意志与迅速秘密确实的侦察联络技术，必要时则以军分区的侦察通信人员和其他干部来临时加强之。

3. 加强有线电话尤其各个电线末端的侦察任务，授以必要的

侦察技术，并以有实际锻炼的侦察人员或其他干部加强其机能。同时切

实联系附近有关指挥部的情报通信组织，适时搜集与报告各重要情报。这些电话侦察组织应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在敌未到危害本身之前，仍应继续工作。当电线之某段被敌占据或破坏时，则剪断其通敌之一端，保持其余一段，续行通话。但须防止道出有关我军行动之秘密，以免被敌窃听，当敌离开电线时，必须力加修补，以求恢复工作。

4. 军分区所直接掌理之秘密情报通信所，应与当地指挥部完

全结合起来，并作为它们的直接助手，借以指导一般群众性的情报通信组织。越是情况恶劣，这种结合就越是重要。不断设法与所属指挥部及兵团部队取得联系，告以总的情况及他们的任务，并了解它们所处的情况，是军分区应注意的事。5. 各级指挥部平时应努力健全所属情报通信的组织。在反“扫荡”中，一方面应与上级保持密切联络，适时报告以自己的情形与周围情况，请示新的任务，并与友邻指挥部及在本地区活动的正规部队主动联络，以交换情报；另一方面应密切与下级指挥部及民兵以至转移群众的通信组织，适时告以所得的情况，与我方胜利消息，给它们以所要的指示，指导它们组织自己直接的侦察联络，以防遭受意外的袭击。6. 各兵团与独立活动的部队（包括非战斗部队在内）无论在战斗或转移与休止中，都要加强自身的直接侦察。这种侦察并须是周围地与不间断地交互派出，必要时还应向可疑的方向派遣小部游击侦察，作积极的处理。同时须主动地向附近指挥部及民兵和友邻部队适时联络，交换情报互相协同。7. 无论部队及各级指挥部，应注意研究与实施各种防谍手段，多方隐蔽自己的企图和动向，规定各部队间和部队与民兵间简易识别信号（适时更换防敌假冒），最好再加上熟人联络，以打击敌人间谍爪牙的活动，及时识破敌人伪装我军和民兵难民等诡骗办法。

8. 在情况恶劣紧张时，组织重复通信，与各有关方面尤其是上级恢复联络，是非常重要的。如借口情况严重不去主动地打通各方关系，或借口得不到上级指示，因而躲闪蛰伏逃避斗争，那是应受到军纪裁处的。第八，物资保障。在经济物资困难而战斗活动频繁错综情况中，物资保障的任务，也同样艰巨而繁重了。1. 补给问题：部队机关，应在预定游击活动之地区，分存必要的粮食（其中最好有一部分干粮，可能时，还可储存一部油盐菜蔬），并商同政府办妥战时领取公粮的手续，以便战斗转移中临时取用。但这应是准备急切之需，如情况不甚紧迫，则不应过早掘取，借口战斗情况而浪费这些粮食的现象，更是应当防止的。

争取完成与超额完成粮食生产任务，以便弥补在战斗中可能吃超与受损失之粮食。

争取时间，赶制炸弹地雷等（石雷则在反“扫荡”中尚可临时伪装），有重点地分散密存，以便部队及民兵紧急时直接取用，是很重要的措施。但同样应防止不需要的浪费，以免长时间无法接济。

各个单位应携带一定时间内所必需的周转费，所有人员，并应经常各备两双鞋子，在某些时机中并可提前发给所需要的衣服。

反“清剿”活动中，适时帮助民兵及转移中之群众，互相借补调剂所缺乏之粮食，在某些地点预储柴水，是区村指挥部应负的责任。

2. 医术救护：各军分区之医院应根据精简原则及地形条件，再

行合理地分散配置，并于反“扫荡”中在某些地方设置临时的小型伤员救护所，加强分遣活动部队的救护组织。分发以必需的救护材料，以便适时救护与安置负伤人员。对于重伤及阵亡人员，则应及时迅速抢救和掩埋，不

得任意丢弃。

帮助救护医疗负伤之民众，并帮助其消毒防毒，是军队卫生人员应尽的义务。

在院伤病人员，在可能条件下，尽量从物质生活上给以应有的
待遇，争取提早恢复健康，减少死亡率到最小限度。同时，加强部队卫生指导，减少与消除疾病现象，是增强战斗力，坚持斗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必须切实指导检查实施。

各级指挥部应注意组织和指导民间医生及药铺，医救负伤民众，进行消毒掩尸工作，并教育民兵及群众以简单的救护常识，同时指导民众迅速转运伤病人员，不应沿途拖延。如情况紧急无法转运时，则应临时转至某些可靠的村庄，妥为照料，以俟情况和缓，再行转送，不可因情况吃紧而任意抛甩。戊，适应新情况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式。我们的一切组织——无论军事组织和其他组织，一切斗争——无论武装斗争和其他斗争，在领导方法与工作方式上，必须力求适应斗争频繁及可能发生之处境分离，交通不便，直接掌握与指导困难的诸特点。为此必须：第一，上级指挥机关与领导机关，对于所属诸下级单位，基本上应采用分割指挥与分割负责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给以训令式的指导，确定其完成某种任务的要旨和某些主要的手段。予下级组织以宽大机动之范围和余地，发挥它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同时适时组织对下层的巡视检查。必要时并分派一些干部，临时加强——仅是临时加强某些组织，以帮助和增进其工作机能，一切过于硬性的命令方式，或包办代替，以及听任自流，放松原则性的坚持和斗争，都是有害的。第二，各下级组织，应遵照上级所指示的要旨，在统一意图下，发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与创造能力，宽大主动地独立负责工作，以完成各时期所应完成的任务。并以此达到协同一致，统一斗争步调的目标，不应机械地遇事等待请求上级的具体指示。但也不应借口独立机断而进行违背统一意图的“独立主义”和脱离原则的“自由行动”。这在战斗指挥系统的各级指挥部各兵团以至分遣活动的诸小部队，尤属万分重要！第三，切实执行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每一工作，均须实现一般与个别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的原则，一切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作风，在新的斗争情况下，更加特别有害。第四，一切工作，更要求战斗化与具体化，要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问题和及时解决问题。争取在战斗空隙中——那怕是很小的空隙中，及敌人不断破坏中，进行整理组织与生产教育等建设工作，把作战与建设，战斗与生产教育诸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一切等待“扫荡”和反“扫荡”结束，等待安静秩序后，再恢复经常工作的和平建设心理，与铺张门面的办法，都是不应该的。

要特别加强党对战争的领导。“一切问题依靠战争解决”，“一切组织与斗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党的工作与民众运动，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我们的党——战斗的党，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应记取毛泽东同志这些明训，动员一切党的组织及每个党员，在“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争取战争胜利”的方针下，来全体“战斗化”起来，把“党员军事化”的号召具体化与具体实现，围绕着争取1944年战争胜利的任务，一致努力。过去我们某些党员，尤其某些党委的负责同志，不注意研究战争，不注意亲自参加领导战争，而仅“听凭人家指挥”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县区村各级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健全各该指挥部的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之一，亲自领导和检查实

施指挥部的工作条例。要知道，战争问题如处理不好——不能争取胜利而使根据地遭受不应有的损害。则一切工作就很难甚至不能办理，这在很多地方过去已有不少的教训。还是应该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在抗战第七周年中我们怎样坚持和扩大了太行根据地

伟大的抗战第七年，已经胜利的过去了，新开始的伟大第八年，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历史任务。在这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太行区的全体武装部队，在我们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遂行了朱、彭总副司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一方面打退了敌人不断的大小进攻与蚕食阴谋，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原有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已被沦陷的太南豫北的大块国土，使这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版图更加扩大与坚强起来。当此神圣解放战争的纪念节日，当此欧洲第二战场已经开辟，苏英美同盟国正从东西南三面合击希特勒匪帮，英美盟国将于明年转移主力击败日本法西斯，我国反攻将要日益实现之际，来总结我们过去一年的斗争，这对我们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反攻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来谈我们所处的情况及遂行任务的情形。一，当去年“七·七”到秋收以前，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件，除了敌第三十六师团第二二二联队之小林大队及伪“剿共”第一师赵瑞部第一、第二两团仍伸据我腹地武乡之蟠龙镇及其周围外，尤其重要的就是庞(炳勋)孙(殿英)逆贼率部叛国投敌〔1〕，和第二十七军弃守太南阵地，以致整个太南、豫北沦陷敌手。这些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要求抗战，要求解脱敌伪残酷压迫掠夺的渴望是极端迫切*本篇是李达同志为纪念抗日战争7周年而作，发表于1944年7月7

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的；同时庞孙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又在日寇指使下，乘机向我根据地进犯，妄图向浊漳河以北逐步窜扰。当时，我们一方面曾于7月18日至21日发起了有意义的蟠武战役〔2〕，获得了重大胜利，严重打击了蟠龙附近敌伪的狂焰；另一方面我们为了打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的阴谋，回答太南豫北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收复已沦陷的大块国土，并于8月中旬组织了豫北战役〔3〕。在进行这一战役中，由于我们参加作战部队的全体指战员的无比英勇与对祖国解放事业无限忠诚，终于在10天之内获得了伟大的战果，接着乘胜向太南及道清沿线〔4〕全线扩张战果。此役设计将该伪前敌总指挥刘月亭所率之特务团、警备营，新五军第三、第四团之主力，新七军之刘月德、王国藩、侯如墉、赵增祥、杨振兰、范龙章等6个独立旅，李同秀之太行山区保安队，共约2万余人，大部解决，一部击溃，驻扎林县城内之日军第二二二联队伊藤大队300余众之数度出击，亦均被我击溃，把残余敌伪打缩于林县城及临淇集两个仅有的据点，计共毙伤敌伪约2000人，俘伪团长2人，以下约5000人(杨振兰之独立旅全部被俘)。刘逆月亭亦负伤易服而逃，我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12门、轻机枪83挺、步枪3118支、电台3部，攻克与收复敌伪据点90余处，从此将整个太南豫北广达32700余平方公里的全部国土收归国有，使亡国亡家的约75万同胞，重回祖国怀抱，我们也在这一块领土上增设了两个军分区，现在已成为我们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部分了。二，在秋末及冬季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是，各地敌伪的频繁抢粮与惊人的严重灾荒，同时整个华北敌人并对我各邻区根据地施行空前残酷的大规模“扫荡”，而本区周围之敌伪亦同样有对本区进行此类“扫荡”之谣传与迹象。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如何保卫秋收，如何救灾生产与消除敌人大规模“扫荡”于未然。为了遂行这些任务，一方面分派有力部队结合该地抗日民众进行坚决的秋收保卫战，大部机关部队，进行大规模的秋季开荒，打下自己解决3个月粮食的基础，入冬以后我们更加强全区的备战组织并以无数小部队伸入

敌之“治安区”积极活动，以先制之举，来破坏敌人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扫荡”；另一方面进行全军的大节食运动，战斗部队由每人每日1市斤6两〔5〕之食粮递减至1市斤4两和1市斤2两，后方机关由1市斤4两递减至1市斤2两至1斤，大量采食野菜糠豆和其他代食品之野生植物，而以节余的粮食，交由政府赈济灾民。这些任务我们基本上都胜利的完成了，各地秋粮在武力与劳力结合下，胜利的收获了，敌伪之抢粮与强征企图受到了应有之打击，在我们不断的向敌伪小股出击，与政治攻势和备战组织下，使敌人企图大规模“扫荡”太行区的阴谋终于未能实现。由于军队的大量节食，使大批饥民得以不死，严重的灾荒是顺利的渡过了，全军3个月粮食的生产地也基本上解决了。三，由本年1月至4月间各地敌人均进行防务之调整，以准备实现中原大战，和对本区有所行动，我们即动员全体部队在救灾生产之后进行广泛深入的拥政爱民运动，同时结合各地人民武装与抗日民众，对各据点之敌伪，乘机进行决定意义的、不断围困的逼袭强攻和搏击，在执行这一任务中，我们是获得了不少辉煌胜利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敌人久费经营建筑在我根据地心脏上的榆社县城、林县城、蟠龙镇、临淇集等重要据点——敌人控制我根据地及其对我“扫荡”、讨伐的前锋基地，被我们先后收复了。计：蟠龙敌据点是在我沿蟠（龙）武（乡）线上的人民武装及广大民众长期围困后，在我第三军分区主力部队结合这种斗争进行最强烈的袭击下于2月28日收复的；临淇集据点是在我第七军分区主力部队及新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强烈袭击下，于3月1日收复的；榆社县城据点，是在城周围及榆（社）武（乡）线上的民兵和广大民众长期围困下、由我第二、第三两军分区各主力团之有力部队配合夹攻中，于3月29日收复的；林县据点是在我第五、第七两军分区主力兵团全部，结合县城周围及林（县）水（冶）公路两侧，以及调用辉县地区新发展的勇敢善战的广大民兵，经一星期的强韧急袭、强攻，和对其封锁困饿下，于4月11日收复的。此外，我们主力兵团出勤于敌人的前锋段及其“治安区”的多数小部队及武工队，敌后各小型武装，结合了所在地区的民众斗争，在这一时期袭夺与逼退了许多地方，尤其是平汉路两侧零星据点，把这许多地方从敌伪铁蹄下解放出来，这一时期总共收复据点80余处。四，入夏以后，正面敌人开始了中原大战的实施，而我太行区周围点线之敌，则分向我区不断进行其演习性的小股侵袭，同时企图破坏和掠夺我之麦收，与此同时，我第五、六、七等军分区则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这一时期我们为了制先发之机，出动了各军分区主力部队之一部，伸挺边地结合所在地民众，进行保卫麦收的斗争，一面积极进袭敌人，给各出袭之敌以坚决打击，并指导群众快收快打快藏。一面则动员所有机关部队毫无取偿的亲自动手，代群众收麦，以使本年夏季空前未有的全区丰收，基本上获得完满的抢收效果。在我第五、六、七等军分区保卫麦收斗争之同时，我们全区部队并参加了大规模的连续捕蝗活动，协助各地民众消除或基本上灭杀了这一严重的蝗虫灾害。在我第八军分区结合着保卫麦收的斗争，我们曾调集了第四、七、八军分区策个主力兵团及XXX等独立营，并动员了数千群众，发起了对陵川城及其周围敌伪的激烈围困和强攻，从5月29日到31日在陵川城至平城间之郎持岗、杨砦地区，获得对日军松山、小山两指导小队，及伪“剿共”第二师一个团的兵力之歼灭战的胜利，至现在为止，仍对陵川城及陵（川）高（平）公路进行封锁、围困、破坏与伏击，以使敌伪不仅不敢外出破坏与掠夺我们的麦收，而敌人由高平补给来的粮弹物资及护送部队也几乎没有一

次不遭受我中途截获、焚毁或打击，以致城内敌伪刻下仍在四面楚歌中，困守待援不可终日。五，贯穿在全年的斗争中者，就是各点线敌伪对我施行不断的小股出扰、奔袭和蚕食，而我们则动员和组织无数各式各样的小型部队和所在地的抗日民众，主动的、先发的，挺进边地并透入敌占区及其基本交通线上，与敌伪进行长期缠绵，犬牙交错，插花式的尖锐斗争，袭击、伏击、破袭交通，争取与瓦解伪军伪组织，这些斗争基本上都获得了完满的胜利。敌人的小股出扰与奔袭，差不多没有一次不遭受我们的严重打击，尤其重要的是敌人的蚕食阴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实现，交通不断受到我们的破坏与威胁，不少伪军被我争取与反正，相反的，敌人不少地方尤其是格子网内的“治安区”的统治机构，乃被我们摧垮，成为我之根据地与小块游击根据地了。六，至于我们全区的民兵自卫队，除了配合主力部队及游击队不断在所在地区主动向敌出击外，凡是向我出扰之敌，则没有不随地遭其有力袭扰和破坏，尤其是地雷的轰炸，使敌伪不能不感到我根据地草木皆兵，寸步难行，这是广大人民武装起来不可战胜的明证。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在过去一年中，获得了如下的战斗成果（民兵活动在外）：大小战斗 4758 次，收复据点 229 处，收复国土 37261 方里，扩大人口 92.733 万人，毙伤日伪军 11266 人，生俘日伪军 8623 人。此外，还有毙伤和捕获骡马，缴获枪支弹药、电台、电话、电线，破坏飞机、铁路、公路、桥梁等数字没有列入。在一年的斗争过程中，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周凯东团长、邵文斗团政治委员光荣的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马忠全、王海东两团长，崔建功团政治委员亦受了伤，营以下干部战士阵亡 1009 人，负伤 1969 人，我特代表全军区指战员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慰问和敬意！此外，我们的部队在过去一年中，由于与广大人民的血肉结合，由于政府与人民的热烈拥护与爱惜，无论在数量上与质量上不仅没有亏弱，而且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壮大与提高，这是值得我们为民族抗战庆幸的。一年以来，我们坚持与扩大了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获得这种胜利成果的基本经验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必须使军事斗争与民众的抗日和民主运动结合起来。我们之所以胜利，是由于我们不是单纯的军事抗战，而是我们的军事斗争结合并扶持了全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在豫北战役时，我们是接受了新沦陷区同胞的抗日要求，并吸收了各地要求抗日的群众同时参加这一斗争，而在贯穿全军的整个军事斗争中，我们也继承并发挥了过去扶持与结合全区人民的这一要求的传统，当每次大小军事活动中，均注意征求与采纳当地政府与民众对于抗战事业的某些意见，并吸收所在地民众与军队协同作战。第二，必须使战斗力与劳动力结合起来。我们之所以胜利，又由于我们的军队在军事活动之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掀起空前的生产运动，解决本身的物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而特别重要的就是帮助，保卫，并推动了广大民众的生产热潮。在群众每次耕种锄苗与收获时，我们一方面派出部队到敌人可能出扰的地区，以战斗活动，直接保卫耕作，同时动员全体部队人员无代价的帮助人民耕作；另一方面推动民众并组织民兵自卫队在军队配合之下，进行抢耕抢收的斗争，这样把战斗力与劳动力密切结合起来，使战斗任务与劳动任务同时完成。第三，必须真正依靠人民，形成与人民血肉结合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之所以胜利，还由于我们真正依靠了人民，在军事活动上，处处为保卫人民利益着想，与广大人民的抗日活动相结合，并帮助发展人民武装和指导民众进行游击作战，进行除奸防谍转移等组织，形成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和全体人民血肉结合与有机配合的群众性

的游击战争，也就表现为全面性的各级游击集团，使根据地到处都在这种游击集团的笼罩与控制之下，这就使得敌人无论在对我蚕食和进攻“扫荡”中，无时无地都不能逃出我们的监视与不断的消耗和有利的打击，造成在每次敌人“扫荡”进攻中，无论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都能避免一切不应有的损害，而得到不断的大小胜利。第四，必须执行我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战术方针。我们之所以胜利，还由于我们在军事路线上，真正执行与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们基本上采取了游击战，也没有放过任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战术上我们一般的采取在统一意志下分割指挥的原则，高度发扬和培养各级指挥员，各自为祖国解放战争负责的政治责任心，发扬了各个部队独立负责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发扬了挺入敌后的敌进我进的精神。一年来的战争，我们以微小的牺牲换取了极大胜利的成果，就证明上述正确方针的执行，是争取胜利的唯一保证。第五，最后尤为重要的，即是必须彻底肃清军阀主义的残余。我们之所以胜利，特别由于我们全区的军队，努力克服军阀主义的残余影响，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执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忠实执行党给我们的政治任务，根本没有军阀军队中轻视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的现象。我们认真实行了拥政爱民的政策，尊重并执行了抗日政府的一切法令，成为政府的有力支柱，尊重与爱护一切抗日民众的利益，减轻人民负担，并处处给群众以积极的帮助，把群众的事业看成了自己的事业，而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根本没有军阀军队中欺压政府与欺压人民的现象。在本年一月份的拥政爱民运动周中，我们全体部队一致深刻的反省了自己过去对政府人民尚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承认与纠正了这些错误，进行了道歉与归还借物、赔偿损失等必要的处置，与政府和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消除了相互间不应有的误解。此外，我们在部队的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各个部队之间的关系上，均不断进行过深入的检讨，克服和纠正了许多不应有的错误和缺点，根本没有军阀军队中，上下猜疑打骂士兵和互相倾轧的现象。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们的部队获得了政府与人民的热烈拥护与爱戴，无论在战斗活动或平时工作中，都受到精神与物质上的有力帮助，在伤病员的救护转运，粮食接济，及兵员补充等问题上，均可得到及时的解决。我们军队的内部是团结一致的，战斗力在不断提高。因之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我们的部队一般的都保持了原有的数量，某些部分还有了一些发展和壮大，这也就是实际积蓄与充实了反攻的力量，值得我们告慰于全国人民，与关心中国抗战的世界人民和国际朋友的。注 释 [1] 庞炳勋、孙殿英叛国投敌：1943年春，日军向驻在河南北部、太行山南郡地区的国民党四十军、新五军发动进攻。新五军军长孙殿英于4月24日率部向日军投降，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于5月6向日军投降。他们投降后，所部改编为“和平剿共军”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2）蟠武战役：1943年6月14日，日、伪军1500人占领了太行山腹地武乡县的蟠龙镇一带。太行军区集中了第一、三、四3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于7月19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攻克两个据点，歼敌500多人。（3）豫北战役，又称林（县）南战役，太行军区部队在河南省北部采取集中兵力先歼其一部，然后迅速地逐次予以歼灭的战法，战胜了3倍于己的日、伪军，以伤亡790余人的代价，歼敌7000余人。（4）道清线，即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5）此计量单位系旧制，1斤为16两。下同。

怎样执行 1945 年战斗活动的任务

我们已胜利的度过了 1944 年，并踏进 1945 年了。这一新的年度的战争情况将是：同盟国集中力量最后解决希特勒德国的命运，接着就是联合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总的反攻，把这吃人的野兽也最后给以结果其命运的打击；而日本法西斯强盗则将在中国加强巩固其大陆交通，同时可能对正面某些地区进行某种程度的进攻，以配合它的政砖阴谋；在敌后尤其是华北将仍进行不断的大小“扫荡”，以巩固其“兵站基地”作为最后决战的大陆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敌后尤其我们太行区，战斗活动的任务是什么呢？综括起来就是坚决粉碎敌人的大小“扫荡”，积极向敌人进攻，夺取敌人在我们周围的某些据点，以“巩固根据地，缩小敌占区”，保卫根据地的人力财力，保存与积蓄力量，准备直接投入反攻，把日寇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出去！我们太行区的全体部队和全体人民武装怎样来执行这一任务呢？我们去冬召开的杀敌英雄大会所总结与提出的一切任务，尤其是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讲话中有关武装斗争的部分，实际上都是我们执行 1945 年战斗任务的具体内容，我们都要很好的讨论实施。我这里特再申述其某些要点和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首先，要切实执行党中央及毛主席关于大整训的指示。要知道我们部队以及人民武装的战场技术和战术还不够熟练，有些* 这是李达同志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所作的新年献词，发表于 1944 是很低落的，不把我们的技术和战术进一步的提高起来，就很难执行新的斗争任务。因此在这次整训中，大家都要虚心学习，时时苦练，首先要把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弄熟练，做到人人都要会使用自己所拿的武器。当干部的并要与战士队员们一起学习，首先提高与精练自己的技术，以自己学习的榜样和熟练的技术，来影响与指导群众学习。政工人员也须亲自参加这种学习，以便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掀起热火朝天的热潮。

这里必须提出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兵关系问题，否则我们的整训任务以至战斗任务很难完成或不能圆满完成。因此要按照毛主席“拥于爱兵”的指示，继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部队要求各级干部以整风的精神，把自己平时对待不妥善或关怀不够的地方，在战士群众中公开的自我反省。同时要战士群众本着爱护干部的精神大胆向干部提出意见，而干部则应向战士作保证，不管战士所提意见是否正确都要耐心考虑，不可表露不满，即对提出不正确意见的人，亦须一概不记仇不报复，并根据战士们所提出的意见，来检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一问题如没有解决者，应立即解决，即使停止一短时期操课，亦在所不惜。如已解决但不彻底者，应继续求得彻底解决，并在整训过程中，不断检查和处理这些问题。民兵中官兵关系的问题，虽然不象部队中那样严重，但有许多方面也须加以注意，因此按此原则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要改进情报通信工作。准确而适时的情报通信工作是我们完成战斗任务的有力保证，现在我们这些工作，还是不十分顺利的，如此将会影响战斗任务的很好完成。所以一方面在情报上应该首先整理和加强部队的侦察、敌占区的侦察及根据地内的群众性的各种情报组织，加强侦察人员的工作技术，提高其政治责任心，发扬全区杀敌英雄赵宗德、刘兰子、宁文小等同志的侦察经验，做到真能确实了解各出发及行动中之敌伪的一切情况，掌握其变化的方向。同时组织准确的递传，充分的利用交通机构及原

有的电台、电话、递传哨等各种通信组织，不失时机传达已得的各项情报。各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则要认真研究判断这些情报，作为战斗活动的主要根据，这是完成每次战斗任务的主要关键。要知道“情况如不了解，政策势必错误”，这在战斗活动中尤感特别切要，如不把当前的敌情伪情地形等具体情况弄得十分清楚，则不仅战斗任务难以完成，且常会遭到不应有的甚至严重的失败，不可不严重注意。第三，要加倍努力进行敌伪军工作。为着要拔除敌人的各个据点，为着要顺利地粉碎敌人的大小“扫荡”和进攻，为着更好地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还需要很好的开展敌伪军工作来配合战斗活动，不然就会使战斗任务同样不能很好完成。现在这一工作在各地都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但还不够十分好。国前总的战争形势已很清楚的证明日寇很快就要失败，故敌伪军伪组织内反战厌战动摇情绪日益增长，我们应该做到敌伪各个据点和敌人各个出发的部队，各个伪组织的机构中，都要有我们的工作基础，把敌伪军伪组织内的动摇情况更推动其向前发展，争取在每次战斗活动中，都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则战斗任务的完成就更会圆满起来。希望全体部队和全体人民武装大家努力都进行这个工作。第四，要改善部队生活，发展卫生运动，以增强体力。我们一方面要以一切办法争取时间完成3个月的粮食、全年菜蔬及办公学习等费用的自给生产任务，并要加强部队单位中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想尽一切办法，研究如何吃饭吃菜，如何调剂食物，如何防止贪污浪费，以堵塞不应有的漏洞。同时要注意作适当的节约，以防止不意的灾荒的袭击和其他可能发生的青黄不接顾虑（有些人以为已丰收了，我们应该大吃大喝的想法是错误的），以争取在现有物质条件下，改善伙食，增强营养，保证部队的体格与精力；另一方面要特别讲究卫生运动，从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以及结合农村卫生上，防止一切病患的侵袭，同时加强卫生机关的医疗工作，争取尽早医好各时期的在院人员，减少疾病现象与死亡率到最低限度，以保持健康，巩固部队，积蓄战斗力。这些，要求全体干部及一切人员都要注意实施。要知道吃不饱饭，以及多病的部队是无法打仗，甚至根本不能进行战斗活动的。

关于进攻作战中的一些问题

自毛主席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任务后，给我们全区军队作战活动的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赋予了新的、物质的力量。新年以来，本区各部队，已有连续不断的进攻作战的胜利。如道清线南北的攻势作战〔1〕，襄垣作战〔2〕，安阳作战，凤居与马坊据点的光复〔3〕，祁县的进击〔4〕，陵川及辽县的解放〔5〕，正太、平汉、白晋各路上的破袭，和其它许多小的胜利行动，均响亮回答了毛主席的号召。更给全区指战员，以现实事实的示范，和进攻精神的推动。因而全区部队进攻作战的要求是普遍提高了，许多部队都在摩拳擦掌请求打仗，以期用“新英雄主义”的精神，进行革命竞赛的胜利作战。这种新颖的积极进攻精神，确是非常宝贵，并应普遍发扬光大的。然而，我们在这些进攻作战中，却存在着许多弱点和缺点，以及某些严重的错误，以致影响到作战胜利，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一些不应有的损伤。这就是：1.为总的胜利形势，和各地胜利战，一时冲昏了头脑，发生了严重的轻敌观念。认为：“敌人都不行”，“某部某部能打胜仗，我一定也不会比他们差”。可以不费大气力的，消灭某些敌伪，拿下某些据点。为了竞赛比赛胜利，以为“别处都打得轰轰烈烈，我可不要落*1945年6月底至7月初，太行军区集中兵力发动了安阳战役。本篇系

1945年6月30日，李达同志在战役中起草的给部队的指示。

后”，所以就急切求打，仓卒进行作战。由此之故，因而就：

(1)不注意细心侦察与研究情况，不作周到的诸种准备，以致

打起来以后，往往发生预料不到的新情况。事先以为敌人较少，而事实则很多；事先认为敌人经不起一打，而实则自己反碰到钉子。有时在打进据点之后，尚不知敌人的军械、军需品贮藏地在何处。为进攻而筹备的器材（如梯子、吊桥等），因不合实际情况，而多无作用。

(2)不注意作深入的敌伪军工作，没有细心周到的伪军工作的

组织，故得不到更好的“里应外合”的配合。有时则因工作欠确实，而碰到意外的抗击；有的则以为自己周围伪军不多，而根本忽视这一工作。

2.在作战布署上，忽于“重点主义”的原则。有些平分兵力，以

致形成没有高度的攻击力与弹性力，甚至不掌握任何机动兵力，既不能一下给敌以粉碎的打击，迅速取得胜利，又不能在时间延长时，持续作战。且一处碰壁，则处处受其影响，敌人援兵一到，则感到成为意外的威胁，使整个行动处于被动。有的则在时机尤其是自己的准备尚未成熟之前，便超然进入战斗，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因自己碰壁损失，而增加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与抗力。

3.缺乏大部队作战的组织纪律，与密切协同的精神。游击习

气，给作战的影响很大，大部队动作的秩序和时间计算，开进和展开的组织，队形的选择与运用等均欠适当。有不按统一的时间动作的，有不照顾友邻部队的动作的，而只顾自己的便利者；有不善于土工作业而致遭受无谓损伤者；有习于游击动作中之“晚出早归”的心理，而不敢进行日间的持续活动者；有不准确执行命令，而于情况稍微困难时，自行退出战斗者；有不与上级下级和友邻部队主动保持密切联系，而不了解各方面情况并指挥中断者。

4.战斗团结不够坚固。几个部队联合作战时，相互间的照顾与

谅解往往不十分周到，有时因分担任务之难易，而发生不平之感，甚至有胜利时争抢战利品，且因之而争吵，意图动武，以至不让他部人员进入自己战斗区域者。有些部队，则只为自己宣传，而不提及友邻，以至使对方不满者。5. 物质观念很浓厚，甚至有发展成为“土匪主义”现象。有些部队在胜利之余，只专注意于胜利品之夺取，以致秩序混乱，难于掌握，一有敌情，则很难遂行战斗；有的只知专找私人必需品者，而抛弃了更宝贵的武器、弹药；有的则为了要东西，而忽视政策与纪律，以致有搜俘虏腰包者；有为夺取其东西，因而抢毁俘虏物品者；有把战地视为“殖民地”，借口搜查残敌和敌物，而乱拿老百姓的男女衣物者；甚至有些干部不能以身作则，也有动手拿物，或对所属部队，乱拿东西的行为“视若罔闻”者。凡此种种就影响到部队战斗力之不能保持及损害了我部的政治声誉。上述问题，是我们进攻作战中的很大障碍，是妨害我们顺利完成扩大解放区任务的凶恶敌人。过去4个月的进攻作战中的许多战斗战役，按客观条件来说，本来我们是可能获更圆满的战果的，但由于存在着上述诸问题的原因，以致降低了我们应得的成果，放过了许多可以获得更大胜利的机会，而许多可以被彻底消灭，或大部可被消灭的敌人都给逃脱了。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些弱点缺点和错误，时刻注意纠正和克服，否则将使以后的作战任务更加困难，减低我们的作战战果，甚至造成某些不应有的损害。这里首先要了解我们革命军队，进攻作战战术原则，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除敌人的武装，来武装我们自己。为此：第一，在敌情侦察与判断上，必须准确而客观。要以各种方法，从各方面不断搜集材料，进行周详地分析和估计，并善于掌握敌人的弱点与规律，掌握各种有利条件，同时设法创造这些条件，一切粗枝大叶，道听途说的办法，都会给自己造成一些困难和损害。在战斗组织上必须十分周到，一切准备工作（技术与物质条件）必须十分成熟，若有缺点之处，如时机尚未成熟，则宁可推迟时日，亦不可作无把握之行动。第二，在兵力布署上，必须肯定“重点主义”的原则。集中力量（兵力与器材），于主要方向（敌之弱点与要害所在），同时以各种设施如伪装欺骗，各路同时并进等，遮蔽我之企图，给敌人以突然不意的歼灭打击，然后乘势扩大战果。在其次要方向，则仅使微少的力量行箝制佯动（但须争取与创造时机变作真面目之进攻），以配合主要作战方面，确实获得胜利。摧击精神上，要一定把“死猫子当活老虎打”，要有以特殊有力的铁锤，一下子粉碎任何抗力的气势。一切无重点或重点不明确的平分兵力，及轻视敌人，满不在乎，以致仅使敌人受些不疼不痒或创伤不大（如仅将敌人击溃或消灭其小部等）的打击之结果，这在我们的原则来说，却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并不是什么胜利。此外，还须加强突击队方面的后续力量，与弹韧力，控制必要的机动兵力，作为突击队的二、三梯队。在突击胜利时，则立即加入上去扩大突破口，把胜利向最高度发展。如敌人可能来援时，则在其增援运动中，给以歼灭的打击，使抗守之敌得不到任何妄想解救的希望。其次，要加强小部队作战的组织与纪律性，克服一切游击习气。尔后在进攻作战中与大部队共同行动的场合将日益加多，我们必须善于组织这种行动，明确规定各部队的队形与任务，严密其协同动作的纪律。这里特别要使干部与战士，深刻了解大部队带组织性与纪律性的作战，在许多方面是与小部队的游击活动完全不同的，在小部队游击活动中，一个小部队，即应灵活主动自己决定前进或撤退，但在大部队的联合作战中，即使一个全团的首长，亦不能单独决定所属部队出乎原定计划

新的移动，纵令情况十分恶劣，亦不允许超规定的自由行动。小部队的游击动作，往往是“晚出早归”一打就走的，而大部队则不仅要日以继夜，且常带有连续进行数日，或十日以上的作战，故必须坚决服从指挥执行命令，没有命令，即不得作超范围之自由行动。此外，还须不时照顾与友邻部队之协同一致，齐一步伐，那种“你来，我不来”的习气是要不得的。要不断与上级下级及友邻部队保持联络，报告与通报自己的情况，请示新的任务和意见，为了进行日以继夜的持续活动，无论突击队与箝制队，都须注意土工作业，避免不应有的伤亡和敌人意外的突袭与出击。第三，加强大部队作战中的友爱团结，今后的进攻作战中，往往是几个部队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行动的部队，多是因历史和地域的关系，影响到战斗作风生活习惯，以至装备条件诸多不同。而在战斗实施中，又不可能平均负担一样的具体工作，有担任突击的，有担负箝制的，还有的作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因之可能有伤亡过大者，也可能有根本无伤亡者；有缴获较多者，也有毫无缴获者；有胜利的完成任务者，也有因其它条件而未完成或未彻底完成任务者。还有因特殊原因，而相互配合不够，或无意中相互障碍者，有彼此争功者，争要胜利品者，凡此都可能使相互的团结友爱受到影响，甚至障碍到作战任务之实行。今后应高度发扬我们战斗团结的作风，要使各部队了解在总的方针下各部队的具体工作，固有不完全同一之处，但在总的任务上是具有共同性的，缺乏一个部队的努力，即使是箝制队和预备队的努力和箝制不够，都会使整个任务有缺陷的。因此，不要因执行任务之轻重，而对某些部队产生轻视和不忍耐的心理。战斗力强之老部队，应注意帮助与带领较新的部队，胜利不大的部队，则不应嫉妒胜利较大的部队，尤应注意各个努力于自己的具体工作，竭力求得相互密切配合，在友邻部队困难时，则应主动大力援助之。一切避难就易，不积极配合动作，不主动支援友邻，打滑头仗的现象，必须彻底纠正。其它无意中互相妨碍之处，则应一律互相谅解不可相互埋怨，尤应严禁互争胜利品，以致发生严重的各不相让的现象。第四，加强敌伪军工作，在作战实施以前，应以各种方法进行艰苦深入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求得更深入的巩固，提高已有的组织关系，一方面尚须作广泛的普及工作，即使一个很小的，或不关重要的个人和小部队，如能使工作深入下去，在一定条件下常会起到重要作用。在进攻实施之前后，则应在不妨碍机密条件下，尽一切努力策动内应，即使是极小的不抗击，或假抗击的策动，也常会因之而获得很大的成果，不可丝毫放松的。战斗中，在敌人解除武装后，应特别注意对俘虏的工作，严守不搜腰包，不侮辱其人格的规定，越是大的俘虏军官，这点越加重要，过去有人以为对俘虏军官可以随便些，尤其红眼于俘虏军官们的漂亮衣物用品，而设计留用者都是极不正确的。第五，纠正“发洋财”的思想，与“土匪主义”的行为。要使指战员深刻了解，我们的作战是为了执行党给我们“扩大解放区”的任务，为了解救被敌人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同胞，而不是为了解决私人的生活问题。当然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东西，我们是可取用的，必须经过一定的有组织的统一处理，那种自由乱拿的办法只能混乱我们的组织，解除自己的战斗力，或遭受人民的反对，过去战斗中，关于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我们应特别警惕勿忘。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我们应该：（1）组织专门的战场扫除队，担任一切胜利品的登记收集，统一处理。一切作战部队均须进行战斗任务，清搜残敌，搜集武装（所有武器都要部队自己收缴）或追击已逃亡之敌，或集结于机动位置整顿待机以防万一，非有命令任何人员均不得

离开战斗岗位私拿东西。(2) 对战地居民，应协同地方工作同志，及时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安抚工作，不得借口搜抄敌人，或以为某人是汉奸，而随便强拿其财物，即使系敌人的合作社，或确系逆产，而部队亦只可临时派兵监视，交由战场扫除队办理，而不得乱自插手。(3) 进攻较大的据点或城镇时，则由相关党政机关，协同军队政治机关组织善后工作委员会，于这些地方被解放时，专门进行财物登记、存藏（尤应注意可资我们建设工作的各种机器和用具），逆产处理，公安设施等工作。作战部队则只派必要兵力看财货、作警戒和平点之守备，其余部队在秩序尚未安定之前，一律不准进去以免混乱。(4) 为给作战部队以应有之鼓励，在战斗结束时，应由高级领导机关，将所得战利品之一部，统一分配于各参战部队，必要时并可将武器弹药，给这些部队分给一部。(5) 各级指挥员应以身作则，领导所属遵守这种纪律，以维持部队的组织性与战斗力，过去个别干部对此注意不够，应特加纠正。

注 释〔1〕道清线南北的攻势作战：1945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太行军区第七、八军分区部队，平原分局党校警卫团，及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在道清铁路沿线连续向日、伪军发动攻势，歼敌2500余人，解放了道清铁路以北、辉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收复国土2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

〔2〕〔3〕〔4〕在道清攻势作战的同时，太行军区第二、三、五军分区部队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晋中和晋东南发起攻势作战，相继攻入了祁县、襄垣城，攻占了凤居、马坊、东艾口等据点，歼灭日伪军数百人。〔5〕1945年春，太行军区部队在晋东南发起攻势，收复陵川、辽县（今左权）、和顺等县城，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谈安阳战役经过

为了继续执行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的方针，用胜利行动，拥护党中央，给抗战8周年一件新的礼物，消灭日寇忠实走狗，拯救安阳同胞，为抗日根据地扩大经济区域，我们调集了一些兵力对汉奸李英，展开了歼灭性的进攻。这次战役我们是理想的完成了，不但歼灭了伪军李英2/3的主力，且消灭了日寇的援兵，解放了大块国土，和30万同胞，而且对我军亦是个大的锻炼。这次战役可叫作较大规模的一次大演习。参加这次战役的兵力，除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外，并有1.5万以上的民兵自卫队。经过缜密周详的准备后，乃于6月29日黄昏以快速行军，突破敌伪重点封锁阵地分头直扑敌人心脏。至30日晨2时，各部开始进攻。经4小时激战于晨6时全部占领曲沟，打开战役的锁钥。紧接着在北流寺如数消灭了从安阳增援的日寇，给强攻水冶的部队以有力的支援，振奋了部队。强攻水冶的部队，人人抱定必胜信心和牺牲决心，30日完全占领水冶。7月1日拂晓，我完全肃清水冶城内日寇，第一步原定3天的作战计划，1天即完成，第二步计划是扫除水冶南北两翼的据点。到2日夜，即按预定计划攻克水冶以南的善应、九龙山、边石店和水冶以北的积善、鲁仙、石官等据点。把敌伪经营8年的封锁阵地和星罗棋布的碉堡全部摧毁。这时安阳、观台敌伪恐慌万状，我军*本篇是安阳战役胜利结束后，李达同志与《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的谈话，发表于1945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延安《解放日

报》于1945年7月29日转载。

进逼安阳、观台近郊。接着第二步计划完成之后，我即实施第三步计划，即以主力一部以突然勇猛的动作，打下鹤壁集，歼灭了孙殿英的第二十六团。其他主力结合广大群众连续破袭观丰路[1]，抬回铁轨800条，使敌掠夺六河沟煤矿的大动脉完全陷入支离破碎。谈到战果，有几个重要数目字，如北流寺一战，敌大泽大队长率领的100余名日寇完全歼灭了。汉奸李英的队伍经过这次战役被我消灭了2/3——2个旅、1个游击总队和1个独立团，消灭了孙殿英的1个团，活捉伪军将官3人，校官22人，尉官169人，士兵2000余人。我们非常重视这次战役给予我们的锻炼。我们的老兵团有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但比较缺乏平原地作战经验，这次我们获得了它。新生的某团、某团及地方部队都还未经过大规模的战斗，而在这次战役中却考验了自己的力量，学习了很多东西，发挥了英雄气概。这次战役中，我军士气旺盛，动作神勇，组织非常周密，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压倒敌人。在此次作战中，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敌伪大为震惊，彻底粉碎了汉奸李英对其部下所说八路军“行不行，两点钟”的欺骗谰言。这次战役锻炼了主力兵团，也锻炼了人民武装。这样大规模的民兵和自卫队，随同部队有组织的配合出击，在太行区还是第一次。他们从游击战、麻雀战进入进攻的野战范围，获得了许多新的作战经验。至于地方工作与军事的密切配合，后勤工作与前方作战协同动作，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在这次战役中，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参加到战斗行列里来，实行了党政军民全面大进军，真正体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这次战役领导的最大特点与最大收获之一。注 释 [1] 观丰路，即从河北省南部观台镇到河南省北部丰乐镇的铁路。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

四战之地四战之军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它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这个革命战略区，处于全国解放区的中央，扼华北解放区的大门，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雄峙于西，冀鲁大平原舒展于东，南濒黄河，北界正太，它的四周为同蒲、正太、津浦、陇海四条铁路所环绕，平汉铁路贯串其中央。刘伯承同志称这块战略要地是四战之地。晋冀鲁豫野战军东面配合华东作战，西面配合晋绥和陕甘宁作战，南面配合中原作战，北面配合晋察冀作战。因此，刘伯承同志也称这支野战军为四战之军。这个地区是古燕赵之地，首府邯郸，是古赵国的首都。“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自强不息；廉颇、蔺相如团结御侮；乐毅的弟弟乐闻说：“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在晋冀鲁豫区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支解放军，不但有红军的光荣传统，而且有燕赵健儿慷慨悲歌的传统。晋冀鲁豫战略区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已控制了80多个城市，*本篇是李达同志1982年为《刘邓大军征战记》撰写的回忆文章，发表于该书第1卷。198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拥有约1400万人口。它的四块根据地基本上联成一片。全区军队发展到30万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等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同时建立了军事领导机构——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早些时候，已经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以杨秀峰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工、农、青、妇、文化各种人民团体都有了悠久的历史。

保卫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战略部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胜利。正当我军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向周围点、线上的日、伪军发出通牒，令其立即向我八路军缴械投降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抗战果实，却发出了反动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要日伪军维持秩序。他一面装出和平姿态三次邀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一面却从其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调动大军，陆续向我华北、华东、华南解放区开进。向华北开进的蒋军，其先头部队第一战区胡宗南部2个军，经风陵渡进抵山西的运城以南地区，准备沿同蒲路北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3个军，经豫西向郑州集中，准备沿平汉路北进；第十战区李品仙部，经安徽之阜阳、太和等地向徐州前进，准备沿津浦路北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于攻占我归绥、集宁两城后，又沿平绥路向察哈尔进攻。盘据在晋西南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中旬即在日军和伪军接应下，以其主力占太原，并以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全军人马加上六十一军等共5个师16000人，从临汾、浮山、冀城侵入我太行山腹地上党，随即占领我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我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蒋介石的军队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解放区开进。内战的危机十分严重。8月2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张际春

副政委等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从延安飞回太行山，在黎城长凝简易飞机场降落。这时，我正在前线指挥太行部队作战。这一天，太行部队攻克了武乡县新城——段村，肃清了该城的日伪军，便乘胜挥师南下，准备攻打襄垣城。这时，刘邓从涉县赤岸驻地给我通了电话，听了扼要的情况汇报之后，命令我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邓政委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刘司令员说，蒋介石的军队沿五条铁路开进，五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8月29日，由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签署了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晋冀鲁豫全区作战的战略部署。部署决定集中太行主力，加上太岳部队及冀南部队，共约28000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进犯上党区的阎军16000人。这是主要的作战方向，务必取得全胜。为了配合这一作战，令冀南、冀鲁豫部队留一部继续在延津、封邱地区活动，威胁开封，破坏陇海、新（乡）汴（开封）铁路。主力转向平汉线，扫清新乡以北平汉线两侧之蒋军。令太行第七、第八两军分区部队消灭焦作伪军（约2000人），并破坏道清铁路。三个战线完成上述任务，估计需要一个月时间，届时拟将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结合冀鲁豫主力控制平汉路更长一段，相机夺回新乡或迎击蒋军北上部队。太岳部队沿同蒲路的部队加紧破路。上党作战完成后，太岳主力可转向同蒲路。我获悉了这个部署之后，高兴极了。这是一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完全适应于我们这个四战之地的当前情况和发展趋势的战略决策。我们虽然处于四战之地，但决不能四面平均分兵。刘、邓常说：“五个手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着”。这个部署，完全按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在次要方向以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在主要方向则三个人去痛打一个敌人。第一步是集中兵力痛打上党的敌人，除去心腹之患，然后转移主力于平汉线，转移部分主力于同蒲线以各个击破来对付腹背之敌。

战略方针的转变

8月27日夜，我太行部队包围了襄垣城，经数天的战斗，于9月1日午夜12时胜利解决了战斗，毙敌350余人，俘敌450余人。襄垣城的解放揭开了上党战役的序幕。襄垣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都来到了襄垣。他们到达后，立即向附近集结待命的太行部队的干部，传达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讲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上党战役的决心，布置襄垣攻城战斗的经验教训总结，组织攻城演习。并亲自到虢亭，下良一带看望十四团等太行部队，对十四团和三十团连以上干部作战斗动员，提出了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号召。部队知道了毛主席要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和平民主建国的時候，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邓政委回答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刘伯承司令员还亲自检查了十四团的装备，战士们所携带的子弹，有的只有两颗三颗，但他们都很坚决很乐观地对司令员说：“凭刺刀和手榴弹也要把敌人歼灭，保卫抗战果实。”在分析了敌情

之后，刘伯承司令员起草了一个《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于9月5日发到部队，这个指示首先指出，消灭这些敌人，将是一个艰苦的战斗任务。在这一战役之中，我们将主要进行许多城市攻坚战，也要进行野外战斗（运动战）。指示指出：阎军作战的特点是：长于防御，构成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他配备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因此，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攻击战斗（包括村落战），才能消灭之。这种战斗是一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用密集队形一冲了事。在我们向阎军主力核心城市的周围小城市进攻中，估计其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它有大预备队），因此我们也将遇到若干野外的运动战。刘伯承司令员还把节约弹药问题写进了这个指示里，他嘱咐部队：“千万节约弹药，不得丝毫浪费。同时要拾缴弹药壳，不得散失，这点实行与否，应以之来测验指挥员之政治责任心。”这就是说，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战略方针，必须来一个转变，转而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把过去同军区部队合并了的正规军，重新组建而且扩大起来。以适应新的情况和新的战略方针的需要。同时要估计到敌人占领的是城市，城市攻坚战这种不痛快的战斗，将占相当的比重。

布势险恶敌不就势

9月7日刘邓首长发出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决心以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组织上党战役，彻底消灭盘据在上党地区的阎军，第一步计划先夺屯留，吸引了长治阎军来援。争取在长（治）屯（留）路上作运动战而消灭之。”命令太行纵队全力攻夺屯留及上村据点。吸引长治之敌来援；同时命令太岳纵队适时到达屯留以南之李坊村、常北村，准备于长治阎军出援时，在长屯路上的双塔、崔邵村段击灭之。命令冀南纵队适时到达长治西北之南岗上（不跨白晋铁路），于长治阎军出援时，在长屯路之崔邵村段击灭之；命令韦杰指挥五团、四十一团及地方武装为独立第一梯队，战斗开始前隐蔽集结于老顶山东北反斜面，在长治伪军出援部队之后尾脱离长治时，且其先头与我部队接触后，即经长治以北，向该出援伪军进行猛烈尾击。其余长子、潞城、壶关等小城，则命令其他部队分别监视，并打击、消灭由各该城出援之敌。决定于9月10日凌晨2时30分发起屯留战斗，亦即发起上党战役。这一夺城打援的战役布势是很险恶的，但险恶的布势只是造成消灭敌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必须具备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敌人按我们预想那样前来就我们的布势，敌人不就我们的布势，险恶的布势就归于无用。当我攻打屯留时，长治之敌曾出动6000余人，于9月11、12日两次试图增援，但因为敌人害怕被我歼灭，加之我个别打援部队过早地暴露，这样长治出援之敌同我军略为接触就缩回去了。我们只完成了夺城任务，而没完成打援任务。接着，刘邓又部署于9月13日夜，用同样的战法，以太岳部队攻长子城，以太行、冀南两纵队埋伏长治、长子公路以南，准备歼击可能由长治出援之敌。但长治城敌军再也不敢出援，因而我们又未实现打援意图。

无足之蟹不能横行

这样，刘邓便暂时放弃了吸打敌援以削弱敌核心城市的兵力，而便于尔后夺取该城的意图，转而采取分兵加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孤立其核心城市之敌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各部队开始攻打长治外围各城，9月17日，冀

南纵队攻克潞城，歼守敌 1 个营；9 月 19 日，太行部队攻克壶关城，歼敌 1 个团；同日攻克长子城，歼守敌 2000 余人。连同 9 月 1 日攻克的襄垣城，共攻克县城 6 座，使长治敌人完全孤立，成了无足之蟹，刘伯承司令员常说：“无足之蟹，不能横行，理至明也”。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下了夺取长治城的决心。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是日军侵华期间三十六师团的驻地，

它是一个重点设防的城市，深沟高垒（城墙高三丈余），工事坚固，阎军主力万人据守，加上连日倾盆大雨，地面泥泞，爬城极为不便，对于缺乏炮兵的我军，要攻下长治城，自然比攻下其外围小城困难得多。但是，如果不能迅速攻下长治城，及时解决上党战役，在敌人坚守下旷日持久，则平汉、同蒲大门洞开，北进蒋军主力，将突破、分割我华北解放区，抢占东北，战略上对我十分不利。20 日刘邓首长发出《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五号命令》：“决心以勇猛速决之作战，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之敌”。并采取围三阙一面，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阎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人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歼灭之”。这样就可能使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命令规定各部队应于 9 月 23 日以前，首先消灭长治城外围之

据点，并对敌情、地形进行周密侦察，于 24 日 22 时开始攻城。

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

长治攻城战斗战至 9 月 24 日，我军已攻占城关据点多处，各部队正要按命令规定，于 9 月 24 日晚开始攻城的时候，得悉从太原出动的阎军 3 个师 7000 人，正沿白（圭）晋（城）线南下，已到达子洪镇以南，有增援长治模样。刘邓便迅速地把攻城的决心转换为攻城吸打敌援，命令攻城部队扩大攻城声势，以加急长治之守敌的呼救之声，催援敌快快送上门来。9 月 28 日，刘邓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命令中通报的情况如下：“阎伪八十三军 3 个师约 7000 人，于 9 月 27 日到达沁州，其先头部队 4 个团，于 9 月 28 日 12 时已进抵新店（沁州东南 35 里）；另一股约千人，9 月 28 日晨尚在南里村（沁州西南 20 余里）一带，估计该敌将继续驰援长治被困之敌军。”根据敌情与地形之判断，刘邓定下决心“我决以攻城打援之方针，在上述敌军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歼灭之。”在这一决心下，刘邓命令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决死队第一旅全部及独立第二支队为攻城部队，继续积极佯攻长治城，吸引八十三师向长治急援；命令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第二支队（缺三十团）、第四支队及十七师为打援部队之右翼队，于 29 日 11 时集结于北村、中村、南村、上下葛家庄一带。在敌援军先头部队进到上村镇时，由东向上村镇至吴家庄段突击之；命令陈质同志指挥三八六旅及太行三支队为打援之左翼队，于 29 日 10 时前进到屯留以北之前后董庄、张家庄、栗村地域集结，于敌援军先头进至上村镇及我右翼部队投入战斗后，向铺草沟、常隆镇及其以北地带突击之；命令三十团为独立支队，隐蔽集结于襄垣以西之南田章、北田章地域，于我主力在上村镇至常隆地带投入战斗，俟敌援军之后尾超过夏店时，由北尾击南援之敌。

刘邓这一打援部署，是极为周密的，照顾到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五个因素的部署，是一个钳形的、袋形的进攻部署。

刘邓还命令攻城部队，于我打援部队投入战斗及长治敌军出

城接应时，以主力向敌军尾追或平行反击，并以一部相机攻城或占领之。

敌不就我势我因势利导

刘邓十分重视侦察判断敌情、地形，以此作为定下决心的依

据，尤其重视敌情变化时的侦察，侦察变化中的敌情。他们常常说：敌情变化了是否还是那样办？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致使敌人逃脱，要注视战机的进展，因势利导，机断行事，以自己的积极行动去开展战局，努力达成歼敌任务。刘邓常常这样教导各级指挥员，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

9月29日，发现敌援军除八十三军3个师外，还有改编之伪

军杨诚部2个师南援长治，加上仍留在沁州的伪军千余（另有日军千余），共约12000人。我以1万人继续包围长治城，2万人打援军。

9月30日，敌援军突然离开白晋线，沿虢亭、屯留间公路前

进，敌不就我之布势，刘邓就根据情况的变化，顺势转移兵力于虢亭、屯留公路两侧，因势利导去歼灭敌人，改以右翼队的十七师与独立支队（三十团）尾敌援军跟进。这时刘邓指挥部由黄碾前移到西北的中村，实施指挥。10月2日，我打援主力预期遭遇敌援军于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之线，我军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两翼向敌两侧迂回。右翼队之太行二、四支队向磨盘垴、王家渠进击；左翼队之太岳纵队主力（三八六旅）和太行三支队向老爷岭，顺坡上进击；同时命令尾敌前进之十七师和独立支队向南展开攻击，襄垣独立营扼住虢亭断敌退路，将敌援军合围于老爷岭，西虢，磨盘垴至榆林地区。敌发现被围后，即利用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襄垣县的虢亭镇和屯留县的余吾镇之间，有一脉海拔1200余米的山岭，它的制高点是三座鼎足对峙的山峰，这就是王瓚山，由太原到长治的交通大道就是由这座山的中间通过的。在王瓚山的东南为磨盘垴，西南为老爷岭。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冲。现在敌人据守这个地方，真可以说是易守难攻。

用火力侦察和捕俘发现新的情况

歼灭被围的敌人需要经过十分艰苦的战斗。敌人火力很强，善于赶筑工事据守。如三十团三营，在攻击磨盘山东据守山垴的敌人时，发现敌人将山垴周围削成万丈高的陡壁，部队一往上攻，就被滚雷打下来。为了避开敌人优势火力，我军主要利用夜间，凭手榴弹，刺刀向敌人各个要点突击；白天则组织兵力、火力抗击敌人的反扑，并借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弹药。我军弹药十分缺乏，得不到补充。一天夜里，陈锡联同志和我陪刘伯承司令员到前沿部队去视察，他听到前线枪声特别稀疏，他虽然知道弹药缺乏，还是怔了一下。他问为什么枪声这么少。陈锡联答道：“现在每个老兵只有5发子弹。我们正在想办法抓俘虏。抓到一个阎锡山的兵，可以得到200多发子弹。他们每个兵都携带有300发子弹，100发自己使用，200发是送到长治去的。刘司令员听了高兴起来，说消灭了一股敌军，油水还不小哩！经过数天的激战、火力侦察和询问俘虏，才判明援军的真实情况，他们是阎锡山的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领的二十二军、八十三军、伪军杨诚部队改编的省防军等共八个师，附两个炮兵团。由副总指挥胡三余兼炮兵司令，兵力为2万人。与我们打援的2万兵力正旗鼓相当。敌军被我歼灭一部分之后，正被迫步步退缩，猥集在磨盘垴、老爷岭及关上地区，缺水缺粮，饥疲不堪。我右翼队不断从王家渠，磨盘垴以东以北向磨盘垴钳击；我左翼队则从顺坡上

及井道上东南，向老爷岭钳击。十七师则在合围圈的东北方向的任家沟方面与右翼队的右钳，钳击磨盘垴；独立支队（三十团）则在合围圈的西北方向与左翼队的左钳，钳击老爷岭。为加强我军，争夺优势，彻底歼灭已被围而疲困的敌军，刘邓乃下令从1万围城部队中，调动冀南纵队（6000人）作后续力量，投入打援战斗。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攻长治城。并且命令他们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增加敌人的动摇；同时为了避免敌人困兽犹斗的行动，决心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在北面敞开一个口子，给敌人虚留生路，部署在运动中分割包围歼灭敌人。乃命令十七师和独立支队分别协同右翼队和左翼队猛攻阵地两翼之制高点磨盘垴与老爷岭，压迫敌人脱离阵地北逃。我冀南纵队，即从右翼队和左翼队中间突击，贯穿到底。与左翼队的追击穿插部队会合于榆林以北之赵村。10月15日，我左翼队攻克老爷岭主峰，敌人果然于夜间向北突围，而我们的一支迂回部队则早已奉命由榆林以北迂回到虢亭镇西北的土落村附近的制高点，作封锁敌人退路的布置，襄垣独立营也占据了虢亭附近的要点作封锁布置，主力则沿虢（亭）屯（留）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致敌溃不成军，纷纷向我缴械投降。我后方人员、参战民兵及附近群众，也奋起捕捉溃散的敌人。战至10月6日，敌人除了约2000人逃入沁州城以外，其余全部被歼。其副总司令、援军总指挥彭毓斌被我击毙，援军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十数名高级军官就擒。完满地实现了“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

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

刘邓在长期的指挥作战的过程中，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的好办法。这就是把筑城，驻守，蹲在工事里用堡垒罩着的敌人，转化为在野地行进的敌人，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野外运动战，使敌人容易被消灭。这次消灭敌援军战斗的末尾，就已经采用“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在追击中消灭敌人的战法。而对长治被围的敌人，最后则完全采取了这种战法。10月6日，敌援军被全歼后，长治的守敌对援军已经完全绝望了，便于10月8日向西突围，企图横穿我太岳根据地，逃回他的老巢。刘邓早已预见到情况的演变，命令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又命令已经腾出手来的太岳纵队，从虢亭地区直出沁水，进行兜击。太岳纵队以一支先遣部队经后沟、马良镇，在南孔滩渡过沁水，在马壁村地区控制沁水，主力则经郭庄直插古锥、将军岭、桃川村地区。太岳区的人民武装获得情报之后，也主动在沿途进行截击，捕拿，结果在沁水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歼灭了逃退之敌的主力，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就擒，完满地实现了“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在运动中，在追击中歼灭了敌人。

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

1945年10月13日，刘邓总结了上党战役的经验。这次战役敌我兵力对比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参战兵力计太行18000人，太岳7000人，冀南6500人，共31500人。阎锡山在日本投降后侵入上党者，有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十九军之三十七师，六十八军，督导第二、第六2个纵队，保安第五、第九2个团，及十余县之伪还乡团和收编之伪军，共计兵力18000人，9月下旬，阎锡山又派其二十三军3个师，八十三军3个师（缺2个团）及省防第三军杨诚部4个团，炮兵一部，共兵力2万人增援长治，总计敌兵力约38000人。除2000人逃回沁州，1000人逃散外，歼敌35000人。

这次战役，以我之 31500 人，歼灭了敌人 35000 人。

刘伯承同志说：“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在上党战役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是把敌人打退而已。”

“牛抵角抵了半天，消灭不了敌人”。刘伯承同志幽默地说过：

“作战有三种战术：一、牛抵角；二、马的战术，用后蹄踢；三、狼的战术。四川民间有个故事说，成都有一条坡路，狼就在坡路附近静坐等着，一个推平车的人推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腿上咬一块肉，推平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了一块肉。狼的战术是高明的。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刘伯承同志在论述合围钳形攻势的要旨时，精辟地说：

“由于我军善于宽大的机动捕捉敌人的弱点，所以战役的围攻较易奏效。但无论在阵地战或机动战，尤其是在机动战中，必须各部队根据作战基本命令与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协同动作，才能合围与歼灭敌人。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寻求敌防御体系的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与割裂的队形之类），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割裂自突击敌人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敌人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从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支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张战果。”这里是说围攻在主要突击方向以两个突击队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至于两个突击地段的中间地带及其他活动上活动的诸军队，则作辅助进攻的钳形突击。或扼守要点防御，或实施佯动。无论怎样，这些军队都应从各方面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施行向心的突击。足以使敌人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御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适应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布置。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尤其是上党战役的主要战斗——麴亭、屯留间的打援战斗，就是合围钳形攻势的典型战例。这是就战术上来说的。

烧红的铁不能用手去抓

上党战役，我以劣势装备对敌优势装备，以劣势的兵数对优势的兵数，而终于取得了干干净净消灭侵占上党之敌的重大胜利。战史已经作出了总结，指出其基本经验首先是在晋冀鲁豫全区军民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以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武装了部队和群众，使军队与人民认识了要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要保持人民的既得权利，除了打垮反动派的进攻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从而发挥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民兵和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战士舍命，英勇杀敌，真正形成了人民战争。哲学家，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的哲学教员杨献珍同志，在讲述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政变”时，讲过阎锡山有一种高超的真理观，对这种真理观，杨献珍同志打了一个比方，就是“烧红了的铁不能用手去抓”。据说有一个老铁匠的徒弟，为了求得老师傅在去世之前把保留的一手秘诀传授给他，就用全副心血侍候老师傅，在老师傅临终前，这位徒弟来到他床前提出了这个心愿，老师傅说：我留的一手秘诀，就是“烧红了的铁不能用手去抓”。说完这话，老师傅就咽气了。上党地区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心之地，是全区人民在八年抗

战中用抗日的烽火燃烧得通红的一块铁，而阎锡山却违反了他自己高超的哲学，伸出手去抓。

自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二仗* ——平汉战役

上党战役的胜利和“双十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国民党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

正确侦察敌情

当时刘邓首长对国民党以 14 个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突贯进攻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四十军、三十军、新八军、三十二军配合伪军孙殿英部为第一梯队，约 45000 人；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八十五军、七十八军为第二梯队，约 55000 人，总计兵力约 10 万人，沿平汉路向石家庄、北平挺进；以十六军、第一军、第三军为左侧卫，沿同蒲路、正太路，经榆次、石家庄北进；以十二军、九十七军和伪军吴化文部为右侧卫，沿津浦路经徐州北进。他们企图控制铁路、发扬美国现代化装备之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退入农村或山地，而便于各个歼灭之。*本篇是李达同志 1982 年为《刘邓大军征战记》撰写的回忆文章，发表这三路进犯军，以平汉路的为主。但因为它的左、右侧卫是战略上的策应，难以作战役上的策应，故平汉线上的敌人，仍然是孤军深入。

这些进犯军善于阵地战，特别长于工事构筑和固守，射击亦较准确；但缺乏机动和反攻击精神，尤不善于运动战。在野战中，他们惯于以正面部队巩固阵地，钳制对方，以有力部队施行一翼或两翼包围，或以优势火力给对方以有力的杀伤。他们的装备较笨重，行动迟缓，互相间的协同和支援很差，对后方顾虑多，怕我军抄他的后路。他们不善于白刃格斗，最怕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打遭遇战和夜间战斗。

这些进犯军，都是原西北军的底子，比较有战斗力，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久经训练，在编制装备上火力重于突击。三十军是半机械化部队。这些部队中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爱国分子，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正确判断地形和选择战场

根据敌我态势和地形条件，刘邓首长把战场选择在平汉线东侧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里。这里是多沙地带，不好挖工事，无坚可守，北有滏阳河可挡住敌进路，南有漳河可阻断其退路，可以把敌人的长处转化为短处，使我可以避其长击其短。且我东西有纵深的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的支援，可利用滏阳河、漳河间的横幅地带向敌人实施钳形攻击。

为了准备战场，刘邓首长令平汉线上的太行军区部队于上党战役结束后攻占磁县县城；冀南军区部队在太行区部队的配合下，攻占邯郸；命令陈再道所部迅速回师平汉线，并指令在平汉线上的所有部队统归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以坚强的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洛关、紫山两要点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与此同时，还指令战场附近党政军民大举破路、平沟、拆堡，以便于进行运动战。

集中意志集中兵力

为了准备作战部队便于统一指挥，经军委同意，刘邓首长命令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

三、四纵队。一纵队以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二纵队以陈再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三纵队以陈锡联为司令员，彭涛为政治委员；四纵队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除四纵使用于同蒲路方向作战外，其余均集中使用于平汉路方向。党中央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同志，立刻签署了中央局和军区的指示，对全区各级党委、各军区和各纵队提出了具体要求：“所有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分亲临前线参战”。并指出：“应放松次要方向，应将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因此，除了动员10多万民兵自卫队和人民群众参战和担任战勤工作以外，调集了6万多主力部队用于平汉线上，力争战役的胜利，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晋冀鲁豫区的战略任务。此外，刘邓首长还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结合上党战役的经验，除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外，还发出了战术指示。这次的战术指示共计7条，是根据敌情、地形以及互相行动的相关情况而拟定的。这种预见式的战术指示，使部队在战役、战术上都有了底，打起仗来有办法，更有克敌制胜的把握。具体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于漳河北岸到临漳关段平汉铁路两侧，分路西、路东两军。路西军由杜义德、韦杰指挥所部为右翼队，于蒋军先头到达安用后，除以有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隐蔽集结于漳河北岸彭城山地待机作战；陈锡联、曾绍山指挥所部为中央队，先到武安准备，适时集给于峰峰及其以北山地待机作战；秦基伟、孔庆德指挥所部为左翼队，在肃清临漳关、紫山地区伪军后，集结于邯郸西南地区待机作战。以上各部统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路东军由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指挥所部和兄弟部队共2万余人，先于安阳以东地区肃清伪军残余，待敌人大部进至安阳后，即转移于临漳以西地带待机作战。独立支队，由张廷发指挥所属3个团，在北进敌人的两侧随时给以打击，查明情况，逐次向北转移，于敌占领安阳后，即到丰乐、安阳西侧，箝制北进之敌。

把敌人袋进口袋

10月14日，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指挥第一梯队从新乡出发，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向石家庄方向前进。由于前进中未遇我主力，速度较快。10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北渡漳河，占领岳镇、丰乐镇等处，掩护架桥。但此时，我向心集结的路西军主力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尚在开进途中，二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一部尚在肃清临漳关等伪军据点战斗中，这样，参战的主力中仅路东一纵已经赶到临漳、南东方村地区。为了保障我兵力向心集结，刘邓首长令一纵先行扭击敌人，迟滞其前进。一纵队遂于21日夜，以一部奔袭岳镇，进行运动防御。22日，敌主力开始北渡漳河，我一纵队一部，即与其右翼先锋四十军之一六师接触，让其边打边进。至24日上午，其右前锋被我坚决扼阻于邯郸东南之崔曲、赵庄、南堡一带。敌人发现我兵力大之后，即被迫采取防御，积极构筑工事。这时，他的右翼前锋新八军，已跨溢阳河占领南起马头镇、徐庄，北至阎家浅、屯庄一带，后尾的三十军，也已占领溢阳河东侧的中马头、大小狼营、柳儿营及南豆公以北，与新八军连接。此时，我参战兵团已大部赶到。二纵四、五旅及太行一支队已控制邯

邯郸东南阵地，分三路由北向南，向阎家浅至崔曲一线的敌人反击。一纵主力向突击者的侧后发动反突击，攻势进展得很顺利。四十军和三十军的接合部被我突击成功。一纵二旅已攻占其接合部的赵桓城；一纵三旅正向张辛庄突进；一纵一旅和二纵五旅正向崔曲实施东西钳击。进至南北泊子和沙河口的敌一六师一部已被迫缩回崔曲。二纵六旅已在邯郸以南的南张庄进入阵地。三纵的七、八、九旅，太行五支队、独立支队由北而南地集结于台城镇、车骑关、光禄寺、磁县以西地区。至此，我军对敌已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一纵队的顽强狙击，胜利地完成了钳制敌人于预定战场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此时刘邓首长正在峰峰指挥所围着地图分析敌我态势。显然，敌人已经深陷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两岸的狭窄地区，钻进了我军预设的口袋阵里了。刘司令员兴奋地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猫捕老鼠盘软了再吃

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和战役发展趋势，刘邓首长随即决定：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受挫，以及我后续力量尚未到达前，暂不与敌决战；将敌围困于澄阳河河套的沙漠地带，以局部消灭手段来实现大部消耗，借以争取时间、最后消灭敌之主力。这就是刘邓常用的猫捕老鼠先盘软了再吃的战法。刘邓首长当即要我下达命令，要各路部队本此方针，实施以下四点：一、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与敌人接触，机动集结，选敌弱点，以几路合击一点的向心打法，逐步消灭其个别部队（由一两个排到一连一营，不消耗仗），达到消耗其实力；二、除以地方游击队分头活动外，应分派较多的精干小队（四五十人），携带小炮、掷弹筒等，于夜间挺入敌纵深，突袭其心脏部队，尤其是各个首脑部，使其不得安息；三、敌人可能北渡的桥梁，凡我不能控制时，则破坏之，并扑灭小股出扰之部队，打沉所有船只，堵绝其逃路，使敌完全困于河套之内；四、各部队主力应利用时间休整，注意休息与政治鼓动，研究歼灭敌人的战法。上述四项任务，限定在两三天内积极进行，以争取我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后，全力击灭被围之敌。

歼其一点 再及其余

10月27日，当冀鲁豫独立第四旅、太行第四支队、十七师等三支后续部队赶到战场时，我军新的作战部署已经完成。刘邓首长决定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面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点，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一面加紧对高树勋将军的争取工作。决心变更部署：以一纵、二纵、冀鲁豫军区部队及太行军区一、四支队为北集团，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先割裂四十军在崔曲、阎家浅的先头部队，尔后各个消灭其它部分；以三纵、十七师、太行军区五支队、独立支队为南集团，由陈锡联指挥，积极钳制三十军，隔断他和新八军的联系，主力则由西南向东北兜击，协助北集团消灭四十至。对高树勋部，则围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变化。10月28日晚，我军发起总攻击，在9点钟的时候，一纵队从崔曲村东和村西北同时发起攻击，两个团顺利地突入村内；二纵对阎家浅敌三十九师一个团进行攻击。10月29日拂晓，崔曲敌四十军一六师，已被我歼灭一部，但其主力继续顽抗，敌我伤亡都大，我牺牲团长、团参谋长各1，且我军进展迟缓。阎家浅的敌人一部被歼，其主力越过滏阳河东窜。下午，敌连续向崔曲增援；我北集团也抓住此重点不放。最后，敌不得不从崔曲突围。我一、二纵立即进行追击，并在运动中歼敌1个团。我先后占领崔曲、南堡、赵庄。这样，

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被我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战役的进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0月30日，我北集团继续由北向南压迫敌人，向南北左良、南北文庄的敌人实施攻击，先后攻克村镇20多处。这时，四十军的一六师已大部被歼，三十军也受到了有力的打击，敌进一步收缩阵地。南集团已控制了中马头渡口，争取新八军的工作已取得了成功，高树勋将军就在这一天宣布起义。于是，战役进入了转折点。30日下午，司令部接到南集团的报告，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一些村庄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非常慌乱。邓政委听了报告以后，马上对刘司令员说：“敌人要跑，我们要争取主动。”刘司令员当即走到地图前，提出了歼敌计划：“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军退路的东西两侧，放开退路；二纵从正北面向南压，待敌人脱离筑城地带，给敌人来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指挥机关，割碎其部署体系，以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队三十二军。夺其魁攻其所必退消灭其退者”

30日夜，敌三十军的六十七师退到西玉槽至冢王之线占领掩护阵地后，其主力随即于31日黎明前采取逐村掩护的方法向南突围。当敌人脱离阵地以后，一、三纵队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二纵及冀南军区部队跟踪追击；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至漳河北岸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要道捕歼逃散之敌。一群群向南逃窜之敌，均在我军民跟踪追击、两面截击、迎头堵击和宽面扇击下，予以歼灭。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部近2万人，窜至前后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被我包围，据守村落顽抗。敌三十二军主力，为解马法五之围，向我伸入漳河南岸的独立支队阵地猛攻。我各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有的部队已组织了十来次突击，有一个团的3个营级干部负了伤不肯下火线，战斗空前激烈。“要迅速打开局面。时间紧迫，绝不能让敌三十二军再加上来。”邓政委分析了战斗情况后说。“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不行啊！擒贼先擒王，集中一纵和二纵，先解决马法五的指挥部！”刘司令员强调重点解决问题。部队经过政治动员和调整部署，对马法五的指挥部加强了侦察，黄昏时分开始了总攻击。我们侦知马法五的长官部在前旗杆樟，当即集中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主力一部从北猛攻前旗杆樟；三纵主力从西，二纵主力从北，进攻东西玉槽的三十军之二十七师，冢王地区的敌三十军军部及其三十师、六十七师主力。11月1日夜，我军突入马法五长官部，敌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东西南北各路人马，奋起围追堵截溃逃之敌。第二天向南突围的敌人除少数漏网外，马法五以下大部放下武器。企图增援的三十二军，在遭我阻截部队打击与三十军、四十军被歼后，亦急遽南逃。其由石家庄进至高邑企图策应的三十六军的部队，在我军狙击下，这时也闻风北撤。至此，平汉战役大获全胜。此役，全歼敌2个军，争取1个军起义。我俘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以下官兵23000余人。此次进犯的敌人共45000人，除少数漏网、1万多人起义外，全军覆没。

高树勋起义

发起总攻的10月28日的清晨，到高树勋长官部联络的王定南同志回来向刘邓首长汇报说：高很愿意同我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在这个紧要关头出现这个重要情况，马上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当时邓政委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司令员接着说：“是啊！不能光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啊！”刘邓首长向来重视争取敌军的工

作。他们经常谈到要打退反动派的进攻，一方面要在军事上挫败敌人；另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反内战的统战工作，尤其是要利用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和嫡系的矛盾，和平民主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为此还设立了专门机构，选拔不少得力的干部做这方面的工作，刘邓首长还亲自处理有关的重要问题。记得在上党战役紧张的作战中，刘邓首长，就一再听取高树勋的“座上客”王定南同志的汇报，并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同志同他一道进行争取高树勋的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联系。平汉战役开始后，邓政委又多次布置此项工作。由于有了以往的工作基础，在新形势下又出现了好的动向，邓政委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巧妙地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邓政委对王定南同志说：“高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定南同志，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不断，反受其害。关于高的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刘司令员补充说。王定南同志临行时，邓政委再次强调说：“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10月29日，王定南同志又赶回来汇报了高已决心起义的消息。他说：“我今天见到了高树勋，把刘邓首长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了他，特别是将刘邓首长十分关心高夫人的安全，已电请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军长派人到徐州车站去接她的事告诉了他。当时高激动地说：‘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刘司令员高兴地说：“很好，我们对高完全以兄弟相待。”这时邓政委看了看我，当机立断地对我说：“我看你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刘司令员把话接过来：“对！非常之时，这样做，作用更大呀！”当晚，我就在王定南、靖任秋等同志的陪同下，步行通过三纵队阵地，在高部担任团长的田树青同志的接应下，进入高的指挥部。高见到我，知道刘司令员、邓政委派自己的参谋长做代表来看望他，非常激动。在作了礼节性的寒暄以后，我遵照刘邓的嘱咐鼓励他说：“高先生在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两种前途大搏斗的历史关头，决心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将比当年冯玉祥先生领导五原誓师影响更大，足与董振堂、赵博生二位西北军将领发动的宁都起义相媲美。希望高先生做出比五原誓师更光辉的事业来。”他听了我一席话之后，非常高兴和激动，并向我明确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义。”第二天上午，我回来向刘邓首长汇报，我说谈话经过良好，高的态度已经明朗，答应30日率新八军及附属的地方部队共1万多人起义，并且决定把他的指挥部立即移到马头镇，向我军靠近，双方接通电话。根据这一新情况，刘邓首长对下一步的作战重新作了部署。刘邓分析，高一起义，马法五必感到恐慌和孤立，有可能突围逃跑，故特别注意了歼灭突围之敌的部署。10月31日，刘邓首长商定，由邓政委和我留家指挥部队作战；由刘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偕同新华社、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朱穆之、安岗等同志，亲去马头镇同高树勋将军晤面。会面时，刘司令员对高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刚才来电，对高先生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特地到此代表他们向你和全体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高将军说：“毛先生、朱总司令如此关注我们，真是不胜感激。”刘司令员接着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和平民主生活。现在蒋介石背弃‘双十协定’，

内战危机十分严重。高先生能在此时此地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与人民合作共同为和平民主斗争，乃是国民党所有爱国军人的楷模。不知高先生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高将军说：“我考虑需要给全国发表一个通电。”刘司令员说：“发个通电非常必要，意义很大。”高的通电稿拟成后，当天就由新华社播发了。为了便于高部安全休整和补充棉衣，经双方商定，高部在11月1日离开战区，开往武安县伯延一带。高树勋将军的起义，对我军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果真如邓政委所料，高30日下午宣布起义，马法五第二天拂晓就突围逃跑，第四天（即11月2日）下午即被全歼。党中央对高的起义非常重视，认为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1月2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热诚的贺电：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毛泽东未德戌冬

中共中央任命高树勋将军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3个军。11月10日，高树勋将军在武安县邑城镇举行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毛主席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工作。”“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平汉战役的胜利，是军事、政治并举；打和谈双管齐下所取得的军政双丰收的硕果。1945年12月1日，刘邓首长在总结平汉战役时说：“此次战役，在参战兵力上，调集了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军区的主力达6万余人，并有后方指挥部组织的30余万民兵、群众直接参战与担任后勤，遂造成我军在战力上的绝对优势”，“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加上高树勋毅然反对内战，率新八军全部起义，更促成了战役的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

一年来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工作（摘要）

各位参议员先生：我谨代表刘司令员向边区参议会作一年来
的军事工作报告。去年春，我们边区的参议会，是分别在冀鲁豫、太行、
太岳召开的。当时各军区同志，都作了军事工作报告，所以我这次也就衔接
着去年各军区在参议会上的军事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准备反攻与实施反攻；第二，争
取和平的自卫斗争与对停战命令之执行；第三，复员与整军；第四，对
民主政府的几点要求。

第一，准备反攻与实施反攻。

A. 扩大解放区的战斗活动——准备反攻的实际步骤，就是具

体执行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任务，去年春季后，本军
区各部队及所有人民武装，在执行这一任务上，都尽了极大的努力，普遍进
行了春季攻势与夏季攻势作战，仅是大的战役，就有 34 次。其中如：冀鲁豫
的阳谷战役〔1〕，丰单战役〔2〕，南乐战役〔3〕；冀南的大名战役〔4〕，
南宫战役〔5〕；太行的和辽战役〔6〕与安阳战役〔7〕；太岳的豫北战役〔8〕
与沁源围困战〔9〕等等。这些战役都严重的打击了敌人和伪军，削弱了敌伪
的力量，计毙伤日军 2000 多人，俘日军 200 多人，毙伤伪军 17000 人，俘伪
军 40000 人，伪军反正 10000 人。我们并收复了东平、虞城、丰县、单县、
堂邑、大名、威县、南宫、*本篇是李达同志 1946 年 3 月 21 日在晋冀鲁豫边
区参议会上，代表刘

伯承同志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李达同志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1946 年 4 月 18 日，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的军队》摘要发表。

和顺、辽县、陵川、沁源、安泽、高平、晋城等县城和据点 2850 处以上，
把敌伪军限制在极小的点线范围以内。同时也壮大与锻炼了我们自己，保卫
了各解放区的人力财力，为实施反攻积蓄了雄厚的物质力量。B. 反攻日寇的
战役出击——在日寇投降后，我们执行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全
力出动，组织了各战线上的战役进攻，如在平汉线、津浦线、陇海线，同蒲
线、正大线及道清各线的大的战役出击共计有 105 次。反攻以来，我战役出
击略计：（略）C. 我们斗争的胜利及其由来——总结我们准备反攻与实施反
攻的全部战斗，我们是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具体说来，有如下数目字的
说明：（略）根据这些斗争的胜利，来追溯我们所以获得胜利的由来，有以
下的几个方面：1. 由于毛主席战略指导方针和朱总司令命令的全部正确，由
于我们切实执行了这种方针和命令，在对敌斗争中，我们是遵循着战争发展
的规律前进的，所以也就无往而不胜。这就说明我们应该永远遵循着主席
所指示的道路前进，因为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 由于我
全体指战员政工人员及全体人民武装高度自觉的忠诚努力。他们在战斗中，
为着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了抗击日寇，为了保卫国家人民的利益，是抱着无
限忠诚和自我牺牲的决心的，许多英勇的指战员、政工人员当进入战斗时，
都写好了遗书，交出了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品，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干部及战士，
要求在他光荣牺牲之后，追认他为党员。这在下列的一些伤亡数目字中就可
以看出：春夏攻势至反攻以来我军伤亡数字（不完全）夏季攻势——7000 名
反攻以来——11000 名

总计：18000 名，牺牲占 4/1 强，约 4000 名。自卫作战伤亡数

字还未统计进去。这就说明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真正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在所不惜，也说明我们必须爱护与培养这种人民的军队。

3. 由于全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支援，我们在历次作战中，得到

全解放区人民的支援是极其重大的。为了支援前线，各地人民，常常不惜牺牲自己暂时的利益，来尽心竭力帮助作战。常常总是超过规定动员数额的3倍5倍，而自动奔赴前线，并接连十天半月，毫不疲倦的帮助部队。他们在前线后方，对于一切伤病员的救护和转移，对于战场上粮食的接应和供给，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至于号召参军，则不仅完成计划，而且大大超过。例如在反攻开始时，太岳四分区，在几天内，一下子就有2400多人参军。太行动员多少就来多少，甚至还超过要求的数目。冀鲁豫的鄆城，就是民兵集合起来打下的。冀南在过去敌寇严重分割环境下，本来没有兵团了，但在反攻时，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兵团。因此，这也就直接加强了战斗活力的后备基础，鼓励和增进了军队作战的决心与信心。在历次战斗中，根据我们统计，每次都须有两倍以上的人民配合军队行动。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的胜利便不可能取得，这就说明军队必须依靠人民。那种不要人民，以人民为剥削和压迫对象的专制军阀办法，必须坚决反对和改革。而由人民支援战争的实例，也看到我们的民主政府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军队人力物力的保证，尽到了一切可能的责任，实是我们应当深刻感谢的！

第二，争取和平的自卫斗争和对停战命令之执行。

A. 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制造内战，威胁和平的阴谋活动——这

里先要说到法西斯分子制造内战的阴谋活动：抗战八年中，全国人民所受到的灾害与痛苦是非常惨重的。在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结束时，无疑的是应全国一致立即进行和平建设，以苏民困而复国家的元气。但国内法西斯分子，则于日寇伪军还未解除武装的时候，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内战巨浪，而本区就首当其冲。除了阎锡山先以大军攻夺我上党区外，国民党大军更沿平汉、同蒲路北进，他们借口受降，实际上却是按照“剿共”计划南北夹击，企图消灭我军。平汉线进犯的反动派军队，还在黄河南岸就大批颁发《剿匪手本》，命令与鼓励他们进行内战。马法五、高树勋等将领在北进途中，都接到了胡宗南转发的《剿共密令》，叫他们“速予剿除奸匪”，叫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并规定“有功的赏，迟滞者罪”——企图到我坚持八年抗战的解放区来收复失地。在陇海、津浦线方面，亦复战云密布。此外，反动派并勾结与指使各地日伪军，不仅坚决拒降，而且由各地向我不断犯扰，继续其残害中国人民的禽兽行为；致使和平民主之道路有被全部遮断之危险。抗战以来，我解放区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有被夺去的危险。B. 我们争取和平的自卫斗争——我们是酷爱和平，忠实于民主团结事业的。但当此和平民主局面濒于危机的地步，人民力量将被摧残的地步，我们便不能，也不应该不起来为消除内战危机而自卫。于是就在当时，发生了两次较大的争取和平的自卫战争。由于全解放区军民的一致努力，特别是高树勋将军的率部退出内战，我们是胜利了。虽然我们也曾受到不少的损失，例如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进攻本区及在自卫战争中所受损失，计：被占县城23座，损失人口300多万，损失土地25000平方公里，人民死亡35800，被吊打者170万人，被奸淫妇女13000人。但我们终于击退了战争挑拨者的进攻，配合了国际国内和平民主运动的洪流，使战争得以停止，和平得以实现。C. 我们忠实的执行了停战命令——政治协

商会议获得完满的成功。停战命令颁布了，我们便忠实坚决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刘司令员接到停战命令后，当即彻夜不眠的在前线上亲自以电话指挥各部，限令一律遵照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即对不法拒降的日伪军，亦为了维持停战命令之尊严，也于同一时间内停止了攻击行动。在同蒲路方面，我军因此并忍痛将已攻入曲沃城内之大军于1月13日午夜以前全部撤出。在豫北方面，国民党九十军于1月14日违约渡河，攻占我孟县城及其以西地区。但我除在自卫原则下收复孟县城以外，对盘踞孟县城以西地区之该军，则坚持政治交涉。直至现在仍持此态度。有些孤立于我解放区内部之伪军，在停战命令颁布后，还拒绝执行命令，继续其不法行动，而我军则仍隐忍宽大，不予计较。最近一时期内，国民党之内战挑拨者到处挑衅，制造借口，而我军则一本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之原则，从未主动先发过一枪。这就证明：谁是忠实执行了停战命令？谁是污辱了这个命令的尊严，而千方百计，企图撕毁，以便重新发动内战？这就是我全国人民应即予以严重警惕和注意的。

D. 全解放区人民在反对内战中的作用——这里要特别提出

的，就是全解放区的人民，在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问题。在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全部斗争过程中，我们认为全解放区的人民，是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的。因为人民饱受了八年战争的摧残和过去内战的惨痛教训，深知战争灾害之必须消除，才能求得继续生活下去。因之就根据他们八年抗日战争的经验与锻炼出来的力量，尽力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许多地方的人民，不惜牺牲，坚持支援与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这种例子，真是不可胜数，如在乎汉自卫战役中，全区人民参战的就达10万余人，他们有的还是从一两百里以外赶来参加，自战争开始，直至战争结束，他们始终是情绪激昂，毫不厌倦，特别是许多小学生和农村妇救会的同志，他们成群结队的到前方医院来照顾伤员，夜以继日，喂汤洗伤，差不多继续了一月有余，真比家人父子兄弟姐妹还亲切、耐心，使得许多伤病员都感激流泪，由于这种伟大的人民力量的作用，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才能胜利的成功。因此我们认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国际压力与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固是决定的因素，但如果没有全解放区人民的一致斗争，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足够估计到这点。目前和平民主的基础是奠定了，但无疑的前途尚有许多曲折与坎坷。隐藏在国内的日本法西斯走狗们，还在大力挑拨内战，我们必须培植人民的力量，发挥这种作用，作为保障永久和平民主的后盾。第三，复员与整军。A. 关于复员——在停战命令颁布后，我们认为和平基础开始奠定，人民负担必须立即减轻，当时即主动的进行了初步的复员工作。一方面把正在动员补充军队的几万新战士限令一律回家，同时并将原有部队复员一部，截至现在为止，总计全区，共复员75000人。现在仍在继续复员。拟于短期内再行复员75000人，连前共为15万人。此外，则在全军布置了生产运动的组织，计划全年全军自给15%至25%的物质供应，以减轻人民的负担。B. 关于整军——三人委员会确定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公布后，我们即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立即商定执行这一方案的具体工作。拟定了本区部队，按照整编方案，组成国防军和地方性的保安队，其他编余人员，则进行复员和转入生产与其他社会职业。对于在战争中有功的荣誉军人及阵亡的士兵的家属，则正商请政府给以妥善的安置和抚恤。凡此工作，务期提早付诸实施，按期完成。总之，我们保证无论

如何，要百分之百的执行这一基本方案，成为实现全国整编军队的榜样。C. 建设人民的军队为保卫持久和平民主而努力——在复员整军实施之后，我们即拟从各方面训练我们的军队，提高它的素质，加强近代化的军队技术。更要从思想上、纪律上锻炼其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我们认为，军队必须国家化，必须属于人民。我们这支军队，过去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今后也必须而且一定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坚定不移的为人民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服务，为保卫持久和平民主而努力！第四，对民主政府的几点请求。1. 请求民主政府领导人民检查我们军队的工作，监察我们的纪律，使之在任何情况下，不失其为国家军队和人民军队的素质。如发现军队及个别人员，有侵犯群众利益、违犯政府法令事情者，请即依法处理，决勿姑宽。2. 请求民主政府，监督我们复员整军工作的实施，使其确遵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如期向国家化的目标迈进！3. 请求民主政府，妥善安置荣退及在乡军人，对殉国烈士予以表彰，对阵亡将士的家属，给以应有的优待，从社会地位与舆论上提高军人地位。使现有军队能毫无顾虑的为保卫国家民族，保卫和平民主而献身。最后，敬请全体参议员先生和我们的人民代表机关来审查我们的军事工作，并给以批评和指示。注 释〔1〕阳谷战役：1945年7月下旬，冀鲁豫军区集中4个军分区的部队在山东省西部地区发动攻势，攻克阳谷县城、堂邑县城，毙俘伪军团长以下2300人。〔2〕丰单战役：1945年7月上旬，冀鲁豫军区以第十和第十一军分区主力，在微山湖以西地区展开攻势，先后攻克丰县、单县、虞县3座县城，歼灭日伪军1600余人。〔3〕南乐战役：1945年4月下旬，冀鲁豫军区集中4个军分区的部队攻克河南省东北端的南乐县城，及外围据点32处，并击退了安阳等处来援之敌。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解放了卫河以东的大片地区。〔4〕大名战役：1945年1月16日，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里应外合手段，一举攻克河北省东南端的大名县城，击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坤，歼灭日军1个小队，俘日伪军400多名。〔5〕南宫战役：1945年6月中旬，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河北省南部的南宫发起攻势，拔除了艾辛庄、东汪、东陈等据点，收复了南宫、新河两座县城，歼灭伪军暂编八师二十二团等部900多人。〔6〕和辽战役：1945年4月，太行军区部队向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日伪军孤立据点发起攻击，攻克和顺县城、辽县（今左权）县城和马坊镇，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7〕安阳战役：太行军区1945年6、7月间在河南安阳一带发动的战役，详见前文《谈安阳战役经过》。〔8〕豫北战役：1945年4月4日，太岳军区集中第二、第四军分区近4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在河南省北部的沁阳、孟县、济源地区发动攻势，经近1个月激战，攻克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2800多人，并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反正。因太行军区部队1945年1月下旬发动的道清战役又称豫北战役，故太岳军区发动的豫北战役也称为“第二次豫北战役”。〔9〕沁源围困战：沁源地处太岳根据地的腹心。1942年10月，日军“扫荡”太岳根据地时，留下第六十九师团两个大队据守沁源和周围据点。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遂决定长期围困敌人，以军区第三十八团为骨干，结合县区基干队和民兵组成13个游击集团，将敌人围困于沁源城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西山头上。1945年4月11日，被围日军因粮弹水源断绝，在沁县日伪军1000人接应下弃城逃窜。在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中，日伪军共伤亡4000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此战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

三破邯郸梦三出陇海线*

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们取得了歼敌 120 万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大大削弱了敌军，打击了蒋介石的疯狂气焰；锻炼和壮大了我军，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地区，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基础。

在这期间，处于战线中央的晋冀鲁豫区，在上党战役之后，即分东西两个战场作战。其西战场由陈质同志率领太岳部队在同蒲路方面作战，东战场则由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亲自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平汉线方面和冀鲁豫战场作战。在东战场，我军胜利地进行了平汉、陇海、定陶、巨野、鄆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战役，以及豫北反攻作战和鲁西南战役等 10 次战役，其中平汉战役和鲁西南战役，是承前启后的两次重要战役。这些作战，呈现出我军三次打破蒋介石的邯郸梦、三出陇海线的错综景象，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给予的战略任务，值得我们回味。

一破邯郸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和平谈判的掩护下，积极向解放区进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遵循党中央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对国民党军的进犯，坚决予以反击，发起了上党战役，全歼侵入上党之敌 13 个师，有力地配*本篇写于 1981 年，发表于《军事学术》1982 年增刊第 1 期。合了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以这个协定作掩护，扩大进攻规模，其首要目标是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北平、天津，夺取东北。到 10 月中旬，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三、第十六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一军进到闻喜以南；孙连仲的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等 4 万多人，在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其后续部队 4 个军正向新乡开进；沿津浦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其先头 1 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傅作义部则沿平绥路东犯，已迫近张家口。刘伯承同志当时说：敌人沿五条铁路向我们进犯，就象五个爪子向我们伸来。这五条铁路中的三条南北干线——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有两条半在晋冀鲁豫区，其中平汉路贯穿在晋冀鲁豫区的中央。这四路进攻的敌人中，平汉线的一路是主力。它企图占领战略要地晋冀鲁豫区首府邯郸，打通战略要线平汉路的安阳、石家庄段，这是蒋介石做的第一个邯郸梦。邯郸正是唐朝文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中所描写的卢生枕着吕翁借给他的枕头大做黄粱美梦的地方。邯郸北面有个小车站，就起名为“黄粱梦”，至今在它附近还保存着一个供奉吕翁和卢生的庙。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除以太岳部队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外，必须集中力量，歼击沿平汉线北犯的敌人。并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指示我们要利用上党战役经验，动员太行、冀南、冀鲁豫区全部力量，首长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争取第二个重大战役的胜利。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同志，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以及本区的具体情况，一再严肃地指示各区党委、各军区、各纵队：“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分亲临前线参战。”“应将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加强平汉作战。集中意志，集

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同时指示部队：“平汉战役关系全局，为了继续持久作战，各个消灭敌人，抑留更多敌人于平汉线，完成晋冀鲁豫战略区的历史任务，我们务必：（甲）除已计划加入平汉作战者外，必须继续集中兵力到平汉线，放松次要方向，集中于决战方向；（乙）加紧动员新兵补充主力兵团（首先补充野战纵队），保证继续作战。”

为了部署平汉作战，刘邓首长提早上党前线回到司令部，作

出如下部署：立刻把陈再道的二纵从上党战场东调，与一纵、冀南军区部队会合，在平汉线占领必需的要点以准备战场；连夜起草《关于平汉战役战术上某些问题的指示》，下达基本作战命令；指挥部东进到武安南的和村，然后进到峰峰。刘邓首长对平汉战役这样全神贯注，组织党政军民全力以赴，这样谨慎从事，这是保证一个影响全局的大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这次战役，开始采取了象猫抓老鼠那样，把老鼠盘软了再吃的

战法。刘邓首长指示部队：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挫折，我后续力量尚未到达前，暂不与敌决战。先将敌围困于滏阳河河套沙漠地带，以局部消灭手段实现大部消耗，借此争取时间最后消灭敌人之主力。各部队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以3/1的兵力，不断与敌接触，机动集结，选敌弱点，以几路合击一点的向心打法，逐步歼灭了其个别部队，达到了消耗其实力的目的。除地方游击队分头活动外，还分派了许多精干小分队（四五十人），携带小炮、掷弹筒等，于夜间插入敌人纵深，突袭其心脏部队，尤其是各个首脑部，使其不得安息。敌人可能北渡的桥梁，凡我不能控制时则全部破坏。对于敌人小股出扰的部队，积极加以捕灭，堵绝其逃路，使敌完全困于河套之内。最后用合围钳形攻势的战法，不断把敌人分割成块，各个歼灭。这样，终于把敌人全歼在预设的战场里。

这次战役的胜利，还得助于争取了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

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举行战场起义。在实施上党战役之初，刘邓首长就亲自接待过高树勋将军派来联系的人。在这次战役中，又派我通过火线进入高树勋将军指挥部进行联系，促使高树勋将军迅速起义，加速了平汉战役的胜利。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先后促成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在军事上促成了晋冀鲁豫我军战略上的转变——从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建立了一支能够打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次蒋介石派了两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3个军零1个纵队在其他各路进犯军配合下，沿平汉线大举进攻，但他们不仅没有到达邯郸，反而2个军全军覆没，1个军零1个纵队举行战场起义，蒋介石的第一个邯郸梦就这样破灭了。

一出陇海线

在经过半年短暂的、不完全的和平之后，1946年6月，蒋介石为了掀起全面内战，以重兵围攻中原我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对我苏北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刘邓首长奉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8月间在陇海线汴（开封）徐（州）段实施自卫反击，发起陇海战役，这就是一出陇海线。在陇海路北侧横列一条反动武装势力地带，自考城以东到虞城县北部一段，纵深六七十里，到处是敌人的据点、封锁沟、封锁墙，由反动武装守备。刘邓首长的打法，是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监视铁路北侧之长垣、考城（右路军开进道路）和虞城（左路军开进道路）等地敌人先锋据点，根本不理其它大多数据点，我左右两路大军即于8月10日夜，以急行军秘密通

过敌人密布据点 60 里纵深的地区，在 300 里的宽正面上，突然向陇海路汴徐段沿线之敌发起总攻。刘伯承司令员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时指出：“当打开突破口的时候，各路的第一梯队，不为敌人的战斗警戒所迷惑，主要是乘破竹之势，直透敌人心脏，割裂、撕毁敌人的防御体系，使其互不联系，断绝生命；而第二梯队则在突破口左右卷击而扩大之，掩护主力之进入。至于残留侧背之敌，则由第二梯队肃清之，如此则可获全胜。”陇海战役“如果我们顾虑残留在我们侧背的考城和吕园子等处之敌，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要想进到陇海路”。这次作战，是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毛主席在 9 月 16 日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并举了“8 月 10 日至 8 月 21 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作为例子之一。陇海战役的胜利，就是因为大踏步透入敌纵深而收到了奇袭制胜的效果。一出陇海线，战略上有两个目的。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个目的以外，还有一个目的，按邓小平政委的通俗说法，就是“探路”。也就是预见必将到来的战略进攻任务，事先以战役行动实际探明陇海路一带及新黄河以东以北的地形、敌情、民情，并准备加强新黄河以东即后来的豫皖苏军区的工作，建立前进阵地。陇海战役攻克兰封、砀山、杞县、通许、虞城等 5 城及 12 个车站，毙伤俘敌人 13600 余人，缴获敌人大批物资。当时大家注意到的只是陇海战役的战果和眼前的战略作用，而对将来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则是不易看出的。

二破邯郸梦

陇海战役之后，敌人迅速在郑州、徐州之线，集中了 14 个整编师〔1〕32 个旅共 30 万人之众，于 1946 年 8 月 28 日开始对我冀鲁豫区疯狂进犯。企图以优势兵力，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刚结束陇海作战处于疲惫状态的时机，迫我连续作战，钳击歼灭我主力于陇海路以北的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水归入故道〔2〕，分割解放区，确掌鲁西南，然后以主力进出漳河，占领邯郸一带，打通平汉路安阳、石家庄线。蒋介石又想重温已破灭的邯郸梦。敌军分别在郑州、徐州两绥署指挥之下，分 6 路向我进犯。刘邓首长决心以少数兵力箝制徐州方面各路敌人和郑州方面的两路敌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郑州方面的整编第三师，然后扩大战果再及其余。对整编第三师又首先采取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在决战之前，消耗了它大量兵员和弹药，然后一个旅一个旅地歼灭该师，把战斗的胜利，发展成为战役的胜利，把进攻发展成为追击，在追击中又歼灭了另两个旅。毛主席曾把定陶战役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他指出：“我刘邓军在定陶附近，9 月 3 日至 9 月 6 日歼敌一个旅，9 月 6 日下午又歼敌一个旅，9 月 7 日至 9 月 8 日又歼敌两个旅”；一共歼敌 4 个旅。这一巨大的胜利，使蒋介石“占领邯郸，打通平汉线”的美梦还没入梦就告吹了。《解放日报》9 月 12 日发表的社论《蒋军必败》，对这次战役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继续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定陶战役胜利之后，刘邓首长又率主力举行巨野战役，转而打击东路的敌美械化的五军和整编十一师。10 月 3 日至 7 日，在张凤集歼敌整编十一师 3000 多人，在龙堙集地区运动防御战中，歼灭敌五军 2000 余人。

这就是龙凤之战。但是这次作战的缺点是没有大踏步的机动，而陷入牛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所以没有在机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刘邓首长及时地总结了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10月11日，已经侵占我许多城市的敌人又侵占了我张家口。蒋介石当天就下令召开分裂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声称5个月内打垮我人民解放军。11月15日，伪国民大会开场。蒋介石还下了密令，限令王敬久、王仲廉两集团东西对进，进攻晋冀鲁豫区，于11月内打通平汉线，以配合伪国大的召开。在这期间，刘邓首长号召部队打几个胜仗来打击伪国大的召开。10月、11月刘邓首长接连指挥我们实施了鄆南、濮滑两个战役。10月中旬，敌三路大军北犯。敌王敬久指挥五军和三个整编师，由红沙窝、金乡之线进犯巨野、嘉祥、郓城。刘汝明部2个师由菏泽进犯鄆城，孙震集团的2个师由滑县地区进犯濮阳。这时刘邓采取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的打法，以七纵队结合地方武装在鄆城西南地区拆围墙、平水沟以准备战场，佯言与王敬久的五军决战，以迷惑与箝制强敌王敬久部。刘邓首长则率主力二、三、六等三个纵队，由鄆城、巨野之线以西地区突然秘密地向濮阳地区开进，准备寻机歼灭进犯濮阳之孙震集团。当我进至鄆城东北地区时，发现一个新情况，敌刘汝明部1个旅零1个团附1个榴炮营、1个山炮营，由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统一指挥，从菏泽向鄆城冒进。刘邓首长当机立断，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捕歼这路既弱而又孤立的敌人。29日至31日的3天内，歼灭了9000余敌人，生俘敌旅长刘广信，缴获榴弹炮8门、山炮7门，我们用这些武器和炮兵，建立了一个炮兵团。同时我二纵1个团和冀南、冀鲁豫军区各1个团，于10月22日，在白道口以伏击战歼灭了由滑县东犯的敌人四十一师1个团。白道口战斗的规模不大，但此战的战法有典型意义，因此获得了军委通令全军表扬。通令指出：“他们这次机动于宽大的战场，以极迅速捕捉的伏击，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这完全执行与符合了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指示的精神。”鄆南战役后，敌刘汝明集团5个旅于东明、菏泽及其以南地区守备；孙震集团5个旅于平汉、陇海路间的浚县、滑县、封丘、长垣地区守备；王敬久集团集结于鄆城、郓城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经濮县向大名进犯；豫北的王仲廉集团其主力八十五师到达安阳，也准备向大名进犯，企图两军会合于大名，把矛头直指邢台，然后与由石家庄南伸到元氏的孙连仲集团会师，回头再取晋冀鲁豫首府邯郸，打通平汉路安阳、元氏段。

11月2日，刘邓首长接毛主席指示：“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

刘邓首长决定抑留与阻止王敬久集团与刘汝明集团，而集中力量进击孙震集团。即以七纵、六纵1个小团、二纵1个团配合军区武装进行广泛的游击活动，大踏步地辗转袭击敌人，截敌辎重，破敌交通、通信线，捕灭可能捕灭之敌，以箝制王敬久、刘汝明两集团。刘邓首长则率二、三、六纵主力，实行对孙震集团作战。15日星夜，我军开始由濮县附近及鄆城以北地区秘密西移，撇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管，以猛虎掏心之战法，从一一四旅、一二五旅、河北保安十二纵队三个敌人的接合部进入其纵深，分解割裂，先击其首脑部。19日拂晓前我军出敌不意，发起钳击强攻，至黄昏即将朱楼地区河北保安十二纵队完全解决，俘敌纵队长何冠三。入夜，我军进攻邵耳寨与上官村，20日拂晓克邵耳寨，中午再克上官村，歼敌一一四旅、一二五旅共12000人。

鄆南、濮滑两战役的胜利，再次打破了蒋介石的“邯郸梦”。

刘伯承同志关于濮阳、滑县之战对记者的谈话，劈头就指出：

“企图于11月内打通平汉线之蒋军，已完全丧失主动；陇海线蒋军攻势亦已达到顶点，无能力继续展开。”“此次缴获之文件中，有蒋介石之密令，限令王敬久、王仲廉两人东西并进，于11月内打通平汉线。王敬久经菏泽、郓城、鄆城、濮阳、清丰至大名，王仲廉经林县、六河沟、安阳、临漳至大名，然后直趋邢台，与孙连仲会师，回头再取邯郸，企图打通平汉线。这样绕弯转路而不直取邯郸，真是煞费苦心，此乃企图出我不意，诱我上当。但10月底鄆城之战与此次濮阳、滑县之战，蒋军损失4个旅之后，此种狡计已被完全粉碎。”

11月和12月，刘司令员在《论蒋军的致命弱点》和《再论蒋军

致命弱点》的两次谈话中总结说：“蒋介石的致命弱点，是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无论哪一个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但他要卖国、独裁，就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五军、第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不得不拿来守备。”“蒋军以现存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为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同时还指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

这就是在蒋介石以30万军队换取了张家口等105座空城而

大肆鼓噪的时候，刘伯承同志用事实告诉根据地人民，毛主席的“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终归要胜利的；同时也警告了蒋介石不要高兴得太早，象袁世凯召开“筹安会”那样召开独裁的国民大会，其结果必然是步袁世凯之后尘而注定要失败的。

三破“邯郸梦”

二破“邯郸梦”之后，蒋介石调兵遣将，命令郑州绥署顾祝同寻

我主力决战，妄图继续实现其攻占邯郸、邢台，打通平汉路的黄粱美梦。刘邓首长奉中央军委毛主席之命，率野战军主力挥师向东南，在徐州西北地域作战，调动敌人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和苏北的作战。决定于12月25日以后以主力攻奔济宁、嘉祥、巨野、成武、金乡、鱼台、单县等城，造成钳击徐州的态势，以威胁敌战略要点徐州和战略要线陇海路，调动王敬久部而打击之。在刘邓首长指挥下，我野战军主力发起了巨（野）金（乡）鱼（台）成（武）地区战役，以“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的战法，歼敌26400余人，恢复县城9座，既有力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北歼敌5万余人的峰（县）枣（庄）战役与苏北作战，又严重地威胁了敌人控制的战略要点徐州与陇海路的安全，使妄图北犯邢台、邯郸的敌人不得不停滞于大名、南乐地区并被迫抽兵回援陇海路。我军钳击徐州，使蒋介石占领邯郸的黄粱美梦变为噩梦。被这个噩梦笼罩着的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长官薛岳，搞得六神无主，到底增援哪一方面，难以定下决心，只好长时间各就各地挺起挨打的架势无所作为。后来薛岳为挽救徐州危局计，令整编二十七军放弃刚刚占领的濮县、范县和观城，以便回援陇海，经汲县抵商丘集结；第五军亦集结清丰，其先头一个

师和一个交警总队开汤阴候车南运。“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是刘伯承同志常说的，也是常用的战法。这次南下徐州西北地域作战，不管敌人如何攻陷濮县、范县、观城、大名、南乐等地，佯渡旧黄河，威胁我后方，逼我回顾，刘邓首长仍坚持敌进我进，采用抽薪止沸的战法，使敌人欲进占邯郸、打通平汉线的黄梁美梦第三次破灭，不得不将其主力回援陇海路以解救其徐州、陇海路之危局。而我则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了敌人，稳稳地掌握了主动权。

二出陇海线

为了进一步发展战局，配合华东作战，刘邓首长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统率主力二出陇海，举行豫皖边战役。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一、二、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由邓小平政委率领六、七纵队结合豫皖苏军区武装为路南作战集团。战役自1947年1月24日开始，至2月4日止。路北作战集团连续攻克定陶、单县、曹县等城，并控制和破坏民权、商丘之间的铁路70里，炸翻敌装甲列车一列。路南作战集团连克柘城、大康、鹿邑、杞县及皖北重镇亳县等5城，歼敌16000余人。

我军在陇海路南北的巨大胜利，大大地威胁和震撼了敌人。敌

人被迫急调进占南乐、大名等地的五军、八十五师，以及武汉地区的七十二师驰援陇海路，连同先行到达的七十五师，企图击破我军攻势，尔后参加“鲁南会战”。这时，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刘邓首长，要拖住王敬久主力，不使东去。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作战，调动敌五军、七十五师回援而破坏其东进计划，2月21日夜，我陇海路南北两集团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向民权以西之郑庄寨地区的吴绍周八十五师发起进攻，二纵十六团，英勇果敢地一举突入敌人八十五师师部。但是，由于仓促投入战斗，侦察、通信和协同动作没有搞好，后续部队没有跟上，致使十六团孤军奋战蒙受重大损失。为摆脱被动，刘邓首长立即指挥部队撤出战斗，主力向北往老黄河边撤退。我们采用运动防御战术把王敬久集团主力吸引到冀鲁豫腹地，打破了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的计划，配合了我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我主力于2月底北渡黄河（蒋介石已经提前在花园口堵口，把黄河水引入故道）休整待机。

二出陇海线，按照邓小平政委的说法，是二次探路，探明将来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路。

三出陇海线

1947年2月，蒋介石在战略上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置

重点于山东、陕北两处。而在其战线的中央，面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则依托黄河，构成黄河防线。中央军委统一的战略计划是，在敌人转入防御的方面，我军则转入反攻。刘邓首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地由东向西，发起豫北反攻作战；陈赓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发起晋南反攻作战。豫北我军自3月23日起发起进攻，在接连攻克延津、阳武、封丘后，向北扩张战果，至5月28日止，又攻克淇县、浚县、滑县、汤阴等城，歼敌45000余人。晋南我军于4月4日发动进攻，至5月4日连克曲沃、新绛、永济等22座县城和黄河渡口的禹门口、风陵渡要点，歼敌18000余人。3至5月间在豫北和晋南同蒲路两侧所展开的攻势，是我军实施战略上的中央突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奏，毛主席指出，晋南、豫北反攻，是“战略性的反攻”。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首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作为中央突破的战略突击队，突破了敌黄河防线，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

军渡过黄河后所进行的鲁西南战役，歼敌 9 个半旅 4 个师部共 56000 余人。原来亲临开封指挥的蒋介石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羊山战斗结束前，虽然其 3 个整编师被歼，1 个师长和 2 个副师长被俘，但仍然不眼输，认为我军打不下羊山。7 月 28 日，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羊山战斗”胜利结束，我军歼敌内战先锋六十六师，并活捉了师长宋瑞珂，从而完满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鲁西南战役胜利之后，我军即于 8 月上旬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出陇海线，义无反顾地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这次出陇海，按阶段的划分来说，属于战略进攻阶段了。刘伯承同志在总结从一破邯郸梦到三出陇海线的 10 次战役的军事指挥时，认为基本上是机动作战的。只是在龙垵集、张凤集地区实施的巨野战役（龙凤之战），虽然我们敢于摸了摸全美械化的敌五军、整十一师，并取得了胜利，但从指挥上来检讨，这一战役则“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而其余 9 个战役都是在机动中歼灭敌人的。刘伯承同志认为，我们是以弱胜强，集中兵力吃敌一块，因此特别需要机动。我军在冀鲁豫战场就是在大步的进退中消灭敌人的。一破邯郸梦之后，我军大步前进，一出陇海线，取得了陇海战役的胜利；接着又大步后退，在内线作战，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在检讨了巨野战役的“牛抵角笨拙状态”以后，随即又大步后退，调动敌人并回马一枪，取得了鄆南战役的胜利；后来又大步后退以休整部队，然后再大步前进，以猛虎掏心之势取得了滑县战役的胜利，并二破蒋介石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的梦想。二破邯郸梦后，我军转入待机位置休整，接着又向徐州西北部大步前进，与华东野战军配合造成钳击徐州的战略态势，调动了敌人，取得了巨金鱼战役的胜利，第三次打破蒋介石的邯郸梦；随即我军乘破竹之势，再大步前进，二出陇海线，取得了豫皖边作战的胜利；接着我军又大步后退，以箝制敌军主力，支援华东作战，赢得了以利再战的休整时间；然后又向河南北部大步前进，取得了豫北反攻作战的胜利。最后由豫北向鲁西南地区大步前进，突破黄河天险，取得了鲁西南战役胜利，并立即三出陇海线。从此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了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军就是用这样的机动作战，大步地进退，才得以粉碎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成批轮番地向我进攻的阴谋。注 释〔1〕整编师：自 1946 年 5 月起，驻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整编，将原来的军改为师，师下增设旅，旅下设团。军整编为师后，称整编师，整编师的兵力与原来的军相等。〔2〕黄河故道，又称旧黄河、废黄河、淤黄河。原为金代明昌年间黄河夺淮入海河道，从河南兰考向东，经江苏北部徐州、淮阴等地入黄海。清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河北徙至山东入渤海后，大部分河道干涸。

在训练科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首先，谈谈对到会同志的期望。这一个时期各训练部门负责人同志作了相当努力，特别是几个支队有显著成绩，如漳河支队〔1〕成立训练集团；晋东支队〔2〕代全区办了工、炮、兵干训队和本区营团干部轮训队；运河支队〔3〕从前在训练工作上基础较差，最近有新的建树。军区训练科长田牧同志前一时期亲自下去跑，讲课。许光之同志在工作上已建立了初步的威信，首长对他十分信赖。这都是值得特别指出的。如果大家都努力，军事训练工作会作出成绩，能在部队里创造出威信，而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也会因之真正提高的。训练部门的同志，如果在干部或战士中建立起威信，事情就好作多了。要建立威信，就首先要要在技术上继续提高自己。昨天的实弹射击，就是为了鼓励大家自己干。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先不谈大的东西（如兵团战术等）。个别同志，对技术不及对战术兴趣高，形成对自己本身这一行不熟练，这样就不能提高威信。就是在部队的将来，继续提高技术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和平经过斗争后真正实现了，部队主要就是训练，其次是生产。苏联红军经过长期训练才拿到前线。美国军队能拿得出来，是由于马歇尔尽了很大力量训练。所有这些，说明军队训练很重要。军队不能只打不练，指挥员不会教育，就谈不上完善的指挥。*这是李达同志 1946 年 6 月在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训练科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 1946 年 6 月 14 日《人民的军队》。我们现在是过渡时期，将来部队的训练靠指挥员。班长以上的指挥员，都要能单独自己干。怎样向这个方向前进，首先要求我们训练工作者建立威信，首先从本身技术着手，不是空谈空喊。

第二，关于训练问题。

我们从 3 月起开始练兵，当时要为和平民主阶段的斗争作思

想准备，所以着重政治整训，在当时条件下应当如此。现在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更加逼得紧，我们目前的政治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力量，时刻准备自卫作战。所以提出新的练兵热潮。首先要技术基础打好，搞技术动作，也要搞实际的，如村落战、夜战、守城等，而且要多练，光说是说不通的。总的方向就是这些。其次是怎样实施，军区作出基准表。部队以团为单位，按 3 个月的标准，任务加速实施，能争取训练两个月算两个月，争取到一个月算一个月。如不能集中训练，就轮番实施，基本上要以不妨碍自卫斗争与作战准备为原则。练兵必须与实际任务相结合，内容要针对当前进攻者的特点，真的战斗与演习相结合，不要以为战斗任务会妨碍练兵。

第三，训练中的政治工作。

在练兵中，是要加强保卫人民利益的决心，认清反动派面目。

政治活动完全贯串到训练中去。政治人员参加练兵，这本身就是很好的政治工作。光说无用，只有政工人员投入练兵热潮，才能真正起到最大的保证作用。也只有参加实际运动，才能体贴运动的味道，说话就不会无的放矢。

第四，练兵的物质保证。

对练兵中教材、器材、给养等问题，军区尽量想办法，但不能因为练兵加重人民负担。各级不要光等上级想办法，要各自在现有条件下去想办法，想不到好办法就想穷办法。

注 释

〔1〕漳河支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三纵队。〔2〕晋东支队，指晋

冀鲁豫野战军的第四纵队。〔3〕运河支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回顾定陶战役*

定陶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全国解放战争初期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一个成功的战例。当时我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协助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指挥了这一战役。

一、战前的敌我态势

陇海战役结束的当天，即194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即致电祝贺我野战军在陇海战役歼敌2个师的伟大胜利。并指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要我野战军集中主力至少18个团于陇海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在作战中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要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的轻敌观念。8月25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刘邓首长，强调指出，在战前，应充实至少18个到20个主力团，每团人数2000人至2500人，经常保证满员，作为突击力量，勿取平均主义〔1〕。

中央军委这两份电报，非常明确、具体地向我野战军提出了集

*本篇是李达同志1984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的回忆史料。

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要求。我野战军进行的定陶战役就是遵循这一行之有效的战法，打了一个大胜仗。当时，由于我军在陇海路汴（开封）徐（州）段实施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打乱了南线国民党军进攻的部署，迫使其从陕南、豫西尾追我中原解放军的部队中抽调了3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等地抽调了1个军、2个整编师，一起投入冀鲁豫战场，连同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邱地区的7个整编师，达到了14个整编师32个旅约30万人。至8月下旬，上述国民党军已集结于郑州、新乡、开封、商邱、砀山一线，企图乘我野战军主力未及休整之际，钳击我野战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水改入故道，控制山东西南部，然后以其主力进击漳河，打通平汉铁路线。其具体部署是：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第八十八师等部共5个旅，分3路由徐州、砀山之线向单县、成武、鱼台地区进攻；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第五绥靖区孙震的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全部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的整编第五十五师、第六十八师各1个旅和暂编第四纵队的3个团，共10个旅，由封丘、开封、考城、商邱一线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攻，形成钳击我军之势。另以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在平汉线安阳至新乡段佯动，配合主战场的进攻。此外，还有地方团队、还乡团、倒算队和伪政权人员随军前进。进攻之敌的兵力、人力和装备，与我军相比均属优势。这时，正是我野战军主力刚刚经过20多天的（陇海战役）行军作战，伤亡5000余人，亟需休整和补充的时候。我野战军所处的这种状况，蒋介石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已有所了解。比如，蒋介石于8月29日饬令薛岳、刘峙的电报就曾称：“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徐、郑两绥署各部必须予以彻底歼灭。续向3日指定之线推进，以绝匪患而利今后作战，并限7日内完成。”尽管他作出了我野战军是由于伤亡过重而溃退的错误判断，但他毕竟抓住了我减员很大，

兵力、弹药未及补充的弱点，而以 30 万重兵“围剿”我野战军，确实给我们迎击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对敌情的周密分析

在强大的敌军面前，刘邓首长极其冷静。他们多次对我讲了对战争形势和进攻之敌的分析看法。认为：我野战军立即迎击优势敌人，确有较大的困难，可是不把敌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破坏他们的进攻计划，那么我野战军将被迫在很短期间内退到老黄河以北，放弃鲁西南这一战略要地。这对我野战军以后的战略机动极为不利，也将对战争全局发生不利影响。因此，无论如何困难，也要坚持连续作战，力争粉碎敌军的猖狂进攻。至于我军，武器装备虽处劣势，部队也很疲劳，但却有很多长处和有利条件。首先，刚打了胜仗，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其次，有根据地可以依托，有地方武装的全力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只要我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去迎击敌人，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刘邓首长也同我们一起对进攻之敌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在向我进攻的 32 个旅 30 万人的总兵力中，进攻鲁西南的是 25 个旅，而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 15 个旅 10 万余人。况且，这股敌军又分为郑州和徐州两部分，这两部分，又分成 6 路，每路兵力仅力 1 至 2 个整编师。其中还有一个用数字不能表示的问题，即郑州、徐州两部之敌是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间有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在被我军围攻时，互相救援是不积极的。这就使我们具有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徐州绥靖公署的部队属于嫡系，其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全部美式装备，力量较强，我们可以先避开他们。郑州绥靖公署的部队，有嫡系也有杂牌，力量相对较弱，却又是主攻部队。如果我野战军能集中兵力先挫败郑州之敌，其郑、徐两路的钳形攻势便会随之瓦解。因此，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认为，首先歼灭郑州之敌较为有利。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8 月 29 日，中央军委来电，向我们通报了郑州之敌进攻的动向，并指示我们，野战军主力要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当时，郑州之敌向我进攻的左路是整编第四十一师，任务是攻东明、守封丘、长垣，该师因有守备任务要兼顾，必不敢深入；右路进攻之敌是整编第五十五师等部，目标是攻曹县，该师在陇海战役中遭我严重打击，心有余悸，也不敢轻易同我交锋；中路进攻之敌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是齐头并进会攻定陶，两师的间隔有 7.5 至 10 公里，有割裂和围歼其中一部的可能。而且，整编第三师是郑州各路敌军中唯一的嫡系，如遭我军围攻，其他各路为保存实力，是不会积极援助的。还有一个对我有利的因素是，该师（原为第十军）在中原作战中伤亡较大，此次长途跋涉而来，部队既不充实又相当疲惫。在作了这些分析之后，刘邓首长下了先打整编第三师的决心。

三、歼敌的作战部署

针对敌军进攻的态势，刘邓首长决定发起定陶战役，集中野战军主力（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至少集中 4 倍于敌之兵力），歼灭整编第三师。首先，歼灭其 1 个团，尔后，逐步扩大战果全歼整三师。根据刘邓首长的指导思想，我立即组织司令部人员拟定了定陶战役作战的基本命令，规定总的作战方针是：“箝制刘汝明集团，并置重点于消灭孙震集团之第三师。”战法是：“采取南北钳击以求各个消灭之（先消灭其 1 个旅，再消灭其另 1 个旅），尔后再视战斗进展情况扩张战果。”作战命令还要求：“各部注意首先消灭其师、

旅首脑机关，打其指挥系统……”各参战部队的作战任务是：以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全部组成右集团，统归陈再道指挥，由北向南或由西向东攻打整编第三师，先求割裂该师后方及其与整编第四十七师的联系。同时以小部队佯攻整编第四十七师，阻其向北增援。以第三纵队和第七纵队为左集团，由杨勇、张霖之、陈锡联、彭涛共同指挥，首先楔入敌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之间，将两师割裂；亦以小部队佯攻整编第四十七师，阻其北援，主力由甫向北或由东向西攻打整编第三师。以冀南独立第四旅籍制长垣之敌。以第三纵队第九旅和冀鲁豫第五军分区的2个团担任貉制刘汝明集团及整编第四十七师的任务，务使上述敌军在9月2日前不能进至魏湾之线及曹县城。各箝制部队应沿韩集、定陶公路诱敌东进，当主力开始作战时归建。另以第七纵队第二十一旅深入陇海路南，结合冀鲁豫第六军分区武装，捶击敌军后方。冀鲁豫第五军分区领导率领指挥机构携电台一部，转入敌后，指挥各县地方武装，对敌进行不断地尾击、侧击、伏击和夜间袭扰，破坏敌之补给线和通讯设备，并准确侦察敌情，以干扰敌军，使其齐头并进的战法难以实现，便于野战军主力分割歼敌。并将歼敌战场预定在定陶之普连集以西地区。《定陶战役基本命令》于1946年8月31日颁发。要求各参战部队在9月2日前完成战斗准备，于9月3日或4日开始作战。为消耗、疲惫、迷惑进攻之敌，掩护我野战军主力休整和完成战役准备，根据刘邓首长意见，我让第六纵队以2个小团同整编第三师周旋，边阻击边将其诱至预定战场。基本命令下达后，各参战部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到9月2日，主力部队得到了4天的休整。并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表扬了在陇海战役中英勇顽强，完成战斗任务好的单位与个人，批评了少数人不敢打大仗、硬仗的右倾思想。从而，全野战军将士斗志高昂，求战迫切。同时，各级指挥员还根据敌军的特点，反复研究了歼灭敌军的战术和技术，尤其是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我军夜战长处等问题。由于全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战场的准备和后勤组建工作都是比较顺利的。其中仅冀鲁豫区的参战民兵即有8800余人，参战民工1.6万余人，出动担架1.7万多台，大车5000辆。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带头，率领各级党政干部和民兵、民工奔赴前线。

四、苦战整编第三师

9月2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8月30日，第三师位置：师部及炮十团第三营孟砦；第三旅旅部及第八团李堡、蔡口、韩庄；第二十淀旅部及所属2个团南门刘、杜寨，王庄；第三淀第八团守备考城。”9月2日当天，整编第三师又进至秦砦、桃园地区；整编第四十七师进至黄水口、吕砦地区。这时，自徐州方面各路进攻的敌军被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和第三军分区武装阻击于单县以东地区，与郑州方面进攻之敌主力相距有100多公里。自郑州方面进攻的左路整编第四十一师被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阻击于东明西南地区；右路整编第五十五师等部被第三纵队第九旅与冀鲁豫第五军分区武装阻击于曹县以南地区，靠近中路整编第四十七师距离最近的左路也有20多公里。而这时，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又将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以整编第三师攻菏泽，整编第四十七师攻定陶，这样一来，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的间隔就加大到20至25公里。于是，刘邓首长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敌军的“钳头”尚未合拢、郑州各路敌军间隔较大的有利时机，提前一天开始作战。我立即下达命令，要钳制部队放手引诱整编第三师冒进，并将战场西移至韩集、安陵集以西的大杨湖地区。争取在3日夜间发起攻击。

3日晨，第六纵队的2个（小）团同整编第三师稍稍接触之后，便故作招架不住的姿态，迅即后撤。整编第三师误认为我军真的不能抵挡，便毫无顾忌地向前推进，于当天下午，按照我们给他们设计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了预定战场：其第三旅进至大黄集、周集地区；第二十旅进至阎砦、大小杨湖、方车王地区；师部进至天爷庙。而整编第四十七师则被我第三纵队阻于三邱店、常路集一线及其以南地区。

当夜23时30分，刘邓首长命令主攻部队向整编第三师发起进攻。

各主攻部队接令后，因有些部队的攻击动作迟了一些，未能收到南北同时钳击的效果。故这一夜的战果极微，仅歼敌1个营。

4日，各部队继续攻击。敌军以飞机和坦克相配合，抵抗相当顽强。我军当天仅歼敌2个营。

整三师发现已处于我军北、东、南三面包围之后，便向刘峙呼叫求援。4日，刘峙命令整编第四十七师向我第三纵队左侧背的梁集、路王庙等阵地猛攻；另以一部迂回进攻桃园、企图由南面向北与整编第三师靠拢。5日，整编第四十七师主力向西南迂回进攻桃园及其以南地区，向整编第三师增援。但由于遭到我第三纵队的顽强阻击，行动消极，同整编第三师的间隔始终在5公里以上，无法会合。同时，整编第四十一、五十五、六十八师等敌，也从东明、曹县地区分头增援整编第三师。

9月4日、5日，军委曾连发两电，指示我野战军：在尚有未使

用之足够后备力量，或主力伤亡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再打一仗，即在歼灭第三师后，迅即转移兵力至东明方面，再歼灭东明附近之川军两个团（即属整编第四十一师的第三一一团和属整编第四十七师的第三七四团），确保东明于我手中。并告知我们，敌人2个团，经过鄂北、陕南长途跋涉，比较疲劳，且远离其后梯队，孤军深入，直迫东明城下，比较好打。故待第三师完全解决后，相机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尽快解决整三师，等该师同增援部队会合之后，就很难打垮敌之进攻。东明之敌更难以解决。为此，刘司令员率领我们司令部一部分人员于5日夜赶往第六纵队司令部，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提出了坚决、迅速歼灭整三师的要求，再次强调了在战术上集中兵力的问题。重新作了全线进攻的部署：第六纵队攻歼大杨湖敌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第二纵队以1个旅包围在周集、大黄集之敌第三旅，并钳制小杨湖之敌，配合第六纵队作战，以1个旅迂回敌左侧后，切断敌后方交通运输，并阻止敌军向西南突围；第三、第七纵队主力首先攻歼申倪砦敌第二十旅旅部及其据守方车王的一部，再攻敌师部阵地天爷庙。

会后，各纵队向敌发起全线进攻。刘伯承司令员亲临第六纵队

指挥。第六纵队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前仆后继，连炊事员、饲养员也投入了战斗。经一夜苦战，至6日晨，第六纵队终于全歼了第五十九团。第二、第三、第七纵队，亦各歼敌一部，并逼近敌师部阵地。至此，整三师第二十旅已被我全歼，第三旅遭我重创。从而，打开了战局，使整三师陷于混乱之中。刘峙曾几次严令整四十七师向整三师靠拢，在我阻击下，均未成功。

在此期间，我第七纵队第二十一旅收复太康、淮阴两城；太行

军区部队在豫北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反复破击安阳、汲县间的铁路，有力地配合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6日中午，整编第三师师部和第三旅残部向南突围，力图与整编第四十七师会合。我军对此早有准备，待敌军丢弃工事，仓皇退却之时，便猛烈追歼，将其全歼于秦寨附近地区。至此，整编第三师被我全歼，中将师长赵锡田被俘。

从西北、正南、东南向整三师作向心增援的整编第四十一、四十七、五十五、六十八师诸敌，知增援无望，便迅速撤退。

刘邓首长见敌军溃退，立即命令围歼整编第三师的第六、七纵队主力，于9月7日转而卷击整四十七师的侧背；第二、三纵队以一部向考城迫近，追击整编第四十一、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等敌。9月7日，整四十七师第一二七旅和归该师指挥的整四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在溃退中被我军全歼。至8日上午，由曹县向兰封撤退的第七十四旅2个营，整四十一师第一二五、第一四旅各部约2个营亦被我歼灭。我军乘胜收复了东明城。

其余各敌仓皇退至考城、兰封〔2〕之间，转入防御。至此，郑州方面进攻之敌，已被我彻底击退。徐州方面出犯的敌军，也被我军阻击于成武地区。前进不得。到9月8日，历时5天的定陶战役即告结束。我军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歼敌4个旅，共17000余人。其中，毙伤敌第20旅旅长谭乃大以下5000余人，俘敌12000余人〔3〕。

五、集中优势歼敌的范例

定陶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内线打的第一仗。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钳击我军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猖狂气焰，提高了晋冀鲁豫全区党政军民的胜利信心。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定陶战役的评价很高。他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关于歼灭整编第三师的电报后，立即于9月7日复电，祝贺我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传令全军嘉奖。

在接到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关于定陶战役作战经过的报告后，于9月13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又立即把定陶战役的经过和经验，电告了张宗逊、罗瑞卿和聂荣臻、贺龙、陈毅、宋时轮，在通报了作战经过和战果后，特别强调：定陶战役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集中优于敌人5倍或4倍至少3倍的兵力，首先歼灭1至2个团，振起我军士气，引起敌人恐慌，得手后再歼敌第二部、第三部，各个击破之。切不可贪多勿得，分散兵力。”

定陶战役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中引起很大震动，郑州绥靖公署

主任刘峙因此被撤职，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定陶战役的意义，从作战原则上来说，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最早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中共中央军委在9月16日向全军下达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曾将定陶战役列为一个范例。指出它为我军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如何以弱势兵力战胜强大的对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同时，它也再次说明，我军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可以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关于定陶战役的经验，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和张际春曾在战后，总结了4条，其主要精神是：（一）在诱敌深入我解放区以利于我作战时，必须组织适当的运动防御，以消耗其弹药和损伤其人马，为我决战创造条件。这就是刘伯承常用的“猫盘老鼠”战术，即猫在抓住老鼠之后，并不马上吃，而是先玩弄它，待它精疲力竭瘫软之后再吃。在定陶战役打响之前，我军就已经消耗了整三师的大量弹药，毙伤其

1500人以上，第二十旅的2个团长也被击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师的战斗力。（二）对战斗力不强，特别是两个系统（嫡系和杂牌）的敌人，则可以插入其中间，钳击其一部。如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时，杂牌军为保存实力，则不会积极增援。我们此次即利用了敌人的这个弱点，大胆以主力插入两敌之间作战。（三）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一支基干部队，而尤以打嫡系更为有利。打掉了这支基干部队，则可威震其它各敌。如这次整三师被全歼后，其它各部则全线溃退。（四）在战术上，则重点打击敌军的弱点。这样容易收到各个歼灭之效，并且也可以缩短作战时间。同时，也吸取了定陶战役的一些教训：如连队不充实；因无法防空袭，弹药奇缺，以致白天作战困难；3日、4日两天协同作战较差；在战术上集中兵力打一点的运用仍嫌不够，等等。这些教训，有的是主观上的原因，有的则是由于经验不足而致。在作战中，各纵队英勇奋战，打得都很顽强，其中第六纵队尤为突出，9月7日，刘、邓、滕、张首长将该纵队的事迹上报了中央军委，并通报了各军区和各纵队。通报指出：“在此次陇海战役及消灭第三师作战中，各部都能在统一意志下完成本身的战斗任务，而尤以我六纵在王近山、杜义德、韦杰、鲍先志诸同志领导下，以极不充实的部队圆满的达成每一个作战任务，表现了始终如一的高度积极性、顽强性和勇猛的战斗作风。……尤应为各地所效法。我们特对六纵全体官兵表示敬意并通令表扬。”至于定陶战役的政治意义，在《解放日报》9月12日的社论《蒋军必败》中明确地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注 释〔1〕中央军委这两次电报，均为毛泽东同志拟稿。〔2〕兰封，即今河南兰考县。〔3〕1946年9月10日，《刘邓滕张关于定陶战役作战经过向军委的报告》中说，这次战役“敌伤亡5000以上，实际俘虏最多8000（因空军轰炸逃散很多）。”对外公布是按已俘虏过的数字统计，未减掉逃跑之数。

王克勤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46年12月1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蒋介石疯狂进攻的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新华社从延安发了一篇《解放日报》的社论，题目是《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高度评价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班长王克勤带兵的经验，指出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社论还着重介绍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各部队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经验，并号召解放区军民，都能按照自己当前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地推动这个运动。王克勤是怎样一个人呢？开展王克勤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开展这个运动对于当时正在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曾经起到什么作用呢？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忆一下这段往事，是为了吸取那些用先烈们的鲜血换来的经验。王克勤是安徽省阜阳县三冬店人，1920年出生。他在家和老父母、一个弟弟靠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度日。1939年7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受尽压迫虐待，过了6年黑暗悲惨的生活。1945年10月，王克勤在平汉战役中被我军解放。他来到我军以后，耳闻目睹，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相比，简直生活在两个世道。在国民党军队当兵，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经常受到长官的打骂和凌辱。现在来到人民的军队里，官兵平等，吃穿一样，干部从来不摆官架子，打起仗*本篇写于1982年，发表于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来，身先士卒，领着大家冲锋陷阵，平时对待战士亲如手足，关怀备至。国民党军队对待老百姓，奸掳烧杀，无恶不作，老百姓把他们看作是土匪。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还帮助群众干活，人民把我们军队看作是自己的子弟兵。经过党的教育和老同志的帮助，特别是经过诉苦运动，王克勤的阶级觉悟很快提高了。他亲眼看到解放区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组织互助，一个个有说有笑，过着自由、幸福和丰衣足食的生活。联想到自己的家乡，贫苦乡亲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终年不得温饱，借者财一斗麦子，到时候得还三斗，逼债逼得人上吊。他在诉苦会上边哭边说：“提起老财，我恨不得咬他两口。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穷人干，当中央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这时候的王克勤，只是具有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感恩的思

想。他被我军解放后不久，生了一次病，连长送给他五块钱，四把挂面，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连长说：“我要好好干，才对得起你。”后来经过几次战斗的考验，结合他平时的表现，连队党支部认为他具备了入党条件，对他进行了党的教育，使他对我党我军的性质、任务、前途以及共产党员的作用等等，有了初步的认识。1946年9月，王克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克勤当班长的时候，就在班里开展了团结互助活动。他常常

对战士们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我们要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在班里成立几个互助组，组长大家推选，自由结合编组。根据行军、作战和训练等任务的不同，组里的成员可以变换。当时班里的老战士经过战斗考验，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多数是共产党员，是班里的骨干；新战士中有解放区翻身农民，他们热情高，有觉悟，但没有打过仗，军事技术不行；还有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他们有些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经过诉苦，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但不稳定，有的还染有旧军队的坏习气。这几种人通过互助组的形式，发挥各人一技之

长，互帮互助，互教互学，班里的工作搞得很活跃，战士们进步也很快。新战士初来部队，对部队生活不习惯。有的人想家，睡在被窝里哭鼻子。王克勤重视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一发现战士们有思想疙瘩，他总是个别谈话，耐心说服，从来不变态度，下发脾气，并且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有一次，一个新战士想家开了小差，走到半路感到对不起班长，又自动回来了。王克勤嘱咐班里的同志：“谁也不准对他说一句讽刺话。”这个战士不识字，王克勤还帮他写家信，鼓励他好好干，这个战士后来表现得很好。在生活上，他很关心战士的疾苦。谁有了病，他端水送饭，煮面条汤，把自己有限的津贴费买鸡蛋煮给病号吃。晚上查铺，他把战士的被子都盖好。这些事情使战士们很感动，有的说：“在家里父母也没有照顾得这样周到。”王克勤对班里的军事训练抓得很紧，要求很严。他说：“要能打好仗，先要教好新战士，平时教得好，战时就省力。”他动员新战士刻苦练兵，给他们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他不但自己亲自教，还让解放战士中有一技之长的人当小教员，手把手地教，不厌其烦，教会为止。他们班是个轻机枪班，突击了几天，全班新战士很快就学会了机枪的拆卸、安装和使用，有的还学会了在紧急情况下排除故障。王克勤是个老机枪手，不仅打机枪的技术过得硬，他对武器的爱护也经常受到连里的表扬。他的机枪3天一小擦，7天一大擦，打了七八次仗，班里两挺机枪没有发生过故障。王克勤是旧军队过来的人，用他的话说，旧军队当兵的那些“穷毛病”，他了解得最为清楚。他常常现身说法，用两种军队和两个地区的对比，教育战士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是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经过思想教育，许多解放战士很快提高了觉悟。过去有的人偷老百姓的东西，对年轻妇女嬉皮笑脸，动手动脚；还有的偷着赌钱，唱无聊的小调，这些现象，经过教育基本消除了。不过，这些人的思想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解决了还会出现反复。王克勤的经验是：抓到根子上（提高阶级觉悟），说到点子上（抓住具体事实），看到表现上（好的表扬，坏的批评）。而且要经常抓，抓到底，在方式方法上，多个别谈话，不要动辄当众批评伤面子（因为他们很爱面子）。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

在行军的时候，王克勤让互助组进行行军互助，体力强的帮助

体力弱的；老战士帮助新战士。他自己以身作则，帮助走不动的战士扛枪，背背包，积极做宣传鼓动工作。到了宿营地，他烧水给战士们洗脚，为战士挑脚上的泡。住在老百姓家里时，教育战士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同群众的关系，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打扫室内外卫生，给小朋友讲战斗故事，教唱革命歌曲。临走的时候，归还借用的东西，和群众握手告别。有一次，他们刚到宿营地就碰到一家失火，他们马上和其他班的战士将火扑灭，还帮助老乡把房子修补好，那家老乡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话都说不出来。

王克勤带的这个班，一共11个人，其中有3个党员，2个根据

地的老战士，其余都是新战士和解放战士。要把这班人带到战场上和敌人拼杀，确实是不容易的。有一次，作战前王克勤看到有的新战士表现神色不安，不言不语，就对他们说：“在战场上你们好好听指挥，凡事开头难，第一次打仗没有经验，多打几次就有经验了，久炼成钢嘛！”他指定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具体帮助新战士，全班订出战斗计划：（一）多杀伤敌人，多缴枪枝，缴获的东西归公；（二）多抓俘虏，不搜腰包，宣传我军俘虏政策；（三）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叫；（四）不管敌人火力怎样激烈，都要掩

护步兵冲锋。在坚守徐庄的战斗中，敌人打了2000多发炮弹，6架飞机轮番轰炸，很多民房被炸塌了。由于王克勤这个班战斗互助搞得很好，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适时转移阵地，动作灵活迅速，全班没有一人伤亡。新战士白志学第一次上战场，听到打炮，拔腿就跑。在王克勤的带领下，在这次战斗中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还立了功。战斗结束后，许多新战士都说：“跟着俺班长打仗，心里有底，不怕危险。”王克勤同志在战斗中，几次立功受奖，他总是把奖品分给大家。他说：“我当战斗英雄，是沾了大家的光。我的进步，是党的教育和大家帮助的结果。”由于王克勤同志的努力，他这个班不但任务完成得出色，其它方面也很好，团结得象和睦的一家人一样。后来王克勤同志升任排长，也把这个排带领成为英勇作战、团结互助的模范排。王克勤所在的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的领导，发现了这个典型，经过调查研究后，连续写了几篇通讯报导，刊登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报——《战友报》上，表扬了王克勤的模范事迹，介绍了王克勤班进行团结互助的经验。野战军文工团和六纵队文工队的同志还编演了歌剧《王克勤班》到部队中演出。这样，王克勤的事迹和王克勤班的经验，很快推广了。后来，第六纵队政治部把王克勤这个典型事迹和部队学习的情况，向野战军政治部作了汇报，受到刘邓首长和张际春副政委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几位首长严肃地指出，王克勤班开展的团结互助活动，是适应战斗需要和部队情况应运而生的一个典型，是广大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友爱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着极大的意义。根据张际春副政委的倡议，野战军政治部发出了学习王克勤班的指示，各个纵队很快展开了向王克勤班学习的群众运动。党中央和军委对这个问题抓得很准，很及时，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通过学习这篇社论，这个运动就在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中普遍开展起来了，出现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和各自部队的典型人物，对保证作战的胜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7年7月11日，当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准备千里跃进大别山，实行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我们时代的著名战斗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王克勤同志，在率领突击排攻打山东定陶县城北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临死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地对身旁的战友们说：“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告诉全排同志……要团结……要互助……好好打老蒋……解放全中国。”这是王克勤同志留给战友们最宝贵的遗言。

刘伯承司令员在悲痛之余，亲自挥毫，以他自己和邓小平政治委员的名义，撰写了《悼唁战斗英雄王克勤同志》的悼词。悼词说：我们以极悲痛的心情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悼唁我们一切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的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利益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崇敬。为了永远纪念王克勤同志，决定王克勤所在的排永远保持王克勤排的光荣称号。我们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

王克勤同志永垂不朽！

一个王克勤倒下去，千万个王克勤式的战斗英雄站了起来。宣传和学习的王克勤和其他战斗英雄的群众运动，在全军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政委在总结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经验时，提出了改造部

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他指出部队（特别是连队）政治工作必须抓紧四个环节：第一，抓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第二，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工作不能流于形式；第三，走群众路线，用典型推动一般，工作发动大家做，不能只靠少数人；第四，强调支部在连队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由于刘邓首长对政治工作的改造抓得很紧，又得到张际春同志的协助，自卫战争开始以后，晋冀鲁豫战场上各野战部队的群众路线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今天回忆在解放战争中各部队开展王克勤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有借鉴之处。温故知新，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复习。

关于进入新区作战的卫生工作揭示 *

一、夏季行军作战的卫生管理与教育

部队卫生管理与教育重点，应放在连队战士身上。卫生部门与各级卫生机关，尤其是连队首长与卫生员，教战士讲卫生等于爱护战士。应利用点名、休整空隙，向战士们作卫生常识的讲话，使战士同志懂得卫生来爱护自己的身体，防止发病，保证战士的健康，巩固部队战斗力。夏季行军作战，连队卫生管理如果做得不好，可能导致许多疾病发生，减弱部队的行军与作战能力；如果传染上霍乱、赤痢等传染病，将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故择其大者，扼要提出，作为连队夏季卫生工作之中心。（一）防治胃肠传染病：各部队虽多进行了霍乱等疾病的免疫注射，但仍须讲究卫生，防患于未然（没有注射的还应进行补注）。假使进入霍乱、赤痢、伤寒等传染病流行区，应立即设法迅速脱离；万一不可能脱离时，当即严格施行卫生管制。1.不进入民房，不用群众的家具，与群众严格隔离。2.严禁乱吃、乱喝，在规定的吃饭、喝水以外，不准买零食吃，* 1947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着手外线作战的准备。本篇为部队强渡黄河，进入新区作战前，李达同志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签发于1947年6月13日。特别是一些陈腐食物，苍蝇爬过的食物，在尘土飞扬里摆着的食物（如路旁摊贩卖的凉粉、麻糖、切开的瓜果等），绝对不能吃。必要时，可有组织地集体购买新鲜、干净的食品、瓜果吃，不得个人零买吃喝。3.发现了害传染病的人，迅速隔离。初期可尽早吃些仁丹、八挂丹、救急水、救急锭（此药必须经医生才能服用）或肠胃消毒泻下剂；然后再请医生迅速救治，并采取防疫措施，防止蔓延。（二）防治感冒：出大汗后，不要一下脱下衣帽；下雨衣帽打湿后，容易感冒，应设法弄干或调换；夜间露营被子盖不好也易感冒，肚子受了冷，容易泻肚，应于睡下后互相检查、盖好。感冒了应喝点胡椒、辣子和葱熬的汤，身体发汗；发汗后应注意不要再感冒，休息一下恢复精神。（三）防治中暑（发痧子）：天太热时，身体内集热放散不出，衣帽被打湿，汗蒸发受阻时最易中暑（轻的脑充血，重的热射病，症状：头痛、恶心、出汗、脸发红，甚至忽然晕倒）。预防：要少吸烟，不喝酒，多喝开水，争取夜间行军，白天尽一切可能利用时间得到充足的睡眠；行军中解开衣扣，松打绑腿，戴草帽（用冷水打湿更好）。发现上述症状时，不要勉强再走，应在树荫下卸去衣服给他煽风，用冷水手巾敷头部，也可采用挑刮（针灸）的办法。（四）防治疟疾：进入疟疾流行地区，或发现大批人患疟疾时，应尽量争取每人每日服1—2粒奎宁丸，连服10日或半个月。已发者，严格隔离，正规服用奎宁（按医生的指示）根治或针刺疗法。（五）防止过度疲劳：除必需武器、弹药、服装外，尽量少带个人用品，以减轻体力负担。休息中，解下所有携带的物件，松解衣扣、绑腿等，安静休息，尽最大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疲劳。争取时间安睡，每日得到充足睡眠，睡得好才是恢复疲劳的好办法，临睡前尽量搞些热水洗脚，擦洗全身（最好锻炼使用冷水擦洗）。衣服也要经常换洗，保持清洁干净，这也是间接使人减少疲劳的办法之一。（六）防止烦渴：夏天走路出汗多，身体水分消耗很大，所以喝水比吃饭重要得多。在出发前的一顿饭菜，定要少放油盐。每休息站定要先派专人去烧开水，放冷了等部队来了喝。尽最大可能争取每一战士带水壶，出发前灌满开水。（七）保护

脚：发动干部与战士经常检查鞋袜，及时修理补充，力求合适，以免在路上打起泡来。每到驻地，应人人洗脚，洗后脚趾上水必须擦干，否则就易烂脚丫子。注意不要碰伤与抓破腿和下脚部，否则过河水打湿，就难免化脓、溃烂，跟不上队。（八）对负伤同志的应急处理：除止血、绑扎等专门急救处理外，一般的应多给开水喝（注意腹部伤了胃肠的不要给水喝）。在救护沿路应多设水站，防止苍蝇跑入伤口，沿路不准乱换药，必要时只可多换绷带，保持清洁没有臭味；但交换后务必包扎好，免得半路上脱落。大出血后的伤员，夜里容易感觉冷，应好好把被子给盖好。脸发白、出冷汗的，应使之平卧，把头部放得比身体低些。

二、进入新区后，卫生部门应注意的几点新的工作

时局发展很快，大反攻时我们必须进入新区。因此，提出几点原则，作为思想准备，供作参考。（一）接收医院、医学院校、药品、器材。攻占城市后，必然有一些医院、医学校和一批药品、器材要卫生部门接收管理的；过去搞得不很好，乱抓一把，把些贵重器具，因战士们不认识其宝贵，竟破坏抛弃了，而我们却正需要这些东西。如峰峰的X光机，汤阴的显微镜都很好，可惜把最主要的部分丢掉了，现在等于废物。这种教训，今后必须纠正，进行教育，把医院物资保护完整，全部的人员、器材、药品都接收过来才好。攻城部队应当派守卫，不许干部与战士进入医院与药房。

（二）争取医务技术人才，外来技术人员可概括分为四类：

1. 有本事的大学教授、医院大夫（不可能很多），这些人中有的

以清高自居，不大喜欢接近一般人，有点攻死书的味道，个人生活要求高，自己要特殊，不与一般人一样。但这种人对我们作用很大，应很好接近争取，学习他们的技术，为我们培养、造就人才。2. 青年多刚从学校出来，有理论和知识，但实际经验少，对旧社会多半不满。这类人应很好争取为党、为人民服务。3. 江湖式的，吹牛、拍马，也吹拍得开，善摸病人心理，没本事，但生活要求也很高。这类人我们不很需要，如同啃骨头，食之无味。4. 政客之流医务人员，年纪大，牌子不少，位置高等，生活特殊搞惯了，架子放不下，工作不会作。如俘虏过来的一些处长、少将先生们，做医生安不下，做教员不会，这也不很需要。争取方针：生活上毫不计较，物质待遇不要小气，但工作要求严格，要逐渐地争取、改造。领导上要会认火色，会接近他们，善于团结他们。论技术，有的我们应当虚心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不如他的话）；有些国民党的军医，认为我们是土包子，所以大吹，目空一切，这样的人，我们要认清，不要被他们吓唬住；对待他们的态度要不卑、不傲，同时在工作上抓紧，看他们是否有真本事。自由职业者的毛病，是生活散漫、享乐、自由主义、背后乱谈，当逐渐改造之，不要性急，领导上避免生硬。第二类的改造最快，第一类要慢一些，三、四两类无任用的必要，免得麻烦。

（三）刚一解放过来的军医，不得马上任用。凡国民党的医院及

后方医院的军医，刚一解放过来，必须先集中送大军区政治部，集训审查后，才得任用；否则，即令自行留下，分配工作后，多半容易逃跑，这是教训，我们千万不能马虎。以上两件工作，望各级卫生部门用负责的态度，具体地布置一下。各级军政首长要领导这一工作。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 *

1947年7、8、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时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奉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担任战略突击队的任务，实施中央突破。

当时敌人虽然在装备和兵数上仍处于优势，在两翼仍保持着攻势，但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洞察敌军的有生力量已经受到很大损失，敌人战线的中央已经转入防御，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已经形成，新的大革命高潮已经临近，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毅然决然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决策，对扭转整个战局有决定的意义。在这样的形势下转入战略进攻，而进攻的样式又是千里跃进，釜底抽薪，因而，担任战略突击任务的部队，就不免碰到很多险关。

鲁西南战役旗开得胜，但在捷报声中，埋伏着危机。譬如：羊山战斗迁延，蒋介石认为刘伯承部攻不下羊山，则鲁西南会战共军即系失败；蒋介石又继续从各地抽兵向我围攻：敌人阴谋水淹我军。真是一波三折。这时刘邓首长的决心是：

公开揭露蒋介石决堤的罪恶阴谋，呼吁各界人士起来制止；集中全部兵力，迅速攻歼羊山敌人；不在鲁西南恋战，提早跃进大别山。于是三折之波平伏下去了。*本篇是李达同志1982年为《刘邓大军征战记》撰写的回忆文章，发表

于该书第4卷，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进军途中，刘邓指挥部进到汝河北岸时，遇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的险情。这是战略进军中遇到的最大难关。刘邓决心在当面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于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过了汝河一关，又是淮河一关。刘邓指挥部在河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开紧急会议，最后邓小平同志说：伯承和陈先渡过河去指挥部展开，李达组织渡河，我来对付后面的追兵！刘司令员当即定下决心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刻行动！在掌握了水情之后，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于是，许多出于天意民心的神话传开了。我军在大别山取得了战略展开和中铺、张家店、高山铺等歼灭战的胜利之后，敌人集中了33个旅对大别山作重点进攻，刘邓决心以二、三、六纵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而以新来大别山的十纵、十二纵和原在大别山的一纵，在桐柏、江汉、淮西三区作战略再展开，蔓延游击战争，在陈唐〔1〕、陈谢〔2〕两兵团发动平汉战役的协同下，内线坚持与外线拉敌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围攻。这一决心下得很紧急，而且立即付诸实施，同时为了适应战斗环境，把刘邓指挥部一分为二。于是，敌人对大别山重点围攻的阵势被撕破了，我军在江淮河汉4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战略战术上都展开了，迫使敌人防线从黄河退到长江，退了1000里。在这个期间，大别山内线坚持和外线展开的部队和地方工作干部，斗争都是十分艰苦和英勇的，他们高度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釜底抽薪，不怕烧手”的精神；许多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在斗争中牺牲了，他们将永垂青史！在这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出许多优秀的干部和战士，他们成了部队的坚强骨干。南征大军拖瘦了，但比之以往更加壮实了。在这样的艰苦斗争环境中，树立良好的作风和风气，坚决而切实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在敌人战略要害地区立足生根取得胜利的根本大事。在大别山，刘邓多次

在讨论地方和部队工作的会议上，着重指出：“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必须反对一种浮夸、浪费、奢侈、铺张，不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并且指出：“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就为党为人民造福万代，否则就对党对人民贻害无穷。”这种树一代人之新风的远大思想，一直指导我们前进。

刘邓首长说，如果我们部队没有良好的纪律，就和国民党军队一样，人民也要反对我们。邓小平政委多次向部队干部阐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含义。他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创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把军队的三大任务集中了一下，能够适合每个军人都能够做到和必须做到，即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为一切缴获要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化到八项注意中去，如对人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公平是工商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等”。他强调指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做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个锋，是不够格的”。在大别山敌人集中 33 个旅对我作重点“围剿”的时候，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每到一地都亲自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最痛恨的就是抛撒粮食，抛撒稻草，到处屙屎，还有住群众内房。后来，他去参加中央 9 月会议的时候，从西柏坡写信回中原说：“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强调指出，加强纪律性，即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保障前两任务及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

1947 年的南征及南征后一年的艰苦斗争，转瞬过去 30 多年

了，这场斗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尤其是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为人民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遇事在关键时刻正确迅速下决心付诸实施的作风和气概，“釜底抽薪，不怕烧手”的献身精神，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注 释〔1〕陈唐，指陈士榘、唐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2〕陈谢，指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八纵队二十二旅及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

大别山四个回合的斗争*

1947年8月底，我军一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刘邓首长立刻就宣布：

“我军已胜利地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的任务，敌人的追截计划完全失败。”“党中央说我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行动。”“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并指出：“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住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戒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在半年内，还有困难须要我们上下一心去克服。”“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能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

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我们经过7个月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实施了战略展开，粉碎了敌人的重点围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重建了这个革命根据地。1947年底，刘伯承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了4个月来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把它划分为三个回合；1948年4月他又把7个月的斗争作了总结，着重讲到大别山斗争和全局的关系，并把这一阶段概括为四个回合的斗争。

这四个回合的斗争是：*本篇是李达同志1981年为《刘伯承用兵录》撰写的文章。

第一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敌人追击，我们战略展开。展开的基本内容，就是刘伯承司令员所说的，“开动歼灭敌人，发动群众这两个车轮。”渡淮以后，按刘邓首长指示，以三纵展开于安徽西部；以六纵的2个旅展开于湖北的东南部，乘虚迅速抢占中心地区数十县；以一纵4个旅及中原独立旅，二纵的3个旅及六纵的1个旅共9个旅的兵力，在大别山北部掩护战略展开，同时每纵队分遣1个团作地方部队，就地展开。在我实施展开时，蒋介石为阻挠我军在大别山立足生根，慌忙以23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尾我直追，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同我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我们以大别山北部的部队并抽调在皖西的三纵主力，同敌人打了三仗，这就是9月上旬在河风集地区，打击了战斗力较弱而又孤立的敌滇军1个师；中旬在中铺地区歼敌1个团；下旬又在光山附近打击了东援之敌1个师。经过这三仗，把大别山敌人的全部机动部队调来或抑留在大别山北部，掩护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鄂东和皖西迅速展开。这一回合，把敌人的追击止住了，我们实行了战略展开。担负掩护的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被掩护的部队完成了展开的任务。这一回合，把敌人阻止在大别山北部，我军展开达到长江边。这一回合的较量，我们先后解放县城23座，歼灭了敌正规军6000余人，反动地方武装800余人，并且建立十几个县的民主政权。这一回合是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

第二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敌人合击与追击，我们突围与歼灭追击的敌人。我主力在大别山北部掩护展开并打击敌人，敌人企图对这一地区来一个合围。9月27日，我们已经查明，敌七师、四十师的两个半旅，由麻城向沙窝北进；四十

八师、五十八师集结商城；八十五师及五十二师主力集结潢川、罗山线。敌人以约7个师的兵力，对大别山北部我主力进行合击，估计以上之敌两天内可以行动完毕，寻我作战。这时鄂东、皖西敌人只有少数正规军防守。刘邓决定分东、西两路向南突围。突围不是单纯的、消极的突围，而是有目标的、积极的突围。主力向南机动，机动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敌人，造敌弱点，把它歼灭之。刘邓首长的部署是：以一、二纵主力及中原独立旅俟敌七师、四十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南出黄安、麻城地区；三纵应俟七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出皖西地区，寻机歼灭小股之敌，路线自行选定；六纵对七师、四十师不要正面作战，主要打敌辎重，尔后应相机歼灭麻城之敌。

当各纵队按部署行动时，东路突围的三纵又接到刘邓首长指

示：“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急回师，放手歼敌”。三纵得到命令后，立即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东返，寻机作战。结果带走了敌战斗力较强的桂系第七师、第四十八师，并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歼灭了敌人八十八师师部及所属的六十二旅全部，俘旅长汤家楫。

西路是刘邓首长亲自率领的一、二纵主力，中原独立旅和六纵

一部，共7个旅的兵力，乘虚出鄂东，寻机歼敌。此时大别山北部只留下一、二纵各1个旅，伪装主力积极迷惑敌人。这时鄂东及沿长江一带敌人很空虚，麻城、黄陂两地区只有4个半旅；汉口以北只有1个师，敌从黄陂到麻城的拦阻线很薄弱。在江南，敌兵力更加空虚，只有要点九江摆了1个青年军二 三师的二旅和新十七旅。我们西面突围部队，以中原独立旅和一纵一部为先锋，于10月1日奔袭经扶（今新县），歼敌保安团，打开向南机动的道路，直奔黄安（今红安），沿途消灭土顽，冲向敌黄陂、麻城拦阻线。接着我一纵主力和二纵一部，于10月8日歼灭了歧亭、柳子港敌五十六师新十七旅旅直和第一、二团；10月10日，一纵一部攻克李家集，歼敌五十二师1个营。这样，刘邓首长便挥师直指长江北岸。10月20日命令各纵沿长江北岸蕲春、广济、黄梅、宿松之线展开，以半个月的时间解决冬衣，尔后集结，寻机歼敌。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中原独立旅和一纵一部在蕲春东北之竹瓦店歼敌青年军二 三师第二旅从江南伸过来的2个营，一纵另一部解放长江北岸重镇武穴，六纵进驻团风。皖西方面，三纵一部也解放了安庆西南的望江及华阳镇。我军控制了长江北岸300里，威震大江南北，安庆敌人一夕数惊，蹲在庐山的蒋介石听到炮声，深恐我军渡江，便急令二 三师从九江伸至黄梅、蕲春警戒；又急令其四十师和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经宋埠、歧亭沿公路经总路咀、上巴河、浠水，向蕲春、广济方向盯梢而来，企图拊击我侧背，阻我渡江。敌四十师辖三十九旅（欠一个团）、一 六旅，连同八十二旅在蒋介石的急促驱策下，孤军冒进。刘邓首长认为，这是我歼灭该敌的大好时机，我们应趁机打一个较大的歼灭战，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刘邓首长便决心打了仗再解决棉衣问题。在敌由浠水向广济进犯时，刘司令员即一面组织指挥员侦察地形，准备战场，集结兵力，准备歼敌；一面侦察周围敌情动态和这股敌人进展的情况。刘邓首长根据敌人的行动路线，决定把敌诱到地形险要的高山铺设下一个口袋阵，杀他一个“回马枪”，在运动中全歼这股敌人。为了准备战场，10月24日，刘邓首长对高山铺作战作了基本部署，指出：六纵尾敌，并以一部分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以便主力集结；一纵集结于广济，二纵集结黄梅西北地区；三纵陈（锡联）曾（绍山）即率现有4个团，限28日到达张家榜待命，对桂系留皖西部队积极箝制

之。10月25日，刘邓首长发现周围敌人没有什么动静，仍是原来的敌人孤军冒进，于是又进一步作了战斗部署，指出：杨（勇）苏（振华）应扼制敌人于高山铺西北地区，迫使敌人展开，并抓住时机割裂之，而置重点于敌右侧背，杜（义德）韦（杰）应乘敌展开之际，从敌背后间隙中插入割裂之，而置重点于敌左侧背，并速与杨苏联络，受其指挥；二纵限26日黄昏前到达桐梓河以西地区集结待命。26日晨，指示陈再道，该主力改向广济西南许家铺、新屋咀地区，其先头部队由杨苏指挥，参加歼灭八十二旅的战斗。

刘邓首长周密部署以后，派出一支小部队，化装地方游击队，

诱骗敌人。敌以为有便宜可占，紧追不舍，我边打边走，终于把敌人引进了我预设的高山铺的口袋阵里，被分割包围，27日，我军发起总攻。这一战役，我歼敌1个师部和2个半旅，共12600多人，击落敌机1架，胜利地结束了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第三个回合

第三个回合是敌人重点“扫荡”，我们内线坚持反“扫荡”和在外线再展开，在友邻的平汉破击战役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重点“扫荡”。1947年11月底，敌人以14个整编师共33个旅的优势兵力，在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九江指挥所统一指挥下，开始对大别山进行重点进攻和“扫荡”。蒋介石这次围攻大别山，采取的方法是以一个强大纵队寻我主力，其余分散“清剿”，两者互相衔接，全力“扫荡”。

刘邓首长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计划，根据敌我双方情

况，制订了作战方案：（1）我主力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歼敌一路；（2）以一部主力（二纵），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3）军区、分区以一部适时转移到外线，大肆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侦察敌情。这时陈粟〔1〕、陈赓两军就实施平汉线郑州、信阳段的破击战役，调动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顾其要点和要线，以拖散敌人，协同大别山我军粉碎敌人重点“扫荡”。我大别山部队则以内线坚持反“扫荡”和外线再展开三个地区，来协同友邻的平汉战役，撕破敌人的阵势。即是适时从晋冀鲁豫南下的后续部队十纵和十二纵，分别向桐柏区、江汉区展开，以一纵由大别山内线转出，向北前进500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区（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展开，同豫皖苏军区连成一片。刘邓指挥部也一分为二，由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我组成小型前方指挥部，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各纵队，这样，敌人一个月围攻大别山处处扑空，其“进剿”部队到处受我袭击，立煌〔2〕、太湖、英山、宿松、岳西等城，接连被我袭击攻占，守广济城的青年军被我军歼灭。我再展开部队卡住了淮河，进入了桐柏山、大洪山，越过汉水，直抵潜江、石首，在武汉、宜昌间向南鼓出一个“肚兜”，与武汉、南京间向南鼓出的“肚兜”东西呼应，威胁敌人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破击平汉路南段作战大胜利之后，我军继续向许昌、信阳间扩张战果，连续歼灭了敌第五兵团整编第三师，给敌二十师以歼灭性打击。这一回合，又是敌败我胜了。

第四个回合

第四个回合是敌人反复“扫荡”，我们继续坚持繁殖游击战争，配合全军进行新式整军。白崇禧在对我合击扑空之后，往往朝令夕改，一日数变，

且表现急躁，一触即跳。在刘邓首长指挥下，我野战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下，采取敌进我进，适时分遣与集结，内外线相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斗方式，粉碎敌人的合围与“清剿”。各部队还以小部队结合地方武装，伪装主力，以袭扰、疲困、迷惑敌人，争取我主力机动转移、休整与寻找战机。组织精干小分队，破坏敌军一切可以利用的公路、电线，焚毁敌兵站、仓库，阻绝其补给交通。这一回合斗争的结果怎样呢？我们歼灭了许多敌人，自己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游击战争进一步改进了，桐柏、江汉、淮西的游击战争展开了。我们对于全国军队的整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个回合的斗争，又是我们胜利了。

刘伯承司令员说：“四个回合的胜利，不要单看自己，还要看到友邻的胜利。看到新式整军〔3〕过后，东北的几个大胜利，特别是四平街的胜利〔4〕；看到西北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打死胡宗南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歼灭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的大胜利〔5〕。我们也要看到陈唐、陈谢解放洛阳的胜利〔6〕，山东胶济西段的大胜利。〔7〕”“要看到我们的利剑插进了敌人的胸膛，我们以釜底抽薪的战略行动，调动了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胜利；而不要只看到自己被敌人咬掉一个指头，烧伤了一点子手皮。釜底抽薪不烧伤手，那才是笑话哩。”

四个回合的斗争，胜利地结束了中原逐鹿的头一个阶段。1948

年2月24日，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中原局及后方指挥部，在安徽临泉以南的韦寨会合。2月2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命令三、六纵向淮海以北集结。2月28日，二纵根据命令，北渡淮海进入淮西地区补整。晋冀鲁豫区补充我野战军主力的新兵，由华东野战军十纵和我野十一纵带领，越陇海路南下到达豫皖苏军区。这些，都预示着中原新局面的到来。从1948年4月起便展开了三军会合、机动歼敌的局面。

注 释

〔1〕陈粟，指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

〔2〕立煌，即今安徽省金寨县。1932年，国民党政府为表彰卫立煌率国民

党军队攻克金寨县的“功绩”，改金寨为立煌。1947年解放时恢复原名金寨。〔3〕新式整军，即人民解放军1947年冬到1948年春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经过新式整军，全军指战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军内外团结，部队战斗力得到加强，对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4〕四平街的胜利：1948年3月13日，东北野战军攻克吉林重镇四平，全歼守敌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共2万人。〔5〕打死胡宗南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歼灭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的大胜利：指宜川战役。1948年2月24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地区围城打援，全歼敌整编二十九军等部共2万9千人，击毙军长刘戡，被毛泽东同志誉为西北战场上的“第一个大胜仗”。〔6〕解放洛阳的胜利：1948年3月14日、4月5日，陈士榘、唐亮兵团和陈赓、谢富治兵团两次攻克洛阳，歼敌2万4千余人。〔7〕山东胶济路西段的大胜利：1948年3月11日至19日，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歼敌3万8千余人，克复城镇14座。

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 *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我军斩获之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加速了全中国解放的进程。

这次战役，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策，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筹指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由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华东、中原地方部队并肩作战，而共同完成的。当时我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作为此次战役的参加者，仅就中原野战军在战役中的行动作一回顾，以供研究探讨。

一、作战方针和战役准备

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过去两年我军的作战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规定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歼敌的任务。中央军委要求全军应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左右，其中规定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旅左右，并攻占鄂豫皖3省若干城市；指示全国各战场发起秋季攻势，中野协同华野作战，歼灭中原敌人，解放全中原；尔后协同各兄弟 * 本篇是李达同志1985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的回

忆史料，1986年10月定稿。

野战军，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之深远后方。9月6日，正在中央开会的邓小平政委写信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传达了会议精神，特别强调提高纪律性，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况，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是1947年7月、8月间开始的。我中野部队跃进大别山，在华东野战军协同下，以品字形展开于江、淮、河、汉之间，转战中原一年中，主力一部地方化，发展地方武装21万，创建了皖西、鄂豫、桐柏、江汉、豫西、陕南、豫皖苏等有3000万人口的7个解放区，把敌人赖以进攻我军的后方，变成我军继续大量歼灭敌人，发展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1948年7月底至8月初，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豫西宝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指示，决定在过去半年作战和整党、新式整军的基础上，再以两个月时间进行整党整军。8月、9月间，中野部队深入进行形势与方针任务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发扬民主，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团结，激励斗志，掀起以提高大兵团作战和攻坚作战的战术技术为重点的大练兵运动，增强了打更大胜仗、解放全中原的决心和信心。

打 郑 州

发起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1948年9月24日首先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的。刘伯承、陈毅司令员接此电后，在河南宝丰大张庄研究了差不多一天，我也在场。9月25日上午，刘、陈首长和我电告军委并华野：“粟24日7时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毛主席拟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1〕。同日，中央军委又电刘、

陈、邓、李（达）：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刘、陈、邓首长遵循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研究拟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10月13日，中央军委即予批准，同意“按你们所规定的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打援”。同一天，邓小平政委在军区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旋即，中野首长召集第一、三、四、九纵队领导干部在郑州西南的宝丰县皂角树村开会，专门研究部署攻打郑州的方案。18日，颁发了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杨勇、苏振华、陈锡联、阎红彦、陈赓、谢富治、秦基伟、李成芳等分率各纵进入指定地点，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及附近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准备发起郑州战役。陈毅、邓小平和张际春于19日下午，从皂角树出发，驰往郑州前线第四纵队司令部指挥。至21日夜，我军实施对郑州之敌的包围。22日拂晓，郑州守敌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第一六师、第九十九军第二六八师和郑州警备司令部等万余人弃城北逃，被我第九纵队全歼于郑州以北之老鸦陈地区，生俘敌少将参谋长余辉廷。郑州宣告解放。

开封敌慑于我军之威力，24日弃城东撤。我豫皖苏军区部队收复开封。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解放郑州极为关注，连电嘉勉：“占领郑州甚慰。”“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此祝贺。”开封收复后，中央军委指出：“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拖住张淦、黄维兵团

拖住在武汉方面的白崇禧集团，使其不能抽兵东援，保障华野顺利投入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是中野的又一个作战任务。在陈、邓、张〔2〕指挥中野主力发起郑州作战的同时，刘伯承司令员率中野第二、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及江汉、桐柏两军区主力，把敌张淦、黄维两兵团引向平汉路西大洪山与桐柏山区。郑州解放的当天，刘司令员、邓子恢副政委和我曾就摆脱白崇禧集团包围，抑留张淦、黄维兵团的部署问题，报告中央军委：我们已令二纵、桐柏、江汉主力于20日夜转移至随县以南之尚家店、古城贩、三阳店地区，拟南下钟祥地区，寻歼弱敌，以拉张淦向南；令六纵于21日夜转移新野西南之新店、桓铺南北地区，捕歼向邓县地区之第十五军部队，目的是抑留黄维在西。10月22日13时，中央军委电示华野：“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第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广两纵〔3〕，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此期间，当敌人分路向随县、枣阳、桐柏、唐河地区进犯时，我第二十八旅随同二纵又进到随县以南地区，配合江汉军区部队于10月25日攻克应城、安陆，歼敌第二十八军军部等4000余人，副军长顾心衡被俘，将张淦兵团吸引在大洪山区。同时，我鄂豫、桐柏军区主力结合群众，破击平汉路南段，威胁武汉；我六纵、陕南第十二旅围攻在南阳

以南下薛集的敌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把黄维兵团拖在桐柏山区。10月24日，蒋介石令黄维兵团进至周家口地区机动。由于我中野的上述行动，该敌迟至10月底才得以向平汉线上集结，旋即由确山东进。

不出淮南佯攻徐州

中央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示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复于25日3时，指示陈、邓率中野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10月26日，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个建议，毛主席拟电复示：“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10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28日进一步指示：“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并指出：“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得知中野不出淮南，于10月31日23时向中央军委建议，淮海战役即将发起，这次战役规模很大，请已到达前线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同一天，陈、邓向军委提出了配合华野作战的3个方案，表示“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钳制邱、孙两敌之任务”。代表了中野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复陈、邓、粟，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3个方案中选择1个，由陈邓临机决定。”此时，华野正在部署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佯攻徐州。刘伯承司令员则指挥二、六两纵（包括陕南部队4个团、一纵的二十旅、豫西1个团），分别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和花园、宣化店，向息县方向侧击、尾击黄维兵团，造成与华野合攻徐州的态势，以迷惑敌军。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和准备已告完成。

二、切断徐蚌线，协同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

中央军委在部署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于10月22日13时指示中野“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一行动“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毅、邓小平当天复电军委：完全同意中野“直出徐蚌，牵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11月2日，陈、邓根据孙元良、刘汝明、邱清泉位置的变化，又提出3个新方案。其第二方案为：如邱已缩徐州，刘在砀山、黄口，孙在宿县南北，我则以三、广两纵及赵健民部割断徐州与刘汝明联系，并积极由西向东攻击徐州。我以1个纵队以上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并由南向北攻击徐州。主力位于铁路西侧，吸引孙兵团北援所部歼灭之。11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子恢副政委和我在豫西研究落实军委指示时，着重讨论了截断徐宿线的时机问题，向军委及陈、邓建议：“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斩断徐宿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陈、邓首长当天正在拓城西北的刘楼，于深夜进至亳县。军委、毛主席于5日电示陈、邓：“第一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11月5日，中野主动进入商丘东南地区，发现敌第四绥靖区部队停留在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陈、邓首长当即决定举行汴（开封）徐（州）段作战，先歼

该敌，吸引邱兵团西援，配合华野作战。在华野发起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的第二天，即11月7日，中野第一、三、四纵队，华野三、广两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始攻击。敌东撤，我第一纵队在兄弟纵队的配合下，追至张公店地区，全歼敌第一八一师5000余人，俘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米文和。8日，我第四纵队在陇海沿路歼灭正向徐州收缩的邱兵团2000余人，解放碭山，威逼徐州。

整个战局的发展很快。淮海战役将发起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

束，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华北、西北我军已全面展开攻势，平津战役也在部署。在淮海战场，中野主力在解放碭山之后，向徐蚌线逼进，两大野战军已经靠拢。敌黄百韬兵团遭华野分割追堵之际，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部在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的运河通道，使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刘峙之邱、李、孙3个兵团慌忙向徐州收缩。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于11月9日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又于9、10、11日连续多次致电陈、邓：“务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并指出：“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足见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包围，对于争取淮海战役全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1月10日，刘司令员率中野前指从豫西东进淮海前线，同陈

司令员、邓政委会合。他们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攻打宿县和切断徐蚌线的问题，并决定于12日发起徐蚌作战。

我四纵和华野第三、广两纵队在徐州以南的夹沟地区，追歼从

宿县北撤的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军部及所属第一二二师，俘敌3000余人。军委、毛主席13日指出：“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14日，该部在三堡地区又歼三绥区残部第七十七军军部和第三十七师4000余人，并逼近徐州。我三纵于12日包围敌交通补给基地宿县城。守敌恃高厚的城墙、坚固的永久工事和宽深的护城河进行防御。15日17时，我三纵在九纵一部协同下，发起攻击，经数次强行架桥，连续爆破，突入城内。击退敌人多次反扑，逐街争夺，激战至16日凌晨，终克宿县。计歼敌第二十五军之第一四八师、交警第十六总队等12000余人，俘敌津浦护路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豫皖苏独立旅、军分区部队和豫西两个团，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了曹村至固镇间的铁路200华里。这样，以宿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已控制在我军手中，斩断了徐蚌间敌人北援南逃的通道，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任务，保障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并使原定在淮阴、淮安、海洲地区展开的会战，发展为在以徐州为中心，陇海、津浦线两侧广阔地域内进行的大规模南线决战。徐州告急，黄维兵团奉命于11月8日由确山东援。中野已部署二纵经宣化店、息县向涡阳、蒙城方向急进，沿途侧击敌人；六纵和陕南第十二旅附豫西1个团，经方城、周口，尾击、侧击敌人。该两部于15日超过黄维兵团，在涡阳、蒙城地区阻敌东进。豫皖苏军区部队和一纵第二十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积极破坏敌人必经的道路、桥梁、渡口，并沿洪河、泉河、颍河，阻击、迟滞和消耗敌人，各部指战员忍饥冒雨，不分昼夜，不顾疲劳，紧紧咬住敌人，完成了牵制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15日，刘汝明兵团（即第八兵团）重占固镇，李延年兵团（即第六兵团）亦

积极北援；黄维兵团也进至阜阳西南。为确保华野作战，刘、陈、邓首长指挥中野九纵及豫皖苏独立旅、豫西两个团，在任桥一线向固镇方向布防，阻击刘、李两兵团北进。一纵开赴蒙城，沿涡河、淝河布防，准备阻击黄维兵团。二纵、六纵进至蒙城、涡阳地区，以一部沿河布防。三纵、四纵则进至宿县西南地区待机。18日，李延年兵团由蚌埠经固镇、大店之线向诸兰，刘汝明兵团由固镇向宿县，向我九纵、豫皖苏独立旅进攻，我顽强阻击，阻敌于任桥、花庄一线。至22日，黄维兵团被我阻于浍河上游的赵集地区，4天只推进了60华里。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解放徐州东、北广大地区；中野攻占宿县，斩断徐蚌联系，解放徐州西、南广大地区。从而陷徐州之敌于孤城，使援敌黄、刘、李兵团不能靠拢徐州，为淮海战役顺利发展，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总前委统筹全局

随着战局的发展，华野、中野并肩战斗，战役规模战区范围越

打越大，后勤支前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于11月14、16日电示华野、中野：鉴于徐州集团是个大敌，“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并指示：后勤保障和支前等事宜，“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

总前委的成立，对及时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协调华东、

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战区党政军民全力支前，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总前委临机处置了许多重大问题。我在这里介绍确定打黄维兵团的经过，领导后勤支前和指挥活动的一些情况。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敌军主力被分割在3个地方：邱、

李（弥）、孙3个兵团在徐州及其以东；李（延年）、刘两兵团在蚌埠及其以北；黄维兵团进到南坪集以南。总前委根据这一态势，曾提出下一步作战设想，将中野和华野一部转用于南线，打击黄维或李延年、刘汝明兵团。11月14日，刘、陈、邓电呈军委：如敌出永城或宿县，我以集中中野6个纵队及华野两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因黄维兵团“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19日9时和17时，总前委又两次电呈军委，阐述决心先打黄维的理由。认为华野6个较能攻坚的纵队，12昼夜尚未歼灭黄百韬，“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且“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而以中野“现有6个纵队，单独对付两路大军困难颇多”，“如果实行钳制黄维打李延年5个军，至少须5个纵队，但以1个至两个纵队防御黄维均无把握”。因之，建议在“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3兵团，争取休息10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11月21日，中央军委和华野首长均表示同意刘、陈、邓关于集中打黄维、李延年的提议。当时，邱、李、孙3个兵团紧缩于徐州一线，不易割裂；李、刘两兵团到达任桥、花庄集后迟迟不前，向宿县冒进

的黄维兵团，被阻于浍河以南的赵集地区，距徐州尚有 200 里之遥，与李、刘两兵团也有 40 里之隔。且黄维兵团被我军辗转牵引桐柏山区近 20 天，已相当疲惫；又孤军东援，连续行军 500 华里，沿途遭我不断打击，消耗较大，处于运动之中。再加上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部队士气，必受影响。这些，都构成了我围歼黄维兵团的有利条件。基于此，刘、陈、邓首长于黄百韬兵团被歼的当晚，即 11 月 22 日晚，在总前委指挥所驻地周殷圩，召开了中野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了打黄维的部署，预定 23、24 日正面阻敌两天，以后俟机出击。23 日，中央军委在祝贺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的电报中指出：“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中，大量歼灭南面敌人，即使敌人这样做，我们亦有可能实现原定计划”。刘、陈、邓即于当夜请示军委：现在“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刘、李更属有利。如果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

11 月 24 日 15 时，军委、毛主席电复总前委：“（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4〕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前委很重视统筹领导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以中野为例，邓

小平政委在淮海战役打响前就指出：大战迫近，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尽大力把弹药、粮食运到前线。并指定我协助邓子恢副政委，组织后勤支前工作。郑、汴解放之前，华北的弹药运到中野部队，须几经辗转：先从豫北运抵洛阳，再通过洛河水运至黑石关，最后还要靠汽车和人力才能送到部队。秋冬之季多阴雨天气，运输更无保证。当时中野弹药亟待补充，拿野炮来说，只四纵有两门；山炮总共 42 门，炮弹 200 余发；步兵炮 4 门，炮弹 10 余发；207 门迫击炮，每门炮只有 1 发多炮弹；至于步马枪、轻重机枪的弹药，则不足一个基数。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是很难投入大规模作战的。郑、汴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为我掌握，我们在组建郑州警备司令部和郑州铁路管理局之后，于 1948 年 11 月 19 日呈请总前委并报中央军委，拟组织一个交通司令部，以专司铁道、汽车，船舶、车马和人力运输诸事宜。交通司令部直辖：兵站；辎重第一、第二两团（以缴获的 200 辆汽车装备）和第三团（以胶轮大车 200 至 300 辆组成）；交通警备团（由豫皖苏和豫西两军区抽调 1500 人组成）；技术修理部门。调文建武任交通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到职前暂由我兼任），杨国宇任副政治委员。11 月 30 日，军委和总前委批复同意，并增调李静宜为副司令员；同时指示我们在郑州设立军区办事处，以刘岱峰为主任，赵增益为副主任。华北地区支前的装备和中原的粮草供应，均由火车直运前方，不仅及时解决了中野参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对支援华野作战，也起了一定作用。1948 年 12 月 12 日，邓子恢副政委和我曾电告粟裕、陈士榘、张震：“我们从郑州送中钞〔5〕2 亿到商丘，请华野派人接收使用。亥齐（12 月 8 日）知华野可在汤山车站接收粮食，即令刘岱峰于亥灰（12 月 10 日）从郑、汴搜集现粮 65 万斤，车运碭山；又令豫西第一、四、五分区分区赶运小米 700 万斤、小麦 300 万斤，共 1000 万斤，送郑、洛、巩（县）等处上火车东运，小米直运汤山，小

麦则在郑州磨成面粉再送。”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总前委5位成员只在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于12月17日在萧县东南蔡洼，即华野前指驻地，召开过一次研究向中央汇报情况的会议。总前委对战役的指挥通常由3位常委酝酿决定，以电报、电话同粟、谭磋商实施。战况紧急时由常委临机处置，重大问题报告军委。每项作战计划决定之后，邓政委就承担起组织实施和前敌指挥的大量日常工作。刘、陈司令员年事稍长，因此，也大多由邓政委担任夜间值班，掌握和处理攻歼作战的情况。加之分工我在后勤司令部协助邓子恢副政委组织支前工作，属于中野司令部掌管战斗保障工作，亦须邓政委亲自过问，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负担。为便于指挥，总前委指挥所11月22日从周殷圩移驻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村（23日），并向华野和中野三纵、一纵延架了电话线。中野各纵队互相架线，把双堆集围绕起来，周长约130到140华里。总前委通过电话指挥，极为便利。小李家村位于徐宿铁路与徐（州）阜（阳）公路之间，是敌3路大军南北对进的预定会合地，每天均有几批敌机临空侦察或过往。总前委指挥所设在这里，是敌人意料不到的。战役指挥员靠近前沿，对于适时掌握敌情我情，临机处置，非常重要。12月上旬，杜聿明集团被华野合围于永城东北之陈官庄地区，总前委常委指挥所12月3日迁至纪家，7日复返小李家村，距南北两个被围的敌重兵集团仅几十华里。到12月23日，前指又转移到周殷圩。刘、陈、邓首长常常在黄昏时乘车前往部队视察，直接掌握战场情况的演变。由于他们在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指挥所又紫靠前线，使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12月30日下午1时15分刘、陈、邓率前指出发，于当晚7时

到宿县兵站宿营。31日凌晨：时20分由宿县搭火车北上，7时许达徐州车站，当日下午1时又专车西进，晚6时到宋集车站，宿朱集营房。1949年元旦，由朱集迁至阎集东北的张菜园，在此指挥了围歼杜聿明部作战，直到淮海战役结束。

四、在华野协同下围歼黄维兵团

黄维所率第十二兵团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辖有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军（含第四快速纵队），共12万余人。其中第十八军为陈诚一手培植，美械装备，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生，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

我中野参战部队有7个纵队和2个旅。部队自转战大别山后，

未能得到及时补充。如第一批南下大别山的4个纵队和野直共11.5万人，3个月后即减员3万余。还有一部分富有战斗经验的纵队、旅、团干部，被调到新开辟的军区和地方上工作。到淮海战役打响时，以兵力来说，除一、四两纵各有9个团外，其余均只有6个团。九纵只有5个团。平均每个纵队仅有15000至16000人，其中二纵、十一纵不过12000至13000人。可参战的总兵力在12万人左右，与黄维兵团相当。再说武器，因部队减员很多，有些武器不得不埋在大别山。为了轻装，我们还忍痛炸掉了一些重炮。战前，除了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步兵炮和200多门迫击炮外，基本作战武器是轻重机枪、步马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不足。因之，武器装备处于明显的劣势。中野要歼灭蒋介石的这支“王牌”军队，的确是很吃力的。但是，为了实现中央军委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意图，遵照总前委指示，中野毅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与黄维兵团进行决战。邓政委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

这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为了全局而知难犯险的胆略，极大地感染了部队全体将士。各级领导在动员中，反复强调战役的重要性、整体性、持久性、连续性，和顾大局、识大体的精神。首长带头，自上而下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全力以赴，不怕一切困难，不借最大牺牲，为歼灭黄维兵团，解放全中原，贡献全部力量。（一）包围黄维兵团。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于11月23日发起，至12月15日结束，历时23昼夜，分为3个阶段。11月23日至24日为阻击作战阶段。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地区后，遭我连续、顽强的阻击、尾击，已有相当损耗。23日清晨，黄维为协同李、刘两兵团接应徐州之敌南移，以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十八军居中，第八十五军殿后，在空军和坦克掩护下，向我南坪集四纵阵地猛烈进攻。我军顽强阻击，予敌以沉重打击。当晚，刘、陈、邓首长作了大胆部署：令四纵放弃南坪集，转至徐家桥、朱口、伍家湖、半埠店一线，在浍河北岸让出一块地方，诱黄维兵团进入预设于宿县西南的袋形阵地。24日上午，敌先头部队第十八军强渡浍河，进入我袋形阵地时，发觉其处于不利态势，下午即向南岸退缩。我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7个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豫皖苏独立旅，于当日黄昏乘机全线出击，激战至25日晨，歼敌数千，将其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忠义集、王朱庄、马家楼、双堆集地区。11月25日至12月2日为紧缩包围、准备攻击阶段。25日晨，我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在任家以北，东坪集、沈寨、邵围子地区；六纵、陕南十二旅在周庄、小张庄以西地区；第一、二、三纵在小张庄、马庄、任家地区，构成了对敌军的包围。六纵第十八旅在豫皖苏军区部队配合下，在大营集地区歼灭了合围圈外向东南逃窜的敌人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26日下午，刘、陈、邓报告军委：“截至现时止，我已将敌压缩在东西不到20里，南北10里左右，六七个大小村中（这是当时的估计，实际不止此数）。敌人始终企图向东南突围，今日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多次攻我阵地，均未得逞。其粮食已极困难，且无宿营地，但仍逐村顽抗。我们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利用炮击，最后歼灭的战术。”“全歼该敌，已大致肯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当日20时复电：“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军委提醒我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在头两天的战斗中，我军从运动战仓促转入阵地攻坚战，对敌防御能力估计不足，部队有急躁情绪，受到一些挫折，已引起刘、陈、邓首长的警惕。果然，黄维自恃重兵，于27日集中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第一一八师，第十军的第十八师，第八十五军的第一一师4个主力师为第一梯队，在飞机、坦克、炮兵掩护下，向双堆集东南我六纵、陕南第十二旅阵地发起持续猛烈的攻势，顽强突围。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周乘突围之机，率部起义。在反击黄维突围作战中，部队打得非常英勇。如第十二旅第三十五团第一营扼守小李庄阵地，打退敌军10多次冲锋，毙敌千余，保住了阵地。但该营的200多人只剩下40多。又如28日，敌第十八军以3个团的兵力，配以12辆坦克，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第十七旅第五十团第三营马小庄阵地强攻，发射炮弹数千发，摧毁了地堡和前沿工事，把村内房屋几乎打平。我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主动增援，终将顽敌击退，付出代价亦不小。邓政委总结这几天的战况时曾说：对付敌人每一次的出击，我们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对付敌步、炮、空、坦克的联合进攻，实属艰苦。

28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曾乘机飞临双堆集阵地上空

视察，并和黄维通话，要他“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还许诺“空投粮弹补给”。黄维连续突围无望后，于29日再次调整部署，采取环形防御，固守待援。其部署力：第十八军守平谷堆、尖谷堆，作纵深防御；第八十五军守腰周圈、李庄地区，向西防御；第十四军守张围子、杨四麻子地区，向东防御；第十军守马围子至杨庄、李庄间，向北、南防御；兵团部位于小马庄，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构筑了临时机场。他还下令将所有的汽车装满土，同被打坏的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构成如城墙般坚固的防御工事。并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每天抽调1至3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突击。中野首长重新估量了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认为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应把作战时间延长为10天左右。中央军委认为还可以把时间打宽裕些，“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10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还指出，“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66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据此，中野首长提出“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稳扎稳打，逐点攻击，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构筑纵深坚强的攻防阵地，利用敌军突围或出击之时，予以重大杀伤。这样，经我指战员艰苦围攻，至12月2日，迫使黄维兵团猬缩到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的“死亡圈”中。此时，敌军人乏弹缺粮绝，被歼及起义者达3万多人，全兵团的机动突击力量只有七八个团了。

我军在总攻准备中，普遍推广了两项卓有成效的战术和技术。

这是各部队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的结晶，它弥补了我军炮火不足的弱点。一是推广第十一旅和第二十二旅在战前试制成功的“飞雷”（也叫“土飞机”），即炸药抛掷筒。就是把20公斤左右的炸药制成状如西瓜的“飞雷”，以抛掷筒射击，射程可达150米左右，威力相当大。敌人称之为“特大威力炮”。一是“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进行工程浩大的近迫土工作业，逐步向敌阵地延伸工事。这是减少我军在开阔地冲锋时被敌杀伤的一个有效办法。每当夜幕降临，指战员带上工具，隐蔽地向我军前沿运动，在距敌阵地60至70米时，卧倒排成一条“人龙”，瞬间就挖成许多卧姿散兵坑。接着，由卧姿挖成跪姿、立姿，再挖成能隐蔽和运动部队的交通壕。几天之内，各纵队即完成了纵横交织的、从四面八方伸向敌阵地的交通壕及散兵坑，构成了完整的攻防阵地。为防敌坦克、大炮、飞机破坏，我采取多路沟壕同时并进的方法，以步、炮相互支援，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进行艰苦作业。

12月1日，陈毅通过电话对粟裕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

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刘伯承则风趣地把这一战役部署比喻为胃口很好的人上酒席，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挟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说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此期间，为保障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作战，华野组成两个阻击兵

团：主力北阻由徐州南犯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1个纵队力挡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他们勇猛奋战，粉碎了敌人援救黄维的企图。当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向西南方向撤退时，华野全力猛追逃敌，于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6日，

孙元良兵团在向西南突围中被华野歼灭。

（二）总攻双堆集。

黄维兵团与杜聿明集团被围后，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

两兵团向双堆集方向增援；蒋介石又从武汉方向抽调两个军进至浦口。总前委决定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尔后再歼杜聿明集团。遂调集战役总预备队，即华野七纵、十三纵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加强总攻力量。同时，令中野二纵加入阻击李延年的作战。

从12月3日到15日夜，为围歼黄维兵团的第三阶段，即阵地

歼灭战阶段。12月5日，中野首长下达了《对黄维兵团总攻击命令》。根据黄维兵团的防御态势，我总攻部队分为3个集团：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等为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先歼灭位于双堆集以东的沈庄、李围子、张围子和四个杨庄的敌第十四军残部及第十军之第七十五、第一一四师；以华野第十三纵、中野第一、第三纵组成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歼击双堆集以西之后周庄、小马庄、马围子、三官庙、葛庄、许庄的敌第十军之第十八师、第八十五军各一部；以中野六纵、华野七纵和陕南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歼击双堆集以南之敌。

各部队虽经连续战斗，伤亡较大，但士气愈战愈高，战斗力愈

战愈强。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伤亡后，由班长、战士，甚至司号员、卫生员自动代理。总攻前，各部队又进一步动员，实行火线整编，教育争取解放战士，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歼敌战术，加强通信联络、后勤支前等各项保证工作。各部队普遍提出，哪怕1个旅编成1个营，也要为全歼黄维兵团战斗到底！

12月5日，我和邓子恢副政委又将截获的一份电讯报给刘、

陈、邓和军委并粟、陈、张：“谍息：杜聿明支（4日）午决不顾状况如何恶劣，采逐次闪进战法，装甲车掩护部队向东楔形突进以与黄维会师，并要求李延年向北采积极行动。同时请求空军协同作战，空投粮弹。”12月6日下午4时30分，刘、陈、邓首长命令发起总攻。各集团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实施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至7日晨，攻占了李围子、李土楼、周庄、宋庄、东马围子等地。此后，我军昼夜不停地对敌猛攻，不使其喘息，我军愈战愈勇，攻坚能力不断提高，伤亡逐日减少，战果日益增大。敌军在我连续猛攻下，猬集一团，以村舍为核心，以地堡群为骨干，作困兽斗。他们每天以1个营至2个团兵力在坦克、炮兵和空军掩护下，向我反击。我军则依托纵横交织的交通壕和散兵坑，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击前进。每晚以“两点攻击，一点成功”，或“三点攻击，两点成功”，“四点攻击，两点成功”的战法，压缩敌阵地，进展显著。正当黄维兵团遇我猛攻之际，蒋介石于8日给黄维及所属各军长写了亲笔信，签署了给第十二兵团全体官兵的“嘉奖令”，连同早已准备好的毒气弹使用说明书，分别空投给该兵团。然而，黄维兵团官兵却把蒋介石的“嘉奖令”看成是“催命符”，一见这道“催命符”就知道“快完了”。蒋介石给黄维的信中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黄遵此于9日致空军副总司令官王叔铭电被我截获，我们即上报总前委和军委：“谍息：黄维亥佳（12月9日）致王叔铭谓：南兵团如两日内可会师，渠则仍勉力固守，否则有要求派飞机降落双堆集接其逃命之意。”可见，黄维将军这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我各集团越攻越猛。

中央军委 10 日 3 时致电总前委：“各电均悉。对黄维的攻击逐步奏效，对李延年的钳制亦有办法，甚慰。尚望鼓励全军全歼该敌。”激战至 13 日，我东集团占领沈庄、杨围子、杨庄；西集团攻克东西马围子、周庄、腰周圈、小马庄；南集团拿下李土楼、小周庄、大小王庄等地。歼敌第十四军全部，第八十五军、第十八军一部，将敌压缩在不到 3 华里的狭小地域内。敌军死伤枕藉，饥寒交迫。早在 12 月 5 日，黄维曾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被我截获。该电说：“黄维 5 日以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 1/10，弹不足 1/3，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到了此时，其官兵更是饥饿难挨，竟然为争夺空投粮食而互相残杀。我军抓紧政治攻势，敌纷纷携械来降，整连整营整团，以至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师部及两个团向我投诚。刘伯承、陈毅两将军于 12 日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希图在弹丸之地顽抗到底，并于 12 日、13 日两次呈请顾祝同准其向我军施放甲、乙两种毒气弹，以封锁我军。总前委为速歼黄维兵团，13 日又调整部署：以南集团为主，东西集团配合，并调华野三纵和十三纵加入南集团作战，南集团改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鲁中南纵队为战役预备队，对拒绝投降的敌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14 日夜，南集团攻占敌临时机场南端及尖谷堆，东集团攻占杨老五庄、杨子全庄，使敌军核心阵地完全暴露。15 日黄昏，敌军残部向西突围。我各部立即堵击、追击，于当夜 12 时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仅副司令官胡琏等率少数人逃脱。与此同时，华野六纵和渤海纵队第十一师，中野二纵和豫皖苏军区 5 个团，在固镇、新桥、曹老集一带阻击李、刘兵团。敌以 8 个步兵师、1 个战车大队，昼夜向我猛攻。我顽强阻击 12 天，歼敌万余。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军 1 个兵团部（不含孙元良兵团）、4 个军部、11 个整师（其中 1 个师起义），共 10 万余人；阻击并部分歼灭南北援敌，将杜聿明集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我中野部队也付出了伤亡 3 万余人的代价。12 月 16 日，我军开始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于 16 日夜撤向淮河以南地区：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处于内缺粮弹、外无援兵的绝境。总前委指示，在华野战场休整期间，中野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并担任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华野于 1949 年 1 月 6 日发起总攻，经 4 昼夜激战，至 10 日全歼杜聿明集团。

伟大的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我军全歼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5 个兵团部、1 个绥靖区司令部、22 个军和 56 个师（其中 4 个半师起义），共 55.5 万余人。

五、关于淮海战役的意义和围歼黄维兵团的一些体会
淮海战役刚刚发起，中央军委就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预见。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淮北地区完全解放，长江下游以北的淮南大部地域入我掌握之中，使中原和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更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援，分路南下，迅抵长江北岸，直接威胁南京、上海、武汉等重镇。这就为我军渡江作战，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决策、

作战方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发挥集体智慧，统筹领导和临机处置，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三大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的结果。正如中共中央的嘉奖电所说，是“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淮海战役已经过去38个年头了。今天回顾这段经历，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得战役刚结束，刘、邓首长就嘱我组织中野各纵认真总结一下作战经验，尤其是双堆集作战的经验。不久，中野司令部编辑了双堆集作战经验汇集，请刘、邓首长题词。刘司令员挥毫写道：“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为承先启后的关键。”双堆集作战是中野在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激烈的围歼敌主力兵团的村落攻坚作战。因为对手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其兵力之多，装备之现代化，工事之强，抵抗之坚决，都是中野第一次遇到的。中野在坚持大别山、转战中原之后，部队消耗很大，兵员不足，装备又差，但仍能在华野配合下勇胜强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于作战的艰苦程度，恰如邓政委1949年1月11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说：在总攻的时候，中原各纵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战后各纵队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许多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我仅就中野在华野协同下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行动，谈一些粗浅的体会。（一）总前委审时度势，决心先打黄维兵团。总前委基于对战场形势发展变化的分析，在第一阶段作战将近结束时，即建议将主力转用于南线，以歼击黄维为上策。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总前委认为邱、李、孙紧靠徐州，李、刘背靠蚌埠，均不易抓住；而黄维兵团孤军冒进，易为我军围歼。遂于11月23日向军委报告：现在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中野首长又以勇挑重担、破釜沉舟的决心，全力以赴，在华野大力协助下，取得了全歼黄维兵团的胜利。前线高级指挥员这种把握全局，审时度势，临机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宏伟胆略，是由于他们深刻领会并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军委关于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战略意图，因而取得了最佳战果。

（二）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适时变换战法。

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作战的头两天，是在运动中实行阻击，预置

囊形阵地诱敌深入，转而全线出击，猛力向心合围。敌被围后，我全面封闭敌人，紧缩包围圈，以顽强的拦击对付敌人大规模突围。继则根据敌顽强固守和我军炮火不足的特点，提出“坚决持久围困敌人”的方针，采取稳扎稳打，逐点攻坚的战法；强调抓住敌人每次出击之机，在运动中杀伤敌人；解决阵地编成，进行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把交通壕逐步延伸到敌人的前沿阵地，甚至进入敌人第一道鹿砦之内，构成了完整的进攻阵地；组织火力，把全部炮火集中使用，普遍推广炸药抛掷筒。待投入战役总预备队，发起总攻时，各纵队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猛烈杀伤和压缩敌人，最后终于全歼守敌。刘司令员对此总结说：“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

（三）坚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淮海战役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邓小平、张际春领导下，在前阶段整党整军的基础上，更为活跃。首先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学习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总前委关于先打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确立勇挑重担，破釜沉舟，敢打更大胜仗的信心与决心。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深入部队，帮助做好战前动员和战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强调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加强团结，密切协同，顾全大局，为了整体不惜牺牲局部和个人利益；发扬不怕困难，艰苦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把战斗动员、作战行动，和开展军事民主、火线练兵、火线评查结合起来；和群众性的思想互助、立功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勇气和信心建立在坚实的自觉基础之上。至为重要的还有，在战斗激烈、情况多变、伤亡又大的情况下，以最大决心一再进行火线整编，始终保持战斗建制，部队也始终保持着坚韧顽强的战斗力。这一工作的关键，一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的模范带头作用，及时吸收积极分子火线入党；二是要坚决果断，及时编并调补，大胆选拔干部，补充缺额。（四）在军事打击下，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当敌军被围，进行突围和反击时，我地下党员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正选择在敌人以4个主力师（含第一一师）向我猛攻的最高峰时机，因而极大地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士气。当敌军被围在弹丸之地，饥寒交迫之际，我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阐明我军政策，指出敌人生路。各前沿部队采取喊话、广播、散发宣传品、张贴标语及释放俘虏等多种形式，对敌军进行争取和瓦解工作。于是，敌人纷纷来归，成连成营建制，以致师长黄子华率第二十三师师部和两个团向我投诚。我军坚决执行俘虏政策，重视争取俘虏工作，被俘士兵经过短期教育，甚至当天就补入连队，这些解放战士成为我军补充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五）党、政、民全力支前，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无限威力。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重视这次淮海决战的后勤支前工作，曾一再指示总前委会同中原局、华东局与华北局统筹解决全军和民工130万人3至5个月的粮草、弹药和10万至20万伤员医治等项问题。周恩来副主席对此也十分重视，委派杨立三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我们请示中央的电报，周副主席亲自过问，件件有具体批示。

战役开始前，鉴于中野粮弹缺乏，严重减员的状况，刘、邓首长强调，一定要把后勤支前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来抓。指定我协助邓子恢副政委组织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工作。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把动员支援前线，作为高于一切的任务。邓子恢副政委要求书记们亲自到前线，不惜打烂坛坛罐罐，其他工作，打完淮海战役再说。

人民群众全力支前，提出了“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许多乡亲自动把房子拆了，把房梁、门板送给部队筑工事。不少群众把谷种也拿出来支前。我曾亲见，乡亲们饿着肚子把热气腾腾的馒头、大饼送到前线部队。战士们拿着馒头，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不打胜仗，对不起人民哪！”可以说，为支援淮海战役，人民群众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仅豫皖苏地区，就支援米、麦2.485亿斤，绿豆、黄豆、花生540万斤；派出民工200余万人以上，担架8万余副。据中原局1949年2月9日报军委和华东局电称：中原在淮海战役中，供给华野粮食4.3亿斤，已超过徐州后勤会议规定的数目。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力量！正如陈毅

司令员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非常形象、深刻地说明，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前后方党政军民共同谱写的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援，就谈不上淮海决战的胜利。

38年前，当我们总结作战经验时，邓小平政委曾在题词中嘱

咐：“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重温这段话，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淮海战役的经验，有

些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的。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们指挥淮海战役的伟大实践，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他们为建立新中国的献身精神，对于教育后人和研究、指导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把老一辈当时在战略全局上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决战的宏伟气魄，作为坚持改革，“继续进步的基础”，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激励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伟业，而团结奋斗！此稿正在修改时，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刘伯承元帅辞世了。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在军事理论、指挥艺术和参谋工作上，向他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永志不忘。奈何顽疾缠身，悲切难言，谨以此文，敬献在刘老灵前，作为对他的悼念！

注 释〔1〕孙兵团，指孙元良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第十六兵团。〔2〕陈、邓、张，指陈毅、邓小平、张际春同志。〔3〕三、广两纵，分别指华东野战军的第三纵队、两广纵队。〔4〕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同志。〔5〕中钞，即中州市。因华北老解放区钞票在新区不通用，1947年尚使用银元。1948年中原局决定在郑州设立中州银行，印制中州市，以在中原地区流通。

百万雄师过大江*——回顾第二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一、渡江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诸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的作战部队只剩下 100 多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实际上已丧失了有效的防御能力。国民党内部也陷于四分五裂、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1 日发出求和声明，企图边和谈边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在江南布防，阻我军于长江以北，造成以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局面。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 1 月 14 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以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同时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力。中共中央在 1 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 1949 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本篇是李达同志 1986 年 6 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的回忆史料。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总前委于 2 月 9 日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毛主席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部署、战术、准备及支前等问题。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5 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为适应今后的艰巨任务，我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 1948 年 11 月 1 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于 1949 年 2 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张际春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担任参谋长，2 月 19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伯承、小平、际春、陈赓、李达等 5 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小平为书记。

经过此次整编，第二野战军达到 28 万余人，有各种火炮 1500 门。整编后，二野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

二、渡江的准备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分割南北的天然屏障。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长江沿岸，在依赖黄河天险失败之后，又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汤恩伯集团所辖 75 个师 45 万人，其中有 50 多个师直接担任由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主力则在京沪地带。其余 20 多个师分置于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仅有 10 个师可以机动。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白崇禧所辖有 40 个师 25 万人，其中 27 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的守备任务，另以 13 个师配置于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此外，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空军主力分别配属汤、白两集团，构成了陆海空联合防线。再加上天险长江，恰似“铜墙铁壁”一

般。

刘伯承同志编译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赶在渡江战役之前出版了。刘司令员在该书的编译前言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他说：“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时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于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作。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作了。汉口以下长达 2000 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1〕”

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呢？刘司令员认为，“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2〕”这些精辟分析，为我二野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一）关于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问题。这是确保渡江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中共中央和刘邓首长早就交代我们司令部进行侦察和收集资料了。还是在挺进大别山的初期，中央曾指示我军派一支部队秘密渡过长江，在南岸箝入一颗钉子，并侦察敌情。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商定成立 1 个独立旅，配属 3 个团，以张体学任旅长，鲍先志任政委，谭善和任副政委，到皖南一带活动，公开打出的番号是十六军。他们在老根据地的黄梅、广济（武穴）活动，相机渡江。但由于敌军江防很严密，他们无法偷渡。经请示中央后，又调该旅返回鄂豫军区，但他们也不虚此行，初步摸清了这一带的江防情况，完成了早期的侦察任务。刘司令员自己在大别山的时候，常常抽暇在地图上以汉水模拟长江，研究强渡作战的战术和技术问题；在淮海战役中，他也没有间断对渡江战役的考虑。所以，当他撰写《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时，就着重写了突破江防的问题。在 1949 年 2 月 9 日的总前委会议上，与会同志首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问题，均认为“在 3 月半出动，3 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 4 月初长江一带水位低、雨水少，便于作战。如早于此时，我军各项准备的准备都来不及；晚于此时，国民党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则会有更多的准备。而且水位上涨，到 5 月的桃汛期，风浪可达半米多高，对不习水性的北方籍战士极为不利。然而，即使 3 月底渡江，我野的困难仍然不少。如弹药，三野仅有携行基数；而二野则连携行基数也没有，通讯器材和药品也很缺乏。再如渡江作战用的地图，三野已有的不足自用；二野则一份也没有。汽车，三野、二野都已经有了上千辆，但二野却没有汽油。而二野更困难的，则是粮食严重不足。当时还不知到江北岸后竟找不到一只船。这些，都必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其艰巨程度可以想见。在各项准备工作中，对

长江两岸的侦察是首要的。刘司令员非常注重皖南山地的交通、物资、粮食供应状况，布置我们设法和胡明等同志领导的皖南游击队联系，请他们提供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如有多少条道路，能容纳多少部队吃饭等问题。

还是在 1949 年 1 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了一份美蒋

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但当时我们对图上的水文符号还识别不了，就让情报处的同志拿到开封市水利部门，请专家帮助识别，由情报处一一注明后，又由作战处翻印了若干份，发往各部队，进一步作实地考察和订正。

大约在 3 月底或 1 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到野司，接应我

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这时邓政委在总前委）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由情报处在桐城找了一家印刷所石印一批，记得大约是在 4 月 15 日前发到部队团营级的。从此，我们开始有了渡江作战的行动路线图。

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 3 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

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 月 8 日，已经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邓小平同志

给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发来电报，转告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即使我军事行动与南京集团的谈判密切配合，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 4 月 10 日左右发起。我们商定，华野、中野各部，务于 4 月 8 日进至江边，10 日夜开始渡江作战。”并嘱“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根据这一指示，刘司令员交代我加紧组织司令部各业务处进行侦察、测绘、通讯联络、工兵作业、以及后勤和江上救护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及时地完成了各项准备。司令部还草拟了《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呈送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张副政委审定后，于 1949 年 3 月 30 日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通报的形式下发部队。《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共有 10 项，其中关于准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准备渡江的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容易出航”；“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渡口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具体准备工作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先以船只的准备为例。当我十一、十五两个先遣军于 3 月 27 日到达江北岸时，沿江各种船只已被敌人劫持一空，船民也被迫四散逃避。很多北方籍战士对南方不了解，看到既无船只又无其他渡江器材，一时产生了恐惧心理；有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听说长江一带的蚊子有一寸多长，“3 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肉”；还有的怕“被打死在江里喂鱼”，等等。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各部队及时聘请驻地居民介绍长江水性，组织南北方战士座谈会，并轮流到江边观察对岸情况，练习游泳、划船和试制救生圈。

从而掀起了一个筹集船只、引船入江和水上练兵的热潮。如十二军在渡江演习中，曾以 20 斤稻草捆成一只救生圈，在水中浸泡 12 个小时后仍可使用，战士可露出胸部射击。在物资、船只准备有了眉目之时，刘司令员指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攻打一个有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作一次实战演习，以取得经验。铁板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和第五连共 300 余人，筑有地堡工事。我三十五师由一四团组成突击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乘带有云梯的船只，仅以 7 分钟即登上洲岸，无一伤亡，35 分钟结束战斗，全歼守敌。4 月 9 日，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将这一经验上报军委、总前委，并告三野。三十五师在夺取铁板洲时，“每人携带做好的一个稻草护生圈（18 至 20 斤），减少战士顾虑。每人准备数个竹尖和棉花，便于堵塞子弹孔。”还有的部队利用竹筒作救生圈，装置了救护舟筏。这些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救生器材，在渡江作战时虽然使用不多，但对增强北方籍战士的安全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船只的筹集工作，是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组成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在附近湖泊进行的。对于船民，一方面从政治上启发他们，一方面适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有些部队还动员了一些船帮头和保甲长，利用了一些关系，把已被敌人押至南岸的船只又拖回北岸。部队对船工和水手照顾得很好，开饭时为他们找碗，给他们送香烟，尊称他们为师傅，很快就建立了感情，成为真正“同舟共济”的战友。这样，仅在半个月内，就在沿江居民的协助下，搜集、打捞、修补船只达 1428 只（大船能载百人左右，小船可载 10 人左右），动员船工 2000 余名。由于船只多在内湖，而内湖出口又为敌军炮火所封锁，大家便创造了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把所有的船只从几十里外的内湖，翻过数道堤坝引入长江，然后又挖掘了隐蔽的船坞。船只解决后，部队又在内湖和夹江上昼夜进行水上训练。从上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水上射击，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直至分队综合演习，都比较熟练了。据我们 4 月 15 日的统计，二野第一线部队水手和民兵水手已有 4410 人，每次可渡 30500 人。当上述准备工作就绪后，各兵团、军师党委向渡江突击队授了旗，向船工和部队水手颁发了荣誉证书，号召大家“在渡江作战中为人民立新功”。参战部队的各级司令部根据野司的安排，均于江岸设立了观察所，组织了敌前侦察，加强对长江水文、气象的观察和调查，选定了起渡点和登陆地段，并设立了渡口指挥所，组织指挥员进行沙盘作业。再谈谈物资的筹备。这项工作艰巨而又繁重的，由于华东局和中原局负责同志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及时有效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勤部门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沿途设立了兵站及集结地，建立了 4 条补给线。安徽、湖北、河南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部队架桥、修路，在部队进军途中设立了招待站，还组织了随军渡江的民工团。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路上，有数十万浩浩荡荡的民工“海潮似地”（刘伯承语）日夜赶送军粮。皖北人民群众提出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口号，竭尽全力支援渡江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是人民群众“送”过长江的。至于支前和运输的工作量有多大，我手头尚无确切的数字。仅以安徽省为例，省委曾动员服务半年的担架 3000 副，服务 3 个月的挑工 12000 人；仅六安、桐城两地就征收了 1 亿斤大米。刘司令员曾说：“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食粮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另外，汽油、弹药、服装等物资，也都是依靠地方向前线运送

的。这里，我引用一份1949年3月9日，刘司令员和我给“军委（转陈邓〔3〕）、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也可见一斑：“一、统筹解决汽油及零件之补充，并在蚌埠、合肥设库分发。立请调拨500到1000桶汽油应急。另请天津筹拨400辆〔汽车〕的备分零件。二、3月份经费之未领足数，请军委直接速送蚌埠。4、5两月份经费酌量拨2/3现洋、1/3人民币券，于寅哥〔3月20日〕前送蚌，以便能在过江前送到部队。中原军区现洋请就近拨交我们。三、追送十分困难（特别在南方脱离铁道条件下）。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只能担任渡江前之第一线运送。故请中原局、华东局分送正阳关及合肥转交我们。四、……我们尚差5万套血衣、5万套俘虏单衣、5万套衬衣。今后这类供应品由我们随军购买抑由华东转发，请速确定。”到开始渡江前，向前线运送的弹药是4个基数；补给的携带粮是每人5日份，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些事迹，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上，还是在军事交通史上，都是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的。（二）关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当时部队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主要是对和谈的认识，如：国民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了，还要不要过江？会不会搞南北朝？如果美国出兵干涉怎么办？为了统一认识，牢固树立“敢于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1949年1月10日，曾以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的名义颁发了《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提出要“根据新华社新年献词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必须彻底清算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关头，可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动摇思想”。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教育指战员认清政治谈判和军事斗争是密切联系的两种手段，国民党政府并非真心和平，只是因为打不过我们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国民党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与否，我们都是要过江的。决不能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给某些反动政客和军阀以喘息之机。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头脑清醒，不可松懈斗志。陈赓同志曾经把和谈看作是对国民党的又一攻势，并且“不啻增加我百万大军力量”。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都对我们有利。和谈，势必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与动摇。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震撼。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知道是因为打不过共产党才和谈的，如果谈判破裂，就更加瓦解了他们的士气。我们过江后敌军的迅速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问题，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战员们也有了思想准备，立足于他们出兵，有备无患。而且，只有我们作了准备，美国才不会轻易出兵。解决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士气就日益高涨了。于是，“不让反革命有喘息余地，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全国革命胜利，为人民立大功”等口号，就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关于组织准备，总前委在渡江前下发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了连队的党组织建设问题。这在以往几大战役中是没有过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部队整编后，解放战士在部队中的成分很大，和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对比，达70%到80%。入伍较晚的战士，有的出征前几天才到部队，没有赶上渡江政治教育。这当中有些北方籍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到南方去，曾发生逃离队伍的现象。再一个原因，就是渡江作战是以船、战斗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和以往的战役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做到统一，这对于拥有一两千只船的大部队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基于这些原因，只有健全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才能保证部队的巩固、纪律和行动的统—。这些，在渡江前是基本做到了。

三、稳健的决策

关于渡江作战的谋略和战术问题，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反复研讨，逐步确定的。把两个野战军放在长江下游渡江，是摧毁蒋、美结合的防御体系，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的“稳健办法”（刘伯承语）。“钳白打汤”的策略。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大家认为应该充分利用

蒋介石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以二野、三野的近百万（渡江作战时，加上军区部队共百万人）的优势兵力突击汤集团，箝制白集团，以强大的震撼力量，使敌军闻风丧胆；并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如美国可能的挑衅或武装干涉，这是最稳健的作战方针。当天曾确定：以三野的4个兵团和二野的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的任务区分是：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二野的一个兵团任安庆东西段。

二野的另外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

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

会后，总前委发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汤、白两集团在长江鼓向北岸的突出部的汉口、浦口，各有2

个军的机动兵力，在安庆摆了1个军。浦口为三野的当面，二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白集团；刘汝明的部队不多，其前哨部队放在江心洲。白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伸出警戒部队（小部队），在江北也不少，而在麻城及其南面的城镇到处皆是。当三野已经收集到一些船只时，二野还两手空空。我们要准备船只，就必须消灭这些伸到江北的警戒部队。

为此，刘、邓首长考虑了三着棋：

第一着，是从2月初开始，以王宏坤部带领桐柏、江汉军区的部队，到武汉、沙市、宜昌之间，吸引白集团西顾，以减轻二野主力正面的压力。

第二着，陈赓的四兵团向南开进，有意让绕道麻城，打跑了白

集团第七军的部队，攻占了麻城。之后，总前委和刘司令员便让四兵团停留在此地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刘邓首长考虑光这两着给敌军的压力还不够，还必须请军委批准以四野先遣兵团迅速南下，钳制白集团，这是第三着。当四野十二兵团率第四十、四十三军10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使二野右翼的安全确有保障时，四兵团主力才继续向指定地点开进。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时，白崇禧也派了私人代表到中原局洽谈。按这时的局势，我们分析白集团是不会受蒋介石调遣的，他们守不住武汉，必退衡阳再退广西（他们后来也是按这条路线退的）。还有一个地理上的因素，就是汤、白集团之间隔着一个鄱阳湖，两侧山脉多为南北走向，不便于大部队东西运动，互相支援。有鉴于此，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策略是钳制白崇禧集团，打击汤恩伯集团。这样，对白、汤既有所区别，又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歼重点之敌的原则。在渡江作战的准备中，还有一个打不打安庆的问题。当四野先遣兵团和四兵团完成了预定的一系列佯动之后，白崇禧误认为我军将抄袭武汉，将其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留第一七四师驻守安庆。于是，我先遣军就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等地。

至此，我主力兵团3月初分别由阜阳、沈邱、漯河地区南进，4月初已相继到达长江北岸。安庆守敌是白崇禧集团在江北的一个钉子，对二野渡江是一个威胁。开始，确定由三兵团第十一军把安庆打下来，拔掉这个钉子。对于打不打安庆，刘司令员一直有所考虑。4月3日，我二野前指到达舒城后，刘司令员打算去前线看一下再决定打还是不打。我陪他去了，到安庆周围和东西段都看了一下，发现这一带丘陵和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而且日军占领安庆时，曾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经过观察，在安庆的东西两段都可以渡江，只要看住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即可。而打安庆，势必要攻坚，既耗时，又会过多地牵扯兵力，于是，刘司令员下决心改由第10军围困和监视安庆守敌；换下第十一军参加渡江作战。4月4日，刘司令员商得邓政委同意后，下达了《关于三兵团暂不攻安庆，各兵团积蓄精力进行渡江作战的指示》，确定：“（一）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二）以十五军、十六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三）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棕阳镇石机头段渡江。（四）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我主力过江后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1949年4月1日下达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开始遂行本战役”；以全歼或大部歼灭白、汤集团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守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0万人左右）和控制浙赣线的敌军（计有6个军23个师），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战役目标。《纲要》规定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之间渡江；第二野战军在马当至贵池间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三野东西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完成钳形合围。二野密切协同三野，适时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以主力一部速出蕲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和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归二野统一指挥，担任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我二野的渡江地段，为汤、白两集团的结合部，处于汤集团的左侧背。守敌是老对手刘汝明的第八兵团3个军8个师，约4万余人。其六十八军军部位于至德，所属3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五十五军军部位于贵池，所属1个师位于马沙闸至贵池段，2个师位于三野部队渡江下面的铜陵、青阳地段；九十六军军部位于殷家汇，所属2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深地区仅有第十七兵团侯镜如率领的2个军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我渡江地段敌军兵力较弱，敌机动部队较少，而且有皖南游击队策应，对我突击渡江是有利的。但是，白集团的主力位于我预定渡江地段的右侧背，是一严重威胁。总前委根据敌军的这一态势，确定战役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我二野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以保障其钳形突击的成功。具体部署是：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200华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段为突破重点；第三兵团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然后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然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攻占南京之战。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在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4月8日，第二野战军依照《纲要》的规定，下达了《渡江作战基本命令》。

四、为了配合和谈

渡江作战与和谈，是我党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两个手段，无论和谈能否达成协议，解放军都必须过江，只是时间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国民党则以和谈作为继续备战的手段，自恃有不可突破的长江防线可以作为和谈的筹码。4月9日，中原军区情报部门曾截获一份敌军电报，发给刘司令员和我。其内容是白崇禧3月间曾对空军说：“和平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还是继续备战，始能和平。……长江天险共军不易渡过。我们对各渡口有重兵防守，且有海空军协助，假若和谈，则可以保全江南地区（是否完整尚成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想依赖长江天险，暂保半壁河山。而对解放军具有攻取京、沪、杭的能力，则无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是1949年4月1日在北平开始的。中共中央为了给国民党政府考虑和签字的时间，曾几次将原定渡江时间推迟，从4月初推到4月中旬。4月12日，总前委在推迟渡江作战时间的指示中说：“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但“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15日，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第二天（1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才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22日一举渡江成功。”该电还让总前委考虑：“假如南京愿意于4月20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4月22日改至4月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们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障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要求。”4月17日，总前委向军委报告说：“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当天，中央军委复电说：“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20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20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22日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23、24、25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4月18日，中央军委电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此时，我部署在江北的部队犹如弦上之箭，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央军委的渡江命令。

五、强渡长江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于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21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遵照这一命令，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三野西集团于4月21日晨，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成功，将敌军的长江防线拦腰切断；我二野各兵团与三野东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的1200华里宽的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军发起攻击。

二野的炮火，除射击敌人的舰队、飞机外，都集中在第一线支

援渡江。四兵团的野战炮营也调来了，集中于安庆东西段。在三、五兵团组成的主要突击地段，其正面不到30华里的宽度上就排列了各种火炮300余门。21日17时，即我军开始渡江前1小时，这300余门火炮朝敌守军阵地整整轰击了一个钟头，江南岸的堡垒十之八九都被摧毁。由于炮火发挥了最大的威力，二野第一批渡江的三、五兵团的6个团，伤亡还不到10人。然而，在彭泽上下游渡江的四兵团先头2个军，由于对岸敌六十八军阵地未被摧毁，顽强抵抗，伤亡达350余人。

发起渡江作战的时刻，二野前指设在桐城的一所中学里。作战

室设在该校的图书馆，门前有两棵高高的冬青树。刘司令员下达了作战命令之后，和张副政委一起，端起一碗茶水，边饮边静候前线的消息。我在一旁陪着他们。作战处处长姚继鸣在作战室点燃了煤气灯，准备标图和作《阵中日记》。第一位从前线打电话给前指的是十一军参谋长杨国宇。我在电话里十分清晰地听到他那有些激动的四川话：“我们的大炮打过去了！激起的水柱子有几丈高哇！现在我们开始渡江啦！”我渡江部队在强大的火力准备之后，相继起锚强渡，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疾驶南岸。敌军集中火力，在海空军配合下，竭力阻击我渡江船队。但因我军是全线出击，敌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我突击部队全速前进，乘船的战士们以洋锹和钢盔划水，给水手们加速。有的船工负伤后，战士接过来，继续掌舵、摇橹，没有一只船后退，都奋力争当登陆第一船。先头船仅以15至30分钟即强行登陆，抢占了敌军的一些滩头阵地。开始曾顽强抵抗的敌军，见阻击我渡船无效，士气低落，一触即溃。这样，我先头渡江部队很快就登上南岸，迅速抢占了要点，然后以一部横扫沿岸之敌。我主力部队则向敌军纵深插进。后续部队也及时登船起渡，对顽敌连续突击。4月21日18时，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向军委和总前委拍发了渡江作战的第一份报告：“二野于马[21日]17时全线开始渡江作战，刻渡南岸者三兵团2个团占领乌沙闸以西阵地；五兵团1个团占领黄石矶以南高地。余在续渡中。”当夜20时，第二次报告总前委说：“我二野刻已知渡达南岸者计三兵团7个团，五兵团2个团，三野七兵团。”当夜24时，第三次报告说：“（一）我三兵团刻已渡过4个师，预计明养[22]日拂晓十一、十二两军可全部渡完。（二）五兵团之十六军已渡过2个师。预计明养日拂晓前该军可渡完。（三）四兵团情报待报。”第四次报告是22日5时：“截至今养日5时整，我三兵团十一、十二两军全部已渡达南岸；五兵团之十六军抵达南岸者共2个师，四兵团之十五军马[21日]亥开始至华阳镇强渡，今养日2时已抵南岸1个师；十三军已进占马当以西之八宝洲。”这几次报告，记载了二野各兵团渡江的确切时间。对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壮观场景，国民党所谓《戡乱简史》中这样记载着：“满

江尽为匪船，首尾相接，络绎不绝”；海军舰只“太原”“安东”“楚同”“美亨”等号赶往阻击，但“匪船过多，顾此失彼，而两岸匪炮更集中射击我舰队，致均负伤，弹痕累累……乃被迫驶向芜湖下游”。该书作者哀叹道：解放军渡江部队“几有所向无敌之概”。二野部队于4月21日晚9时，已渡过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华里、纵深10至20华里的登陆场。又经22、23两日作战，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安庆守敌弃城而逃，被我歼于吴田铺地区。至此，二野顺利地完成了突破长江防线的任务。总前委在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时，估计在国民党首都所在地南京周围会有一场恶战。不料，敌主力在我军渡江之时即已望风披靡，逃离了南京。于是，第三野战军在23日前连续解放了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和国民党首都南京；其东西两集团正按总前委的预定计划，加速向长兴、吴兴地区东西对进，钳击由南京、镇江南逃之敌。四野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在解放了稀水、黄梅、荆门、汉川之后，继续向江边挺进。至此，国民党政府的长江防线，在3天之内即完全崩溃。

六、全力截断浙赣线

当我军渡江之后，国民党政府仓皇迁往广州。南京及其以东守敌纷纷沿京杭、京沪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准备“以海、空军全力确保淞沪。”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向浮梁、祁门、石埭方向溃逃，准备在皖浙边山区阻我进军，以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防线。当南京、芜湖两城已为三野解放，我二野四兵团渡江后的位置距浙赣线最近时，刘司令员考虑：汤集团如果要退，只有两条路，一是走海路，一是浙赣线。按原定作战方向，我野将与三野兵力交叉；如改变原定方向，三野以主力直出浙赣路之贵溪、上饶、衢州，直至义乌一线，就可以割断蒋、桂两敌的联系，暂时放松桂敌，以全力迂回蒋敌侧背，堵住汤集团的退路，扩大预定的京沪杭会战的范围。切断浙赣线这着棋在战役上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淮海战役中打宿县的一着。刘司令员把这一设想报告了总前委，立即获得批准。4月23日，总前委就此向中央军委呈递了调整渡江后部署的报告，提出：二野三、五两兵团正向石埭、浮梁方向挺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之四兵团则尚在望江、湖口地段之江南岸，该兵团如向芜、京转进至少需时半月，且与三、五兵团交叉运动较不便利。故我们已与刘张李〔4〕商定作如下处置：一、陈赓四兵团取消接管南京任务，改沿杨苏〔5〕五兵团之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之敌，并视情向东发展。”同一天，二野下达了《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给各兵团的指示》：要求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衢州之敌。并要求“各部队应加强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指示》下达后，各兵团不顾疲劳，不怕山地行军的困难奋勇穷追，有些部队日行120华里，速度极快。我二野前指4月29日从桐城出发，30日到达南京市。我二野渡江后的进程是：5月1日，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歼敌一六军二八二师和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全部，九十六军、六十八军、七十三军、一一九师及暂编第二、三师各一部，使刘汝明部和侯镜如部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的计划未能得逞。所剩残敌又纷纷向金华、衢县、上饶等方向溃逃。同时，三野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了由南京、镇江等地南逃之敌，疾进杭州，逼近淞沪。5月1日这天，中央军委电示：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三野不日即将其歼灭；二野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以便在敌军

歼灭之后，即分别开辟三区工作。二野遵此指示，根据敌军溃逃方向，确定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五兵团向衢县至上饶段，四兵团向横峰至东乡段进击；并确定各兵团均留一部在屯溪、浮梁、乐平等地清剿残敌，协助地方党开辟新区工作。皖南人民游击队在胡明等同志领导下，已拥有 7000 多人的武装，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皖南、浙西、赣东北 40 个县，深得当地群众爱戴。他们同三兵团密切配合，于 4 月 24 日至 29 日，解放了石埭、太平、黟县、祁门、歙县等县城，并于 5 月 5 日在歙县、黟县等地与三兵团部队举行了会师大会。

5 月 3 日，四兵团解放了贵溪、万年、德兴、弋阳等县城，在贵溪与闽浙赣游击队会师。8 日，陈赓在鹰潭镇会见了游击队负责人曾镜冰。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他“在闽浙赣坚持十数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不愧为共产党人也。”

四兵团主力先于 5 月 4 日到达贵溪、横峰地区；三、五兵团于 5 月 6 日进抵金华、衢县地区。至此，已歼敌六十八军一四三师、一一九师、八十八军四十九师、一六军一九二师、一一师和暂三师全部，七十三军、安徽省保三旅、保五旅、交警第七、八纵队等大部。敌残部已溃不成军，拚命向浙赣路以南山区逃窜，有些则纷纷向我军投降。5 月 7 日，沿浙赣线东进的我三兵团和由杭州南下的三野部队，在诸暨会师。这样，我军就控制了从义乌至东乡段长达 800 华里的浙赣线，完全切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

5 月 3 日，三野占领了杭州，之后集中其主力围攻上海。在此之际，二野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部队作战，各兵团就势以一部兵力轻装继续分别向丽水、松阳（三兵团），崇安、浦城（五兵团），建阳、临川（四兵团）等 3 个方向猛追。至 5 月 14 日，解放了丽水、青田、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逼近闽江、赣江。

我军在追击敌军的初期，各兵团的追击战术，都是采取正面平推和尾追的打法，而追击面又在 400 华里宽的广大正面上；敌军跑得很快，又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故此我军的战果不大。我在前指每日处理各兵团来电，发现在统计歼敌数字时，增长缓慢。我向刘司令员和张副政委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商量如何改变追击战术。经过研究，决定必须实行猛追、猛冲、猛打，变尾追为平行追击和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而如果要赶上甚至超越逃敌，就必须再加快速度，这也只有组织轻装部队才能奏效。于是，先是通知各兵团马上改变战术，跟踪、平行和跟踪追击相结合，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又在 5 月 7 日下达了《组织轻装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的指示》：“各兵团在抵达浙赣线之休止地区后，应：一、分别以轻装师或轻装团附电台继续向南猛追，寻歼逃窜之敌，并指定三兵团追击方向为永康、武义、宣平、遂昌、松阳地带，五兵团为龙泉、浦城、崇安地带，四兵团为铅山、资溪、金溪、临川地带”；“二、以其余部队集结于休止地区，立即进行必要的休整”。各部队改变战术后，充分利用已有的和新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以轻装部队猛追、猛冲、猛打。他们在病号增加，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而又缺乏雨具的条件下，仍以每日 100 华里，甚至 150 至 160 华里的强行军，翻山越岭，使南逃之敌有的尚未撤至预定地区即遭歼灭；有的刚刚退到预定地区，喘息未定，也在我追击下，一败涂地。在轻装部队追歼残敌的同时，各兵团主力相继集结于浙赣线上待机，准备协同三野对付美国可能的

军事干涉。在我渡江作战过程中，英国的 4 艘军舰炮击北岸我军，被三野击伤其中的紫石英号，其余 3 艘逃上海。但是，美军始终未敢轻举妄动。5 月 14 日，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规定“三兵团主力应以金华至江山之浙赣路为中心，分驻于义乌、丽水、遂昌线以北，开化、建德线以南地区，其第十军即分布于安庆、芜湖及徽屯地区〔6〕；五兵团主力以浙赣路玉山至弋阳为中心，分驻于浦城、崇安线以北及乐平、德兴线以南地区……；四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以机动备战态势集结于贵溪、金溪、临川、进贤、余干、万年地区”。各兵团除大力展开城乡工作外，分遣部队至闽北鄱阳湖地区，和在驻地附近立即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开展山地、河川、水田的军事训练，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四兵团密切监视南昌、九江方向之敌，视情况适时驻南昌或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四野先遣兵团一部于 5 月 14 日由蕲春、黄冈间胜利渡江，盘据在长江中游的白崇禧集团一部无力阻击，于 5 月 16 日弃阵南撤。四野当即解放武汉。为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二野四兵团一部进至丰城、樟树一线，截击南撤之敌，并以一部于 5 月 22 日解放南昌；五兵团留置湖口地区的部队随即占领九江。三野部队于 5 月 27 日攻占了上海。至此，渡江作战及整个京沪杭战役即告结束。我二野在四野、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及江南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协同三野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任务，在战役中歼敌 10 万，解放了安庆、衢州、金华、上饶、南昌等 86 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

七、几点体会

渡江作战，始终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战役的成功，取决于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稳健决策。“稳健”二字，是刘司令员在 5 月份关于渡江作战情况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综合报告中所使用的词汇。这个稳健决策的主要之点，就是以二野和三野在南京两侧形成两个拳头，直捣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京、沪、杭；再以四野重兵进逼武汉城下。这样，既可集中力量一举摧毁京沪杭，打击汤恩伯集团，牵制白崇禧集团；又可在渡江后抽出足够的兵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刘司令员紧紧抓住这个主要之点，在部署二野的兵力时，撇开了敌军的某些对我渡江作战妨碍不大的江北据点，专注于突破敌军的江防和南岸阵地。在渡江作战时，二野、三野密切协同，在 1200 华里的宽正面上，万帆齐发，重点突破，使敌军无法防御。当我军缺粮少弹、又无船只的困难时刻，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依靠群众的帮助和集体智慧，竟能以木舟、渔船突破了敌军陆、海、空联合设防的长江天险，不能不说是创造了近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渡江成功后，在敌军全面崩溃之际，刘司令员又及时地提出切断浙赣线的问题，经总前委批准后，集中二野全力，一直打到赣中、闽北地区，从而割裂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箝制了白集团；以主力迂回汤敌侧背，同时又使从江岸南逃之敌无法收容部队组织抵抗，而且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我军下一步进军华南，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作战之后，还有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即 4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宋任穷同志分任正副主任；5 月 9 日，刘伯承就任南京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这象征着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即将终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注 释〔1〕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6 页。

〔2〕同上书，第 586—587 页。〔3〕陈邓，指陈毅和邓小平同志。〔4〕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同志。〔5〕杨苏，指杨勇和苏振华同志。〔6〕徽屯地区，指安徽省南部的歙县（徽城）、屯溪地区。

解放大西南之战*

—

1949年春末，国民党政府拒绝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

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占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太原、西安等重要城市。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就此甘心。它们在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下，绝望地进行挣扎，准备把退集在华南、西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的部队，全部组织起来，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仅有的集团为骨干，建立陆上和海上基地。在华南地区，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队，组织“湘粤联防”，阻我进军两广。在西南地区，以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的部队扼守秦岭、巴山，防我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并把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机动。打算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再次定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一旦上述计划破产，即退往云贵；再无法存身时，则逃亡国外。

毛主席指示全军，在继续进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

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

毛主席并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在作

*本篇是李达同志1957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周年”征文撰写的文章，曾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0集。

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军之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1949年10月间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白崇禧部，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令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1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其于四川盆地。

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是使蒋介石100万人马腾翅难飞的

一着。为圆满实现毛主席所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意图，必须首先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因之，在军委统一部署下，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在刘、邓、贺诸首长指挥下，并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给敌人设置了许多“迷魂阵”。

先是1949年6、7月间，活动在鄂西北地区的我湖北军区部

队，对川鄂边之敌，积极展开佯动，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陕南军区部队，对敌大巴山防线发动了两次进攻，重创守敌九十八军，并攻占平利、安康等城。8月底至9月初，集结在秦岭北麓的十八兵团等部，开始向敌秦岭防线实施佯攻，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10月，当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日子，南京人民热烈地欢送第二野战军北上。一列列的火车，从浦口开出，从津浦路转到陇海路。我军到了郑州，人民又在车站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新华社发出了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讲话的消息。

蒋介石原来就有这样的判断：认为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

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他认为：在川贵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他判定：“共军不会舍近求远”去碰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

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以来在鄂东、陕南的一系列行动，更使蒋介石有了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原来判断的“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它的主力集团胡宗南3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又以宋希濂的2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广文兵团控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并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大西南防线”。

正当蒋介石进行上述部署之际，我第四野战军的各路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地区急进，打算夺取广州，并准备在衡（阳）宝（庆）地区，痛歼白崇禧集团主力。这时，我第二野战军的部队，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乘机以秘密和公开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敌意料不到的方向，向西南进军了。我四兵团在四野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五兵团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荫蔽地开向湘西。随野战军指挥机关行动的三兵团，亦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四兵团和五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这时二、四两个野战军的情形是：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进军的二野是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在武汉，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的同志们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点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行动的掩护下，实现出奇制胜的企图。

蒋介石正心神不定，四野在衡、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在此同时，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三、五兵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仍按兵不动。待攻占广州，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后，才开始向预定方向开动。而在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各兄弟部队，则仍佯动，作试探性的进攻。在兵临汉中城下时，又进展迟缓，攻而不破，以稳定蒋介石守四川的心理。被装进“迷魂阵”中的蒋介石，这时仍望眼欲穿地注视着川北的秦岭、巴山防线。

二

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决策。这个门既不能早关也不能迟关。正如我们所料，10月14日晚，当南线我军刚刚占领广州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便急忙逃到重庆。其他各地乱七八糟的敌人，也象一群失散的鸭子，纷纷向西南流窜，甚至连过去远在东北地区的“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总指挥赵洪文国等部，也先期逃到四川了。我们秘密荫蔽在湘西地区的野战军主力，大张挾伐的时机到了。刘邓首长立即命令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十军为左翼部队向贵州进击，要他们“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大道，然后向川南兜击。同时令三兵团主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为右翼部队，向川东南进击，割歼和吸引宋希濂集团。我四兵团部队则从广州乘胜西进，迂回向广西逃窜的敌人，断敌逃往海上的通路，协同四野主力全歼白崇禧于广西境内。11月1日，我二野的三、五兵团和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敌人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黔、川部分，突然挺进。于10日之内，连续解放了镇远、三穗、秀山、酉阳、恩施等城。这时蒋介石才慌了手脚，急令罗广文兵团向川东增援，以配合宋希濂集团，依托乌江，阻

我西进；令何绍周兵团坚决死守，确保贵州。但是，为时实已太晚。我各部队不仅行动突然，而且轻装疾驰，每日以百里以上的速度，昼夜不停。排除各种困难，克服一切障碍，越过许多云雾弥漫的山峰，涉过急湍的河流，从敌人认为不可通过的地区，杀奔贵阳和遵义，逼近川、鄂边境；并在咸丰、黔江地区，歼敌十四兵团大部，俘敌兵团司令钟彬。蒋介石这时一面勒令宋希濂和罗广文凭借乌江天险阻我前进；一面又将孙元良兵团由川东急调重庆外围布防，同时又将防守川北地区的胡宗南一个军，车运重庆。并准备在防守不了的时候，向云贵撤退。当蒋介石布防重庆之际，白崇禧则在他的家乡——广西境内，正在遭受着我四野大军的围歼。这时，我从左翼对敌实施战略迂回之五兵团等部队，在击退敌何绍周兵团的抵抗后，以突然神速的动作，于11月15日，攻占了贵阳市。接着我军越过层层大山，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于21日，攻占了遵义城。然后一步不停，向川南实施兜击。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册上，曾经有过两占遵义、佯攻贵阳的记载，那是14年以前的事，那是中国革命危机的关头，是毛泽东思想重新照亮中国革命前程的开始，是中国工农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4年后的今天攻克贵阳，占领遵义，是人民解放军——以前的中国工农红军无敌于天下的时代，是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候。14年前，蒋介石坐镇贵阳，耀武扬威，兴兵动师追歼北上的红军。今天他坐镇重庆，象一个几乎将输净全部家当的赌徒，两只眼正瞪着赌场上的最后一注。这一注还没有全部亮开，他就目瞪口呆了。我军攻占贵阳、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逃跑的道路。11月下旬，我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从彭水等地分别突破乌江后，在南川地区歼灭了宋希濂、罗广文主力3万余人，形成直捣重庆的威胁。但为了迷惑和抑留敌人，便利我左翼部队之迂回，我军又暂不去攻占重庆。我另以四野一部从涪陵北渡长江，向垫江推进，迂回重庆外围。蒋介石此时发觉大为不妙，乃于11月30日天不亮，爬上飞机逃之夭夭。我军当日解放重庆。接着我军又组织部队向成都方向急进。我从贵州向川南兜击的左翼部队3个军，日夜不停，于12月初，占领了纳溪、泸州、自贡等地后，迅速向乐山、大邑、邛崃一线迂回。骄横一时的胡宗南，不久以前还向蒋介石表功，说他3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说什么“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被突破”。他原来不知，秦岭防线不是我军不能突破，乃是实行既定方针的“突而不破”，目的是牵着他的鼻子，不让他过早地南撤，以便南线各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胡宗南看见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方知上了大当，这才放弃他坚守近半年的秦岭、大巴山防线，急令他的3个兵团，向成都地区撤退，准备负隅顽抗。这时，我屯兵秦岭北麓的华北十八兵团等部队，分兵三路，在贺龙司令员统率下，如猛虎下山，从秦岭猛扑下来，紧跟着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越秦岭，跨巴山，攀摩天岭和米仓山等山脉，进入四川境内。时逢大雪纷飞，战士们棉衣上都结了一层冰，但也奋不顾身地猛力前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沿途人民特别是川北通（江）、南（江）、巴（中）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支援下，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各追击部队在行进中到处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李白著名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条路。原想依托秦岭、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天险、隘路，却都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由于我从北面扑下来的部队猛打猛追，终将南逃之敌后尾8万

余人，尽歼于川北地区；接着我追击部队又占领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我军便从四面八方，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围困在成都盆地。

三

毛主席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就曾向我军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即以“北平方式”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后必然要出现的，也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军政兼施解决残余的敌人，是毛主席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当南线我军关闭了敌人逃走的大小门户之后，刘邓首长于11月21日，适时地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逃到成都的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南线白崇禧集团大部覆灭后，他更加没有指望了，只好命令胡宗南猥集在成都附近的部队，准备来一次最后的决战。当时他还抱着另一线希望：想由西昌退向云南，但几天之后，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2月9日，国民党的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诸将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我党中央的长期争取和刘邓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分别在昆明、彭县宣布起义。蒋介石得此消息之后，唯恐自身难保，便把大权统统交给胡宗南，于13日偷偷爬上飞机，带着他的“政府”和美国顾问，向台湾逃窜了。被紧紧压缩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数十万军队，四面楚歌，完全成了瓮中之鳖。它们是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垂死地进行挣扎。这时我军各部队，虽也有些疲劳，自从向西南进军以来，战士们几乎一步没停留过。每支部队，都步行了几千里以上，特别是向南线大迂回的部队，完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完了漫长的道路。有的部队，一天曾经步行过200多里。许多战士的脚底板上，都是泡加泡。许多指挥员，由于长期劳累，眼睛红肿。然而，每个指战员都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战争越是到了最后，越不能松懈。刘、邓、贺诸首长除令各部队充分进行攻击准备外，更加强调对敌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于是，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同时展开。12月21日，被围困的“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率国民党军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这是川境敌人全部瓦解的开始。胡宗南为稳定军心，在十六兵团起义的第二天——22日，在新津召开了紧急的军以上指挥官会议，会上他故作镇静，声言“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并表示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而且还作了向雅安、西昌突围的部署。哪知会议的第二天，这位在两年前因占领我延安而不可一世的“胡长官”，也象蒋介石一样，甩下他的部队，爬上早已准备好的飞机，夹着尾巴溜走了。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敌人，更加混乱动摇了。我军乘机紧缩包围圈，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我前方各部队分别向敌军各指挥官发出忠告、警告，号召他们迅速回头，不要失误时机。我前沿直接作战的各个分队，都利用各种方式，向敌人喊话、散发传单。敌五兵团司令李文，执迷不悟，垂死挣扎，于24日集中了7个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突围。其二十七、三十六、九十、五十七等4个军由崇庆地区向西南猛突，其一、三、六十九等3个军，亦同时由新津地区向西突围。但我军在王泗营、三盆街、高桥等一线，早已布成了铜墙铁壁的阵势，立即予以迎头痛击。他们虽多次组织攻击，均被我军击溃。在此情况下，12月25日至27日，敌十五兵团司令罗广

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其残部在彭县起义之后，敌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敌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地区起义。他们的起义虽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可以避免流血和破坏，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我各路大军继续向成都外围压缩，先后逼近了崇庆、新津、华阳、广汉、什邡、简阳等地，包围圈渐渐地缩小。25日，顽敌五兵团司令李文，怀着最后的梦想，又组织突围，向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李文亲自出马督战，他绝望地叫喊着：“拚光亦光，不拚光亦光。”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高呼着“不让一个敌人逃走”的口号，英勇奋战。敌人冲上来，我们杀退下去，敌人再冲上来，我们再杀退下去。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许多指战员负伤不下火线，他们说：“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战，一定要参加到底！”在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后一战中，革命战士不惜流血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更加令人敬佩的。我军就是以这种精神，坚决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粉碎了李文突围逃走的幻想。

26日拂晓，我军向被围在新津地区的敌五兵团等部，发起全线攻击。全体指战员在“打好大陆上最后一仗”的口号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人纵深猛插、直冲。有的部队，就连上火线送饭的炊事员，也掂起枪来投入战斗。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杀声，激战至黄昏，枪声平息了，李文的五兵团，终于成了“无兵团”。连李文自己也成了5万多俘虏中的一名。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集团的30万人，和退集成都地区的其他数十万残敌，除起义者外，全部被我消灭在成都地区。

正当成都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我四兵团和四野一部，在滇、桂、黔边区纵队协同下，于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企图向国外逃窜的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并活捉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同时，我军又以有力部队，在成都围歼战结束之初，迅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敌贺国光部万余人。我另一部在江安地区活捉化装潜逃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战犯王陵基。至此，退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被我歼灭。整个进军西南的作战胜利结束。共计消灭敌90余万人（包括起义、投诚的各色武装）。解放了川、康、云、贵四省。西南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迷梦。

进军西南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军政兼施政策的光辉结晶；也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领导全军坚决而又有精巧措施的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在战役进行中，由于各兄弟野战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南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全力支援，更加速和保障了这一伟大战役的胜利。

贺龙同志在西南*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曾经三次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那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他那胸怀全局，舍己为人，关心和爱护同志的高贵品质；他那严肃认真，深入实际，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他那热情、豪爽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总之，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炽烈的赤胆忠心，永远铭记在我心中。1949年12月底，解放祖国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我又有机会在贺龙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贺龙司令员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呕心沥血，建树了卓越功绩。

挥军入川

毛主席、中央军委在部署解放大西南战役时，给予贺龙同志的任务是：率部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积极吸引和扣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断其退路时，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贺龙同志接受任务后，和*本篇是李达同志1979年5月为纪念贺龙同志逝世10周年而作，发表

于1979年6月6日《人民日报》，这次编辑时略有删节。

李井泉、周士第等同志率领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主力一部，分兵三路，从陕西南下。在进军中，掌握部队前进速度，是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关键。当时，部队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贺龙同志耐心地对大家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这时，胡宗南正狂妄地自吹自擂，说什么他“3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也正是这时，贺龙同志已在秦岭北麓布阵就绪，“突而不破”，紧紧地牵住了胡宗南的鼻子。等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他才如梦初醒，急令他的3个兵团弃守秦岭、巴山防线，向成都地区逃窜。但是，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贺龙等同志抓住战机，立即挥师，如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秦岭猛扑过来，揪住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大都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时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部队行动非常艰难。进军路上，贺龙同志时而跑到前面观察情况，时而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战士们边走边谈心；他和大家同吃同住，搭个铺板就睡觉，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贺龙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沿途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斗志。追击部队高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的战歌，奋勇前进。越过巴山后，贺龙同志命令主力之一部尽快抢占灌县，保护都江堰，以防胡宗南利用岷江之水制造泛滥。胡宗南梦想依托秦岭、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却变成了他自己的穷途末路。由于贺龙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适时地把握战机，巧妙地指挥部队猛追猛

打，终将南逃敌人之后尾尽歼于川西北地区。贺龙同志在给中央及西南局的报告中说：我们“遵照先慢后快的战略指导方针，以极小的代价歼灭敌近 8 万，促成残敌 26 万余人超乎预料地迅速土崩瓦解，川西北完全解放，军事任务圆满完成。”

改造起义部队

解放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西南军区面临着对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 90 余万部队进行改造的繁重任务。根据毛主席关于对这些部队“包下来”的指示精神，中共西南局制定了对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改造和处理的方针：“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所利用扰乱社会”。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贺龙同志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他反复分析研究了起义部队的状况，认为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人，起义较早，在西南影响较大，首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对稳定局势有重要作用。于是，他在百忙中，亲自到刘文辉、邓锡侯家里，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讲解我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征求对西南工作的意见，还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使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心悦诚服，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贺龙同志还多次接见起义将领，做了大量工作。他向那些对国民党反动派仍有幻想的人，进行耐心说服；对企图利用自己的势力，向我党讨价还价的人，则严正忠告他们，不能三心二意，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才是唯一的出路。派到起义部队的我军工作人员，按照贺龙等同志的指示，在起义部队的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中，开展了诉苦运动等项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所有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次，贺龙同志到重庆检查工作，他回成都时，我派了一个警卫连担任护送任务。过了内江以后，天色已晚，司机看不清道路，把汽车开到了一个起义部队的营地。当时，局势很不稳定，匪特四出活动，曾发生过起义部队哗变事件。随行的同志们担心会出意外。但是，贺龙同志十分镇静，爽朗地笑了笑说：“你们紧张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做工作嘛。”贺龙同志进入营房，召见了该部的军官，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接受改造，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临别时，他们列队为贺龙同志送行。贺龙同志勇敢坚定，沉着机智，令敌人慑服，使同志敬佩。他的声誉和威望，对争取和团结民主人士与起义部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各项群众运动的配合下，我军在短期内完成了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艰巨任务，使西南的整个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清剿残匪

早在解放前夕，蒋介石就在西南布置了“应变计划”。他们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机，勾结封建势力，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以残酷屠杀的方法，裹胁群众，到处制造反革命暴乱，给我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到 1950 年 3 月底，全区股匪已达 1000 多股、27 万余人，并在继续扩大。因此，清剿残余匪特的斗争，就成为我们在西南解放后的中心任务。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作了剿匪斗争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结合征粮和生产，迅速展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在进剿以前，贺龙同志指示部队深入调查情况。他还不顾个人

安危，亲自下去检查工作，了解敌情。有些封建地主、土匪头子放风说什么：“只要共产党不在西南搞减租退押，就可以让你们站住脚。你们把锅打破了，没有我们补不起来！”贺龙同志听到后，坚定地说：“我们不搞减租退押，还叫共产党吗？我们不但要搞减租退押，还要搞土改。我们自己打破的锅，自己补！”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剿匪问题的报告，逐个分析了几个大股匪首的来龙去脉，指出：“土匪的产生绝不是因为征收公粮问题，而是国民党残余匪帮勾结封建势力，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作垂死挣扎。不管这些匪徒如何顽抗与猖獗，我们党政军民共同协力，一定能很快清除他们！”贺龙同志十分重视整顿部队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强调指出，大股顽匪多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我们团结好当地兄弟民族，是分化瓦解敌人，彻底歼灭匪特的决定条件。川西北的黑水地区，是国民党残余匪盘踞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我们剿匪斗争中的一个顽固堡垒。开赴这个地区的剿匪部队，按照贺龙同志的指示，揭露了匪首傅秉勋的阴谋，公布了他的罪状，做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工作，并运去大量布匹、粮食、盐巴等物资，广泛救济当地人民群众。这样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歼灭了这股残匪，创造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剿匪的范例。在剿匪斗争中，贺龙等同志指示部队按照匪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对大股上匪，“以集中对集中”，实行分进合围、远途奔袭和猛打穷追；当残匪化整为零，流窜边沿山区时，则“以分散对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跟踪追歼，反复搜剿。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运用各种形式，彻底揭露匪特的谎言和罪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消除了群众的顾虑。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生产、救灾、筑路和兴修水利，大力支持群众减租退押的斗争。他带领机关干部，亲自参加抢修成渝公路的劳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斗争，得到了粮食75亿斤，平均收入较前增加2至3倍。在此基础上，又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新区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西南6000多万农民群众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毛主席在1951年1月28日对贺龙、邓小平等同志的报告批示说：“你们送来的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余匪众而奋斗！”2月25日，毛主席又批转了西南军区剿匪的经验。

至1951年5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取得了歼匪

100余万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全区上匪，稳定了大西南，并为进军西藏、支援抗美援朝，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 军 西 藏

1950年1月，西南军区接受了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贺龙同

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西南局的领导下，亲自组织筹划进军的准备工作。他反复强调：“我们这次进军西藏，在军事上打败敌人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胜仗，做好团结西藏各族人民的工作。我们能够进去并站住脚，主要依靠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总之，要把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放在第一位”。他还勉励准备进藏的部队学习藏语，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等。贺龙同志召集了解西藏情况的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倾听他们对进藏路线、后勤供应等问题的意见。他还搜集了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反复研究。邓小平、贺龙同志着重指出；西

藏的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补给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军区要成立专门的支援机构。贺龙同志多次听取后勤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还亲自察看为进藏部队设计的服装、用具、餐具等样品，连衣服缝子缝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不挡寒，都一一过问。他指示后勤部门：“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个军人的样子，不要穿的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战士的服装做好后，他亲自试穿过才放心。在开始进军时，西藏地方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将藏军主力麇集在昌都地区，企图顽抗。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于10月间进行了昌都战役。我军经过大小20余次战斗，歼灭了藏军总部及其主力部队，部分藏军宣布起义。昌都战役的胜利，给了西藏地方反动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其内部分化，他们终于在1951年2月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谈判，并于5月23日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5月25日，根据协议规定，西南、西北军区进军部队分路开赴西藏。这里，着重谈谈修筑康藏公路的问题。进军期间，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各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供应的指示下，军区组成了由工兵部队和进藏部队参加的筑路大军，决心在飞鸟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筑康藏公路。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世界公路建筑史上所罕见。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嘲笑我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面对这个挑战，贺龙同志斩钉截铁他说：“这条康藏公路不但一定要修，而且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他在重庆召集筑路部队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公路的线路和各项具体问题。工程开始后，他委派我到工地督促检查工作，指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报告。筑路开始后，物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由于对高原气候不适应，部队的工作条件较差，许多战士营养不足，体质严重下降，影响了施工的进度。贺龙同志对此极为关切。他指示后勤部门说：“那里地势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战士们常常吃不饱，半个月见不到太阳，体力消耗很大，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士们的健康。”他委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带工作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这以后，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及时从内地加工、调集了大量物资和药品，改善了筑路部队的工作、生活和医疗条件，保障了施工的正常进行。筑路部队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重重的自然障碍，历尽艰辛，终于在康藏高原架起了一条2400多公里的幸福“金桥”。这条公路的建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进藏部队的行动，而且对于巩固西南边疆，建设新西藏，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藏部队认真贯彻和平解放西藏

的“十七条协议”，1951年12月20日，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西藏的和平解放，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枷锁，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贺龙同志在指挥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反”和整编

1952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西南军区相继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整编部队的工作。

“三反”一开始，贺龙同志就亲自抓运动。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第一线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层层下水”，深入发动群众。他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仓库查看积压和浪费的情况，还亲临一些建筑工程现场，细心检查施工质量。他在很短时间内，跑遍了军区的几个主要单位和仓库。在胜利形势下，有少数干部铺张浪费，追求排场，滥用国家资金，大肆修建办公楼，群众意见很大。贺龙同志看到这些情况，气愤他说：“这都是人民和士兵的血汗，有的部队战士到现在还住帐篷，可是我们有些人却在大兴土木。这不是为士兵服务，而是为少数人服务！我们要把这个歪风打下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某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漂亮的办公楼，而对面山包上执勤的一个连队，长期住帐篷，他们却漠不关心。贺龙同志知道后，立即前去查看，当场命令：“这房子不准他们住，不但不准住，而且还要作检讨。叫他们搬出来，让给执勤的连队住！”为了更好地教育干部，推动运动的开展，他指示有关部门举办了“三反”展览会，并亲自指导军区文工团排演文艺节目。

在运动后期，贺龙同志特别强调定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

说：“定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材料要反复核实，定案要恰如其分，不能草率。”他嘱咐政治机关，对定案材料还要进行复查，定错了的或定得不适当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着重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贺龙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中央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号召领导干部要象贺龙同志那样“司令官上前线”，把运动抓紧抓好。

经过“三反”运动，全军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纯洁和巩固，气象为之一新。

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了部队整编工作。贺龙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关系军队建设和几十万人的大问题，各级党委一定要圆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他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反复讲解整编和节约的意义。他常说：“我们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落后了，就要挨打”。但是，“强大的国防要依靠强大的工业做基础。军队不进行整编和节约，就会影响增加生产，国家就不可能加速实现工业化。国防力量也不可能很快加强。整编不是削弱而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贺龙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搞好复员转业人员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整编不单纯是减少吃饭人数，主要是为着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对复员转业人员，一定要妥善安置，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所长。

在整编过程中，贺龙同志指出，要在全军区人员中树立统一集

中和正规化的思想，建立严格的军事生活秩序，加强纪律和内务条令的教育，克服游击习气和分散主义倾向。同时，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参加各种可能的生产建设工作。他说：“人民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生活非常穷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必须参加生产，厉行节约。只有军事上打了胜仗，经济建设上也打了胜仗，国家才能巩固。”

经过整编，初步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部队冗员大为减少，

机关较前精干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部队更加纯洁和充实，战斗力大为加强。军区后勤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军区上缴了历年节余的大量经费，清出大批积压物资，既改善了部队的物资供应，又支援了国家建设。

顾全大局爱护战士

贺龙同志历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表率。

贺龙同志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常说：“部队是党的工具，党委

托谁指挥都是一样。如果我指挥过的部队，只能我贺龙带，不听别人指挥，那就是说我贺龙没有党性，没有把部队教育好。”在向川西北进军之前，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正集结在秦岭以北。他欣然表示，从进攻态势来说，十八兵团入川最合适，我就带十八兵团吧。西南刚解放时，急需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贺龙同志向干部部门交代：地方需要干部，要多少，就调多少，一定要调好的，不能把不好的调给地方。他和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不要害怕干部级别低，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只要他们听党的话，按政策办事，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可以破格选用，放手让他们去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从军区先后抽调了几个军。贺龙同志嘱咐我们说：“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干部一定要配备好，配得强一些。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贺龙同志作风深入扎实，凡事总喜欢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布置工作，他尽量亲临现场，和有关同志具体研究，迅速作出决定。他知识渊博，作报告、讲话，非常生动和富有风趣，常常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形象地解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非常爱听。贺龙同志身患高血压等疾病，可是，他忘我地为党工作，很少休息。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下去检查工作时，部队同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多做几个菜，他就批评说：“搞这么多菜干什么？给我炒点素菜就行了。”教育大家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有时，他喜欢穿带补丁的衣服。有的同志说：“解放了，条件好了，首长还穿补丁衣服干什么？”他笑笑说：“这是在延安时穿过的，现在穿它，光荣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这在贺龙同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干部，无论是原来的部属，还是由兄弟部队调来的，从无亲疏之分。他对兄弟部队调来的干部，倍加关心照顾：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老部下，要求更严；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同时又热情地教育他们改正错误，轻装前进；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同志，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又提醒他们不要翘尾巴。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同时也很关心院校和医务部门中的技术干部。他每次下去检查工作，都再三叮嘱这些单位的负责同志要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让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大胆放手工作；对于留用的技术人员，要注意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特长。他还交代，每逢年节都要请技术干部会餐，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贺龙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爱护战士，是无微不至的。1953年7月，贺龙同志在军区连队政工会议上说：“干部对战士应该象父母对儿女、哥哥对弟弟一样，随时关心战士的冷暖，战士有病更要体贴照顾，这样才是好干部。”贺龙同志以他光辉的革命实践，赢得了西南军民的衷心爱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但是，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南局和军区党委的

领导，归功于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他谦虚谨慎，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常说：“自己享受人民的东西大多了，但工作做得很少，这是很抱愧的。”贺龙同志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迄今还在激励着我们。

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伯承同志在精心指挥作战的同时，还挤时间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作战总结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刘伯承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的珍贵材料，对于深入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刘伯承同志所说：“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是身当其时，身当其事的。”我在刘邓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3个年头，对于他们的指挥艺术我是十分敬佩的，现在重温刘伯承同志许多关于作战指挥的论述，对他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记得曾经同我们多年作战的蒋军高级将领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的指挥特别机动，令人莫测高深。这种说法，我看相当有道理，也可以说其中包含了许多他们吃过苦头的实际体会。在这篇短文里，我想粗浅地谈一谈这个问题，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艺术。

一机动是弱军战胜强敌之道

刘伯承同志曾经说过，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1982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了《刘伯承军事文选》征求意见本。李达同志参与了《刘伯承军事文选》的编纂工作，本文即为李达同志1982年撰写的学习、研究《刘伯承军事文选》的文章，首次发表于《军事学术》1982年第12期。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机动。”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

刘伯承同志还指出：“我们的作战的机动，必须（一）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二）集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三）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刘伯承同志的这些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机动是弱军战胜强敌之道。

二机动和牛抵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

刘伯承同志指出，机动和牛抵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

要歼灭敌人就要机动，牛抵角歼灭不了敌人。他在总结解放战争中我们内线作战的总情况时强调，我们作战基本上是机动的，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但有时也免不了牛抵角。例如巨野战役（龙凤之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他检讨了这一战役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因而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

刘伯承同志说：“作战有三种战术：一、牛抵角。二、马的战术

——用后蹄踢。三、狼的战术。”他反对和批评牛抵角战术，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终免不了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机动战术，曾举过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成都有一条坡路，狼就在坡路上静坐等着，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走也走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他指出：“狼的战术是高明的。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刘伯承同志就是以

这样一些生动形象而又发人深思的比喻，来教育我们掌握机动的战术，避免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

三歼灭，是机动的本质

刘伯承同志深刻地论证了机动的本质，并在实践中体现了这一本质。他说：“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但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都是担任一个战略方面军的指挥员，他们所指挥的几十个主要战役，几乎全部都是在机动中完成的歼灭战。

四大踏步进退是机动的主要形式

大踏步进退可以保持最大的主动性。“或者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人之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机动方针；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特别要避免敌人的合击。”1946年，在冀鲁豫战场作战时，同敌人打了7仗，除了上述的巨野战役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以外，其余6仗都是在“大踏步进退的机动中取胜的。我在《三破邯郸梦，三出陇海线》一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了，这里就不赘述。后来千里跃进到大别山作战略展开，打了张家店战斗和高山铺战役；接着，敌人派了33个旅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来围攻。我随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在大别山内线打游击。这7个月的斗争，也是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灵活运用分遣与集结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的。刘伯承同志说：“主要运用分遣与集结的机动寻歼敌人。即是大踏步的分遣，撕破敌人合击阵势，此间随即寻机向心集结，以围歼可以歼灭的敌人。”主力转出大别山之后，与陈粟大军、陈赓兵团三军配合机动歼敌，就更加运用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歼击敌人了。胜利渡江之后的千里追击，也是一种机动作战。进军西南又前进了一步，陈赓第四兵团由广东、广西进军云南，陈锡联第三兵团和杨勇第五兵团经湖南、湖北进军川黔，可以说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大机动作战了。

在机动作战中存在一个走路和粮食、弹药供应的问题。关于走

路问题，刘伯承同志对部队进行了许多生动有效的思想工作，着力纠正某些同志怕走路的思想。在大别山，他幽默地说，走这样的田间小路，跌跤也跌的是“骑马跤”，一跌跤就骑在田埂上。他从战略任务需要的高度，来动员大家学会走这种路。他说，现在一切都为了建设中原这块战略前进基地。走小路、跌“骑马跤”，打山地战，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某些人想摆脱这个任务是不行的。他又从战术上来动员大家学会走路。他说：“部队行动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走路也是战术，你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他还常常引用俄国名将苏沃洛夫的名言来说明走路的重要性：“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

关于兵员补充，弹药、物资供应方面，在冀鲁豫作战中，刘邓关

于巨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给军委的报告中，就有这样一项：“由于兵员及弹药供应量之不足（我火力太弱未能攻下金乡），曾影响到连续作战与解决战斗，战斗进展不够迅速与彻底。这是大军大踏步机动作战的极大苦事，当设法补救之。”一般刘邓是不向上面叫苦的，这次叫了苦，但还是不向上伸手，而是自己设法解决。

渡江之后，刘邓命令全部主力三个兵团千里追击，切断浙赣

线，事先也是关注到交通和粮食问题的。如对黄山、波阳间道路和粮食情况进行过调查，对三个兵团出浙赣线的路程远近作过计算等。进军川黔，要后发先至，断敌退路，要猛打猛追，叫敌人来不及变更部署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因此，干部战士的行军是十分辛苦的。由湘西向贵州进军，遇到连续半月以上的淫雨，前进路上横亘着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路小，山陡，流多，水急。干部战士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几跤，有的甚至每天都是浑身泥水。自军长以下大多数干部，在将近半个月时间内，都因山地崎岖而丢掉乘马和铺盖，只能步行，和衣而眠。为了奔歼敌人，为了跳出无粮区，大多以每日120里至180里的行程连续前进，甚至有几个昼夜连续急行军。这些非同一般的困难，在有利的思想教育和必要的物资保证下，都被一一战胜了。刘伯承同志不止一次地引用外国军事家关于要不顾部属疲劳追击歼灭敌人的话。如百团大战时，他引用过德国将领的话：“每至部队追击时，常有报告自己伤亡过大，困难过多，我的答复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别的话说。”又如，他早在红军时代，就引用过这样一段话：“胜利之际，部属常以人马的耗损和疲惫为词推卸追击，结果放走了耗损较大疲劳较凶的已败退的敌人，养成和招致敌人重新对我战斗。其实说来，……养兵之意义就是为此时歼灭敌人，此时不惜部属的耗损和疲惫，正是减免将来的耗损和疲惫。”这就是刘伯承同志认为带兵、用兵要严的道理，他的哲学是“慈不掌兵”。但另一方面，在官兵的福利上，官兵的具体困难上，如疾病、负伤、吃饭、走路、睡觉、背负等等，他又无微不至地细心照顾。在这方面，他的哲学是“慈”。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他的养兵、带兵、用兵原则就是“以严济慈，以慈济严，严慈相济。”如1949年11月11日，刘邓关于隔断敌宋希濂、罗广文7个军之退却道路给第五兵团和第十军的指示中，最后特别写上了这样一条：“近半月来，我各部队天雨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以小失大。每人每天的5钱油盐 and 1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又如准备实施成都围歼战以歼灭胡宗南主力的时候，1949年12月6日，刘邓给各兵团的电报中，具体规定了第十、第十六和第十八军的休息时间（3天至5天）最后又写上一条：“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站收容。”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刘邓事先就关注鞋子问题，要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4双胶鞋，保障了机动作战的顺利进行。

五敌我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刘伯承同志说：“宽大机动地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办法。”所以，敌我争夺主动权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敌我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上面。这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实施“囚笼政策”，我们打破“囚笼政策”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敌人的“囚笼政策”是包括军事上的毁灭，政治上的欺骗，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腐蚀的“总力战”。目的是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其殖民统治。在军事上来说，首先就是用铁路作大输血管，公路作小输血管，据点作血库，以保证他的机动自由；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制成“囚笼”，以剥夺我军的机动自由。我们则以党政军民一元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对敌进行全力的全面战争，以打破其“囚笼政策”。目的就是争夺我军的机动

自由，剥夺敌人的机动自由：就是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以建设和壮大我们的军队，以袭击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中断的敌军。

与敌人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有一个重要环节，表现在采取

“敌进我进”的战术上。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敌人的后方，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毁敌交通，袭敌据点，从敌人侧背打击敌人。刘伯承同志曾说：“‘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作解放斗争的战术。”这种战术和我们发动的全面的对敌斗争紧密结合，粉碎了日本侵华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敌人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还密切联系于根据地的武装建设。抗日开始时，我军是以正规军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的。到了太行山后，刘邓首先着眼于自卫队（后来的民兵）、游击队的建设和军区的建设。一到晋东南，刘伯承同志就在辽县办起了游击训练班，编了两本通俗简要的教材：《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和《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后来在1939年10月，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军区建设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又讲了一次《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1942年又给人民武装干部讲了一次关于人民武装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的课。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建设中，形成了正规军、军区武装、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并组成了游击集团。刘伯承同志形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体制是一只骨、筋、肉组成的打人的拳头，并且总结了人民武装建设的经验。经验表明，正规军要机动，就得有广布的游击队、民兵的掩护和配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机动自如，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对准敌人的弱点实施突击；同时也才能使敌人耳目失灵，摸不清我们的情况，要打我们不是扑空，就是打不着要害。正规军要准备机动，就得休整。这也需要广大游击队以接敌活动进行掩护，迷惑敌人，使敌人“四面楚歌”，“草木皆兵”，在判断上发生错误。这样，我们就把敌人的主力牵制住了，使我正规军能安心休整。总之，游击集团网的掩护与配合，有利于正规军保持最大的机动性，主动地进行机动作战，歼灭敌人；也有利于正规军适时地进行休整，以利再战。而敌军的机动则受到限制，处处被动。正如解放战争中一直同刘邓大军作战的蒋军嫡系部队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日记中写的：“行军数十日，不能与共军相遇，既遇又失其追击方向。”“阅共军文件，知共军第一流部队老控制在第二流部队或民兵掩护之下的适中地点，便于依情况向各方面机动。而我们第一流部队老是摆在前面，不但暴露企图，抑且失动作之自由，万一第一流部队战况危急，第二流部队还有胆应援吗？”

以上充分说明，机动不是某一天才的指挥员一日之功所能达到的。而是要按着人民战争的规律，去完备各种必要的因素，才能办得到。刘伯承同志指挥上的机动，正是在多方面的艰苦努力中得来的。

六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

刘伯承同志异常强调指挥员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这是机动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准备实施襄樊战役时，他曾说：“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发扬机断行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1942年2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

训时，对于当时在战略上占主导地位的游击战争，他就说过这样的话：“游击战争是千变万化，急转直下的战斗环境。凡独立行动部队的干部，特

别是分遣连的干部，应是在上级总的意旨之下，从政治上积极负责，独立自主，刚胆沉着，机断行事，没有消极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犹豫下做的事情，也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事情。”不仅是游击战中独立行动的部队如此，在运动战中协同作战的部队也应如此。1946年评讲巨金鱼战役时，他曾说：“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上述的战役情况如此演变，各级指挥员一般都能在总的意图下，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向胜利方面扩张战果，尤其在战役最后一段向胜利进展之际，各纵队能从各方面向心集中作战，发挥有余不尽之力，故能获得如是之胜利。战斗时敌人屡战屡败，但其狡如兔，不易捕捉。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应在注视战机进展中，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去开展战局，走向歼敌，即如何创造敌人弱点，如何诱敌前进，如何追求敌人，如何兜击敌人之类。这里就包括有适应战机的强行军不怕疲劳的一项，这是在战斗间隙中就要预先锻炼的。由于是机动作战，必须发挥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性与责任感，而上级指挥员的指挥，预宜以训令（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方式示之，以便于下级机断行事。”这段话包含着关于机动的许多精粹的东西。刘伯承同志常常以这样精粹的理论指导，教育他所部的指挥员。因而，他所领导的指挥员，常常能从他的战斗、战役、战局的讲评中，得到营养，并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做到打一仗提高一步，以不断的进步来争取不断的胜利。刘伯承同志1948年6月在总结三军会师，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对敌人主要采取合围钳形突击的战法时，就反复地总结合围钳形攻势中的机动。其中对宛东战役的经验总结中，他又告诫各级指挥员，在机动中，各级指挥部应在上级总的意图之下，适应整个具体情况，负责机断行事，而不要机械地去执行直接上级的某些已不能适应新情况的指示。他举例说：“宋（时轮）陈（再道）两纵于30日在高庙集、兴隆镇地区，根据我们的基本命令与当时张咎的实际情况，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未完全执行西兵团命令，只以二纵进到庙庄寺、苗店之线，就势转移兵力向桥头西方向围击，故能歼敌6000余人。”他肯定“这种机断行事是对的。”并进而指出：“但根据当时情况，还未能大胆完全照我们基本命令再向西延伸，更多地截住敌人，殊为美中不足。”

七撤退是机动的战术形式之一

“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以主动的进攻与追击消灭敌军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防御退却为避害。这是刘伯承同志的机动原则。这是争取胜利的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只知进攻而不知退却，只知趋利而不知避害，就不能完全趋利

而达到战争的根本目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刘伯承同志在机动作战问题上，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他首先分析了退却战斗的观念和实践中所存在的矛盾。他深刻地指出：“退却战斗虽是一般军人所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在运动战中又确有必要的事。”现实的情况既然如此，退却战斗依然不会因为你不愿意听而在作战中消失，那就应该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躲避，不要只陶醉于进攻，而忽视作撤退准备，致使必须撤退时由于缺乏思想上和实际上的准备而造成慌乱，受到损失。因此，刘伯承同志认为，在作战中适应情况，迅速定下撤退的决心，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什么样的火候要迅速定下撤退的决心呢？

（一）没有胜利希望的时候。他对领导游击战的干部说：“估计能够胜利就打，不能胜利就撤走。或正在打，一见得不到胜利时，也要撤走。”

（二）胜利后适时的撤退。抗日战争时期的响堂铺待伏战斗和长乐村急袭战斗就是如此。刘伯承同志在响堂铺战斗讲评中，就讲了这么一条：“撤退敏捷严整。”打扫战场的工作人员，随战斗部队之后行进，故能在两小时内，完成打扫工作。部队在结束战斗之后，更能迅速撤入山地。故敌人飞机 18 架，在 16 时飞来战场狂炸，于我毫无损伤。在对长乐村战斗的讲评中，也讲了一条：“我们善于采用退出战斗的战术，乘敌不觉，运用少数兵力，积极游击在宽大正面上，把主力突然荫蔽迅速撤退脱离敌人。但是我们的撤退是击退了敌人，为了保障胜利而撤退，并不是被敌打败而撤退。”但这次撤退，与前例有些不同，是在敌增援部队继续到来，一见不能彻底解决战斗时的撤退，当时的情况是“急袭战斗已转变到正规的大开大合的战斗，打退敌人增援部队的先头虽有余，消灭敌人全部则不足，于是决心巩固已得胜利，将主力撤退于山地待机。这种急转直下的决心也是正确的。”

（三）局部受挫折影响全局时的撤退。1947 年 1 月豫皖边战役中的郑庄砦战斗就是如此。正因为退却战斗在运动战中确实存在，而又是最难指挥的，加上一一般军人还不愿听，所以刘伯承同志就着意研究退却战斗的指挥艺术。

1. 他认为撤退这种机动形式运用的方法与时机是：敌人突击我第一梯队时，第二梯队即变为掩护队，以夜间撤退为最好，并且要下达命令，作有秩序的撤退，确实掌握部队，防止溃乱。

2. 掩护部队的布置与战斗方法是：随行掩护；防御掩护；移动防御掩护（逐次掩护）；伏击掩护；反击掩护。这五种掩护方法，以移动防御掩护和伏击掩护为最好。掩护部队本身退却的办法，以逐次撤退为最好。将敌欺骗到另一方面，不得已时，小部队如连排，可用分散退却的办法，但要指定集合场。

3. 拦阻队。指挥部应组织拦阻队，其任务是在阵地的后方选择要地拦阻撤退部队，并集合之，使成行军纵队，再行撤退。

4. 各部队应规定紧急集合场——大紧急集合场，小紧急集合场，并规定后备集合场与联络所（联络人员最好着便衣）。

刘伯承同志关于撤退的这些规定，是周密的。没有周密的规
定，并严格而又根据实际情况执行这些规定，就容易造成混乱，使部队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些规定看来很简单，但都是必要的，在作战时要事先有所准备。所以，刘伯承同志在许多战斗总结和战术指示中，都重复强调这些规定。

一般我军的撤退，都是按照上面说的，明确下达撤退或转移至某地的命令。日本侵华军对退却是有所忌讳的。他们喜欢摆着“皇军”的臭架子前进。什么突贯进攻呀，分进合击呀，攻击前进呀等等，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属于不喜欢、不愿意听“退却”的一类人。所以他们退却的口令就拐了一个弯，叫“向后转前进！”

刘伯承同志的这些经验和理论，虽然是过去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但对我们今后作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

灵活机动就特别值得研究和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刘伯承同志的有关原著，吃透这个问题的精神实质，努力运用于今后的作战中去。

再论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一稿发出以后，感到有些问题谈得还不够充分、深刻。现在，我就再来作一些补充。

一再谈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在刘伯承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是打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重要一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打破日本侵华军“囚笼政策”的重要一着；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逐鹿中，它是打破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中原重点防御和在战役上对大别山要地重点进攻的重要一着。其基本特点是大踏步地分遣，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作战，以撕破敌人的阵势，随即寻机向心集结，对准敌人的弱点，围歼可以歼灭的敌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王明“左”倾路线反对游击战的情况下，刘伯承同志仍然奋力总结游击战的经验。他在病中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1934年5月）和《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1934年9月）。在这些论著中，都贯穿着“敌进我进”的原则和精神。刘伯承同志指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本文是对《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的补充阐述，写于1982年。1984年收入《刘伯承指挥艺术》一书。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的间隙，而入于其后方交通线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刘伯承同志强调，游击队在穿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在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阵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而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的碉堡地带，这样恰入敌人陷阱，回旋无地，必遭其严重的打击。

这些来自实践的正确战略战术思想，在王明“左”倾路线统

治时期，未能得到实施。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才得到实施、丰富和发展。比如刘伯承同志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武装工作队经验时曾指出：“武装工作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远殖游击队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进我进”，有两层意思。当时是和国民党合

作抗战，有了所谓“大后方”，其实是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如此，一般说来，我们八路军在敌人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还是由这种“大后方”进入敌人后方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敌人后面去消耗和消灭敌人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由我抗日根据地穿过日本侵华军封锁线，深入到它占领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头是我们当面的日本侵华军，以“堂堂之阵”沿同蒲、正大铁路突贯进攻，钳击太原。孙子不是说过“勿击堂堂之阵”吗？对日本侵华军的“堂堂之阵”击不击呢？不击就会丧失民心，挫伤民众的抗日热情。我们是一定要击，就看怎样击法。当时国民党军队是上面挡敌，扼守忻口、娘子关两个咽喉要点。而我们则把日本侵华军这种按其战斗教令进攻的“堂堂之阵”，视为给以侧击的好机会。因此，刘伯承同志先指挥一个团，机动到同蒲路北段敌人的左侧背，予以拊击，取得了阳明堡毁敌24架飞机、歼敌100余人的胜利。以后

又指挥一个旅，机动到正太路敌人的左侧背拊击敌人，取得了长生口、黄崖底、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配合友军打了一场扼咽喉背的歼敌战，并顺势转入敌后，创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接着是派遣部队到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与山地游击战争互相策应，进而发展了鲁西北、冀鲁豫根据地。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各块被敌人分割、包围、封锁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穿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战争。这些敌占区，敌人用碉堡、据点和交通线摆成“棋盘阵”，构成“格子网”。刘伯承同志指出，“棋盘阵”中间有很多空隙，“格子网”并不象纸上画的那么密。他说：“敌人由点的占领，到线到面到地带的占领，需要很多的兵力，但敌兵力是不足的，因此就形成外强中干。”“总的说敌占区是前头硬，后头软”，便于我派武装工作队进去活动。武工队要接受我们的传统。一二九师在抗战开始就敌进我进，进到敌人后方，在敌人后方去拉他的后腿。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时，在豫南、鄂东、皖西三个地区间巧妙的机动中取得了张家店战斗和高山铺战役等歼灭战的胜利。而在敌人集中 33 个旅进行重点围攻时，刘邓的作战部署是：以刚到大别山的后续部队第十和第十二纵队分别迅速进入桐柏山和江汉区，作战略再展开，以扩大战地面积，蔓延游击战争，拖散敌人。其余主力，适时分遣集结，依托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必要时可暂时渡淮河机动，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路。以一部主力，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军区和军分区以一部兵力适时转移至外线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侦察敌情。

当第十纵队向桐柏、第十二纵队向江汉机动的时候，同志们对这次行动都是完全理解的。但当刘伯承同志率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机动的时候，有的同志就不理解了，说这是“前进 1000 里，后退 500 里。”实际上，这恰恰是对“敌进我进”的发展运用。

二围歼敌军的机动

在“敌进我进”的机动中，要寻机进攻，围歼较弱的一路敌军。在这种进攻战术中，合围钳形攻势占有重要的位置。刘伯承同志对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表述如下：合围钳形攻势必须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合围与割裂。按一般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敌人，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体系割裂成几块，才便于以我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的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求其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之类），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破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刘伯承同志要求部队，“割裂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从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大战果。”这里是说围攻在主要突击方向以两个突击队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至于在两个突击地段的中间地带活动的诸军队，则作

辅助进攻的钳形突击，或扼守要点，或实施佯动，无论怎样，这些军队都应从各方面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实施向心的突击，足以使敌人四面受击，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适应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布置。刘伯承同志的围攻战斗指挥要旨，是其进攻战术的核心思想。他总结了我军进攻战术的经验，吸收了外军采用合围钳形攻势的精华，也批判地吸收了日本侵华军“战术选集”中的东西，特别是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的战术，并使之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战役战斗的角度来估量刘伯承同志的围攻战斗指挥要旨，它超出了战役、战斗的范围，在战略进攻的指挥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研究刘伯承同志的战略思想，必须善于从刘伯承同志关于战略、战局、会战、战役法、战术理论等各个方面及其总体上，来吸取他战略思想的精华。1948年7月襄樊战役中攻克襄阳城的战斗，是刘伯承同志合围战斗指挥要旨见之于战斗的一个小型范例。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刘伯承同志指出：“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13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祜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郟白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城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5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队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进军西南战役是刘伯承同志合围战斗指挥要旨见之于大战役的一例。刘伯承同志在总结时指出：“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有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

三粉碎敌人围攻的机动

刘伯承同志曾指出：“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是被围攻部队的作战的基本原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而把握住的。”

就以抗日战争为例，日本侵华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的

残酷的“扫荡”，不论叫做“铁壁合围”也好，叫做“铁桶包围阵”、“捕捉奇袭”、“铁环合围”也好，都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原则。这种分进合击战术，刘伯承同志称之为“圆规划法”。恩格斯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中，讲到神圣同盟企图以分进合击来夺取巴黎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圆规划法”。就是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弧，其距离大概为70德里，14日行程。向巴黎分进合击的神圣同盟军队，在这条弧线上同时出动，从各方面威胁巴黎。

刘伯承同志指出，“圆规划法”是敌规定战略的传统。就是以某

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采取作战行动的办法。这个点在太行山来说，一般是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这样的我军首脑部位。按照敌酋的如意算盘，是“广大广大包围，压缩压缩消灭”。企图把我军各部都向我腹地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他集团合击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例如1942年夏季日本侵华军对太行山北部“扫荡”的共同合击圈是以姚门口为中心直径约50至60华里。敌人通常是查明我们的活动规律，利用周围的据点、公路作合击的部署。敌人出动，在未构成合击圈（刘伯承同志称之为“利害变换线”）时，只有兵力不等的二三大股，每股都使我们不能

各个击破，及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圈，使能互相策应。其主要方向的大股，常作纵深配备，或在要点设伏，或准备追击，且善于隐蔽和伪装，以期诱我入其圈套。

对于遭到敌人合围时如何机动，以粉碎敌人的合击，刘伯承同志总结了许多好的经验，形成他的反合击战法和反合击指挥艺术。

例如：正规军本队在敌人的大“扫荡”开始时应在内线活动，敌人到达利害变换线时，最好寻求敌人梳子队形的接合部，以转出外线作战。如经过敌人梳子队形不易转出外线时，则须将部队分遣成营或团转移到指定地点。此种转移，应采取正确的路线，并以游击队宽面的佯动迷惑敌人，特别是以他本身的便衣队直接掩护之先遣部队在去路上机警侦察非常重要。本队转移外线时，应派营或连的兵力留在内线加强游击，而本队在外线活动，应指导在敌占区活动的游击集团，以寻求有利的机动的袭击，打击敌交通补给线。正规军应随时寻求敌人的弱点，如对分散之敌及侧背之敌，集结适当兵力给予有力的打击，这样可以错乱其阵势，求得我有力的机动。又如：敌人在分进还不能合击之前，各路不能彼此策应，尤其是在山地策应困难，我们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就是先要采取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的弱的而又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并且击破它的地点和时间，又必须在敌预定合击的地点和时间以外，以免陷于被动的地位。倘若各路合击的敌人，把我围在窄小地面将行捕捉之时，那就毫不犹豫地转到被围圈以外作战。如决定击破某一路时，则令游击集团积极活动，虚张声势，以麻痹吸引其他几路是必要的。这种麻痹几路毒打一路的办法，要靠各部队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又要靠各部队依据总的企图，各向当前之敌积极行动，切不可彼此等候误事。再如：在敌人大“扫荡”的条件下，正规军应在强化全面的游击战争的局面中，进行机动作战，适时分遣或集中在内线与外线上进行夹敌活动；适时把主力由内线转出外线扰敌补给咽喉，断其交通。但首先就须分遣以牵动敌人，错乱其合击阵势，使其在精神上疲倦。敌阵势紊乱之时，特别在他分兵摧毁我民众与资财和收兵归巢之际，我集合适当兵力，进行有力的突击。对付敌人“铁桶封锁阵”的反“扫荡”作战，诸基干军队应保持在边地与敌合击的间隙地进行机动。这种机动，必须出敌不意，而其目的不只要消极地脱离压缩的合击，而且还要积极地奇袭敌占区要点，摧击敌人的补给线，尤其是背击敌人残置封锁部队以策应腹地游击集团活动及其反抉剔“扫荡”的动作，造成敌人腹背受击的环境。1942年夏季反“扫荡”中的苏亭战斗，就是我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主力转到外线后，以约1个连的兵力，在敌人补给线上伏击敌人的最好战例。刘伯承同志当时表扬说，这个部队最好的伏击战例，就是在辽县、黄漳敌补给线上之苏亭、秦庄领导民兵消灭了归巢之敌约140余人。1947年末、1948年初，我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初期，在敌人集结重兵合围我军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机动自由，刘伯承同志也总结了许多好经验，好战法。他在《我反合击战法的研究》中，曾指出，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采取1个营1个连驻守一地的方针。我第一步以1个旅、2个旅分别歼敌1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1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或打大仗。

四作战形式的转换

刘伯承同志在分析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这几种作战形式的互相关系

和互相转换时，作了这样的叙述：“为便于研究战术的运用起见，划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范畴，正如地图上假定划分的经纬线以便于研究地理一样。这在学理的研究上都是必要的。然而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鸿沟，而是互相连贯着的。就游击战向正规的运动战发展的过程及其连贯性来看，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在战术上说，这些基干支队和县区于队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箝制队，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正规战的进攻战斗发展的；伏击运动中之敌，是向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是向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刘伯承同志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还谈到：“运动战与阵地战，时常是互为变换的。如遭遇战，就是标本的运动战，但它一转到固着一地时，就变成了阵地战。如阵地战的阵地一被突破时，又变为运动战了。”正因为刘伯承同志深通各种作战形式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互相转化，所以不但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对各种作战形式运用自如，并使之相互配合，而且在我军历史上几次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他所统率的部队都能在编组上、战术上、指挥上，顺利地、迅速地实现这种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抗日战争时期的阳明堡、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是向游击战转变的很好例证，但其中好些战斗都带有运动战的成分，所以当时刘伯承同志也曾称之为“运动游击战”。解放战争中的上党、平汉两战役，则是从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典型。随着我军炮兵、工兵的发展和建设，突破筑城地带的阵地攻坚、攻城战斗和村落攻坚战斗有很大的发展，到了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候，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总结，则是“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的一元化了。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担任正面阵地防御的部队的指挥员，也必须在平时训练中，学点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并懂得各种作战形式互相转化的道理，以备在必要情况下，灵活采取相应的作战形式打击敌人。如果平时只有阵地防御的训练，没有兼学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临事又不善于及时定下决心，实行必要的作战形式的转变，就必然要吃亏。马岛战争〔1〕在岛上的陆战，阿根廷的守军没有能从阵地防御转变为运动战或游击战，阵地被突破后的结果是可悲的。

五利用敌人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分配上的矛盾击破敌人

刘伯承同志最善于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当面敌人机动兵

力与守备兵力分配上的矛盾，他研究了外国军事学说中关于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的关系的各种论点，并由此产生出一个重要的作战谋略，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敌人的这一矛盾，在作战上迫使敌人不断把机动兵力转变为守备兵力。他在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时候，关于远殖游击队的战略措施，就体现了这一点。当时他敏锐地分析了敌人包围中央苏区的碉堡封锁线，除主要地方由一些白军守备外，大部分都是由拥有若干团队和敌侦察员的乡村办公处或乡事委员会先勒令农民十家联保，然后指定农民守备。因此，他提出远殖游击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击乡事委员会及其团队和敌侦察员，迫使敌人转用机动兵力来守备。刘伯承同志说：“我们要了解，敌人的碉堡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碉堡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同时，敌人

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时，其后方必然守备薄弱，便于我使用远殖游击队断敌后方交通，使敌军困饿于苏区，他特别强调领导地方群众发动武装斗争，以打击敌薄弱的后方守备，迫使敌“围剿”部队退出苏区；在敌人败退的时候，又以内线部队追击敌人，敌后游击队迎击敌人，来打击敌人的“围剿”部队。当时刘伯承同志不轻视敌人的碉堡主义，但也并不认为它是很可怕的。他看出了蒋介石在德国顾问谋划下的碉堡主义的弱点，认为是可以打破的。他的要有强大的预备队的思想，在敌人后方繁殖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敌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关系的论点，都是打破敌人碉堡主义，保持和扩大我军机动，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法宝。和王明、李德的两个拳头打敌人，否定强大的预备队，对敌人碉堡主义先“左”后右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利用和扩大敌人机动兵力和守备兵力分配上的矛盾，争取和扩大我之主动权，迫使敌人缩小和丧失主动权，是刘伯承同志实施机动作战的重要谋略之一。为了较准确地估量敌人的守备兵力和机动兵力，刘伯承同志是这样计算敌军在战场上的兵员密度的：战地面积除以敌军兵数，所得的商，就是一个敌兵占多大面积；反之，敌军兵数除以战地面积数，所得的商，就是多大面积上有一个敌兵。通过这样精确的计算，分析敌军在战场上布兵稠密还是稀薄或是十分稀薄，这是刘伯承同志在战略上宏观敌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同日本侵华军作战中，刘伯承同志曾作过这样的计算：据敌大本营的报告，截至190年我百团大战为止，日本侵华军侵入我国土地的面积约为166万平方公里，按其当时侵入我国的总兵力计算，平均1平方公里还摊不上1个敌兵。仅万余里长的铁路线，就需要17个师团的兵力来守备。这种兵少防宽，此集彼虚的情况，迫使敌人不断转用机动兵力去担负守备。初则靠伪军和混成旅守备，后来不得不把野战师团也用于守备。刘伯承同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得出了日本侵华军“外强中干，前强后干，上强下干”的结论，主张不断向敌交通线及守备薄弱处主动进攻，并派遣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进一步迫使敌人转移兵力于守备，从而对敌人不断予以各个消灭。军事家研究敌军兵力结构的两个部类——机动兵力和守备兵力及其比重，正如经济学家研究工业生产的两个部类——重工业和轻工业及其比重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伯承同志认为这是对敌人作战略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苏区对蒋介石作战的时候，他就十分关注敌机动兵力和守备兵力的比重，并设法削弱其机动兵力，增加其守备兵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在战术原则上，野战兵力要大于守备兵力，守备兵力越少越好。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住，到处守备，到处是弱点。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同志一论、再论蒋军的致命弱点，都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然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1947年，刘伯承同志精确地分析了当时冀鲁豫战场的情况：国民党军有王敬久集团9个旅，刘汝明集团6个旅，孙震集团7个旅，共22个旅，侵占了我15座空城，被我歼灭7个旅，剩下的15个旅，有10个旅被迫守城，仅5个旅可作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我各个消灭的可能性便更大，如果他以机动兵力补充守备兵力，那就会更为被动，更有利于我军机动，随时可以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这种形势说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度分散，其危机已达顶点，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入被动。刘伯承同志又进而

从战争的性质上来分析敌人的致命弱点。他指出：蒋介石既要卖国独裁，就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五军第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不得不拿来守备，并且他现在规定一营人不打仗，每个地方守备兵力都在一营以上。而且他把部队集中到前线来之后，后方空虚，民变蜂起，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蒋军致命弱点是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之所以能达到机动自如，是由于他充分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能精确地分析敌军，正确地估量我情，真正做到了“知彼知己”。他常教育各级指挥员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臏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则不是。”他常用历史掌故及现实的各种典型事例教育指挥员，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指挥艺术水平，所以他所统率的部队常能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注 释：〔1〕马岛战争：1982年4月至6月，英国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爆发的一场战争。起因是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战争中双方使用了多种先进武器装备，进行了海战、空战、登陆和抗登陆作战，英军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西南军区英模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同志们：全西南军区第一届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代表会议，也即是新型的群英大会，今天开幕了。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经过 23 年的英勇斗争，在人民领袖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为了鼓励全国劳动人民，发扬新的劳动态度，建设人民自己的国家，为了表扬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与各方面模范工作者，鼓励全军发扬新英雄主义，继续解放西藏、台湾，肃清残匪，推动部队的练兵与文化学习运动，加强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巩固国防保卫和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作了专门的决定，于今年 9 月 25 日，在首都召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和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在这个精神和号召下召开的。因此，开好这个会议，不仅对我们部队本身的建设和推动全军来积极完成工作任务，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国防，保卫世界和平，也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象这样全军区范围的群英大会，还是第一次。这次被选出来出

席大会的代表，包括七个军区另两个军和西南直属各单位共 137 位同志。这里有全军各色各样杰出的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有坚持云南敌后的艰苦奋斗的民兵英雄，更有冒险挺进奋不顾身开辟

*1950 年 9 月，西南军区召开了英模代表会议。李达同志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本篇为他代表军区所致开幕词，发表于 1950 年 9 月 20 日《人民战士》。

新航线创造高原飞行新纪录的空中英雄，不仅有男英雄，而且还有女英雄。这些同志都是我军最优秀的先进战士，是值得全军学习的榜样和旗帜。是人民国家最忠诚可靠的功臣。我特代表西南军区各统率部门，向大家致以热忱的慰问和敬意！现在，摆在我们西南部队面前的任务还是异常艰巨而繁重的，西藏尚待解放，残余匪特尚待彻底剿灭，封建势力尚待有步骤地加以推翻，巨大的文化学习运动，尚待开始；漫长的国防线尚待巩固。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到处张牙舞爪，侵犯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的美国空军更侵犯我东北领空，杀害我同胞，毁坏我财产，企图扩大侵略，挑动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准备随时以我们的铁拳，打落帝国主义伸出的狗牙，以保障人民祖国及肚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为此我们决不能以功自满，必须兢兢业业，虚心学习，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和政治文化水平，在执行进军西藏、剿匪斗争、反霸减租退押、文化学习以及保卫国防等各项任务中，进一步发挥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带领和培养成成千成万新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为祖国事业创造更大功绩。同时必须牢牢记住一切光荣和功绩，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的拥护下，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取得。因此，在这个大会中，除了推选一批代表出席首都的英模会议，向其他兄弟部队的英雄模范们学习之外，还要很好介绍你们的事迹，互相交流经验，把你们的英雄榜样和模范作风，综合起来，发扬到全西南的部队中去，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全军的新英雄主义运动，推动全军，完成更伟大的历史使命。引为大会光荣的，今天还有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暨各工厂的负责同志、代表和来宾莅临我们的大会，并将给我们以很多很好的指示和鼓励，我们要诚恳接受这些

指示和鼓励，进一步提高和加强我们。最后敬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预祝大会的圆满成功。光荣来自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光荣属于人民，属于全军的成员！为革命牺牲的英雄先烈永垂不朽！

庆祝新中国胜利建设一周年*

我们伟大的新中国，进行胜利的建设，已经一周年了，谨衷心表示热烈的庆祝！去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新中国成立阅兵典礼上，曾发布命令，刘伯承主席〔1〕在人民政协会议上，也曾向大会提出保证：坚决彻底消灭西南华南残敌，巩固国防，协力保卫新中国建设的胜利进行。一年以来，我们西南军区部队，是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和刘主席提出的保证。在中央人民政府、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全国人民及各兄弟部队的全力支持与配合，排除一切困难，为消灭残余敌人，为新中国建设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声中，我西南部队曾以一部配合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完成解放两广，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主力则直指西南，翻越武陵、秦岭等关山险隘，抢渡乌江天险，不惜冒雨忍饥，昼夜兼程，在50余天中，前进三、四千里，将敌最后一王牌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90万人，全部歼灭。解放了西南全境，使全国领土除台湾、西藏外全部解放，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继续挣扎，保持其“大陆基地”卷土重来的迷梦。由于进军之神速，使国民党反动派无耻的大规模破坏阴谋，也不及全部实现，西南人民无数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减少了国家和人民的损失。西南解放战事一结束，各项建设任务，千头万绪，均赖我军部队有觉悟、有组织、有训练的力量为主于地进行与完成，在刘、贺、*本篇写于1950年9月，发表于1950年10月1日《新华日报》。邓首长指示下，我军迅速分赴各省区，圆满担任接管警备城市及征收公粮，发动群众等工作。绝大部分担任军区、军分区任务。同时大力改造与训练90万起义、投诚及俘虏官兵，到9月份为止，起义部队已按解放军原则基本上整编完毕。除极少数被美蒋匪特务煽惑叛变，并随即为我剿灭外，一部复员回家生产，其余则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原则，顺利教育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使之各得其所。

在美蒋有计划地训练、组织、阴谋布置下，今年2月以来，西南

各省陆续爆发匪乱。4月间，匪特最为猖獗，竭尽残害人民，破坏地方民主建设之能事，妄想发展所谓“反共游击战争”，企图复辟。我军不顾进军疲劳，立即广泛分散担任剿匪任务。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军政兼施，发动群众，掌握了农村剿匪统一战线。发扬了剿匪中的新英雄主义精神，不灭匪特，誓不收兵的决心，使匪特纷纷就歼，大批来降。现在四川、西康〔2〕两省，及云南贵州之腹地地域和交通线两侧，股匪已基本消灭，成为净化、半净化地区。保障了农村生产，城乡物资交流日趋顺畅，群众组织逐次建立。

与此同时，我军并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积极准备进军西藏。

驻防捍卫边疆的部队，模范的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的同胞剿匪、诊病、教育、劳动，深得少数民族同胞衷心赞扬与拥护。

在上述繁重任务之外，我军并积极响应了毛主席关于军队参

加生产的命令，除已开荒，种植菜蔬粮食，并喂猪鸡牛羊等外，主要的参加了两项巨大建设工程。其一是水利灌溉防洪：计整修都江、惠泽等20堰；南充、西昌、绵阳、温江等7堤，修浚成都、昆明等地河道，使数百万良田得到灌溉。不取民间丝毫报酬，对农民生产鼓舞极大。其二是成渝铁路

及川康等公路的修建，自 6 月 15 日起，修建成渝铁路军工，抽出大批部队进行筑路，并带领了大批失业民工同时施工，使西南人民渴望了 40 年的成渝铁路，今年年底即可筑通重庆至朱杨溪 250 华里。川康公路在最困难气候、地形、物质条件下，已投入巨大力量，施行修筑，成绩亦甚显著。其他各部队翻修公路桥梁为数亦达数百里。在贯彻精简节约中，我军也积极响应。某些部队展开了不浪费一粒米、一滴油、一尺布运动，在援助上海失业工友中，全军区共捐献粮食 130 万斤，及个人捐款亦为数不少，表现了我军崇高的阶级友爱品质。在各项任务的进行中，我们积极加强了部队建设。在深入农村剿匪、发动群众及参加生产建设中，部队的政治觉悟、战斗素质显著提高。变连队为学校的文化教育准备工作有计划的进行：某些部队与连队已配齐了文化教员；仅我西南军区即印发文化课本 60 余万册，每个团初步建立了小型图书馆，各军区也自行翻印了大批教材，分发部队，扫除文盲工作，在各个直属机关部队积极推行下取得相当成绩，成立干部补习学校速成班 102 所，少数单位已消灭 300 字以下的文盲；全体部队文化学习情绪普遍高涨，剿匪部队在行动间隙也展开了自学互助。“包教保学”等文化学习热潮，表现了人民解放军中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一种象征。在各种斗争中，提高了指战员的觉悟，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成千上万的指战员为人民立功。部队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3〕的建团工作，亦在重点试办中，已有 15000 名优秀青年涌入青年团，不少连队亦将普遍建团，可以预见部队工作必将更加出现新的气象。干部整风正在次第开始，西南军区领导机关整风业已完成，对提高部队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以及各种不良倾向，必将划一新时代。在各项建设工作的进行中，我军同样地将表现坚强的捍卫国家、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全体指战员表示了坚决反对美帝侵略的意志。现在已有 70 余万指战员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签了名。并广泛动员教育城乡群众，参加到和平签名的行列中来。综观一年以来我军各项工作，充分表明了全体指战员为新中国建设、为人民事业，竭尽全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全体同志兢兢业业执行了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而艰苦紧张，尤为卓绝。一年之内，未有一日休息。剿匪部队昼夜冒雨进剿，攀登高山绝壁，进出于荆棘丛林之中，有的鞋子破了，用草裹脚坚持追击。有的露营荒山，风吹雨淋，衣服一天干湿三遍，有时吃不到饭，医药不济，倍尝艰辛。但指战员满腔热忱为民除害，毫无怨言。参加其他建设工程的部队与全体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同样高度发扬了劳动、工作热情。一切可歌可泣的事迹，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巩固人民的血汗成果，建设一个人民的崭新中国。当此伟大开国一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全军当愈益振奋。我们誓将继续努力，参加农村减租反霸退押伟大翻身运动，争取在今年年底肃清全区股匪，继续执行进军任务，贯彻干部整风及政治学习，继续加强部队军事政治建设，加紧准备开展文化教育运动。我们将更好地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不负西南人民的期望，克服缺点，发扬全军上下广泛的新英雄主义运动热潮，与西南及全国人民在一起，在我们战斗与建设的手上，把新中国和西南更快更好地建设起来！注 释〔1〕刘伯承同志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2〕西康省，1928 年建省，辖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省会设在康定。1955 年西康省撤销，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3〕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前身为 1922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 年 4 月，为适应新的形势，改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1957年5月恢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原名。

1951 年的迈进目标*

1950 年过去了。在这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全西南军区的人民解放军，以高度紧张的精神和战斗姿态，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及西南局的指导下，胜利地执行和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彻底全部地改造了 90 万起义和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加强了自己；歼灭了 50 余万国民党特务所组织指挥的土匪武装，粉碎了美蒋匪帮借以作为内应来妄图“反攻大陆”的迷梦，并从而保卫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达成了进军西藏的初步计划，解除了拉萨反动当局集结于昌都等地区之武装，并使这些地区的广大藏胞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完成了军工筑路的使命，使西南人民长期渴望的成渝铁路铺了一段铁轨，开辟了历史未有的纪录；最后并遂行了整风，普遍发动了新英雄主义的运动，并以此提高了战斗意志。以上种种是我们全军上下共同努力的伟大成就与光荣，应特别加以发挥和光大。现在新的伟大的 1951 年来到了。这一新的历史年代给我们带来和提示了新的光辉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在过去一年的胜利基础上来遂行更光荣伟大的建树。为此我们认为应该兢兢业业来向以下的各项目标迈进。

高度发扬战斗意志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虽在侵朝战场上遭受*本篇写于 1950 年 12 月 30 日，发表于 1951 年 1 月 1 日《人民战士》。到了历史性的打击与惨败，但它们仍企图以各种手段来达到其扩大侵略战争的蓄谋，我们的国境与边防随时都有遭受威胁之可能，世界人类随时都有被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陷于灾难境地的危险。因之我们仍应紧张起来，在已发展的新英雄主义运动和整风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我们的战斗意志，尤应向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学习，提高仇视、蔑视、与鄙视美帝的心理，并准备随时以我们的行动来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以保卫国防保卫世界和平。

彻底根绝匪特

我们在去年已经歼灭了 50 余万有组织的特务土匪武装，基本上清除了美蒋匪帮残留在西南地区所有的力量。但尚有不少的匪特分子，在股匪被清除之后，仍勾结封建势力，以各种方法图谋不轨，妄冀待机而动，配合美蒋匪帮的所谓“反攻大陆”。我们对于这类匪特分子必须十分注视，要结合人民从各方面不断予以搜捕和抉剔，以严厉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不达到彻底根绝之目的，决不休止，以保障后方治安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切麻痹大意的现象都是有害的。

完成全部解放西藏和巩固边防的任务

我们要在既定的方针下，全部解放西藏，把所有的藏胞都由帝国主义控制下解放出来，同时要将 10000 里以上边境的国防线建立和巩固起来，不使那里有任何残缺不齐和不安全的现象存在。为此，我们要继续以大力从各方面来支援上述行动。

加强国防军的整顿训练， 发展与健全人民武装

为适应新的国防建设的任务，我们必须加强有关现代化国防军各方面的整顿和训练，提高各兵种及联合兵种的组织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各工作部门的业务能力，以便进一步掌握与运用新的技术，避免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为

了进一步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还必须注意发展与健全人民武装即人民武装自卫队的组织，以便配合军队清匪防特，彻底反对封建势力，保障减租退押以及遂行土改的胜利果实。这里必须严格对人民武装组织的不断整理与教育，严防匪特破坏分子混入捣乱。

大力培养与提拔各种干部

如上所述，新的历史形势赋予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繁重的任务之能否顺利完成，决定于执行这些任务的干部。而我们现有的干部是极不敷用和困难胜任的。因之我们必须以各种办法大力培养与提拔新的干部，要在各方努力下，将各兵种各部门的干部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使之肩负和胜任自身的工作，共同完成国防建设的任务。这里必须反对不大胆提拔培养新干部，而只空口喊干部缺乏，或只向上面请求调派干部的观点。

关于干部工作的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干部很缺，但任务很多很繁重，都要干部去做，一切决定于干部。因之，我们就要特别重视干部工作。这里我提出关于干部工作的几个问题，请大家共同加以研究。一、干部缺乏与形势发展的矛盾。现在干部很缺是事实，这是个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呢？应该说这是好现象，因为我们如果不西南来解放了7000万人民，那我们干部不会缺。从大的方面说，我们过去只有军队，并无国家，现在产生了国家；从军队说，过去只有步兵，现在产生了各个兵种，过去有一个部门，现在就要有好几个部门。我们的事业发展了，一切就应适应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为干部缺而不管革命事业。如果战争没有打胜，像毛主席对解放战争所估计的三个前途——打大、不大不小、打小，我们没有打大而打小了，又来一个“二万五”，那末形势很坏，但可能干部很多。我们不要那种情况，正需要现在这种干部缺乏与形势发展矛盾的情况，情况发展了，需要很多干部，就需要我们产生更多的干部。政权干部向军队要，外交干部也向军队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只有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最有威信，把国民党那些反动份子拿去行吗？不行的。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设特种兵，因为我们将对帝国主义作战，没有强大的特种兵是不能战胜它的；我们的特种兵还不够，还要建设更强大的空军、炮兵、坦克部队，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部队中、从无数的战*本篇为李达同志1951年1月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

表于《军政往来》第21期。

斗英雄中调人。部门方面，过去只有司政，现在有了干部管理部；后勤部有了财务、军需、卫生、运输、营房管理等部，将来还要专设油料管理部，这都说明事业发展了。国家只要强盛，咱们应该欢迎，应该正确认识干部缺乏与形势发展的矛盾，加紧努力，求得适应形势的发展。

二、干部的外调。根据上述情况，干部今后还要继续大批的外

调，如果我们认清了整个局势，就应该不折不扣的、很快的、舒舒服服的调。建设国防力量不是几个步兵就够了的，各个特种兵也还只是国防建设之一，将来还有“之二”“之三”，如交通、军事工业等，西南要发展军事工业，许多工厂都要干部去掌握，要建设西南交通也需要人去领导，西南的长江交通，即使能控制住所有船只，一个月充其量不过能运出×万人，试想不建设新的交通事业怎么行？过去有些同志对整个情况不了解，向他调人时总感到不舒服，想打折扣。同志们应该好好的向大家宣传，说明这个道理。

三、干部的提拔。1.许多地方有些保守观念。在干部大量调动

中，“宁弱毋缺”的方针是对的，没有高明的，“低明”一点的也可以，连“低明”也没有，“不明”的不行。许多地方宁让缺着也不提拔，还有一种富农观念的表现，比如没有团长，副团长本来于着团长的工作，但不肯将他提起来。今后要大胆提拔，弱一点是可以从锻炼中逐步提高的。2.有些同志喊叫越级提升了。什么是越级呢？营长当了团长不可以叫越级，就拿其他国家来说，营长或者是少校，团长是中校，而副团长或参谋长就不一定都比营长高；我们现在认为提营长当副团长或者只能当副参谋长才不叫越级的看法是应打破的，今后好的营长可以升团长，好的教导员可以升团政委，过去慢一点也有好处，但在干部没有的条件下是可以这样提的。3.政治干部较军事干部更缺，可以从军事干部中提升一些。过去有许多政治干部去做地方

工作了，剩下军事干部也能把部队工作做好，证明他们是可以做政治工作的，故军事干部可以提升为政治干部；同样，适合作军事工作的政治干部也可以提升为军事干部的。4. 提升干部的标准，基本上是“德才”为主，并可适当地照顾“资”。

四、干部的培养。1. 办好各级各种学校。步兵学校是正规的军事学校，中央军委的学校会议研究了各级军事学校培养指挥联合兵种作战的步兵干部的问题，其他如培养政工干部及炮兵、工兵、后勤等干部的各种学校我们都要办起来。学员来源除在部队抽调外，还可吸收一部分知识份子，各区需要多少，可向军区作报告，吸收对象主要是乡村贫苦知识份子，一般说他们有家有地，来历较易弄清。美蒋匪帮正千方百计派遣特务，打入我们的各种工作部门中，我们必须警惕。吸收的人文化不太高也可以，在教育中可以提高的。要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川北私自到成都抓了一把，应受批评。政工干部的训练机构，各级步兵学校可多加一个队，师、团应办轮训队对各种干部进行短期轮训，“热炒热卖”，一个时期专门学习一个问题。这样以轮训队与学校来分别担负培养干部的任务。另外，各级应有全盘的计算，定出培养干部的工作日程，要做到全盘的了解干部，如果团级干部经过轮训队的讲课、点名、演习、考试等活动之后能够了解全团班长的名字甚至其特性，那在干部工作上就好办了。师、团轮训队不另增加编制，可在自己编制名额内调剂之。2. 注意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与技能。现在摊子大，部门多，许多部门在新的局面下不会掌握新的工作，所以要求提高业务，做到干部在本身业务上能够计划、检查、总结工作，要求在新的情况下学会新的工作方式，事业发展了，老一套的方式是不行了。我们过去修路，马马虎虎的应付一时之用就行了，华东去年修了许多公路、桥梁都不合标准，受了批评，在华北时期修路不铺石子，现在必须铺石子，在城市修路还要灌洋灰才能坚固耐用；现在修一个能够起落×××飞机的机场要化1000亿〔1〕，钱不用愁，就怕我们没有把握修好。所以，我们许多事情不会做，吃了亏。后勤工作拿老一套也不行了，国家发了事业费不会办事业，节余了钱但没做事并不是好的；供给工作不会计算，许多东西不能按时发给部队；医生有的不但治不了病，还医死了人。总之，我们要求每个干部把自己的业务钻研，把自己的一行搞好。五、专业与转业。干部专业化是基本的、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必要的转业也很需要。有的同志光强调自己干部要专业化，以为转业妨碍了专业，这是片面的看法。只有各项事业都搞好了，才可能少转业。有的说，我的干部是专业的，不准转业；有的说，过去转了业，现在应该调回来，照这样说，成立干部管理部都不去干不就空起来了？因此，我们说专业是基本的、必要的，但必要情况下的转业也是允许的，做哪一行必须把哪一行做好，必须转业的还应转业，转到地方上的干部如果地方仍很需要还不必急着抽回来。六、抚恤与保健。我们有了国家，国家支出了抚保费用，干部部门与卫生部门应负责把这项工作搞好。过去是有缺点的，比如镶牙，卫生部门与镶牙医生没有办好手续，使干部跑来跑去解决不了问题；有些卫生部门对保健工作采取推的态度，有些特殊疾病没很好研究出结果，有的药拿到医院也治不了病。今后必须很好研究。家属救济问题也有不小一笔钱，应适当使用解决问题，华北军区关于发放家属救济粮的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参考。家属的照顾作得好坏，对部队士气、干部情绪关系很大，应很好解决，特别注意解决有困难的和进藏部队留下的家属，进藏部队的家属待遇可以比战士

待遇稍高一些，但应制定一个标准，各军区统一待遇，防止悬殊太大。对于进藏部队，我们准备凑足×10亿〔2〕家当，以作干部抚保与其他的部队福利之用。七、干部管理。我不讲别的，只要求迅速把干部管理部门的机构建立起来，没部长先搞起几个处，没高明的，“低明”一点也可以，有了机构才能执行各种具体的干部管理工作。八、加强对于部的党政教育。干部中的狭隘偏向，应从我们教育工作方面去检查，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直接影响着事业的前进。因此，目前亟需强调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以提高干部的理论及思想水平；同时，不断地将有关的局势和整个情况向干部作传达解释，以扩大干部对事物认识的境界，逐渐克服其局限性。注 释：〔1〕1000亿元，系旧币，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新币1000万元。〔2〕10亿元，系旧币，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新币10万元。

在西南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召开西南全军训练工作会议，是很重要的，这是有关我们国防力量的加强问题。在会议中同志们听了军委关于 1951 年部队训练工作的决定，研究了西南全军 1951 年度部队训练计划，分别进行了讨论，还提出不少问题，李副参谋长〔1〕已作了总结，王副主任〔2〕、黄副部长〔3〕、陈部长〔4〕都已讲了有关的问题，我现在只想谈两个问题，和大家商讨。一个是朝鲜战争给我们说明了些什么，一个是有关训练工作的一些问题。（甲）朝鲜战争给我们说明了些什么？朝鲜战争发生后，不管在我们党内外，军内外，以及一些民主人士，都在关心，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已给我们说明了不少的问题，明确了许多的认识和论点，综合如下：（一）朝鲜战争发展的结果，说明美帝确是纸老虎。这是毛主席老早指出过的，虽然在战争初期还有很多人怀疑，但是战争发展的结果，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论断的完全正确。在军事上美帝曾吹嘘什么“有决定性的新式武器和装备”，什么“空军万能”等唯武器论，企图以此吓倒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但是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1951 年 2 月，西南军区召开了训练工作会议，本篇为李达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经整理，发表于 1951 年 3 月 1 日《人民战士》。志愿军的铁拳打击下，美国侵略军却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美帝是个纸老虎，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了，就连美帝的仆从国家也日益对它失掉了信心。正因如此，帝国主义内部的争吵和矛盾也日益加深和尖锐起来；同时也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遭到日益广泛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反对，使它在政治上走到更加孤立无援的地步。

（二）朝鲜战争以来，证明帝国主义者就是战争。美帝就是最

凶恶的侵略战争的蓄谋者，许多人对这点过去是认识不清的。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是有历史性和蓄谋已久的，它抄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老一套，“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想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要想征服满洲，必先征服朝鲜”。这就是美帝走着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随即侵占我国台湾，近来又不断进行对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援助”，并以艾森豪威尔出任欧洲“盟军总司令”，杜鲁门还叫嚣进入“紧急状态”，凡此都十足他说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再也无人怀疑了。

（三）朝鲜战争的结果，证明毛主席的领导及其军事路线的完

全正确。在战争初期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对朝鲜战争所持的态度，若干人都了解不够，有些人抱着怀疑态度，认为我们“不能置之不理的作法”为“多管闲事”，看到我们志愿军部队出动，以为是去惹祸，害怕美帝强大，我们不会取得胜利。但我们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胜利以及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政治收获，都使以前的那种怀疑被打消了，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被迫改变对我国的看法，这证明毛主席的领导及其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谁也不会再怀疑的了。

（四）朝鲜战争中说明我军需要兢兢业业地作粉碎美帝国主义

侵略的具体准备工作，否则就不行。毛主席在过去论持久战时就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最后解决战争问题，必须要有强大的正规化部队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才行。现在我人民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固然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要知道敌人的装备和技术还都比我们强，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技术装备

和坚强的特种兵的配合，则胜利就会更大。这就说明我们要大力建设特种兵，发展炮兵、装甲兵、空海军，并加强学会指挥联合兵种作战，加强后勤部门工作，从各方面孜孜不懈地去作战胜敌人的准备工作。如果认为敌人是纸老虎就忽视这些工作，那就很难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的。（乙）有关训练工作的一些问题。（一）思想准备。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这次全军大练兵运动是处于什么情况下？是为了准备随时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所以我们要以战斗姿态来进行练兵，虽然现在美帝尚未直接打到我们的国土来，但我们丝毫不能马虎，不能麻痹。杜鲁门非常紧张，他宣布已进入“紧急状态”，艾森豪威尔在欧洲也很紧张，这都说明美帝决不会因朝鲜战争的失败而就此甘心，相反的会更积极更毒辣的随时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因之我们也必须紧张起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紧张练兵，现在的条件并不困难，况且就是条件困难，也必须克服任何困难才行。（二）技术教练。这次练兵应是技术第一，首先将技术搞好，从基本东西学起，从上而下的亲自动手，所有干部都不能单纯的看练兵，而要做到自己先懂技术。并亲自进行技术教练，和检查技术教练。一般战士及各级军事干部必须学会射击、投弹、刺杀、筑城、爆破等五大技术，政治干部及后勤干部也必须学会射击、投弹，军人是要打仗的，要具有随时随地准备打仗的本事。（三）战术问题。一般战术要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知道，务须懂得一些基本知识，不管什么人都要懂得联合兵种作战的一般问题，不管通讯后勤工作人员都不能例外，因为不了解这些问题就无法在联合兵种作战情况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四）业务提高。各个业务部门都必须在这次练兵中将业务提高，明确自己部门职责，加强办事能力，一切工作要正规化，我们虽然反对文牍主义，但必须讲究业务工作的一切正规手续程序，做到有文为证，有案可查，而不是毫无程序的游击作风。

（五）内务整理。包括部队军风纪、人马卫生、健康、营区管理、爱护武器等方面，尤其人马健康等特别重要，要求各部门首长经常亲自检查，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有了较好的条件，必须把部队和每个军人都整得像一个国家军队的样子，一切坏的作风，必须克服。

（六）政工保证。一切围绕着军事，一切为了搞好练兵的政工保证，王副主任已经讲了，总政会议已解决了，这里必须指出：一切军事机关和军事干部，必须主动地和政工人员联系，本身也得做政治工作，一切与政工人员不协调的现象必须纠正。

（七）物资保证。我们有了国家就要争取尽可能的办好各项物资供应工作，只要能办到的就必须办到，但是我们在思想上还要准备吃苦，准备克服困难，防止因为强调保证而不注意克服困难，以致妨碍整个练兵工作的现象。

（八）组织领导。首先确定这次练兵是以军事为主的军事政治大练兵，军事练兵要作为第一位重点掌握。由各级党委领导，军事部门负责首长按期向党委报告，训练部门负责练兵的管理问题。开办各级轮训队（在自己编制内）以训练直接教兵的各级干部，在练兵中，多组织学习代表会，发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组织练兵的检查、检阅、总结、考试，建立对军事技能的考核制，要做到一切军事干部在调动时、提拔时，于其业务能力栏内填入军事技术一项，以提倡尚武的风气。

注 释

〔1〕李副参谋长，指李夫克，时任西南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2〕王副主任，指王新亭，时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3〕黄副部长，指黄立清，时任西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4〕陈部长，指陈鹤桥，时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发挥在尔什维克的战斗性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

我们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 30 年了，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胜利的战斗司令部，勇敢、机敏、艰苦地奋斗了 30 年。这 30 年中，我们党经历了一种光荣的战斗过程，一种艰苦困难走向胜利的过程。在斗争中考验了我们的党，不管在任何强大敌人或复杂的情况面前，都善于清醒而正确地分析情况，决定斗争的方向，组织具体的力量与工作，放手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群众，战胜一切阻碍，绕过一切暗礁，锻炼与加强自己的队伍，完成历史的任务，证明我们的党不愧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战斗司令部。我们的党所以有力量，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就因为我们的党整体是一个有着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铁的纪律的战斗组织，我们的党员能够在各个具体时期、各种具体的斗争岗位上高度地发挥了布尔什维克〔1〕的战斗性，因而我们就能够百折不挠地去为实现我们党的决议和我们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每一个指示，完满完成党所规定的各个时期的光荣任务。

现在的历史时期处在一种什么情况呢？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

苦英勇斗争之后，已经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国人民要以积极的*这是李达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30 周年撰写的文章，发表于

1951 年 6 月 29 日《新华日报》。

劳动生产建设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胜利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在这样一条光明的前进路上，垂死残余的敌人还在进行种种阻挠和抵抗，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以威胁我们祖国的安全，国内的封建势力尚企图抵抗和复辟，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还要阴谋破坏，因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就成为我们当前斗争的历史任务，只有这些任务的彻底完成，才能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进而建设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纪念我们党的 30 周年生日的最好礼物，就是高度地发挥我们每个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克服一切困难，加速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在深入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我们要深刻地检查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和一切消极的思想作斗争，树立与帝国主义作长期艰巨斗争的思想准备，从思想上、从具体工作上来检查我们的准备程度，是否有不符合斗争需要的情况甚至违反斗争任务的消极因素。坚守岗位，做好工作，树立坚强的战斗意志，增强斗争力量，这是每个党员所必须恪守与发扬的。在农民翻身的伟大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站稳或改正阶级立场，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执行，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和一切敌对的或者动摇的地主阶级立场作斗争。在斗争中很好地坚定我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使我们真正能够配得上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在和反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员必须要发扬“对人民要和、对敌人要狠”的革命精神，任何对敌人的容忍和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正因为敌人是隐蔽的又是以多方面来破坏革命，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和松懈，就将使祖国人民的事业遭到破坏与损失。共产党员要发扬极其机警与负责的战斗精神，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护人民的利益。

我党 30 年来胜利斗争的历史证明：当着我们全党和全体党员

高度发扬了布尔什维克战斗性的时候，我们就取得胜利和前进；而当我

们稍有疏忽或因胜利而松懈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挫折或损失。作为一个党员来说也这样，当着我们认清当前斗争任务而高度发扬布尔什维克战斗性的时候，兢兢业业、刻苦工作，我们就能很好地完成党给予的任务而加速进步；而当着我们的斗志松懈的时候，我们就会犯错误，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使我们自己也不能继续前进。

高度发扬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加速完成当前历史任务，努力进步，向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目标前进，这就是我们纪念党诞生 30 周年这一伟大光荣节日的战斗口号！

注 释

〔1〕布尔什维克：俄语音译，原意为“多数派”。1903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投票选举中央机关时获得了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后此词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

为继续兴筑人民铁路而努力*

第一，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成渝铁路自1950年6月15日开工以来，经过整两年时间，现在胜利地全线通车了。这是我们祖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西南区的伟大事件之一，它给我们继续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与强大的国防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先例。我们特为这一胜利成就而表欢欣和庆祝！成渝铁路开工之初，是曾遇到不少的困难和复杂问题的。如当时匪患尚较严重；我们没有成熟的技术条件与经验；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尚不够宽裕，特别是一般人们鉴于过去的反动政府曾经花了不少的代价，费了数十年的时间，终未将这条铁路弄出一点眉目，因此就大都不相信在解放后建立不久的人民政府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同时坏分子又放出不少谣言，企图动摇我们的信心。诸如此类，都是当时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问题。然而由于我们各方面努力的结果，终于战胜了这些困难，获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这中间有许多经验，是可作为我们各种建设尤其是继续兴筑新的人民铁路时的借镜。现在成渝铁路通车之后，我们又要继续筑天成路〔1〕及其他人*这是李达同志1952年6月为成渝铁路竣工通车撰写的文章。成渝铁路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条使用国产器材修筑的大型铁路，西南军区部队承担了大部分筑路任务，李达同志参与了筑路的领导工作。本文发表于1952年7月1日《新华日报》。民铁路，我们认为将成渝铁路修筑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加以介绍，是属有益和必要的，特综合概述如下，作为我们继续努力的参考。

第二，领导决心及组织保证。

在中央人民政府及毛主席批准修筑成渝铁路后，中共中央西

南局及西南军政委员会便详细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上述诸种困难是可以迅速克服的，因之就毅然决定迅速兴修。并首先不顾当时匪患之猖狂，毅然确定抽调足够数量的军队投入筑路，以打开局面，创造经验。在这一决心下定之同时，并确定建立统一领导的组织机构，成立了包括党政军民各方面成份在内的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嗣后又在沿线各地区分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成立川东区、川南区、川北区、川西区各行署的筑路工作委员会，协助解决有关筑路诸问题；为了具体的督导施工起见，在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下成立了筑路工程指挥部，奉令参加筑路的人民解放军，则又分别组成总队、大队、中队，结合工作技术人员协力遂行施工。随着工作的发展，又在有关各行署分别成立了民工筑路指挥部，并将大量民工分别组成支队、大队、中队，依靠这个组织，指挥并管理着成10万劳动大军。有了上述诸种组织的保证，于是施工中的许多问题，如征用土地、调拨工粮燃料，筹划军工民工住宿的工棚、调节劳力、采运枕木，建立医药卫生设备，以及其他，就都及时适当地解决了，这是很重要的环节之一。

第三，军工的作用与民工的迅速成长。

大量的军工当其开入工地之初，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毫无经

验，毫无技术基础。一般人民都以为这种长期拿枪的军人，转而拿起工具来筑路，实是历史没有见过的事情。因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这种筑路事宜，基本上都是怀疑的。至于沿线的地主阶级，除背地冷嘲热讽外，则大都不予我筑路军工以同情和支助，如不愿意借给房子及借用东西，不给以其他任何便利等。但是我们的军工，则显示出他们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本质，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他们不仅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他们发扬了传统的

顽强性与创造性，战胜了日晒雨淋手足胼裂及不懂技术种种困难，愉快地工作着。他们一面施工，一面学习技术，从开工之日起，就逐步获得了与日俱增的工效，很快地超过了标准工率，个别单位后期竟达超过 25% 的效率。一段又一段的路基筑平了；不少的石山陡崖凿开了；接着自重庆至江津第一段路基上铺轨了……。就这样取得了令人惊喜的伟大成绩，一扫人们过去抱着怀疑的观感，人们由此都相信这条铁路一定能够修筑成的了。在军工筑路见效后，又确定将重庆市大批失业工人包括一部分游民在内，集中起来，交由军工带领参加修路，这些失业者开始大都不相信自己能够担任筑路工作，其中一些游民更甚。而我们的军工，则除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直接影响他们外，并加派干部大力指导他们，帮他们办理伙食，作文娱活动，让他们夹杂在军工中学习施工，同时又以挤让捐助等方法解决他们住舍及冬衣等困难问题。这样一来，这些被收容来参加筑路的失业者，就受到极大的感动和启发，他们的能力就被发挥了，很快的就变成一支熟练的工程队伍，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失业问题，并且成长为以后筑路的骨干！在第一期工程告一段落后，为了继续大力推进筑路工作，于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 月，就由沿线各地区动员组织近 10 万的农民群众参加筑路。这时一方面由军工留下的大批干部，分别到这些农民中做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又取得上述经过锻炼的民工之协助，而各地委员会及指挥部，又发挥了过去领导指挥的经验。故所有以后的民工，都在工效上有飞速的进展，现在已经成为最可靠的筑路生力军了！第四，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如上所述，在整个筑路工程的各方面，包括组织领导、工程设计和施工，以及一切具体的技术问题，我们都是毫无经验，毫无基础的。而旧有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则又多被旧的观点或方法所局囿，以致从事新型的人民铁路建设工程时，很难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谈不上什么新的发展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很大的问题。要完成筑路任务，除了发扬我们的积极性顽强性与克服困难的精神外，不虚心学习，就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也就是我们贯穿在整个筑路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之，上自铁路局领导同志下至所有军工、民工，在施工过程中，都热烈地开展了兢兢业业的学习运动，不敢持有一点粗心大意和自满的情绪，并经常向有经验的员工请教。不断钻研技术，逐时逐日地认真总结与迅速地交流经验，以及按期评功表模等，不断地提高自己。因而我们就与日俱增地无论在哪方面，都已步入了门径，某些方面并且因不断研究与提高而熟练起来了。以军工和民工的施工为例：开始时他们都顾虑到工率定的过高，恐难达到要求，特别是技术性较大的工作，如采石、钻眼的工作，是难能达到标准要求的。然而由于虚心学习，不断研究改进方法的结果，他们的工率则由不及格而及格，以至超额提高到标准工的 137%、180%，个别班与小组达到 250% 以上。坚石打炮眼的工效，最初一人持锤一人掌钎，平均每工只打三、四公尺，后来研究一人持钎冲炮眼，每工竟达到 28 公尺。最后打次坚石的炮眼，则有发展到 50 公尺的最高纪录。至使数十年的老工友都为之瞠目结舌，叹为奇迹。

总之，成渝铁路修筑中的许多经验是很可珍贵的，我们将很好地记取与发扬这些经验，不骄不懈地为继续兴筑人民铁路而努力！

注 释

〔1〕天成路，即由甘肃省天水至四川省成都的铁路，后改称宝（鸡）成（都）铁路，1952 年动工兴建，1956 年建成，全长 669 公里。

在已有的传统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军*——纪念“八一”建军节24周年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它于“八一”建军节诞生以后，就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其军事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艰巨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任务；经过了无数次的战役和战斗，消灭了无数的敌人，直至现在已在中国大陆上完全扑灭了武装抵抗的国内外反动派，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它的发展过程是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历经了各时期和各种情况下极其艰难困苦与曲折的道路，同时它的数量、质量与装备以及掌握装备的能力，也是历经了由无而有、由小而大、由弱到强、由不懂而懂，以至善于运用的过程。它在这些过程中的特质与特点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每一个成员都对于人民祖国的事业、对于解放劳苦大众的使命，具有无限的忠诚；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为实现上述事业而奋斗；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在它的历程上任何艰苦困难的遭遇，都不能阻止它的进展，而都被它所战胜；善于团结自己，以亲密的协同动作与主动互援友邻的精神，战胜敌人，获得战斗战役的胜利；善于以战养战以战教战，以夺取敌人手中的装备不断的装备建设和壮大自己，并善于学习与使用这些装备，以达成自己的使命。以上我军这些传统的优良基础和特质，是应保持发扬和发展的！*这是李达同志1951年8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撰写的文章，发表于《八一》杂志1951年第5期。

今年的“八一”节日，正当着美帝国主义仍侵占着我国的台湾，和加深侵略朝鲜的战争，以至正将血腥的魔手伸向东南亚。并积极准备其奴役世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争。而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任务则较前更加伟大和艰巨，我们不但要积极防止美帝把战争的火焰烧到我们的国门以内，积极准备解放被美帝侵占的台湾，巩固祖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并要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决心来防止帝国主义挑动世界大战，以保卫东南亚与世界的和平。这些神圣的伟大任务，我们是要坚决担负和完成的。

这里我们必须了解：现在的历史时期与过去的国内战场情况大不相同了，发动侵略战争与全世界人民为敌者，是挟持有完全现代化装备的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军了，我们要对付这种敌人，以至有把握胜了这些敌人，则就要更进一步的提高自己，很快的把我军建设和改进为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才好进行上述的任务并获得胜利。如何提高自己呢？这就需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来加倍努力加倍提高。

这里首先就要不断提高和巩固我军的政治觉悟，保持经常饱满的政治情绪，加强我军的战斗意识，要求每个成员，认清美国侵略集团的反动本质，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准备随时对付敌人发动战争的阴谋，以我们的英勇动作与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决心来粉碎敌人的一切。

其次要发扬我军克服与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要知道：越是装备日益加强与现代化，则战争和战斗的复杂程度就会日益加深和艰巨，因之一切出乎意料以外之困难也就会较前更加增加，因之我们就要在这一问题上多方加以准备和锻炼，要准备战胜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更艰巨的任何困难，以战胜敌人。

再其次要加紧团结自己，把我军内部巩固得象钢铁一样的牢不可破的坚实，同时多方团结人民，同情各兄弟国家的劳苦大众。由于

现代作战中兵种与兵器之复杂和众多，以及情况变化之多端，因之在战斗中就要更紧密地与友邻和各兵种密切协同一致，并随时以自己的各种行动来援助友邻共同对付敌人，忽视了这种联合一致的团结与协同，其影响是不堪设想的。最后要发扬善于不断地加强自己，善于以新的精神与装备来武装自己，以至善于运用一切现代技术的精神。这在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疯狂准备战争时不我待的今天，在新的技术装备不断增加的今天，就特别重要，因之就要我们兢兢业业地以过去不断学习新事物的传统，来学习各兵种的特性和各种技术兵器的性能和其相互关联的意义，并争取在战斗中善于使用和发挥它们的特长，各级指挥员又需要掌握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学习善于在新的条件下组织和指挥战斗的艺术，这里应特别警惕的就是一方面防止把我们过去的传统一下都完全丢掉，一方面又要防止满足过去的一切而拒绝和不很快地向新事物学习以至贻误时机，甚至于发展到贻误战机的两种偏向。

加强云南边防工作*——在云南军区干部会上的报告（摘要）

第一，充分认识云南所处的重要地位，确立巩固边防的决心和信心。云南在祖国西南的边疆，与印、缅、越、泰等国相连，所以它是首当东南亚的要冲。在抗日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从缅北和越北侵入云南，现在美帝国主义者正图加紧控制东南亚，并积极扶持李弥残部〔1〕作为进攻中国的前哨力量。云南工作的好坏，不仅是云南本身的问题，而且对我国国防的巩固，与对外影响，都有极大的关系，我们要对云南这种政治地位有充分的认识，许多工作都应从此出发。有些同志对云南所处的重要地位认识不够明确，因而对长期驻守云南，巩固边防的决心与信心也不够坚强。西藏部队在对西藏所处的政治地位认识是比较明确与充分的，他们对长期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决心和信心是明确坚定的，因而他们克服着困难，工作做出了成绩，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与世界人民的注意；而云南部队在这方面尚有不足之处。例如我们的边防公安部队认为不如作野战军光荣，而野战军则认为自己是野战军，也不安心于长期驻守*本篇是李达同志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员时，1952年9月在云南军区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后经整理，发表于《八一》杂志1952年第22期（总第38期）。云南保卫祖国边疆。因此，必须明确：不论“野战军”或“公安部队”都是国防军。保卫云南、巩固边防就是我们全体同志长期的光荣任务。一切与此相抵触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需要克服；只有这样，才可树立长期驻守的思想，巩固保卫边防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加强边防地区的领导机构，进行统一而又分工负责的边防工作。过去边防地区的机构不健全，系统不一，责任不明，对建设边防工作影响很大。因此，必须改变此种情况，重建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对各边防的军分区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健全和调整，应增强对李弥残部进行政治瓦解与掌握情况的机构；要增设民运部门，以做好兄弟民族工作；要设专管公安部队的部门，加强对公安部队的领导。此外，还须抽调强的干部参加某些军分区的领导，一切工作要统一于党的委员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分工负责，作好以下工作：一、对当前的公开敌人李弥残部与土匪，要有高度警惕性与战斗准备，敌人如敢于进犯，我们就要歼灭它。另一方面则不要放松政治瓦解工作，对俘虏政策要严守勿逾，特别是李弥残部中有许多北方人，有许多有利条件可以进行争取工作，今后在这方面一定要做出成绩来。二、要很好地掌握民族政策：云南的少数民族很多，据了解：大者几十种，连小的计算上共百余种〔2〕。这些民族因历史上久受反动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各方面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之下，造成各民族之间的不团结，和对于汉族的怀疑。要消除这种长期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争取少数民族相信我们并去掉戒心，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团结教育，才会有显著的成绩。过去在中央、西南局领导之下，我们的民族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要更加努力，重视政策。在边沿地区，帝国主义分子积极进行活动，更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因此也就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对各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要特别尊重，有些同志看不惯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是不对的。我们部队中有许多少数民族战士，某些同志感到他们“落后”，嫌他们“不讲卫生”，因而不想要，这也是不对的。今后不但要“要”，而且还要多“要”，公安部队应尽量补充当地少数民族战士。本地少数民族战士有许多优点，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容易和群众联系，这些方面都不容忽视。

共同纲领中规定少数民族有权利参加人民解放军，并可组织自己的武装，他们是很满意的，因此他们有参加武装部队的要求，我们是应该欢迎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兄弟民族的人民，我们要多方面帮助他们，以实际行动影响他们，他们会逐渐进步的，如部队种菜，他们也会学着种菜；部队讲卫生，他们也逐步学会了讲卫生。

三、云南面临东南亚各国，许多问题常常会涉及外交问题，因

此要严格请示、报告制度。有些国家的政府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人民曾派有代表出席了 1952 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我们切不要在边防线上闹出乱子，造成不利情况，但，同时又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渗入。

第三，加紧对边防地区的营舍、工事与交通的建设。

部队没有营房，没有良好的道路，交通困难，供应不便，就不能

在国防线上长期生活下去，因此，加速进行营房与交通建设，就成为部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加紧建设？谁来建设？建设的困难很多，如交通不便，人

力不足，技术不强等，但是这些困难都能克服。谁来干？自己动手。西藏部队和海南岛部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思想通不通，如果思想通了，认识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来。因此，首先要在全体同志中作好思想教育，同时进行技术和物质各方面的准备。这个工程任务是巨大的，困难是多的，而时间又如此紧迫，每个人都应为这个任务而努力。要求干部在执行任务中，成为建设的专家、工程师，指挥员、政治委员要善于领导这些工程建设。要把部队变为自己动手为自己创造“世界”的部队。抽调干部，学习工程设计，学习勘测。抽调干部战士，烧砖瓦、石灰，砍伐木料。各部队应遵照上级的规定，在现有条件下，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有砖瓦用砖瓦，没有砖瓦盖土坯草顶房，既不能误时，又要求尽可能适用；所谓实用，就是把房子按期按计划盖起来，并适于卫生要求。房子占有群众的土地，必须得到群众的同意，并须按价给酬，不能强占。在伐林时，要有计划有领导，隔几株砍一株，不能砍光。与此同时，还要计划如何修公路，这是一种抢修任务，有了公路，我们修筑的各种器材特别是部队需用的物资，才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最前线去。第四，调整修建工作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工作部署与分量。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许多部队要大力修建营房和公路。我们的各种工作都应围绕这一新的重点。这样，司令员就应负责管理修建营房、工事、公路，参谋工作、政治工作也就毫无疑问地要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修筑营房、公路、工事是当前斗争的大问题，也是能否长期在国防前线生活下去的现实问题，因此，就要好好研究执行。第五，改善对边疆地区部队的供应，把定量的必需品保证先期送到部队。这个问题，上级已经解决了，过去我们主观努力不够，现在应根据边疆地区部队的实际需要，规定定量的物资供给，对处在交通不便的边疆地区的部队，应科学地计算时间、路程，了解交通情况，先期发给经费与所需的物资。对边疆地区部队，应废除不合理的限时报帐或一切非单据不予报销的手续。今后各个伙食单位的伙食帐，只由支部党委审查即可。有些连队首长在“三反”后，明知买了东西也不敢证明，以致长期不能报帐，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对的。各级机构应积极加强一切“先尽前线”的思想，为前线着想，特别是后勤机关要多用脑筋，善于为部队打算，对部队负责；此外，要立刻调整边疆地区

部队的武器弹药，以适应保卫国防的需要。为此，应责成各军负责将边防公安部队武器弹药加以调换和充实，保证不使他们在这方面有任何顾虑。另一方面边疆地区部队要注意及时反映问题，以期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样，才有利于保卫边防和国防建设。第六，一切军分区都应注意加强人民武装的工作，特别是腹地基本区的人民武装建设，这是军分区的中心任务，也是整个国防建设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还没有为某些领导者所重视，他们还保有旧的落后的观点，不愿意干人民武装工作，只愿意到野战军里工作，对这一工作的建设尚缺乏十分坚定的意志与决心，各级领导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这种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加以检查纠正。现在要求无论何人无论在那种岗位上，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因为所有工作都重要，不安心的现象要立即克服。每个军分区对人民武装要加强组织与训练，以充实国防军的后备力量。这一工作应成为军区建设工作的重要一环，不可忽视。注释〔1〕李弥残部：1949年12月，驻云南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拒绝参加起义。1950年初，陈赓率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由广西进入云南，在云南省南部的蒙自、元江等地将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大部歼灭，其残部及一部分地方游杂武装窜入缅甸北部山区。1950年9月，台湾当局派遣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到缅北，统一指挥这部分反动武装，其兵力最多时达18500人，经常对云南边境和内地进行窜扰、破坏活动。〔2〕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计有22个，占全省人口的1/3。

西南军区部队的工作及今后工作的方向*——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我首先表示对贺副主席〔1〕的报告，极端赞同和拥护。现谨将上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以来西南军区部队的工作，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向大会报告，谨请审查。西南军区部队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各级政府与广大人民的指导、扶持和支援下，一年来是完成了应负的任务的。首先是完成了巩固祖国边防与继续肃清内地残余土匪特务的任务。我边防部队，在绵延 12000 余华里的国境线上，以高度的警惕性，密切团结当地兄弟民族，歼灭了多次敢于窜犯国境的小股美蒋土匪特务，保卫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每一寸土地。总计一年来共歼土匪特务 21573 人（去年 10 月至今年 9 月），尤其是今年秋季，完成了剿灭川西北黑水地区国民党土匪特务的任务。黑水地区处于我西南内地，西南解放后，傅秉勋等一部分蒋匪特务，即潜入该地，受着美蒋匪帮的支持与指使，美蒋匪帮对之曾寄以极大希望*本文曾发表于 1952 年 12 月 16 日《新华日报》。望，吹嘘为“大陆台湾”，梦想使其长期盘踞，配合“反攻大陆”。在土匪特务作乱下，当地兄弟民族人民，备受痛苦。今年 7 月，我军经周密准备，深入围剿，经过 60 多天的艰苦搜剿和群众工作，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全部根除了该部土匪特务。计歼匪 3635 名，毙俘尉以上匪首 214 名，缴获六 炮、机枪、步枪等一共千余件。尤为重要的，由于我军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得到了黑水地区上层人士的合作，广大兄弟民族的人民更积极支援与参加了剿匪斗争，开辟了民族团结，共同安靖地方治安的新局面，创造了团结兄弟民族共同肃清较大股土匪特务的范例。现在我各地边防及内防部队，正在进一步加强各种政策教育，加强各种建设性的工作，准备彻底肃清任何敢于窜扰与潜伏的美蒋土匪特务，以保证边防与内防的安全。

其次，继续努力于康藏的建设。1952 年 11 月 20 日，康藏公路

已通车到昌都。早在 1950 年，我军即执行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英明指示。克服千难万苦，于去年冬将公路修通至雀儿山。今年又抢修长达 418 公里，提早到达昌都。在高达海拔四五千公尺的甲皮拉山、达马拉山上辟出平坦大道，汹涌急流的金沙江、澜沧江也没有将我军拦阻。修路部队以各种方法克服了气候、地形、粮食、器材等各种困难。全体指战员以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勤奋努力，并得到康藏各级地方政府与上层人士的帮助，尤其是广大藏族人民，以及内地技工、民工、工程技术人员的直接参加，西南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与鼓励，使今年任务提前 50 天完成了。同时由于指战员与全体民工及技术人员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节约了大批财富，仅经周密复测因而缩短路线 27 公里一项，即节省人民币达 351 亿元〔2〕。至于驻藏部队则认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人民的团结日益紧密。并执行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努力生产，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农场，已生产了可观的一部分粮食和青菜，证明了康藏建设有着无限美好的远景。预计后年部队的粮食和菜蔬即可大部自给。现在修路部队正在休整准备，决心于明年继续把公路向拉萨修筑；驻藏部队则满怀信心，决心为长期帮助西藏建设，为巩固祖国国防而努力。再次是部队本身的建设工作，一年来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与训练，如“三反”、

整党以及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部队训练等工作。在全国规模的伟大的“三反”运动中，军区部队同样得到非常显著的收获：彻底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我军的猖狂进攻，揭露了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分子；在思想上清算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巩固了我军永远是战斗队的传统；广泛发扬了民主，对官僚主义作风亦作了有力地纠正。由于“三反”运动的胜利，使部队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进一步巩固，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今年6月以来，部队又投入了空前大规模的以文化学习为主的训练运动。全军应学文化者97%都参加了学习，5个月前还仅只识百字左右的战士，现在语文则已达到接近初小毕业的程度。尤其着重了以提高干部文化为主的方针，全军区开办了文化速成中学5所、小学23所，抽出干部离职入学。由于文化程度的提高，使部队素质亦正在飞速提高，为今后军事、政治训练、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打下良好基础。现在广大干部战士已能初步阅读通俗书报，在政治眼界的开阔上，军事教育的接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干部战士过去在旧社会的压迫下，苦于没有文化，现在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和一般书报，纷纷亲笔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各级首长写信，报告成绩和决心，其愉快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但在文化学习中，同时会发生某些放松军事教育与军纪管理不严的现象，我们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加以纠正和整顿，准备在明年更全面地开展训练，从军事、政治与文化上将部队进一步提高。最后，在人民武装建设上，一年来也有很大成绩。在积极发展的方针下，民兵数量迅速扩大，普遍建立了县区以上的各级人民武装机构，配备与训练了2万余名干部，各地人民武装在生产建设、支援前线、维护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方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仅据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区民兵配合军队共与残余土匪特务作战371次，歼匪6900余人，缴获长短枪7887支、轻重机枪87挺，迫击炮、六炮118门。此外，全区民兵共守护铁路505公里，守护公路2700余公里，守护桥梁、隧道、涵洞1859处，护仓33855个，护厂护矿100余处。拟再从各方面加以整顿和提高，使之成为配合保卫地方与国防动员的可靠基础。注释〔1〕贺副主席，指贺龙同志，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2〕351亿元，系旧币，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新币351万元。

在西南军区公安部队首届运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西南军区公安部队为着检阅部队过去在军事、政治、文艺、体育方面的工作，准备今年下半年的正规军事训练，召开了这次的运动大会。我认为很满意，除同意鲁瑞林司令员的总结报告外，特简单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我们的部队在它建军意义上，除了要有新的技术装备及其他技术训练以外，还必须清楚的认识体育、文化活动的重要作用。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体力，即使有了完善的新式装备，而缺乏掌握这些武器的坚强的战士，也是不行的。因此，增强全体指战员的体质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带回部队去，普遍的开展部队战斗性、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把每个人的体质锻炼到应有的程度，真正做到兵强马壮。这次各项比赛中我们有许多节目是很好的，有些项目创造了新纪录，这就证明：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获得良好的成绩。各代表团的同志们回到部队去应成为部队体育活动的骨干，成为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有了充分的体育运动，还得更开展广泛的文艺活动。我们干部战士经过文化学习以后，文化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是开展部队文化活动的有利条件，要做到不但使部队所有成员都有坚强的体质，*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公安部队举行了首届运动会，本篇为李达同志1953年4月8日在运动会闭幕式上发表的讲话。

而且在文化生活上也非常活跃与焕发，使每个人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优秀战士。我们公安部队不同于其他部队，在和敌人斗争上须有许多巧妙机警的知识和办法。因此，应更好的开展文化生活，通过文艺活动锻炼和提高指战员的智慧和政治警惕性，达到保卫边防巩固边防和内卫，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

这次比赛成绩大多数都是好的，但有些部队的成绩还不够使

人满意，表现比其他部队差。大家要真正作到胜不骄、败不馁，如果稍微有点骄傲情绪，都是不对的，有害的。失败了不泄气，要爬起来继续努力的前进，他将来还会走到前面的。我们西南军区部队前年参加全军运动大会得了个倒数第二，回来以后没有气馁，按着贺司令员的指示，兢兢业业的加紧练习，去年参加“八一”运动大会时已把倒数第二的帽子摘掉了。相反的，以前好的单位，去年有些却表现不好了，这是活的榜样，大家要注意研究奉为教训。因此，希望成绩好的单位回到部队后，不但自己不骄傲，还要告诉别人不骄傲。成绩不好的也不应气馁，应继续努力。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武装部队，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胜不骄、败不馁。过去我们在革命过程中，曾有过许多挫败，但失败之后，我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地坚持前进，就是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体育文艺活动上也要本着这种精神继续努力。胜也好，败也好，都不要因骄傲或丧气而妨碍继续前进。要使部队体育文艺活动呈现新的气象，要在体育与文艺活动方面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努力。

在西南军区汽车驾驶员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你们代表全军区汽车部队，从西南各地，近自重庆，远自云南边疆和艰苦的康藏高原，来到这里。全军区汽车部队在过去几年中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有了光辉成就。军区几年来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成绩，这些和汽车部队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任务是会顺利完成的。同志们想一想，在进军西南，支援前线，部队的供应，特别是进军西藏等艰巨的任务中，哪一方面离得开汽车部队？我们的环境和条件都相当困难：首先是车况不良，旧车多；路况不良，到处要翻山越岭；气候不良，雨多雾重；高原上空气稀薄，不仅使人透不过气来，连车也受到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困难，都被汽车部队的同志们战胜了。在落雨降雪的日子，许多同志不借以自己的衣服和被子保护车辆物资；当大雪封山的时候，在滑溜的“玻璃路”上，用衣服垫路，使车辆通过；有车辆遭遇事故的时候，同志们不顾一切困难，钻进水里、雪里，把车救出来……。汽车部队是很辛苦的。我在这里代表军区党委，代表贺司令员，向到会同志，并经*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铁路线很少，交通运输主要靠汽车。为加强军事运输工作，西南军区于1954年5月10日召开了驾驶员代表会议，本篇为李达同志1954年5月21日在会议闭幕时发表的讲话，刊登于1954年6月2日《人民战士》。过你们向所有汽车部队致以亲切的慰问。

召开这次会议，有重大意义。它总结了汽车部队的工作，推广

了先进经验，树立了好的榜样和旗帜，这对今后工作有很大作用。汽车部队中出现了安全行车10余万公里的李堂生、李俊林同志，出现了英勇顽强、克服困难、年年立功、事事立功的陈瑞盘同志和刻苦钻研、积极创造的王冠绩同志。这样的事在部队中还很多。把这些事介绍出去，将推动我们的工作。如果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同志都这样做，我们整个事业就会很好地前进。

这里，对到会同志提出几点期望：

首先，要重视汽车部队和驾驶人员的作用。不要认为别人拿着

新式武器在前线轰轰烈烈地打仗才是光荣，而自己开汽车就不光荣。这样想是不对的。汽车部队是我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现代化就是要用摩托，没有摩托就没有现代化。离开汽车部队，许多事情都会搞不好，不说别的，首先在有些场合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现代作战和日常工作中，都要靠交通运输，这方面有了问题，作战和工作任务都要受影响。因此，大家必须认识：汽车部队的任务和岗位，和其他部队一样，都是光荣的。

第二，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很好地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汽

车部队中已经出现的那种不仅爱护车辆，还从各方面爱护物资的事迹，都是很好的，表现了优良的高贵品质的，应该发扬。每个同志要牢记：在运输战线上多尽一分责任，就是为祖国建设增加一分力量。

第三，要虚心学习。现实是前进的，发展的，不断地出现新事

物；如果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成绩不坏，可以不再兢兢业业地工作了”，那就会出问题。这次会上大家都能虚心学习，应该把这种精神带回去，带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单位去，好好传达，学习。这次会议所树立的旗帜，就是整个汽车部队的旗帜，要使它永远稳固地树立起来。各单位的先进经验，也要加以研究、提高和推广。有的人说别人的模范事迹和创造发明没啥了不起，平常事，自己也有，就是没有坚持下去。老实说，这种态度是不虚心的。

许多平常事能够坚持下去就了不起，就是奇迹。第四，要严格遵守安全行车，正规保养等各项纪律制度。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严格遵守制度和纪律，就是要科学，任何疏忽大意都是不行的。愈是科学愈要严格。汽车部队中科学问题多，更应严格，不能丝毫马虎。许多事故都是由于疏忽大意和不守纪律造成的。第五，要消除骄傲自满情绪。特别是到会代表更要注意，不能因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骄傲自满，脱离群众；某些英雄模范的“垮台”，就是由于骄傲自满。有的驾驶员认为自己开车年代久，有经验，有把握，因而疏忽大意出了事故。最有经验的驾驶员说：“越是车开得久，越要兢兢业业，处处小心。”这话说得很对。第六，要提高政治觉悟，克服一切不健康现象。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服从政治任务的，我们参加革命是有政治目的和理想的。因此，只有提高政治觉悟，才能克服缺点，做好工作。目前，汽车部队中仍然存在着个别严重的不健康现象：如不遵守纪律或遵守纪律不严格，不遵守行车规则，抢前头，比快，不让车，蛮横无理，欺压商车，不爱护物资，甚至盗卖物资，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车祸事故的发生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就是因为政治上不强，觉悟不高。我们应该尖锐地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把它们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认识，对这些坏现象进行斗争，彻底消除一切不健康现象，努力把车祸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以至完全消除。总起来说，会开得很好，很有作用。希望大家回去好好贯彻，为完成今后光荣、艰巨的任务而努力！

在全军射击战术集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军官集训的内容，有射击和基本战术两门。在射击方面，要求每个受训的同志按照新的教程学会使用步兵武器（主要是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冲锋枪和手枪 5 种），学会正确地训练兵、军士和军官使用步兵连装备的武器进行射击。在战术方面，要求按照新的条令学会和熟练兵和小分队的动作，学会对兵和小分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战术教练方法。我们组织这次集训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学好，然后带回去训练部队。近几年来，我军的战斗训练是有很大成绩的，也取得了不少经验；但是严格说来，我们的训练质量还不高，赶不上时代的要求。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军官的基础差，本身的教练能力和督导能力薄弱，所以不能有效地训练部队。有的士兵说：“两分的教员，教不出五分的兵。”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事实也是这样，军官不行怎么能把部属教练好呢？通过这次集训，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你们是专门作部队训练工作的，首先应该把基础打好。你们在集训中学习成绩的好坏，将影响全军 1956 年度战斗训练的质量。* 1955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织了一次全军射击战术

集训，李达同志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本篇是他在这次集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发表于 1956 年 1 月 1 日《解放军报》。在这次集训中，不管是哪一级军官，都要完全过士兵一样的队列生活；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要严格按条令办事。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军官如果不能体验士兵生活，本身不能在这方面以身作则，那就不能够很好地教练部队和严格要求部属。你们在这次集训中，无论是对射击、基本战术或队列生活，都应该下苦工夫学习和锻炼自己。这次集训要少说多作，练多于训，野外多于课堂。在训练和学习方法上也要为部队作出榜样。你们要抓紧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正学到一些本领，为 1956 年度的部队训练作好准备。你们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在集训中要把党的工作作好。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发扬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保证集训任务的胜利完成。

战斗训练中的全面规划与统一领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已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6 年度战斗训练问题”的命令，并随令颁发了训练总监部〔1〕关于同年度的“战斗训练计划纲要”。上述命令中规定：“1956 年度战斗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下，在使用新式武器的条件下，展开积极的战斗训练，掀起战斗训练的高潮。同时为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袭击，必须把战斗训练和经常的战斗准备密切的结合起来。”此一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帝国主义集团迄未放弃其侵略阴谋，仍在加紧扩军备战，所以我军就不能不百倍提高警惕，加紧战斗训练，以增强备战的物质基础，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一日千里地前进，也要求我军从实施训练中迅速地提高军事技术和军事知识，与国家经济建设飞快发展的情况相适应。我们全军上下，应当一致动员起来，坚决执行上述命令，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战斗训练任务，给我军在预期的年月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武装部队的军事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此，除要求全军官兵在“要多、要快、要好、要省”的原则下，积极努力，发挥创造性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以外，我们认为，做好战斗训练中的“全面规划”与“统一领导”，是关键问题之一。我们过去的战斗训练，所以进展较慢，质量不高，是与这个问题没得到适当的解* 本篇写于 1956 年 4 月，发表于《八一》杂志总第 100 期。决分不开的。现在，我想对此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首先，要求明确地树立以战斗训练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战斗训练为全军工作中心的问题，是军委和国防部早已确定，并再三强调的基本性质的问题，这一领导思想必须明确树立起来，才能顺利地遂行战斗训练，从而使战斗训练获得预期的效果。为了树立这一思想，就要求以各种方法动员教育全军，使全体干部和各部门的一切成员，认清以战斗训练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的重要意义，和把训练任务当做作战任务来完成的重要意义，做到全军上下，从各方面一致努力，排除一切困难，挖掘一切潜力，发扬我军传统的创造精神，为完成 1956 年的训练任务而努力。没有这种统一的思想与明确的认识，就没有完成任务的可靠的保障。这一点，从最近不少单位的战斗训练总结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应引起足够的注意。第二，各单位、兵团、部队和分队，应在明确了上述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定出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的全年的或一个训练期、一个月、一个星期的工作计划。这种计划，是以战斗训练为中心的全盘工作计划，而不是单独强调某一方面工作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党、政工作，干部工作，后方勤务工作等等都要围绕战斗训练这一中心工作，作协调一致的安排。也就是说，要以其他工作来适应和加强中心工作，以中心工作（战斗训练）来带动和提高其他工作。这样才算做真正的全面规划。这样的全面规划，才能使我们以战斗训练为中心的全盘工作像一架完整的机器一样，协调一致地转动起来。过去，有些部门只强调自己部门的工作，而不相互关照的那种情况，亦即本位主义思想和单打一的作风，是与我们所提倡的如上所述的全面规划，在原则上根本不相容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第三，在真正的全面规划确定之后，即应将统一领导的工作，认真地贯彻到整个执行过程中去。这就要求各有关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同志，认真掌握和坚持已制定的规划，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所发生的与原定规划不相适应甚至互相矛盾的环节。也就是说，要起到

像“变压器”那样可以随时平衡需要和调剂矛盾的作用。过去，我们部队中有不少单位，虽然也强调了战斗训练这一中心工作，有的甚至也制定了包括各方面工作的计划和日程，但由于无人均衡，缺乏应有的控制，往往形成前紧后松，闸门洞开，各处洪流不时涌下，以致冲淡了已确定的中心工作，使战斗训练受到不应有的削弱。这是不应再行重复的。

第四，加强对战斗训练中“全面规划”与“统一领导”的检查工作。为了更好地贯彻与实施所制定的全面规划，各有关单位与首长人员，就应有计划的、定期的和不定期的进行检查，以会议、汇报、个别谈话和深入部队等方式，了解所属单位和部门有无违反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的原则，降低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的作用的现象。要积极鼓励那些在战斗训练中在全面规划与统一领导上做得好的单位、部门与首长，并及时将它们的经验推广传播，作为其他单位学习与仿效的榜样；对那些做得不好的单位、部门与首长，则及时予以应得的批评，并给以具体的帮助，直到他们彻底转变和纠正为止。同时，并将他们的缺点与教训通报出去，使其他单位用以警惕和知所回避，改变我们过去对上述问题检查不周和处理不及时的情况。

注 释

〔1〕训练总监部：1955年4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原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训练总监部，为“八总部体制”中的总部之一，刘伯承任部长，因未到职，由叶剑英代理部长。1958年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将其工作归入总参谋部。

改善指导思想，加强训练行政*

我同意肖克部长的报告和训练总监部制定的 1958 年度的战斗训练任务。在过去战斗训练中，曾发生了不少的缺点，除其他原因外，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专司训练业务的领导机关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混乱，还没有把训练行政很好地树立起来。因而，在这里我想专门谈一下，找出一些教训和经验，以期对实施 1958 年度的战斗训练有所帮助。训练指导思想之所以有些混乱，归纳起来就是忘记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所谆谆告诫我们的要从实际出发与全面分析的辩证唯物观点。因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不正常的状态。在过去战斗训练中，指导思想不正常的现象，可以从下面各点来说明：1. 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教条主义在我们的部队训练中是有的，甚至在个别地方还较突出。根据“八大”和学习 5 个文件的精神予以纠正，是必要的。这里所指出的问题，就是在反的时候发生了不少的可能避免而没有避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偏于批评下面，给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某些同志和报纸批评过去学的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甚至批评条令这不对、那不对。条令是上面颁发的，我们也*本篇是李达同志在训练总监部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言时间为 1957 年 10 月 24 日，未公开发表过，这次经过整理收入本书。不表示态度，使下面无所适从，对于这种重大问题，是值得我们正视和记取教训的。

其次，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片面性和极端主

义情绪，把许多问题都绝对化了，很多方面都把缺点扩大了，把成绩和优点缩小了，个别地方还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例如，因有些方面在执行条令中发生了毛病，就几乎以为所有条令都可以不执行了；好象在学院、学校中所学的东西都是教条主义了；对部队训练也有类似的看法。甚至发展到有这样的传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各院校教员是教条主义的媒介。”这样一来，就使各有关院校的许多干部和教员，以及掌理部队训练的同志在情绪上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有些干部和教员不满他说：“我们多教多学者是教条主义，那些不教不学者倒成了马列主义了。”这说明有些同志不是用实事求是的，而是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去反教条主义的。

再次，是在反的过程中，没有把反对什么，建设什么的中心思

想明确起来，就是说没有明确用什么正确的东西来代替所要“反”的东西，因而带来了使下面莫知所向的盲乱现象，甚至有的单位在短时期内就连续发生了多起不该发生的严重事故，这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2. “劣势战胜优势”问题的乱套。有些同志在指责战斗训练的

方针时，总认为没有体现以“劣势战胜优势”的原则，他们要求在战术上也来一个“劣势战胜优势”，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片面的和教条主义的。“劣势战胜优势”是毛主席所说的：“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是由统帅部和各高级司令部在把握战争局势时来体现运用的战略问题。也就是把战略上的以少对多的情况转化为战役或战术上的以多对少，争取每战必歼，以达最后胜利的目的。这在战役训练上是可以体现的，至于战斗训练（也就是战术训练）当然是不好体现的。若是也来一个以“劣势战胜优势”，那就不完全对了。例如同志们所指出的某部队在一个排的战术演习中，为了表现“敌强我弱”和以“劣势战胜优势”，就在排的正面上，假设敌人投了 3 颗原子

弹；某部队的一个排在演习中为要体现以“劣势战胜优势”的思想，就来一个诱敌深入，排长随便把部队后撤若干公里。过去有些单位在演习作业中把敌人显示得很弱，一打即垮，把自己扮演得很强，一战即胜，这固然是有缺点的。但有些同志就给予过分的非议，甚至联系到整个学的东西都错了，我以为这也未必完全适当。作为一个兵家来说，轻敌蛮干固然是不应该的，但既然要进攻敌人，就要有攻必克的气吞山河的信心和决心。用把“小猫当大老虎打”的狠劲，争取彻底消灭敌人，当然是应鼓励的。如果也来一个“敌强我弱”，以致攻而不克，那也未必对头！

3.对“小米加步枪”问题的误解。彭德怀部长在军事学院曾说过：“只简单地说：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过时了，加以否认是不妥当的。”又说“虽然这些经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是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扬的。”这是批判那些一概漠视过去经验的人们时所说的。有的同志对此不作全面的理解，他们竟片面化地弄成纯粹的“小米加步枪”了。我认为“小米加步枪”的最好经验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用现有的武器以各种有效的方法争取战斗的胜利。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坦克和各种火炮，以及其他技术装备，在训练和作战时，是用这些已有的武器呢？还是把它们扔掉又来一个纯粹的“小米加步枪”呢？严格的说，这种坚持纯粹“小米加步枪”的思想就是单一兵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合成军队的同志们，包括我个人在内，都应加以警惕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由过去的单一兵种而来的，单一兵种的思想很可能有所反映。有些单位在小分队演习时，把扛炸药包、爆破筒做为攻碉堡的主要手段，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过去在淮海战役时，士兵扛炸药包的行动就已经不行了，因为敌人用坦克、汽车围成了像城墙一样的工事，根本无法把炸药包扛过去，所以才大量采用抛射筒抛射炸药的办法。这种扛炸药包实施爆破的手段在今后的战斗中只能是一些特殊情况和条件下的必要和辅助手段，不能过多地强调，以免影响新的现代化各种技术的结合运用与发展。

4.统一领导与因地制宜的不同认识。统一领导与因地制宜本来是一致的，但过去有的“统”得过死，有的“宜”的太宽。如海军在制定训练计划时，有的单位就在“自报公议”的原则下各找易于完成的课目。由于发现下面有不照顾统一要求的因地制宜，有些同志就又想多抓一点，对于“因地制宜”的原则，几乎发生动摇。在物资保障上有的还想统到连，这都是偏到一边去了。不仅因地制宜，按说还有因秦、因时制宜，如海军有些部队有护航任务，就应在执行护航任务的基础上搞训练，也就是说有特殊情况者，应优先完成执行特殊任务的急要科目的训练，随即补训有关的基本科目。在严寒或酷热地区的部队，则应在适应这种特定条件时，尽量设法完成应有的训练任务。总之，统一领导与因地制宜，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对立面的统一体，不能有所偏废。

5.对有什么学什么和照顾前途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有什么学什么这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有些同志就把它片面化了，以为现在没有的东西，一概都不应学。因之，就不去照顾可能发展的前途了，也因之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有什么学什么上面去了。甚至机械到因目前没有或装备尚不齐全，即不设想在可能有的情况下进行训练。例如有的认为我们目前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进行在原子条件下的训练。我认为在装备不齐全或加强兵器不足时，是允许拿一些代用品和假设的东西来弥补的。如利用图表和模型讲解尚未装备的一些新的技术器材，有些部队没有坦克，必要时可以设想有坦克的加强。如果只学现有的东西，而不注意研究将来可能装备的高级技术的东西，一旦有事时新的高级技术装备一到手，如何能够

使用呢？当现代科学飞跃发展之际，我们可能很快的赶上前去，提早生产一些新的技术装备，此外还应设想到：如一旦有了突然的事变，就可能有突然的新装备出现，朝鲜战场就是例子。如果不预先想办法具备一定的新的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战争到来时就会形成意外的突然。不看远景，老在自己脚下打圈子，这是一种保守观念，应注意克服。讲现实主义，应是有发展的现实主义。

6. 结合实战问题的不同看法。在战斗训练中如何结合实战？到底实战是什么？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说这个也不符合实战，那个也不符合实战，于是对战术作业提出了过于苛求的责备或非议。我认为结合实战只能是大致的接近，要想进一步结合实战，只有根据现实情况作出接近实战的想定，多演习几次才能奏效。对于缺乏实战经验不善于使演习接近实战的干部，最好鼓励他们在了解原则之后大胆地实施反复的演习，以达熟能生巧之目的。有实战经验的高级领导者，最好亲自指导部属的演习，克服那种缺乏亲自诱导而却不适当地过多责备与批评，以致使下层干部不敢大胆行事的现现象。

7. 物资保障上的求全观点。现在个别地方存在着一种什么都要求齐全，否则就不能进行训练的偏向。在各领导机关和保障部门来说，应是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保障不力的现象是应纠正的。但在各部队来说，就要在各方面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做到在物资不足的现有条件下，也能克服困难，遂行应有的训练任务。那种因为物资不足而放松训练的现象应力予改变。否则就会养成在战斗中万一补给不足时，就不去主动克服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不良风气。

8. 学术探讨和训练行政有些混淆不清。有些地方把一些带研究性的东西，还没有考虑成熟即来乱改乱用，如拿条令来说，我们要编写更加适用的条令，当然是好的。但还没有编写出来，就可不用现行条令进行训练了吗？当然不能。某单位积极试行单兵和小分队对抗演习，这种要求演习逼真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在经验尚未成熟以前，就过多过早地推行到不少单位，以致影响合成军队训练任务的完成则应引为教训。要知道：合成军队训练的主要任务，是要达到合成战术的熟练，若过多地搞小的，并且占用很多的时间则是不好的。

关于条令和教材。我认为在新东西没有出来之前，肯定是要用现行条令和教材的。这在院校尤为必要。因为我们的院校都有培养干部的急切任务，都得定期有干部毕业参加工作，它并不是什么研究所，在培养干部方面也占相当长的时间来试行研究，没有研究好就可以不出成品，那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有教材施教，以训练在学的干部，只要是国防部命令颁布的条令，在未明令更改或作废以前，大家都要遵照执行。

9. 训练指标的争执。过去在年度的战术训练指标上，我们曾一般的规定从单个到师（只是一般的规定），但有的同志却认为不行。以为从单个到师对兵来说是难能做到的。他们不知道就兵的动作来说，无论到师到军，总还是兵的动作，并不是要他们去演习师长的动作。即以排、连长来说，也还是在师的范围内做排、连长的动作罢了。同时更要知道，较高级的合练，正可以提高小分队和单兵动作接近实战的质量。有些分队平时的专业技术尚好，但在参加合练时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的教训是应记取的。

此外，有些人又以为干部质量太低，主张在基础技术没有完全学好之前，不要作应有的演习，故一再要求削减指标，否则就认为会不深不透，走过场而已。我以为这也是有片面性的，正因为干部质量太低，那就应使他们在具有一定条件后多作一些演习，以便在实践中去体会基本原

则，以补本身质量太低之不足。工程兵最近在黄河上的架桥演习，就是越练越熟，最后达到超过标准限额的速度，而且质量良好，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10. 首长教部属和专长任教中的错觉。首长教部属这个原则是

肯定了的。在过渡时期有些干部还不能教自己的部属时，是可以采用专长任教这种办法来暂时补救的。但是有些单位竟在较长时间内使用这种办法，甚至经常来个全营或全团的武器分别大编组，以便实施专长任教，这是很不对的。对不能任教的干部，在起初实施专长任教时，就要有计划的培养教育，增强他们的能力，限期改变不能施教的情况。要知道平时不能教育部属的指挥员，战时就很难指挥所属遂行新条件下的作战任务。有些干部在经过培养后仍不能教育部属时，就应及时更换，不能长此下去，形成虚设。

11. “以我为主”问题上的片面看法。彭德怀部长在军事学院座谈会上同时说过：“学校的教学方针，应当是以我军现实装备技术情况为主，照顾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教材应当以自己编写为主，……”但有些同志也把它片面化和极端化了，他们认为一切东西都要马上“以我为主”了，于是原有的条令教范等学术性的基本材料都可以抛弃不用了，只要完全按照我们过去的，那怕是已经过时的经验办事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因之，也可以不要在“新条件下”进行训练，而在我军已装备有相当现代化技术兵器的情况下，还用纯粹“小米加步枪”时代的办法来训练部队，以至将来用以作战。我认为彭德怀部长所说的上述问题，是指在实施应用战术，也就是在演习作业时，应以我们的现实条件，如现有的装备、地形、任务以及传统的丰富战斗经验等为主来编拟想定，并在作业后以实际的总结来教育干部。彭德怀部长在向军委汇报时曾说到，他在军事学院时，曾批评过有些同志以为反教条主义就可以不用现行的条令，要求上面另发适用的教材的想法，同时并肯定了在我军尚未编写出新的条令以前，还应使用现行条令。由此就可看出一些同志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了。

12. 关于学习态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主要的是有些同志不够虚心，有些妄自尊大。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来说，首先应该要很好的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和技术知识，要知道我们的军官在军事技能和知识上都差得还很多。我们把现有的条令、教程、教令等都还没有钻透，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钻，这是值得注意的。

我以为我们应该多虚心些，要有自知之明，要下决心学习，由

中国的到外国的，首先是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要很好研究，并多在实践中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和发展。那些不学不做却只盲目叫喊的情况，应予改变。

上述这些思想上的混乱情况，在过去几年中，尤其在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影响着我军战斗训练任务的遂行，确切点说，在过去一时期中，某些方面的保守思想似乎是多了一点。如不设法改善，是会妨害我们战斗训练任务的顺利完成，影响我军向现代化大踏步迈进的。

改善指导思想的办法，就是要在战斗训练领导中，认真深入地

反对主观主义和由它派生出来的片面性与极端主义的观点，以便从根本上弄清问题，利于很好的进行训练和建设我们的军队。

现在来谈一谈加强训练行政的问题。

什么是训练行政呢？我认为训练工作，一方面是业务性质的，

但更多的成分则又是行政性质的。军委把战斗训练问题已定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规定由各级党委和首长亲自领导主持，在组织系统上由上而下设立

了掌理训练的机构以专司其业务，这当然就是行政性的问题了。

其次，军委和国防部又有树立训练行政的决心，在多次会议上

彭德怀部长都强调要建立业务部门的威信，强调由训总〔1〕负责，独立处理一些有关问题。这样我们就应重视这种行政关系，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检查起来我们过去在训练行政问题是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

误的，虽然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总结与记取教训来说，我认为从训总来看，我们是存在着没有完全尽到责任的缺点的。客观的情况当然是我们还不完全懂，要把所有的海、陆、空三军的战斗训练都抓起来，确实大有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实际问题。1957年春军委提出了要整编军队，处理大批干部的繁重任务后，训总为了使各部队在优先的完成整编任务下，来实施战斗训练，故曾强调由各军区、军种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这样一来有些单位就把因地制宜的范围放得大了一些，个别的甚至各行其是，业务部门也未及早报告有关情况。加以前面说过的指导思想在某些方面混乱的影响，就有些失去掌握，影响到全军训练水平的不够平衡和质量不高。总的来说，一方面有些单位没有及时反映可能提高而没有提高任务的内部情况，但在训总来说则是我们监察的不够，以致几年以来使它们没有尽更大的努力，降低了训练水平，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和教训。拿我个人说是专管计划监察的，既要计划又要监察，但监察得很不够。对1957年的训练进度，就没有认真地监察。今年最大的缺点是陆军训练的进度不平衡，我们要负责的。以上是对训练行政上的部分检讨。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加强训练行政的时候了，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 各级指挥员、训练干部和其他军官都应认真体现党中央及军委关于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现代化优良的革命军队的方针和决心。体现了这个方针和决心才好办事，才能看到建军的前途和目标，并从而规划我们的建设与训练事宜，以便向前迈进，防止与避免落后现象。2. 在毛主席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号召下，要决心下苦功学习，军事指挥员，特别是训练部门的同志，要向红色专家的方向发展。合成军队的同志更要警惕，要知道我们大都是从游击战争来的，新的东西懂得太少，单一兵种的观念是会长期存留着，如何掌握与指挥现代条件下的合成军队，困难还是很多的。要以最大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体现上述的号召，来改变旧有的情况。过去计划监察部把主要力量放在陆军方面，可以说就是单一兵种观点的反映。从1958年起我们要逐步的改变这种情况，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向海、空军学习与了解情况，对于陆军的计划和监察，除了有关总的方针与原则问题外，则主要的让陆训部来负责办理。

合成军队要把与特种兵的关系弄得很协调，这一方面是训练

任务，同时又是行政任务。过去合成军队与特种兵之间有些不大协调，在训总来说我们没有完全把工作做好也是有责任的。今后要求双方都要迁就一点，主动地靠拢一点。特种兵要防止可能产生的特殊化，合成军队的同志则应从各方面克服可能产生的单一兵种的观念。要特别明确：我军建设与训练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要很好的合成起来，而不是各自力政的分裂开来！

3. 严格训练行政上的分级负责和请示报告制度。训总要向军

委负责，各军区、各军（兵）种都要各负其本身的责任，严格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有关的重大问题都要及时报告。除各军区、军（兵）种首长直接向军委、国防部、总参及其他有关部门请示报告外，各级司令机关及所

有训练部门对有关训练方面的专门问题都要向训总及时请示报告。

4. 弄清党委领导和行政负责的范围。过去不少单位对这个问题弄得不清楚，有的党委把训练工作全包了，有些在党委分工上，你管射击，我管战术，或团长领导一个营，政委领导另一个营，这样是不好的。党委领导是掌握有关大政方针的问题，例如如何完成训练任务等，行政负责是行政首长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例如各级指挥员都要对所属的战斗训练负完全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诿和包办代替，有些单位叫军事指挥员去搞反右派（如有其他干部确能代替实施训练任务时当然是对的），以不大懂业务的干部去搞训练，以致影响训练任务完成的教训，是应记取的。

5. 为了加强训练行政领导，特建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统一领导与因地制宜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军委早已确定的，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偏差，都仍然应坚持下去。该统的不统或统得太死都是不对的，同样，离开统一约束的各自活动，或虽不离开统一约束，但却不尽最大努力来完成统一任务的情况也是应该反对的。

（2）应确定将目前所使用的条令统称现行条令，在新条令未出现以前，即肯定前者为理论学习的基本教材，不应再有动摇。在演习作业时就应根据“以我为主”的精神，由有关首长人员按照自己所处的情况（包括现时装备、兵力、地形、传统经济等），以各种办法使演习接近实战。同时并尽可能的采用一些必要的假设情况或代用品，照顾发展前途的远景。

（3）划清学术争鸣和训练行政的关系。展开军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阐明理论和提高军事科学的有力武器，必须继续推广，但要防止因争鸣而影响先行训练行政的实施。凡正在争鸣而尚未定案，以及虽已试行成功但未明文确定施行的问题，都不应先行推广，以致妨害整个训练的平衡发展。凡报纸上刊载的一般性文章，如无特别交代，都应当作争鸣的作品来看待。

（4）所有课目都应确定在现代条件下（包括原子武器等）来实施，不必再说什么新条件下和原子、化学条件等。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这些东西已经成为常规武器，不是什么新东西了。

（5）明年的干部集训最好都按内行、半内行、外行等三类划分一下，以便分别加工训练，有计划的消除外行的现象。明年是在巩固技术和射击训练的基础上加强战术训练，可考虑以军或军区为单位实施训练法集训，由军长、政委起都按亲自“滚”、“爬”的办法，从单个教练作起，认真学好战术动作，打下练兵的基础。

最后还要重复的提到：在战斗训练中，应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争取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完成训练任务。要知道在整个国家来说困难还是很多的，军队的编制、装备、器材、油料……等等一切问题都很难一下子如愿以偿地获得解决，故不可设想做到“百事无缺”。因此就要求我们要在现有的条件下来进行训练，这个决心确定后，办法就会多了的。将来打仗时也会有补给困难的情况，但仍须完成战斗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按上述原则来遂行锻炼。同志们！我们大家的责任是很大的，我们应一致努力提高训练业务，做好训练行政，为提早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优良的革命军队而努力！注 释〔1〕训总，即训练总监部的简称。

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贺龙元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的祝词，罗荣桓元帅的开幕词，和罗瑞卿大将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报这次会议，是一次空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和全民皆兵方针的会议。我在这里特代表国家体委和国防体育全体人员 and 广大爱好者热烈祝贺会议的成功，并为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而欢呼！会议给国防体育工作提出了光荣的任务。我现在谨就开展国防体育工作方面，贯彻全民皆兵方针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国防体育是我国体育工作中更直接地服务于国防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人民武装工作——民兵工作的一个方面，它利用业余时间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进行军事知识、军事技术训练，加强人们保卫祖国与世界和平的观念和能力，为国防建设培养和储备技术兵的后备兵员，使人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即可承担光荣的战斗任务；在平时则可不断学习与提高有关技术知识，用以推动和服务于生产、工作、学习等中心工作。由于它的各项活动大都是运用或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知* 1960年4月18日至27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李达同志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这是他1960年4月20日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识，因此，也可以说国防体育是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我国的国防体育工作是从1951年开始的。当时刘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 and 我国武装革命的实践，吸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的经验，即指示建立国防体育组织，开展活动，以适应形势的需要。1954年以后这一工作就一直由贺龙元帅亲自领导。由于各级党委的关怀和军队、共青团、工会、教育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帮助和支持，几年来国防体育工作获得了不断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以来，国防体育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也有了新的发展。截至1959年底止共开展了射击、摩托、无线电工程和报务、飞行、滑翔、跳伞、航空模型、军事航海、舰船机电、航海多项（水兵和海员的基本技术，如手旗通讯、攀登系艇杆、驶帆、撇缆等）、水上摩托、航海模型等十几个项目的训练活动。各个城市还举办了群众性的军事野营活动和军事知识讲座。据195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各项专业性的国防体育俱乐部500多个，参加活动的人数约达2000万左右。此外，广大基层还自建了数以千计的业余俱乐部和活动点，因时、因地制宜地广泛开展了活动。自去年12月中央批转了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报告之后，国防体育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体委按照军委的要求，拟制了发展国防体育工作的3年（1960—1962）规划，除要求各地普遍建立和健全上述各项专业俱乐部，开展活动，并重点要求发展滑翔训练和无线电工程活动，以适应需要外，还拟开展一些新的项目（如炮兵、装甲兵、防化学兵等），要求在3年以内，把参加国防体育活动的人数，发展到7000万以上，以便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予的民兵技术兵训练的光荣任务。这样，国防体育工作就进一步充实了民兵工作的内容。在今年2月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和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由于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积极要求学习保卫祖国的本领，因之国防体育工作，就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局面。各省、市、自治区、军区、体委、共青团、工会、教育等有关部门在党委和民兵工作小组的统一领导下，都相继召开了民兵工作会

议或体育工作会议，制订了大搞国防体育的发展计划，并以建立各级俱乐部为目前的中心环节。山东省体委在军区的积极支持下，计划在各个专区除加强原有的射击、无线电、摩托、航海航空模型等俱乐部外，还拟新建炮兵、坦克、防化、雷达等新项目的俱乐部。各县至少建立一个综合性俱乐部。其聊城专区的各县除建立几个单项俱乐部外，还有 3200 多个基层的业余俱乐部。陕西省除建立健全各市、县俱乐部外，还提出在各俱乐部建立综合性或单项的国防体育业余学校。河北省除专、市建立各项俱乐部，每个县建立一个综合性俱乐部外，还计划在全省开展 5000 个国防体育红旗单位运动。基层的群众活动在各地区已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参加活动的群众日益广泛和普遍，且情绪都很高涨。山东今年 4 月 10 日的不完全统计，3 个多月内参加国防体育活动的人数已近 300 万人。哈尔滨市在中、小学及部分农村人民公社中已建立了基层业余俱乐部 310 个，积极从事活动。该市一所回民小学的 1500 多师生全部参加了活动。北京市宣武区少年之家的业余国防体校，几年来完全利用课外时间，共吸收了 24000 多青少年学生参加活动，今年又计划把参加活动的人数扩大到 70000。朝阳区沙板庄中心小学的 1200 多师生员工，在短短的几周内全部参加了航空模型和军事操练活动，有 500 人参加了射击活动，其中 70% 达到了“普通射手”水平，800 人学习了手旗通讯，并开展了无线电报务和跳伞活动。根据不少地区的反映，国防体育开展得好的单位，由于加强了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了反帝爱国的思想和荣誉感，因此，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中心工作或学习，而且促进了中心工作和学习，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学生家长都很满意，并对继续开展活动给以很大的支持。上海有的学校领导上要求把全部学生送去参加军事野营训练。北京市沙板庄中心小学的有些家长还帮助自己的子弟做木枪和小飞机。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各军种、兵种都积极主动的从各方面给予国防体育工作以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它们都指定专人与国家体委联系，处理开展国防体育工作的有关问题。空军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拨给飞机 200 多架；海军正准备清理仓库调拨可能拿出的器材，帮助建立航海俱乐部；装甲兵已帮助北京市体委建立了一个装甲兵俱乐部，并决定协助国家体委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 150 个左右的装甲俱乐部；炮兵正在帮助国家体委建立直属炮兵俱乐部，并拟仿照装甲兵的办法，在全国建立俱乐部 150 个；通信兵准备共建 400 多个俱乐部；工程兵、防化学兵、铁道兵等部也都准备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上述情况，充分表明了新情况下的国防体育工作的大好形势，真是波澜壮阔，一日千里。使我们深深感到无论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都大大落后于客观情况发展的需要。为此，就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以掌握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我们并拟及时修订和补充原定的计划，使之尽量符合客观事物的需要。现在，我们准备把工作重点指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干部，尽可能吸收更大量的爱好者参加活动；二是珍重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对于支持与帮助国防体育的热情和积极性，协同他们以各种方法，把各项俱乐部建立起来，并争取在 1960 年底或 1961 年上半年大体完成，以便做到大面积的丰收。这样，我们原定的 3 年规划的指标，就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并超额完成。为了很好的完成任务，我们根据在工作中的体会和目前发展的情况，拟遵循和采用下面的原则和办法：（一）贯彻党委领导，坚持业余原则。国防体育是群众性的军事工作，也和我们的军队工作一样，必须切实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使之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方向发展。所有的组织及干部都应弄清人民武装与常备兵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不脱离生产，服从各项中心工作。就在于要少花钱多办事和不花钱也能办事。因此就要把自己的工作纳入党委的统一安排之内，并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取得党委的领导和支持。要切实注意：如果广大群众因参加国防体育活动而影响了生产、工作和学习这些中心任务，那就违背了为劳动生产服务这一目的，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也就不能坚持下去，更达不到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目的。许多生动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凡是在围绕并服务于生产、工作和学习等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北京市宣武区少年之家的业余国防体育学校，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课余时间，安排不同时间的活动（除星期日外，有下午4—6时的，有5—7时的，也有晚上6—8时的）。同时还训练业余辅导员，在课外时间到距离比较远的学校去登门教学。几年来，他们坚持了业余原则，因而使活动坚持下来而未曾间断，且训练水平也不断提高，河北的唐山、石家庄和江西的南昌等市的一些工厂，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一两个小时，连续多日进行短时间的野营训练，既保证了生产，又完成了训练任务，使各方面都较满意。其它有不少地方都总结出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训练活动取得成绩的经验，是应该坚持和推广的。但是必须指出，还有个别的单位和干部，尚没有完全遵循与坚持业余的原则。在民兵技术兵的训练任务提出以后，那些尚没有建立组织或组织不健全的单位，已有因任务繁重而准备对参加活动者进行脱产训练的想法，必须切实防止。为了保证业余原则的贯彻，必须及早建立和健全各级国防体育组织，特别要设法把基层的各项业余俱乐部普遍建立起来。必须采取各种方式培养大量的业余教练员和辅导员，使他们在本单位指导群众活动。在开始培训骨干和建立俱乐部之初，可采取大、中、小并举的办法，不应一下子要求过高过大，以便在初具形式以后，再逐步予以加强。

（二）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上马。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如前所述，国防体育是人民武装范畴的工作，它既有广泛的群众性，又必须坚持业余原则。为此，就必须通过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要向广大群众深入宣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和全民皆兵方针的伟大意义，宣传开展国防体育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热潮。北京布朝阳区沙板庄中心小学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他们在群众一经发动，宣传工作深入之后，连那些担任其他课程的教员都认识到自己也是全民皆兵中的一个民兵，改变了过去认为与自己无关的看法，纷纷投入国防体育工作的洪流中去，协助小朋友们制作有关器材，并指导活动。这样该校就上下一致地沸腾起来，把国防体育推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开展国防体育的首要问题，就是器材、场地等问题。有一种极不正确的观点，以为既要进行军事教育，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较洋的器材和场地，特别是想向常备军比长短，这种观点必须予以改变。我们的主张就是要以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精神，大搞土法上马，凡所需要的东西，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先土。湖南衡阳航空俱乐部在人员器材极不完备，仅有几架滑翔机的条件下，就大胆上马，担负了滑翔员的训练任务，两年来，它们已经逐渐提高，成为较完善的重点航空俱乐部了。有不少单位起初就是由小教员口念或用儿童玩具的小喇叭吹着“滴滴嗒嗒”的符号，教育群众练习无线电报务活动的。还有一些单位利用火枪或木枪开始射击训练，用破木板

或硬纸制作模型飞机，打开航空模型活动的门径……。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应该广泛推广，并应动员群众在土法上马后随即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遵循事物发展的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逐渐朝洋的方向推进，一直争取攀登科学尖端的高峰。（三）改善训练方法。在国防体育活动中的训练方法，开始时，由于对这一新的工作没有经验，无论是开展的项目、器材、规章、制度、施训方法、竞赛办法等等大部分都是向外国学习的，加之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大多数都是从军队转来的，对群众工作不够熟悉，因之就很容易运用军队中的方法来对待群众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许多作法必需改变，才能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使国防体育工作适应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要求。例如必须把那些大套的冗长的教材，改编为通俗易懂，在不长时间内就能教会的东西；把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规章制度，改变为既不违反科学，又能发挥群众积极性的东西；把那些命令主义作风，改变为官将就兵，把技术送上门，并在业余时间分散施教的办法；把只要使用精良器材进行训练的办法，改变为使用土器材、代用品和土洋结合进行训练的办法。总之，就是要适应人民武装的群众性和普及原则，以便更好地实现全民皆兵的要求。上述问题在许多干部的思想中，尚难一时弄通，还要继续加强教育，并一直坚持下去。（四）重视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现场会议是一种用现实事例、具体活动和具体人物当场示范动作，传播经验最快，收效显著的多快好省的先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1958年我们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航空俱乐部的现场会议，使与会者受到深刻的现实教育，对推动航空运动的作用很大。最近北京市在宣武区举行了一次青少年业余国防体育学校的现场会议，当时各区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受到极深刻的现实感染，认为宣武区的办法简便易行，立即发起“学、赶、超”的倡议，并提出在最短期间把本区的青少年业余国防体育学校一律举办起来。我们认为这种现场会议的方法，也应在全国推广。并要求各级领导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发现与培养典型，树立标兵，及时召开大小不同的现场会议，当场指出其优点和缺点，给大家以现实的教育。那种久坐机关，不接近群众，只用通知指示做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纠正。

（五）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训练质量。

国防体育工作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

年群众。因之，就要首先着重普及工作，把活动范围扩大起来，要使广大群众都有接受军事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机会，不重视普及工作就很难达到全民皆兵的要求。但在普及的基础上，又要逐步地不断提高，以达天天向上的目的。与此同时，则要在提高的水平上指导普及，以求螺旋上升不断跃进。这里所谈的提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按训练大纲要求，达到合乎民兵技术的水平；一种是向尖端技术进军，使一些运动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必须竭力加强滑翔及无线电尖端技术研究、设计、制造等等，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

中央军委已明确规定对国防体育工作实行由军委和国家体委

进行双重领导的原则，军委并确定各级军事组织都指定专人领导和参加相关体委中的国防体育工作。我们将很好地按照上述原则办事，责成各级国防体育工作人员及有关组织，认真接受军队首长及其领导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并及时反映情况和请示有关问题。此外，还应当积极主动与共青团、工会、教育、卫生、公安、妇联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指导

和支持。

国防体育工作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但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国防体育工作同志和广大的爱好者一起，一定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虚心学习，戒骄戒躁，圆满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各位代表同志回去之后，就近多方帮助各地把国防体育工作开展起来，首先是把有关的俱乐部分别建立起来，使之尽快地担负起民兵技术兵的训练任务，以便协同民兵组织贯彻全民皆兵的方针。

让我们高呼：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军事思想万岁！

和运动员谈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问题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在这个劳动人民传统节日的前夕，我想和运动员们谈谈关于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的问题。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和毛主席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并且英勇顽强地克服了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目前，我们国家的形势和前途，如旭日东升，无限美好。可是，这一切的取得却是极不容易的，年轻的运动员们，应深刻体会取得革命成果的艰难，以昔日之苦，比今日之甜，继续树立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努力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大家知道，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长征的主要部队有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等三大主力红军，先后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首壮丽的诗篇。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同数倍以至数十倍前来围追堵截的强大敌人，不断进行英勇战斗；走了10多个省，经过汉、壮、苗、彝、藏、回各族2万万以*这是李达同志1962年4月在国家体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工作人员、运动员会议上的讲话。经整理，发表在《新体育》1962年第8期上。上人口的地区；通过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泸定桥、腊子口等高山大川和险关要隘，备尝人间少有的各种艰难困苦，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长征的胜利，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显示了人民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工农红军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战斗和生活。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正和我们党的历程一样，是不断和各种困难进行斗争，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过程。长征开始以后，由于数十万强大敌人从天空到地面不断围追堵截，我军又脱离根据地转战在陌生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连自然条件，也与过去极不相同，有如进到另一个世界，加以行军作战，长途跋涉，极度紧张疲劳。经过雪山、草地时，吃饭、穿衣、走路、宿营等几方面的困难，都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魄，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向各种各样的困难作坚决斗争，终于胜利度过。雪山、草地是一片广大的地区，荒无人迹，自然条件极端恶劣。许多高山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空气稀薄。夹金山等大雪山脉，每到下午常常是大雪纷飞，或者大风弥漫，还不时下冰雹。草地遍地是野草、污水，茫无边际，异常荒凉。有些地方接连三四十里，水深过膝。水草下面便是泥潭，一不小心陷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没顶。这给行军造成很大困难。但在困难面前，红军同志们并没有低头，而是动脑筋，想办法，奋力克服。例如，不少同志相互搀扶着走，不少同志弄了些树枝、木棍扶着走。在这样人间少有的艰苦地区，首先的困难是吃饭问题。许多部队进入雪山、草地以后，每天只吃少量的青稞、玉黍、荞麦等类杂粮，或将一天粮食分做两天、三天、四天来吃。同时多方采集野菜、野草代为充饥。二方面军有些部队，从渡过金沙江以后就开始吃野菜、野草。每到一地，就派人四出寻找，凡用口尝一下觉得不是苦味或有毒的，都采着吃。有的后卫部队连嫩草也吃不上，只能吃到前面部队留下的菜根和草根。由甘孜北上时，每人只带了少量的青稞粉，

在粮食快吃完时，有的同志就烧、煮皮带、皮鞋或牛羊骨头吃。有的同志还在牛皮上划记号，每天按着记号啃一小块，有计划地吃。更多的同志则边走边找野草吃，有时不慎吃了有毒的野草，就会中毒生病，甚至有生命危险。草地多数地方的水是不清洁的，不慎喝了，肚子就发胀，甚至不可救治，必须很好地选择用水和减少用水。一、二方面军南方人占多数，穿的都很单薄，加上长途行军作战，有些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进入雪山、草地后，御寒问题，就很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党又指示全军，以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用棕纤维织成衣服；有些人披着小块小块的兽皮；有些人将少量羊毛放入夹被子里，行坐时都披在身上；不少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便找些草叶，顶在头上抵抗风雨的袭击。翻越雪山时，为了增加体温，就发几个辣椒给战士，准备临时含在口里，或在上山前喝些辣椒汤，以御寒冷。在草地差不多天天下雨，有时全身衣服都被湿透，柴草又少又烧不着，无法烘烤衣服，就挺着身子活动活动，以便增加体温，与湿寒作斗争。行军、宿营也有极大的困难。六军团在离开根据地后，仅使用一本中学教课用的实用地图指挥行军作战，从这样的地图上只能看到县名和河流，方位极不准确。由于一望无际的草原，有时全靠云层里透出的一线阳光辨别方向。特别在深入草地后，不少部队甚至辨不清行进的道路。四方面军曾有成师成团的部队，出去后因失迷方向而中断联系，经多方寻找才重新归队。过雪山时，由于空气稀薄，呼吸非常困难，加上风雨冰雪的袭击，一些体弱的同志在翻越山顶时，会发生生命危险，因此大家特别注意相互照顾。行军时，没有房子住宿是常事，前站人员常常给各部队划分一些可以略略避风的山沟来露营。草地到处是水，地面潮湿，大家往往找点草叶子垫着屁股，两三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有时下雪，个别人员被大雪埋没了，天亮后就要挖雪找人，加以急救。为了遮避寒风冷雨的侵袭，战士们在宿营地经常是就地挖个土坑躲在里边睡觉。为了领导大家共同战胜困难，党及红军的领导同志，也同战士一样节省用粮和吃代食品，一样坚持走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而且不断鼓舞战士们。有些领导同志还为体弱的战士背枪。许多同志宁愿自己饿肚子，把干粮送给缺粮的同志，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红军长征就是这样以不屈下挠的坚强意志，战胜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到达了接近抗日前线的阵地，1935年毛主席曾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毛主席这段话，是对红军长征的生动写照。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受到重要教育与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灯塔。

长征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长征中铁一

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毛主席领导我们，什么时候的革命事业就会发展和胜利；哪里认真按着毛主席的路线办事，哪里的工作和斗争就会不断得到新的进展和做出良好的成绩。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曾使中央红军数次陷入危险的境地，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领

导，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才能转危为安，取得了主动权，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以后又对张国焘逃跑主义右倾路线和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胜利地完成长征。事实一再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战斗力量。同时，也说明了，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坚信，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毛主席和党中央，也一定能够领导我们克服和战胜任何困难，引导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们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二，正确地对待困难，勇敢地克服困难。红军在长征中，由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发挥了革命战士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发了无穷的智慧和潜力，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因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既要正视困难，更要勇于克服困难，学会克服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因为在任何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中，困难总是会有有的。所谓困难，也就是尚未解决的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原来的困难克服了，新的困难就会随之而产生。真正的革命者，正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不断进行革命斗争中前进的。前两年，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确实给我们国民经济和我们的生活上，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也正是由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这些困难也被一一战胜了。所以我们说，困难往往是考验与锻炼我们的好时机。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下定决心，要在困难的斗争中锻炼和考验自己。在运动训练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当然这些和红军长征时所遇到的困难，或是由于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所带给我们的困难比较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也只有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那种艰苦奋斗、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信心百倍地，勇敢地对待，才能克服困难，无往而不胜。

第三，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克服个人主义等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切“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思想，都来源于非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没有远见，在政治倾向上是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在工作作风上华而不实，投机取巧。他们经不起考验，胜利了便会冲昏头脑，以至拼命冒险；失败了便又垂头丧气，以至退却逃跑。总之，都会给革命造成不利或严重的失败。而这一切，归根结蒂，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目前，我国人民以发愤图强，再接再厉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更应该反对那种企图坐享其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思想。更应当进一步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刻苦努力，艰苦奋斗，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同时，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努力提高思想觉悟，踏踏实实钻研技术，不断提高运动成绩；克服胜骄败馁和一切锦标主义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也都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体育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如不克服，不仅阻碍不断提高运动成绩，还会阻碍自己的思想进步。

第四，认清阶级敌人反动本质，提高革命警惕。长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南方的根据地丧失了，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数革命先烈光荣牺牲，党员曾由 30 万减到几万人，红军力量

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由 30 万人减到 3 万人，大批革命群众也遭到反动派的屠杀。红军在长征中遭受严重损失，各根据地遭受残酷的破坏与摧残，赤裸裸地暴露了阶级敌人血腥镇压革命人民的残暴本性。当时，由于日寇凶暴的侵略，已使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我党中央一再呼吁愿在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军队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认贼作父，对日寇采取卖国投降政策，一再退让；对红军则不遗余力，以图消灭。红军未转移前，它们拼命“围剿”，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摧毁革命人民的生存条件，同时，还派遣 AB 团等反动组织到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红军转移后，反动派的军队，就立即连同还乡团以及地主富农等进入根据地，从人民手中夺取政权和土地财产，到处进行血腥屠杀，普遍制造无人区。这些情况都说明阶级敌人具有豺狼那样凶恶残酷的本性。我们对一切反动派都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要接受历史的血的教训，认清阶级敌人的本质，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目前，无论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我们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发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作风，克勤克俭，发愤图强，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不断创造新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在运动队中树立革命的战斗风格

运动队的组成，就是要参加运动竞赛，就是要在运动竞赛中，千方百计地争取胜利。这不仅对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体现和发扬我国人民勇敢顽强、奋发有为、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也有重大的意义。

竞赛胜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技术、战术、身体素质、竞赛经验方面的；也有精神状态、意志品质，即战斗风格方面的。总的说来，在双方实力相当，或实力悬殊不大的竞赛中，归根到底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精神因素，亦即是我们平时所称的“战斗风格”的因素。

每逢运动竞赛，我们对运动队总是提出一条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打出良好的风格，打出最高的水平”。打出良好的风格，这点非常重要。没有良好的风格，就不能出现最高的水平，也难取得竞赛的胜利。所谓“良好的风格”，就是革命的战斗风格，也就是“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风格。根据我个人在革命战斗中一点不成熟的体验，结合运动队（主要是球类）的特点，我认为在运动竞赛中的战斗风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标准，现特提出，和同志们加以探讨。

*本篇写于1962年10月，发表于《新体育》1962年第11、12期合刊。

一、以我为主，灵活制敌

以我为主，灵活制敌，就是要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充分发挥我方固有的特长，以顽强的进攻精神，敏捷灵活的动作，针对彼方的弱点，来左右彼方，制服彼方，而不为对方所左右。运动竞赛，同军事斗争中的战斗活动一样，夺取与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高度地机动，多方创造对方弱点，给我造成可乘之隙的有利条件，从而以己之长，制彼之短，实为首要的一着。因此，投入战斗时，一切斗争的措施和指挥，都要以我方固有的战术、技术专长和意志品质、身体素质等特点为依据，针对对方的情况，以灵活机敏的手法，主动地调动对方，来制造、扩大对方的弱点，迫使对方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从而实施突然猛烈的攻击，而决不跟着对方跑。革命的战略、战术是进攻，要主动地寻求进攻之道。当然也要防御，但防御也是为进攻创造条件的防御，是积极的防御，决不是单纯的、消极被动的防御。任何运动队伍，都要在激烈的比赛中，尽一切努力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自己的特长发挥了，则我们的弱点就不至于暴露，也就不会发生大的过失，给对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当我方特长发挥时，就会使对方陷入招架应付的被动局面，从而暴露其弱点，更使我方有隙可乘，愈益发挥我方的潜力，形成愈战愈强的优势，以至创造优异的战果。过去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各地的军队，无论在兵力和装备上，都是劣于当前的敌人。但我军都能坚持斗争，在战役和战斗中，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军善于掌握主动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并能控制战场，操纵局势，掌握战机，调动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敌人则常常被迫接受我之调动，像瞎子摸鱼一样，盲目乱动，处处暴露弱点，处处被动挨打，以至最后彻底失败。这里还要再着重提一下灵活性的问题。所谓灵活，就是不呆板迟疑，善于掌握火候，善于捕捉战机，不放松每一个瞬息即逝的有利条件，运

用恰当的手段，夺取斗争的胜利。毛主席说：“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过去我们在革命战争中许多辉煌的胜利，都是运用和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参加竞赛的运动队，无疑的也应当体现和运用上述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斗争手段，以争取竞赛的胜利。根据一般情况来看，运动竞赛的双方，大多是势均力敌，或虽有强弱之分，但悬殊并不甚大。问题的焦点，在于主动权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能否积极进攻，并善于虚实并用，“虚虚实实”，“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以摆弄对方。同时还要善于以主观能动的作用，改变被动不利的形势，恢复和夺取偶尔失掉的主动权。如果始终被动，跟着对方打圈子，则必将导致一败涂地之局面。这点，应当特别加以警惕。

二、团结内部，和衷共济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胜利”这一真理，在运动竞赛中同样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军队的作战经验和运动队的竞赛经验都一再告诉我们：每一个作战单位，只有内部团结、亲密无间，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心同德，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威力，谐和一致地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在运动竞赛中，由于情况的瞬息变化，常常出现错综复杂，以至协同不好偶尔失利的现象。但这时就更需要大家头脑清醒，互相体谅，互相支援，以恢复动作的协调一致，继续奋斗，才会挽回颓势，扭转败局。要知道，在复杂紧张激烈的比赛中，任何运动员偶尔出些差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正如在势均力敌的双方对战中，局部的、暂时的陷入被动或动作失调一样。只要失误者不是出自故犯，那怕错误严重，甚至影响整个比赛的胜负，都应当采取谅解、信任和积极帮助的态度。任何彼此埋怨和指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加重失误者的精神负担，影响其潜力之发挥，削弱本队的战斗力，并使对方乘隙而入，以至造成更大的不利。相反只有积极热情地多加鼓励和支持，才能重新树立信心，克服缺点，可望达到安定情绪，恢复理智和信心，以至转危为安的目的。而对于失误者本身来说，则不应考虑个人得失，背上包袱，而应勇于承担责任，迅速吸取教训，改进动作，继续全力投入战斗。古人所说的“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就是指的在风雨交加的惊涛骇浪中，同舟人员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努力，才能克服艰险，达到彼岸。每个运动队和运动员都应记取这一名训。

三、破釜沉舟，毫无顾虑

破釜沉舟，毫无顾虑，就是一定要有勇敢果断、一往直前、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决心和信心。为此就必须丢掉一切包袱，消除任何犹豫迟疑和顾虑多端的现象。我国古人项羽统率军队在一次背水作战中，当军队渡河完毕时，就将炊具全部打破，把船全部凿沉，以示势在必胜，死无反顾的决心，终于获得胜利，传为千古佳话，并被兵家作为一项军事原则。在运动竞赛中，首先必须摒弃杂念，勇敢果断，全力以赴。如果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必会影响战斗力和技术的发挥，其结果必遭失败。一场紧张的比赛，由于双方争夺激烈，限制与反限制；也由于一方主观的努力和一方出现某些漏洞和错觉，常常展现出许多有利的战机，而这些战机又会瞬息即逝，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勇往直前地付诸坚决果断的行动，必然丧失良机，遭受不利。但是在不少的竞赛场合中，一些运动队的成员常常出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现象。追其原因，一是事先调查研究不够（包括临场观察和判断能力），

情况不甚明了，以致决心不大；二是思想顾虑太多，如怕打不好、怕丢面子、怕负责任、怕裁判不公，以及本身修养不够，易被对方激怒，等等。这些顾虑不管出自良好的愿望，或是基于客观原因，如果不迅速消除，以致形成思想包袱，势必分散注意力，影响力量的发挥，对整个战局不利。还必须特别指出：所谓“破釜沉舟”，并不是粗鲁莽撞的孤注一掷，更不是死拼一气；“毫无顾虑”，也不是满不在乎，胜负无所谓。它们是建筑在充分的精神准备、训练有素的良好技术、以及实事求是的作战部署基础上的。这就是赛前要做好调查研究、精密的计划、完善的措施；临场要周密的观察，机断地改变计划中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部分等。一切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现象都必须克服和纠正。

四、顽强到底，力求胜利

任何革命工作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属于意志顽强、坚毅不屈、百折不回、坚持斗争到最后时刻的革命者。一帆风顺，不费力气，尽如己愿，以至侥幸成功的情况，是不会有。一切对抗性的竞赛，总是顺利与困难，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交替进行的。比分有起有落是正常的现象。完全顺利的情况，只有在自己处于压倒优势，并不轻敌麻痹而善于斗争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否则，是不存在的。因此，运动竞赛不仅是比技术、比战术的竞赛，而且是比斗争意志和革命毅力的竞赛。谁的意志最顽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鼓足干劲、认真斗争，顺利时，不麻痹、不松劲；失利时，不悲观，不泄气；相持时，能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敢打而不手忙脚乱；等等。这样，就有可能保持和扩大战果，以至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毛主席说：“往往有这种情况，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顽强和坚持，不仅可以稳住阵脚，巩固士气，最大限度地调动我方积极因素，最充分地发挥我队潜力和技术作用，从而赢得时间，渡过难关，转化敌我形势，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更能实施积极防守，挫败对方的锐气。许多运动队在竞赛中往往易犯以下的毛病：遇到强的对手，或开始斗争时处境不甚顺利，则每况愈下，以至一蹶不振，不易挽回败局；遇到弱的对手，或开始斗争时处境比较顺利，则骄傲轻敌，缺乏善于斗争的应有措施，以至化优为劣，形成转胜为负的局面。以上两者都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就经常教育部队要树立“胜不骄、败不馁”——也就是既能打胜仗，又会打败仗的顽强风气。打胜仗固然是件好事，是应当力争的，也是我们应有的抱负；但事实上没有常胜将军和不败的部队，因此，在力争善于打胜仗的同时，还要作好打败仗的思想准备，养成在吃败仗时，能坚持斗争，力争上游的顽强意志。参加运动竞赛的运动队，同样也应有这样的素养。以上概括起来讲，就是主动、团结、勇敢、顽强的八个字，是我们所提倡的“战斗风格”的实质和综合表现，是运动队伍充分发挥技术、战术威力和打出最高水平的重要保证，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我们所有的运动队伍，都应当在日常训练中积极培养和牢固地树立这种风格，特别要争取在每次比赛中能够体现出来。果能如此，则随之而来的将是理想的水平或完满的胜利。有些运动员在竞赛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计较胜负得失和比分的上下，而未能很好地从体现良好的风格入手，当比分落后时，就惶恐不安，焦急失措，实是舍本求末的现象，应当引以为戒和注意纠正的。

在白城地区打坦克演习结束时的讲话*

沈阳军区举行的这次打坦克演习，是按照军委指示办的，是在吉林省委和这个地区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沈阳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很重视，从各级分队的演练一直到最后，军区党委的同志都亲临督导，演习的计划与实施，前前后后都是按预定方案进行的。演习的情况是好的，所有的课题都是按顺序按计划完成了的。所有参加演习的部队和一切人员都很认真很负责任。因此我在这里以军委和总部的名义并代表叶剑英副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以及我们总参来参观的同志，向参加演习的各方面的领导和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所得到的成功，表示深切的慰问和祝贺，并向全体同志致敬和学习。这次演习，最后将由军区以及演习的指挥部进行详细总结。在没有总结之前，我想先来谈谈今后我们在作战训练中应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来和大家研究讨论：第一，要深入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切实联系自己的实际，解决我们战备训练中存在着某些难点和其他思想障碍。当前，在全国和全军范围内学习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的形势很好，许多地方出现了和继续出现着令人可喜的*1975年5、6月间，沈阳军区在白城地区组织了一次打坦克演习。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丰达同志观看了演习，本篇是1975年6月10日，他在演习结束时对部队干部的讲话，未公开发表过，这次经过整理收入本书。新生事物。我想我们军队本身也要好好地研究在我们的战备训练中，那些旧的东西还有没有，林彪的思想影响在我们脑子里存在不存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究竟我们做得怎么样？毛主席又指示我们：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那么我们的训练严格不严格，要求严格不严格，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昨天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有篇文章批评林彪搞取消主义，他搞的那套去武行文，就是毛主席过去批评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搞成了“文化军”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怎么具体地对待这个问题。批判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登在报纸上了，可在我们部队里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消除。昨天报纸上不是说了吗，林彪胡说什么，“打仗嘛，第一枪打不着打第二枪嘛，第二枪打不着打第三枪嘛。”你第一枪打不着第二枪人家就把你收拾了，你打谁啊！最近就好了，在军委常委会上，我们几位副主席、几位老帅也在场，一再地强调，要把部队训练搞好，特别要把干部训练好。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到战争的时候能担起这付担子，使我们部队善于战斗。我们的部队叫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就能担负起我们的任务，正如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的部队要好好训练，训练成能文能武的军队。可是我们有些单位一强调军事训练，就会遇到一些不应有的思想和障碍。例如我们有些单位刚在那里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动员，要搞战备训练，那里就有人出来反对，好像又有人在搞单纯军事观点，实际上那还是林彪那个只搞文不搞武的流毒在作怪。正像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指出的：要注意呀，我们的干部打起仗来究竟行不行啊！能不能指挥自己的单位？老实说，我们干部的军事素质还很低。林彪把军事和政治割裂起来，他说政治可以冲击其它，那么我们就问，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是什么？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要军队干什么？军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嘛！这个柱石的具体工作就是防备敌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把它消灭。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军队有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战斗队嘛，第一个任务完成不了，别的什么任务都完成不了。仗

打不好怎么能够搞好！所以当兵打仗这个本事要搞好。毛主席的教导你不执行你叫什么军队？那么我们军队怎么办？有篇文章里也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未来的战争中要好好地打仗，要把进攻我们的敌人消灭掉。我们都是来自基层群众，都是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那么我们各个部队、各个单位都要发挥自己的职能，都要能想出各种办法，执行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干什么就得像什么，卖什么就得吆喝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是要打仗的，不能打仗还能称得上军队？在这里我们要求所有干部要以身作则，把本职工作搞好，是什么干部就要把什么工作搞好。组织任务本来是服从政治任务的嘛，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治任务，才有战斗行动。我们拿枪的就要把枪拿好，驾飞机的也得把飞机驾好……但我们有些单位不是这样，有些单位的干部，不深入部队，不深入基层，不知道他那个部队究竟装备了什么家伙，这样还行？所以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理论，学了就要联系实际。毛主席一再教育我们全党必须学习军事，准备打仗。那么我们干这个玩艺的，你还不准备打仗？要准备打仗，必须看看我们的干部能不能马上把队伍拉出去打仗，这就要搞好训练。第二，掀起研究敌我情况的风气，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研究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好研究情况这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方法，只有了解了具体情况才能有具体的对策。毛主席说：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嘛。我们的同志首先都要了解敌我情况，有的连武器识别都不清楚，那怎么能当指挥员、怎么去带兵啊？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要研究当前敌人的情况，它的军队装备、训练情况、作战方法，都要研究，不了解敌人，没办法打仗。同样也要了解自己，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处的地形、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我们部队战斗力怎么样？思想状况怎么样？技术水平怎么样？都要研究。这就是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道就不行，没办法对付它。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有敌人的一套办法，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办法，敌人的办法我们要懂，不仅要懂，而且要研究制服它的办法。现在总参、总部有关部门不断发给有关敌人的材料，过去发的范围很窄，我们已经告诉他们了，要转发到团以上的首长。团以上干部必须很好研究。科学是向前发展的，深入研究敌人是我们的本份。

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都有个兵要地志〔1〕，我看很好，有关的

干部要好好看看，知道自己的地盘多大，打起仗来怎么处理嘛。同样要研究我们自己所装备的武器，怎么使用，能不能发挥作用。越是上级机关越是要注意，因为你要组织战斗，哪个武器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哪个装备应该装备什么人必须知道，千万不要马虎。

第三，要从难从严实施训练。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我

们打仗除了从严以外，还要从难，要设想存在着的很多困难。我们强调人的因素，有了人的因素就可以创造条件，可以变不利为有利。比如我们这次演习吧，那天空军说下雨不能来了。你们李司令〔2〕说要风雨无阻。就是要这样。要知道将来作战那遇到的问题可多了，会遇到好多麻烦、好多困难，打仗不是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打的，要准备应付各种不利的气候，下雨、大风、大雪……你以为他那个地方不能来，他偏从那个地方来，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前个时候全军开了一个全军运动会，我们强调把部队身体锻炼好，锻炼得可以忍耐一切和克服任何困难，有障碍可以渡过去，

有不良气候可以克服。在作战的时候，要考虑到有时候有好多东西供应不上来，我们就要像毛主席教导的要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不要唯条件论，唯条件论搞不好就成了唯武器论。

第四，广泛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各种发明创造。

这次演习有好多好东西：比如部队做工事有创造，办法上也有创造；把全省人武干部和民兵骨干集中起来，通过演习集训干部、骨干，也是个创造。要放手发扬民主，大家研究，这好得很。手持式火箭代替手榴弹，打坦克很好，力量很大；迫击炮曲射，还可以平射打无后座力炮弹，是个好办法；八二转膛炮是转轮可以连发，这就不简单，好得很哪。这说明我们解放军战士脑子开了窍，什么办法都可以想出来。如果大家智慧都发挥出来，肯定有很多好创造，要向新的方向发展。第五，战斗文书问题。当前连、排干部都要注意研究战斗文书。比如下个命令，你得写个文书，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你别看那个老一套，是有道理的，脱离了这一套还不行。刘伯承元帅给我们教育不少。我给他当参谋，他每次下命令找我们商量，第一敌情怎么样，第二任务交给哪个部队，第三怎么具体部署，第四其他保障，最后还要看有什么遗漏没有，没有就这样干。刘帅打仗打得好，他一丝不苟，毛主席多次鼓励他。他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每次发电报都要算帐，缺一条也不行，缺了得补上。为此，战斗文书必须好好研究。就像这个图怎么画法都要研究。排以上干部都要会画图，二野有个干部，到一个山头上看地形就画图，用其他左、右邻的图一连就成了个完整的图，无非是山、河、路，只要把方位搞准就行。军人不会识别地图不行。一个是写命令、写通报，一个是画图、识图，都要会。战斗文书，画图，看起来是老家伙，但可不是教条主义，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第六，工事构筑的一些问题。这回看了很多好工事：什么古钱式、梅花式，名堂不少，好！最好把它综合起来用，不要太规律化了，如果都一样就不好了，敌人也可以利用了。这些工事有个好处，现地作业，不用钢材，不用水泥，不用木材，打仗就要这样。不要强调要钢材、木材、水泥，当然有条件用点钢筋、水泥更好，但仓促应急防御就要这样干，应该说有工事就比没工事好。这样的网状阵地，敌人的坦克来到跟前，就得过沟过壕，限制它的快，迟滞它的行动，减刹敌坦克的长处。例如它过工事，肚子翻起来了，屁股朝上了，不是好打了吗。不过不要搞得太制式化了。过去我们在抗战时破路也一样，乱七八糟给你挖，破坏铁轨把路基给你挖掉一边。摆石头块子也摆个乱七八糟的。总而言之，搞工事干什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扬火力、保存自己，另一方面就是迟滞敌人。搞工事一定要因地制宜。如果有可能，给你搞个反坦克地带。要是在南方就好了，几天就挖出水渠来了。同时在阵地当中可以搞些坚固的支撑点、火力点、地堡群，用地道连接起来，可以互相支援，叫敌人没办法。还要在敌人必经之路上搞些坚固的支撑点、火力点，比如一个连的阵地，一个排的阵地，一个班的阵地，坦克一到它也过不来。这回演习大家看到了吧，敌人遇到有工事就不能不转个弯，转个弯就迟滞了吧。有些地方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还能栽木桩，可以灌水搞泛滥地带。有的还可以搞一些假工事，我看我们还好像缺少一招，火力使用上要能使敌人在几百米的一定距离上过早展开，过早暴露。反正要不拘一格、不搞一个样。第七，伪装问题。伪装这个问题很重要，伪装到什么程度好呢？就是要和当地的自然条件一样，靠山就要像山，在荒地上就要像荒地。在朝鲜战场上，一搞伪装就是树枝，大公路本来是黄沙土，可脑袋上都戴个树枝子，在

天上一看就是一个小黑点，很暴露，要搞些适合当地颜色的东西。在越南穿花服伪装〔3〕那是有道理的，在雪地就要穿白伪装衣，和雪一样。解放战争时我们抓的国民党俘虏说，你们头上都戴个树枝子，我们都知道，都看得清清楚楚。夜间也要搞好伪装，敌人夜间要照明，就要研究对付照明的一套办法。这次演习你们有战备伙房，伙房里支了锅、生了火。那打起仗来，不就告诉人家了嘛！白天不准冒烟，晚上下准点火，不准抽烟，还要防空，叫作灯火管制嘛！我们在朝鲜战争时是吃炒面、喝凉水。伪装这个问题很大，这回演习不是有烟幕吗，我看晚上也搞烟幕、白天也搞烟幕，你不管怎么的，叫他看不清楚。这套学问工程兵部队要好好研究，伪装学应该是工程兵管。在紧急情况下，伪装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几种，要把部队练成变色龙一样，到什么地方就适合什么地方，黄羊是黄色的，北极熊就是白的嘛，生物是这样子。我们在战争中讲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战争条件下，我们的工事也是一样，我们还有假工事。包括我们使用的作战器材，都要伪装好，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毛主席告诉我们叫做声东击西，也是这样，你看我在这里，实际上我在那里，你看我向南走，实际上我向北走，叫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去向。第八，我们要充分发挥地雷的威力。地雷是反坦克的有力武器。将来不管是野战军、地方武装、还是民兵，都要研究发挥地雷的作用。这个过去我们有传统，除了铁的地雷外，其他什么的都可以搞，你说是个茶杯吧，一碰就响了，你看是块石头，一坐就响了，门一开就响了，锅盖一揭就响了，这可不得了。美帝国主义说了嘛，对越南的地雷没有办法应付，他对地雷感到很恼火。从这一点看，我们过去对地雷强调得还不够，特别是工程兵强调不够，工程兵不是在研究打坦克的办法吗？过去抗日战争有好多名堂，石头墙也是地雷，把日本鬼子搞得鬼神不安，日本鬼子拿坛子喝水，一抱就炸，应该发挥这个威力。现在炸药包靠人送，人家怎么会叫你挂上去呢，坦克来了，前边有坦克，后边有坦克掩护，还有装甲步兵，像过去那样一个民兵拿起炸药包跑几十米挂起就跑，那怎么能行呢。当然有些地方可以挂，比如敌坦克进到我们工事里，歪歪扭扭出不来时可以挂，但那也是我们在工事里荫蔽起来挂。这要看炸药包怎么个用法。这一点不要忘记历史，毛主席在淮海战役的一个文件中说过：你有你的飞机加坦克，我有我的土坦克。土坦克就是炸药包，这个炸药包是抛射上去的，不是挂上去的，后来用迫击炮也可以抛射炸药包。在淮海战役，我们还用汽油桶把炸药抛上去。黄维兵团拿汽车、坦克作工事，我们就抛射炸药包。敌人有优势的火力、优势的坦克，光挂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得想办法，抛射炸药包，再加上过去那些办法，用各式各样的雷，石头雷、坛坛罐罐雷……把敌人搞得鬼神不安。第九，协同动作和保障工作。现代装备条件下，协同动作很要紧。现在不仅是陆海空军协同动作搞不好，就连陆军本身一个单位自己的前后也联不好，必须要好好改进。最近我们通信工具有些改进，但不多，还要研究，有些还是不通。通信部队最好研究出些新东西来。此外，除了政治工作保障，主要的战斗保障外，还要着重研究其他保障。这次演习，必不可少的东西还是要用，当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勤俭，在勤俭办事这个基础上，应该用的还要用，不要抠得过死。因为平时训练当中多花一些代价，打仗时候可以少花，平时多用些弹药把兵训练好，打仗时候可以一枪打死一个敌人，可以一炮打毁一辆坦克。所以说应该用的必须保障用。这回同志们不是提出来了吗，炸药用得多了一点，多一点就多一点嘛，为了显示效果，要逼真嘛，这还是可以的，不要过量，

必要的要搞好，这个我们要求有关部门要给予谅解，不要抠得太死。这次我们有些部门提出来，训练器材、训练弹药等，这都可以想办法满足。我们回去研究一下，搞些必要的保障，训练器材就是为了打仗。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有时还组织司令部、政治部、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都来一个人投一颗手榴弹，有的人怕得很，投了以后就好了，这能用多少手榴弹，就是一人投一颗嘛。所以我们的军训部门、供给部门都要注意，不要浪费，但在不浪费的前提下，必需的要保障。第十，谈谈技术上的问题。一个是统一军语〔4〕和标号，一个是战斗文书问题。在北京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录像，有些地方就不大统一。例如做工事，工事里面有个墙叫隔墙，隔墙就不符合军语，你们工程教范上叫做横墙，不叫隔墙，当然隔墙也知道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统一，各地的训练就不好统一。又比如，迫无炮，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昨天一看就是既能曲射又能平射的炮嘛，那么你把它叫做曲平两用 82 炮不行吗？迫无就是无，那就没有了，所以还是叫曲平两用好，这样统一，大家都能懂。还有，比如这次用枪射出去的那个火箭，叫做“枪口火箭”，我找了几个有学问的人商量商量，过去我们不是有掷弹筒吗，我们说这就叫“枪掷小火箭”好了。再一个要注意的是参谋业务、战斗文书。应该把军语、标号统一起来。敌人一律用蓝的，我们一律用红的，这个世界上都一样，希望今后把战斗文书统一起来。军队标号，不论是画还是写，我军都是红的，敌人都是蓝的，不然又是蓝的，又是黑的，晚上看都看不清，搞得不好弄乱了。拿刘帅的话说：“马上搭展，两股分明。”你看这个图，红里有蓝的，蓝里有红的，敌我不分，叫人看不懂。我们的作业是要看的，要看出我们的部署、行动企图，搞不好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参谋业务在这方面来说要赶快改正。军科出的军语、军队标号也是这样，要把它统一起来。第十一，发挥文艺工作的作用，推动战备训练。我们的文艺工作应该有很好的战斗性，可以推动我们的工作。昨天看到白城文工团演的《队长不在家》，就很好。可我们文工团演的打坦克都是用炸药包，不顾坦克与装甲步兵的相互掩护，与现今的坦克比速度，个人抱着炸药包追赶坦克，爬上去挂炸药包，那是在宣传落后的东西。军队的文艺部门要和作战部门、军训部门很好地协同起来。做文艺工作的，就应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深入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要有群众语言，要有足够的生活气息。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了解我军建军的原则，要搞好军人仪表，演的时候要能体现出来。军事科学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的，文艺演出宣传的东西也要跟上时代。今天我谈这些东西，是演习的结果对我的启发，提出来与大家共同研究探讨。这次演习好，提出了好多问题，希望大家回去后好好研究，如何在继续执行战备训练中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注 释〔1〕兵要地志：即根据某一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气象、水文等现实和历史情况，综合编制成的军事地理资料，主要供战场准备、军事训练、拟制作战计划使用，通常分为区域兵要地志和专题兵要地志两种。〔2〕李司令，指李德生同志，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3〕指迷彩服。〔4〕军语，即军队作战和军队建设中常用的统一、规范化的语词。

在参观新疆军区师进攻战术演习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正当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时候，我们这次新的核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利用这次核试验进行的战术演习，也成功地完成了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光荣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我们全体参观学习的同志，都取得了新的经验和体会。我代表三总部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向参加战术演习的全体指战员，向全体参观学习的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祝贺！对这次试验和演习给予大力支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表示感谢！这次核试验，是毛主席生前亲自批准的。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对加速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打破核垄断，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丰硕成果！新疆军区结合核试验组织的战术演习，是个新课题，这在全军来说还是第一次。演习所取得的成果，对我们今后搞好战备训练，*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达同志顶着压力，支持新疆军区按原计划实施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师进攻战术演习。本篇为1976年9月30日，李达同志在新疆某地对参观这次演习的部队干部发表的讲话。落实战备，加强部队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大家看了核试验，参观了演习，听了介绍，都有启发，学到了不少东西。昨天上午，高师长〔1〕的汇报很好，很全面，很实际，这是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这对我们进一步探讨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很有帮助。这次演习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演练和研究的内容比较突出，演练的方法比较实际。各级党委对演习工作很重视。领导干部精神面貌很好，都能深入实际，摸爬滚打，和部队同甘共苦，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演习部队涌现了大批的好人好事，几个月来，广大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唐山、丰南灾区人民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头顶烈日，脚踏戈壁，战酷暑，斗风沙，克服困难，刻苦训练，认真钻研。有的战士几次晕倒，醒过来以后还继续坚持演习，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核爆以后，所有演习部队，勇猛直前，通过爆心，充分显示了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演练中，贯彻了毛主席“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练了机关，练了部队，练了指挥，练了协同，经受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干部、机关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促进了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结合演习，集训了干部，编写了教材。总后勤部、有关军兵种，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研究。铁道兵、总参防化部、空降部队，都组织干部参加了实际演练，取得了较好成绩。现在我根据这次演习，结合全军战备训练工作情况，着重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是我军作战、训练的行动指南。这次核试验和战术演习，同志们积累了一些资料，摸索了一些经验，这对我们研究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很有好处。原子弹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和可防性。原子武器使用于战场，情况复杂了，要求高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但必须看到，原子武器并不能最后解决战斗，不能改变战争的客观规律。毛主席说过，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次演习，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视了对原子武器的研究，加强了防护措施，充分利用原子突击效果，采取

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法，迅速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完成分割和歼灭敌人”的任务。实践证明，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还是要靠近战、夜战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靠人的勇敢精神，靠步兵最后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不断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切实提高各级干部、机关的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第二，进一步加强战备训练。加强战备训练，是落实战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必须认真抓好。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加强战备训练，全面落实战备，对“三北”〔2〕和新疆军区部队来说，就更为迫切，更加重要。近年来，全军训练工作是在不断前进的。战备训练，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不断缩小训练同实战的距离，在近似实战条件下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次参加演习的所有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围绕战术课题，认真抓了技术、战术和专业基础训练，搞了分练，又搞合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近似实战这个问题上，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方法是对头的。这样的训练时间短，针对性强，符合实战要求。要加强基础训练。要搞好单兵、单车、单炮、单机、单舰等等的基本技术和操作规程的训练。各行各业都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要针对现代战争大量使用坦克、飞机和空降兵的特点，进一步搞好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的技术战术训练，着重研究打敌集群坦克的办法。在搞好基础训练的前提下，搞好野营拉练，搞好首长机关演习和实兵战术演习，特别要搞好结合拉练的检验性演习。这次演习部队戴防毒面具演练两三个小时，开始有些同志不适应，经过锻炼好多了。说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没有健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因此，要注意体育训练，增强部队体质。

要加强干部、司令部训练。这次，演习部队集训了干部，培养了骨干，加强了参谋人员的训练，为搞好演习打下了良好基础。干部、司令部能否实施坚定正确的指挥，是取得战役、战斗胜利的关键。为此，必须加强干部、司令部训练，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训练。搞好组织指挥和专业训练，并注意对敌情的研究，特别是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的研究。要按照敌人的战术，设置敌情，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合成军队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军兵种的特点和运用原则。军兵种各级干部，也要懂得合同战术，要按照战术情况，练技术，练战术，练指挥。各级干部在学好本级战术的基础上，要熟悉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提高自己和司令部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水平。要加强军队院校的建设，加强各级教导队的领导，注意培养骨干，增强他们带兵、练兵、用兵的能力。

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问题的研究。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火箭核武器和飞机、坦克等使用于战场，对我军的战备训练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有不少干部对原子武器性能不了解，提到战术上来研究也很不够。因此，我们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问题的研究，掌握原子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既要研究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办法，又要探讨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作战行动。这次演习部队，在疏散配置、荫蔽伪装、简化指挥程序、精简战斗文书、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等方面，都研究和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办法。各军区、各军兵种，可以结合作战任务，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问题的研练，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逐步提高部队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能力。要认真贯彻勤俭练兵的原则。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执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精神，广泛开展

勤俭节约、勤俭练兵的活动，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今年的年度训练，时间不多了，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各部队要加强领导，妥善安排，抓好落实，努力完成今年的战备训练任务。第三，加强研究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的政治工作。这次，演习部队遵照我军的一系列政治工作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针对使用原子武器后部队的思想实际，采取小群分散的办法，发动群众，人人做思想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探讨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供了初步经验。从这次演习看，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给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的政治工作，不断适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第四，认真研究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后勤物资消耗大，救护任务繁重，后方运输补给困难。针对这些特点，参演部队研究了后方组织指挥、运输、供水、供油、战场救护和在沾染区野炊等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他们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研制了汽车排气管做饭箱和简易塑料储水他等多种多样的办法，解决了一些问题。在原子条件下作战，战场情况变化急剧，战斗更加激烈，怎样搞好后勤保障工作，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都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适应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的需要。这次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尽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回去以后，要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认真进行总结，把感性知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上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一些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经验。现在写出的教材和材料，花了不少功夫，还要和部队的演习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用部队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认真加以充实修改。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次所发出的材料和高师长的汇报很好。各大单位回去后，应组织力量研究修改，并告新疆军区，以便汇整加以完善。这次演习，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科、军大，以及国防工业部门都来了一些同志，大家都看到了部队在技术器材、武器装备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各有关单位应引起重视，认真研究，提出意见，逐步解决。同志们，毛主席的逝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在怀念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加强战备，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切任务。注 释〔1〕高师长，指高焕昌同志。当时高焕昌同志所在的师承担了师进攻战术演习的主要任务。〔2〕三北，指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伟大的历史转折*——学习毛主席《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30年前的今天——1947年9月1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总结解放战争第一年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这就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主席还亲自规定了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为全国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方针，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出动，接着，全国其他各战场也相继展开了外线进攻，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使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全国人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历史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全国胜利的道路。今天，正当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时候，重温毛主席的这篇重要文献以及这个时期的其他著作，回顾毛主席指挥我们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战斗岁月，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本篇为李达同志1977年夏应《解放军报》约请而作，署名为“吴浩”，发表于1977年9月1日《解放军报》。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和解放台湾的胜利，具有很大的意义。

—

1946年6月，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怂恿下，以其优势兵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疯狂叫嚣要在3个月至6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毛主席高瞻远瞩，不仅作出了中国人民必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英明预见，而且早就考虑到人民解放军必将迅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早在1946年10月，还在蒋军向我大举进攻的时候，毛主席就深谋远虑，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做好转入战略进攻，向中原出动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经过第一年艰苦卓绝的内线作战，歼敌正规军248个旅中的97个半旅，连同地方团队，共计112万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深刻的失败情绪，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是：在北线，即东北、华北战场，敌人已处于被动状态，我则继续发动攻势。在南线，即西北、华东和晋冀鲁豫战场，敌人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其主力深深陷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这种形势，很像一个哑铃，重点在两头，其中央的“把柄”就成了易被敲断的薄弱部位。在敌战略纵深，兵力更是空虚。总之，整个军事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在所有解放区，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生产，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后方空前巩固，使我们获得了足以战胜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我们党所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基本口号的群众运动，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高潮，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战争仍在解放区严重进行，敌人在数量上、装备上仍占优势，还有相当兵力可以用于战略机动。我解放区经过一年的作战，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和摧残，如果我军还不打出去，虽然在内线仍然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人力、物力、财力都会渐渐消耗殆

尽，很难持久下去。这就正中蒋介石反革命战略的奸计。基于上述条件和形势，毛主席断定中国正处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人民大革命的前夜。毛主席以无产阶级伟大政治家、军事统帅的革命气魄和雄伟胆略，毅然决定人民解放军迅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为了保证这一战略任务的胜利实现，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陈毅、粟裕等同志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等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陕鄂边的伏牛山地区。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纵横驰骋，逐鹿中原。两翼牵制是：西北野战军出击陕北榆林，进一步调动敌人北上；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敌人引向海边，密切配合上述三军的行动。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预定计划转入了进攻。经过周密准备，一举突破了敌人所谓可以代替“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9个半旅，敲断了哑铃的“把柄”，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为了不失时机，毛主席、党中央立即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远离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广大干部战士听到毛主席这个指示，群情激昂，信心倍增。虽然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大批解放战士没有来得及训练，向南进军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还未充分做好，仍提前于8月7日开始行动。我十几万大军不顾敌人前堵后追和飞机轰炸，不顾炎热酷暑和滂沱大雨，不顾种种艰难险阻，浩浩荡荡地分数路横跨陇海铁路，涉越黄河泛区，渡过沙河、涡河、颍河、洪河、汝河、淮河等河流，向大别山挺进。宽达40里的黄河泛区，遍地积水淤泥，浅则没膝，深则及脐，人员车马稍不留意，就有陷进去拔不出来的危险。为了和敌人抢时间，我军所带火炮、辎重改用牛拉人推，有的干脆拆开用人扛。就这样，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胜利地通过了黄河泛区。当时，由于我军行动神速，严守机密，敌人始终摸不清我战略意图，直到我军突过沙河，矛头直指大别山，才有所察觉。当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和一个纵队刚到汝河北岸时，敌人急忙调了一个师和一个旅，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抢先占领南岸一些渡口，并在其空军配合下截断我去路，而尾追的敌人3个师仅距我五六十里的路程。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临汝河前线指挥，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号召，要求大家坚决打过河去。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从敌人层层封锁的阵地中杀开了一条血路，这是我军跃进大别山途中成败攸关的一场战斗。

经过21天的连续行军和艰苦奋战，在战胜敌人屡次追击堵

截、克服重重自然障碍之后，我军终于先敌进入了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此时敌人如梦初醒，妄图重新调整部署阻我前进，但是为时已晚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进攻样式，既不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不要后方的流动作战，又不是北伐战争时期那种逐城逐地的推进，也不同于我军在内线作战时依托根据地打运动战，而是远离自己的后方，对敌作釜底抽薪的长驱直入，在敌战略纵深内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是毛主席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的伟大创举。只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经得起这样的严重考验，创造出这样的

历史奇迹。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挺进豫陕鄂，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调动了大量敌军回援。接着，西北、华东、晋察冀、东北各野战军都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二

毛主席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时，既指出了有利的条件，又指出了可能遇到的困难，曾经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从最困难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地势极为险要。我军主力进入大别山后，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犹似一把利剑插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引起敌人一片惊慌，乱了阵脚。蒋介石为了竭力守住中原这块地方，急忙从各战场先后调集 33 个旅的兵力，连同原有守备部队和地主武装，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和残酷“清剿”，妄图把我赶出这一地区。这样，大别山区便成了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围攻与反围攻、“清剿”与反“清剿”，便成了当时斗争的主要形式。大别山斗争的特点是：（一）无后方依托的大兵团山地作战。从全局上、战略上讲，敌处于内线的防御地位，我处于外线的进攻地位。就大别山这个局部来说，敌仍能集中一定优势兵力进行战役性的进攻，我是外线中的内线，进攻中的防御。（二）敌情相当严重，环境很不安定。敌人政权尚未摧垮，保甲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武装极为猖狂，还在明里暗里威胁和控制群众。（三）群众对我能否站住脚跟，还有疑虑。大别山区是红军老根据地，我军退出后，当地人民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这次我军初到，干部数量较少，情况又不熟悉，与群众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四）广大干部战士从北方到南方，各方面很不适应。不习惯走稻田埂、爬高山、走小路，不习惯炎热的气候和连绵阴雨。为了行动的方便，部队不得不把重武器埋藏了起来。（五）我军供应和伤病员的安置非常困难，有时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很难保证。特别是十几万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御寒棉衣还没有着落，需要就地自行解决。总之，这一切与根据地内线作战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更增加了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给部队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为了捕捉战机，多打胜仗，必须灵活地运用兵力，随时掌握部队的主动。根据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示，我军一方面分遣部分主力，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和随军南下地方干部一起，建立区以上的党政机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人民武装。一方面集中大部兵力，形成拳头，寻机歼敌，把兵力的分遣和集结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实施转辗机动的作战过程中，根据敌情变化，还采取了以小对大或以大对小的作战方法。敌集中兵力向我合击时，我分派小部队箝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远离敌主力，随时保持机动；在敌被迫分散、暴露弱点时，我则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同时，提倡多打小

的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大量地消灭敌人。例如，1947年10月初，我向皖西挺进的部队，抓住敌合击尚未形成的空隙，以一部箝制敌3个师于安徽六安以北，集中兵力将运动中的六十二旅全歼于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毙伤俘敌4000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的胜利。又如，我出击鄂东的主力部队，适时抓住敌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孤军来追的有利时机，于湖北广济的高山铺附近，集中了10个旅的兵力，回马一枪，不到两昼夜，就把该敌12000多人全部歼灭干净。张家店和高山铺战役的胜利以及内线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斗争的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信心，胜利完成了第一次战略展开。当敌集结重兵对大别山区展开大规模围攻时，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大别山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配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坚持现地斗争，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向平汉、陇海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调动和分散大别山的敌人，直到粉碎围攻为止。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同样采取了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即在敌人集中兵力向我合围时，我主力适时跳出敌合击圈，把敌拉到外线，以分散调动敌人。当敌人被我拉到外线后，我就千方百计地把敌拖住，使之不能回顾，减轻内线压力，既便于内线的反“清剿”斗争，又便于我在外线开辟新的地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使敌人无论是集中围攻，还是分兵“清剿”，都遭到了惨败。与此同时，我南线三军密切协同，在中原广大地区实施了第二次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等同志率领的部队向平汉、陇海路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大量歼灭了敌人。经过几个月的英勇奋斗，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豫陕鄂和陕南建立了6个军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华东野战军发展和巩固了豫皖苏根据地。从此，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完成了面的占领。三路野战大军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创建新根据地的另一个关键是积极做好群众工作；而要把群众争取到我军方面，就必须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毛主席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为了积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反复向群众宣传我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反复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表明我军创建中原根据地的决心。其次是抽派大量干部作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同时，部队每到一地，大家都抢着帮群众挑水、扫地、打柴，慰问红军和烈士家属，并注意尊重人民风俗习惯。军队和群众亲如一家，群众称赞说：老红军又回来了。实行土地改革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在新解放区，在相当的时期内，首先是进行清匪反霸斗争，有步骤地摧毁保甲制度，消灭土顽武装，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实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合理担负的财政政策；同时，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争取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团结教育他们参加反对美蒋的统一战线。这样做，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地主富农多出钱粮，社会财富不致迅速分散，

社会秩序又较稳定，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基本任务。由于我军多打了胜仗，反复进行了宣传活动，正确执行了政策、纪律，所以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深信我军在大别山区能够站稳脚跟。在艰苦激烈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我军，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解决粮油柴草，筹借棉花布匹，帮助我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军民共同努力，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

三

大兵团跃进进敌战略纵深创建新根据地，立足生根，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斗争。因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和领导机关，始终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当时敌情严重、战斗频繁和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各部队十分重视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创建中原根据地的伟大意义，敢于战胜无后方作战的各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讲解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形势，说明坚持大别山斗争和战争全局的关系；提倡顾全大局，勇于挑重担子，不怕啃硬骨头的精神，反对害怕艰苦、畏缩不前的右倾情绪；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言传身教，和战士一起抬伤员，运粮弹，打草鞋，发动大家自染、自裁、自缝棉衣。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了部队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荣誉感，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解放整个中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非常重视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特别是在毛主席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作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后，他们亲自深入部队讲话，督促检查，严格要求部队自觉遵守。他们反复强调：党的路线、政策，在军队中人人能够做到和必须做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实际上就是执行我军的三大任务。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做群众工作集中成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解决经济问题集中成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实际上就是执行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如“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是争取群众的政策；“买卖公平”是工商业政策；“不虐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等等。各部队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地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高度来对待，作为每个革命军人够不够格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斗争越是艰苦，越能显示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部队普遍注意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经常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关心战士疾苦。发扬民主作风，有领导地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及时发现群众提出来的好主意、好办法和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加以总结和推广。开展诉苦运动，发动新战士、老战士和解放战士一起回忆诉述受反动统治、地主压迫的苦，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对人民的热爱。在这一基础上，部队开展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根据群众的创造，进一步推广了王克勤团结互助运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关心。掀起了勤学苦练杀敌本领，准备为人民立功的练兵运动新高潮。同时，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了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及时性和灵活性，保证了作战、训练等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毛主席提出的我军到国民党区域

作战争取胜利的两个关键：多打胜仗，争取群众，好像是车子的两个车轮；而推动这两个轮子的原动力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指战员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我军越是认清了自己的政治任务和光明前途，斗志越强，信心越高，与群众的团结就越紧，消灭敌人就越多，革命的车轮也就转动得越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胜利，是毛主席

伟大战略决策和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毛主席人民战争、人民军队思想的光辉胜利。重读毛主席《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这篇重要著作，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战略决策的英明伟大。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准确地完整地领会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把这个克敌制胜的革命传家宝，世代地传下去。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大的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学雷锋学硬六连的群众运动，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为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军队而奋斗！

悼念任弼时同志*

我于接获任弼时同志逝世的噩耗之后，顿如失所凭依，不禁为之失声！弼时同志对我的培养教育，我永远铭记在心，我永远按他的指示精神，为党、为祖国、为军队而努力工作。弼时同志由 1933 年到 1936 年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者，他以马列主义所完全武装了的政治家的风度与领导艺术、优良作风，给我的教益和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在指导战斗问题上，弼时同志完全是运用着马列主义的方法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在他的领导下，无论红六军团与红二方面军，在保卫与创造革命根据地上都获得应有的成果，特别是在两次的长征中〔1〕，他以杰出的艺术手法，领导红军到处都在玩弄着敌人，而没有被敌人所玩弄，因之红六军团与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史上，是写下了光荣灿烂的篇幅的！对一般的政策指导上，他是始终适应情况，完全正确的，故在他领导的湘赣边区的后期与湘鄂川黔边区的整个时期，无论红军及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它良好的成就。在领导作风上，弼时同志始终是循循善诱、不急不躁，经常以自身冷静的头脑与不断说服的精神，来启发教育和扶持被他领导的同志，并善于将各方不同的分歧意见，纳诸正确的道路。尤其要紧的，就是弼时同志最善于运用他的领导艺术来处理党内斗争问题，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叛徒张国焘曾不断阴谋*本文写于 1950 年 10 月 29 日，发表于 1950 年 10 月 31 日《新华日报》。分裂红军，打断二方面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直接关系。而弼时同志则一方面坚持原则教育着同志，一方面又以他的领导艺术与张国焘进行着不调和地、但又避免破裂，使他（张国焘）不感受特殊刺激的尖锐斗争，终于使红二方面军得到了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并使二方面军全部和四方面军的一部亲密和谐地达到与一方面军会合的目的。总之弼时同志的一切都可作为全党全军尤其是个人的榜样，我过去在受他的直接领导时，随时都在学习他的一切，今后我将永远学习他的一切，以期“补偿任弼时同志逝世所造成的损失”于万注 释〔1〕两次长征：1934 年 8 月至 10 月，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从湘赣苏区出发，转战 5000 多华里到达黔东苏区与红二军团会合，这在红六军团的历史上称为西征或第一次长征。1935 年 11 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一起，自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进行了为时 1 年、行程 20000 多华里的长征，在红六军团的历史上又称第二次长征。

我党我军一英才* ——纪念左权诞辰 80 周年

今年 3 月 5 日，是左权同志诞辰 80 周年。左权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英才。每当我想起他的卓越贡献，想起他对我的指导与帮助，想起他正当年富力强就为抗击日寇血洒太行之时，他的英姿就呈现在我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一)

左权将军是湖南省醴陵县人。早年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随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于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品学兼优，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曾和邓小平、杨尚昆、吴玉章、刘伯承、廖承志、蒋经国、屈武等同学。1930 年他归国后即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宁都暴动后，左权被派到红十五军担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是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手枪旅”基础上组建的，当时，我在“手枪旅”任职。那时左权虽然很年轻，但知识渊博，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我们一二九师奉*本文 1986 年 5 月 25 日定稿，发表于 1986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命开赴太行山区。不久，八路军总部也迁来太行山。左权经常来我们师，我也常到总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在苏联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中，左权是比较年轻的，刚刚二十出头，而刘伯承则已经是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但他们是忘年之交。当时左权是很用功的学生，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他总是一一研读。由于他读书多，理解能力强，记忆力也极好，无论是进行政治还是军事测验，他答题时都能旁证博引，成绩优秀。苏联教官对他非常器重，经常称赞他。1930 年，左权和刘伯承一同回国。刚刚入境东北，刘伯承就被日本密探盯住了。左权不顾自己安危，机警地帮助刘伯承脱险。刘伯承曾说：“左权对同志真诚爱护，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二)

左权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了 5 个年头。我作为一二九师参谋长，能够直接接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刘、邓首长的领导，又能领受到左权副参谋长的具体指示和帮助，得益非浅。记得 1938 年冬，左权主持召开晋东南参谋长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对司令部各部门应设机构和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做示范。说左权是八路军司令部业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是毫不夸张的。在我八路军连战皆捷，取得了平型关等多次重大胜利之后，左权极为振奋。他以这些战例为依据，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总结经验，写出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等军事论文，对我军如何适应敌后作战的形势，顺利地转入游击战争，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八路军总部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大都是左权主持的。我曾翻阅过当年一二九师《阵中日记》，这里边记录了大量由左权起草或阅改的命令、指示和通报等，多者每日可达数千字。由此可知，他的工作效率是多么高！他的警卫员曾说：“每天晚上，别人都睡下很久了，我还见他在办公桌上写东西，要么就是看书。有时我一觉醒来，天快亮了，还见他端着灯在看地图。”由于过度操劳，左权的身体越来越差。伯承和小平同志都嘱我好好照顾，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但是，左权知道我们穷得很，坚持不要特

殊照顾。他说：“给我加个炒粉条，就算是美餐了。”说到太行山的艰苦岁月，我还记起在大生产运动初期的1942年，左权就预见到大旱灾将来临。在他的启发下，我提出了一个在清漳河和浊漳河畔帮助群众修筑、垦殖1000亩河滩地的计划。左权和刘、邓首长批准了这个计划。左权还安排总部直属队和我们一二九师一同施行这一工程。左权除带头参加修筑河滩地的劳动之外，还组织总部直属队种了蔬菜。这位太行山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亲手播下了种子。可是，当这些种子结下累累硕果时，他却长眠在清漳河畔！

（三）

左权将军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抗战五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凡是经历过抗日烽火的人，都会想到百团大战。这次震惊中外的战役，其主要计划、组织、指挥者就有左权。1940年7月中旬，左权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师部，同刘、邓首长谈了彭总关于准备打一次大的交通战的设想。我当时也在场。听他的介绍，我意识到他已经把这次战役的方案考虑得比较具体了。他很虚心地征求了伯承、小平同志的意见。回到总部后，他按照彭总的交代，很快就起草了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左权主持起草，由彭总审阅签发的。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战役的发展情况，协助彭总指挥作战。正太战役尚未结束，左权就在9月2日写就了长达四五千字的《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分析得既全面又精当，实在令人惊叹！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次‘百团大战’，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大会战”，“这一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华北的八路军已经生长发展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撰写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胜利》一文，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发表。百团大战后，日寇发起了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左权多次嘱托我们多向他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他依据各师的作战经验和大量情报资料，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日军的“治安强化”和“蚕食政策”，撰写了《“扫荡”与反“扫荡”》、《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颇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军事论著。他还抓紧时间钻研苏联的军事科学，一收集到苏联的书报，必给刘伯承写信，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他曾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为了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自己的武器弹药问题，左权创建了黄烟洞兵工厂。这是太行山区最大的兵工厂，不但生产“太行造”的步枪，还生产炮弹、七九步枪和掷弹筒。日寇在1941年冬季进行大“扫荡”时，把黄烟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左权指挥总部特务团，以不满千人的兵力，与5000顽敌血战8昼夜，歼敌千人，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6比1的最新纪录。日寇在太行山“扫荡”多次，一直没有找到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遂抽出精兵，经过特殊训练，组成专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捣毁我首脑机关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化装成八路军，夜行晓宿，偷袭我总部和我师部驻地。这就是日寇对太行山区发动的1942年夏季大“扫荡”的“前奏”。负责寻找总部的益子挺进队，发现了正在转移的总部机关。但他们误以为是一二九师师部，立即通知日军主力赶来包围。左权是负责指挥总部直属队的，当他得知被敌重兵包围之后，迅即同彭总、罗主任〔1〕制订了详细的突围方

案。当时，我们也正在同企图“围剿”的“挺进队”和几路日军周旋。到了5月24日晚，总部的电台呼叫不到了。一直到28日才恢复联络。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左权为指挥后勤人员突围，于5月24日下午4时，在十字岭被日寇的迫击炮弹碎片击中，壮烈殉国。我把这份电报呈给伯承同志看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许久不能言语。我们所有接触过左权将军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当时他只有36岁。为了迷惑敌人，我军推迟了半月余才发表消息，宣布左权将军6月2日牺牲。为了永远纪念他，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请求，山西省辽县被命名为“左权县”。美军观察组的一位观察员曾经向我问起左权牺牲的情况。我对他说，他是我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左权的死说明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始终是站在最前线指挥战斗的。左权将军离开我们44年了。他为中国革命，为我军创建，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革命胜利，身先士卒，浴血奋斗，不求功名，不图享受，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左权同志时应该永远学习、永远记取的。

注 释〔1〕罗主任，指罗瑞卿同志，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缅怀张浩同志*

张浩〔1〕同志是我党较老的革命家，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对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有过重要贡献。1937年至1938年初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年多，对这一点感受很深。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西渡黄河过程中被胡宗南的军队截断。这样，红四方面军被一分为二，已过黄河的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同敌人奋战。1937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闻西路军危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为基础，加上红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四个军组成援西军。由于援西军任务艰巨、形势紧迫，党中央决定派军事、政治强的在我党我军有威望的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宋任穷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援西军成立后，首脑机关就驻在中央附近。司令员、政委成天忙着军队建设和准备开赴前线的工作。但是不幸得很，在我们出发之前，得到了西路军大部被歼的消息，使大家很震动，很难过。“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停止内战，和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颁布命令，将我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这是李达同志1982年3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张浩逝世40周年

座谈会上的发言，后经整理，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张浩纪念集》。

3个师。我们援西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治委员。后来一一五师、一二师和我师先后开赴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的活动基地主要在太行山。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调回党中央。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当时正是我党我军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由反“围剿”变为抗日。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新任务，这需要强有力地引导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张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适应了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根据我的回忆，张浩同志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第一，教育部队认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危害，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作斗争。由于援西军和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浩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特别注意政策界限，防止扩大打击面。他明确指出：分裂中央的责任不在广大指战员，而在张国焘。同志们只要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进而指出：我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多大，人多枪多，也不能同党闹独立，教育指战员要加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他还用许多生动的事例来剖析张国焘路线的危害，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从而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第二，引导指战员把阶级恨变为民族仇。当时部队有不少同志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思想不通，特别是对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更是反感。有的同志说：“成天打白狗子，现在自己变成了白狗子。”有的说：“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的父母，现在同他们合作办不到。”有的甚至闹着要回家不干了。张浩针对上述思想问题，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解释工作。他从国内外形势出发，进行矛盾分析，说明当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只有团结全国人民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才有阶级解放可言；否则工人阶级要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他号召大家顾大局，识整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先报民

族仇，再解阶级恨。他还搜集许多有关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杀罪行的画报，让大家看，以激发民族感情，决心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雪恨。经过张浩的解释工作，部队求战心切，士气高昂。第三，明确以打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作战的问题上，由于当时毛主席的著作还未下发，刘师长和张政委对日军的技术装备及其战略战术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认为日军不论在装备上、技术上、战略战术上和战斗作风上都比内战时的对手强的多，加上他们又有武士道精神的训练，用内战时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办法去对付日本侵略军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善于打大战打恶战，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喜欢死打硬拼，搞不好很容易上当。因此，要强调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以游击战为主。基于这种情况，部队到辽县以后，刘师长和张政委就决定办起游击训练班，训练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并亲自讲课。讲如何打游击，如何发动群众，如何组织民兵和自卫队，等等。游击训练班分期分批地进行，学员毕业后就带队到各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开展游击战时，既反对只游不击，又反对只击不游，坚持游而避实，击而就虚。因而，部队发展很快，打了不少胜仗，如打阳明堡飞机场，就是用奇袭的办法，击毁敌机 24 架，而部队伤亡很小。第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浩和刘师长在提高部队觉悟和作战能力的同时，还特别注意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靠军队不行，要靠全国人民才行。因此要反对关门主义，搞好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例如，我们在甘肃镇原县时，不仅群众拥护我军，国民党地方官吏、镇原县的县长郑建民先生也对我们很友好。部队的给养他们都帮助解决。到了山西辽县时，我们同地方政府和群众更是鱼水相依，亲密无间。张浩给人的印象是对政治非常敏感，严于律己，并能做到身体力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虽然时隔几十年，还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一二九师在出发前，蒋介石利用高参乔茂才同刘师长的旧关系，送来了一道手令，让我师去石家庄方向同日军正面作战，企图切断一二九师与一一五师、一二师之间的联系，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张浩一看就说：“这是借刀杀人计。”他与刘师长商量后，决定刘师长不出面，让我去周旋，把乔打发走了，坚持了我军的独立自主。第二件事，我们在三原县石桥镇誓师抗日时，因为当天下雨，陈赓同志和我建议延期举行。师长、政委都不同意。师长说：“部队要风雨无阻。”政委说：“不能朝令夕改。”开会时，雨越下越大，他们全淋透了，仍然像挺拔的劲松，巍然挺立在检阅台上。警卫员给他们送雨衣，他们不仅不穿，反而批评了警卫员。说明张浩和刘师长是严于律己的，要求部属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张浩同志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坚决而认真的，因而对一二九师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建树贡献很大，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后来，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发展更加迅速猛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缅怀张浩同志，就要学习他的思想和品质，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注 释〔1〕张浩（1897—1942年），湖北黄冈人，原名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归国后先后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常委，海员总工会书记，中共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2月任红军援西军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

二九师政委。1938 年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

记蔡树藩同志二三事*

我和树藩〔1〕同志在一起工作达5个年头之久，就是从1939年到1943年同在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一二九师，共同坚持太行山和晋、冀、豫区的敌后斗争。我们相处的时间，正是艰苦复杂的战争年月，在这些岁月中，树藩同志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优良品质和崇高风格，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不幸得很，他竟因飞机失事而与我们水别了。蔡树藩同志在工作中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在我们进入敌后抗战的开始几年中，由于斗争情况非常残酷，我军的任务特别艰巨，部队必须成排、成班，甚至以两三个人为小组分散到晋、冀、豫广大地区作广泛的游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和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遭到敌人的捕灭或瓦解。树藩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特别明确而深刻的。他紧紧依靠党的北方局和师党委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加强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特别注意，做到了即使是两三个人活动的游击小组，也必须按时过组织生活，并经常地检查他们对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执行的情况，使我们的部队即使在异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胜利地完成党所给予的坚持敌后斗争、武装人民、扩大与巩固根据地等任务。部队本身在政治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蔡树藩同志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本文是李达同志

1958年10月下旬写的悼念文章，发表于《中国工人》1958年第22期。

有的同志在1939年离开一二九师，过两三年后回来时，就感到这个部队在政治上有了出人意外的巨大进步。

树藩同志在工作中一直坚持党的原则，与一切不符合党的利

益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时我们军队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部队中少数人员或个别单位在一定场合下，发生某些违犯纪律等不合党的利益的事情是在所难免的，但树藩同志坚决维护党的原则，除政治领导机关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提高全体人员的阶级觉悟，严格防止发生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外，他对于偶尔违犯党的利益的少数人员或个别单位，也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决不姑息。例如发现有个别在敌占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执行对敌占区的政策不够彻底，树藩同志就及时严格地进行纠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部队能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亲如家人。形成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在树藩同志身上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坚持对

敌斗争。1939年到1943年，日寇一方面不断实施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把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分成格子网，来分割和限制我们的活动；一方面又不断以“牛刀子战术”和“梳子队形”对我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并实施其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们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在这种残酷斗争的情况下，树藩同志表现了他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除了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外，并坚决地领导各级政治机关，组织了许多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加强斗争，破坏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敌人对我基本区的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树藩同志每次仅带领着很小的战斗分队，掩护着太行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等机关进行转移的斗争。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每次都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完成掩护党政机关安全转移

的艰辛任务。树藩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与战胜困难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发给真正抗日的八路军的军费，而日寇又对抗日根据地不断以恶毒的“三光政策”来进行“扫荡”和摧毁，加上我们还有几年遭受到天灾的影响。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据地的物质条件确是异常困难的。但是树藩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教育我们的部队坚决战胜困难，奋勇前进，以达到争取最后胜利的目的。他通过各级政治机关号召部队采取节衣缩食、参加生产、实行劳武结合、保卫群众耕种和收获等各种措施，自力更生，克服了种种困难。树藩同志自己在过去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被阶级敌人夺去了左臂，他的残废的躯体每逢天气变化时，就会感到十分不舒适。但他仍忍受着这种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坚持繁重的工作。他又患有胃病，需要吃容易消化的食品，但是当时的机关和部队大多是以黑豆、树叶为主食，要想弄点小麦面粉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只能勉强弄些棒子面窝窝头，切成薄片烤焦后作为他唯一的食品，来支持他久经胃病折磨的躯体，以继续坚持工作。他的这种坚毅不拔的克服困难的精神，给部队以良好的影响，以致所有部队也能顽强地战胜所遇到的困难，完成党和人民所给予的神圣任务。从以上几点可以清楚的看到树藩同志的优良品质和高尚风格的一般，也可看到他那固有的工人阶级本色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些，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作为我们的榜样。

注 释〔1〕蔡树藩(1905—1958年)，湖北汉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做青年团和工会工作，1927年赴苏联学习，归国后任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九军团、第三十军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附 录：

李 达 同 志 生 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顾问李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7月12日19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李达同志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时就开始给地主打短工，饱受凌辱。后来先后考入西安市私立东道中学和省立单级师范学校。其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考入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排长、连长。1931年12月，李达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兼团长、第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红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他率军团部分部队，几经辗转，冲出重围，与贺龙同志所率第二军团胜利会合。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参加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达同志任援西军参谋长，为接应突围的西路军部队，作出了积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达同志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后兼太行军区司令员。他跟随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率领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战法，先后在长生口、七亘村等地重创日军。随后，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第一二九师，转战晋冀豫、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精心制定作战方案，部署战役，事必尽责。他作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主要助手，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反六路围攻、反九路围攻、开辟冀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1942年夏季反“扫荡”、沁源围困战、安阳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残酷围攻、“扫荡”，及其“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在平汉战役中，他受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之托，到国民党军新八军与军长高树勋商定该部起义事宜，最后促成了该军的起义。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李达同志辅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先后进行了陇海、定陶、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皖边等战役。随后，他又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部队转战豫北地区，举行局部反攻，支援和配合山东、陕北两个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部突破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之后，又跨越黄泛区，战胜敌人的多次追堵，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政权的腹心地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在大别山区斗争的日子里，他日夜坚守岗位，亲自掌握各纵队反围攻的情况，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组

织实施。在淮海战役中，李达同志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与邓子恢同志一起，组建各级支前司令部和指挥部。他组织部队，迅速修复了铁路、公路，把作战急需的物资及时运往前线，把伤员护送后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此后，他又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随后，在贺龙等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同志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并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后，李达同志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8年，他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为发展军事体育作了开拓性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达4年之久。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7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他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期间，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指示，主持制定修改条例条令，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经常率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检查军事训练落实情况，解决基层实际困难，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李达同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当选为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李达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表现了一个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贞不渝，百折不挠；他胸怀宽阔，不计名，不居功，任劳任怨，在各级参谋长位置上工作几十年，颇有建树，堪称参谋人员的楷模；他身经百战，勇猛顽强，机动灵活，功勋卓著，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和组织领导能力；他对同志满腔热情，战争年代为了首长的安全，舍生忘死，临危不惧，和平时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他始终保持我党优良传统和老红军本色，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不要特殊照顾；他要求子女十分严格，亲笔写下了《勉致儿女们》的长诗，殷切教诲，感人至深。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李达同志退出工作岗位和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他衷心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他壮心不已，严肃认真地撰写大量战争回忆录，为党和军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的《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和两论《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等，被誉为名篇。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实践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他的崇高品德和卓著功勋，将永载史册。李达同志永垂不朽！

编 后

李达同志在 60 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写过不少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而且如实记叙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等杰出军事家的指挥艺术，并研究探讨了我军参谋业务积累的丰富经验。把这些文章编集成书，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的建设，是一定会裨益的。1991 年 1 月，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经过两年努力，收集到李达同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署名文章、讲话等 80 余篇，从中选取了 60 篇编入《文选》。在编排顺序上，是以其每篇文章所述战斗、战役或其它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而不单是以写作时间的早晚为序，例如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尽管是最近几年才写的，但也将其编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李达军事文选》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同志为《文选》题了词；薄一波同志为《文选》题写了书名；宋任穷同志作了序。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军事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成都军区档案馆、新疆军区档案馆提供了历史资料；总参工程兵部的王晓建同志协助搜集资料，并撰写了题解和注释，在此，也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

1993 年 10 月 12 日

